序　一

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区域发展问题特别是区域经济发展问题成为各级政府决策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成为学术界和社会所关注的重大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在这种背景下，愈来愈多的来自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的学者开始从事区域发展问题研究。其中，以部分经济学家为主体的学者，建立了我们中国的区域经济学。目前，这门学科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这套以郝寿义教授所著的《区域经济学原理》为核心的“区域经济学丛书”参考了诸多的前人研究成果，着重在基础理论的高度上，阐述区域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主要议题，提出了较多的真知灼见，在我国已经出版的区域经济理论著作中，本丛书具有新颖、系统和深入的特色。

我是从经济地理学角度进入区域发展问题研究的。在我国，地理学家和经济学家等已经开始共同关注区域发展问题。在地理学家、经济学家都认为区域发展研究极端重要，并纷纷投入到这个领域中来的时候，了解这其中的科学问题是非常重要的。经济地理学和区域经济学这两个学科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可以说基本相同。胡佛（Edgar M. Hoover）和杰莱塔尼（Frank Giarratani）在他们的著作《区域经济学导论》（郭万清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2 年版）中论述了区域经济学的性质和发展过程。在第一章“绪论”中，他们对区域经济学下了定义：区域或“空间”经济学可以归纳为这样一个问题：“何事在何地，为何，以及应该如何？”第一个“何事”涉及每一种经济活动，“何地”是指与其他活动有关的区位，涉及诸如毗邻、集中、分散、空间模式的相似性与差异性等问题。他们认为区域经济学家和经济地理学家的偏向已经基本解决了。近年来在我国，许多方面的人士都在研究区域问题和区域经济发展问题。不管什么人也都可以谈论区域经济发展问题了。其中有许

多不了解区域经济的人士，也发表过诸多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区域发展规划及理论问题的文章。但是，深入的研究工作主要应由学者们做，这是学者们的责任。当我看到国内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工作者开始重视空间集聚、区域分异等经济地理学和区域经济学的基本命题时，我的感觉是十分欣慰的。这套丛书的出版，再次使我感受到这一点。

本丛书的核心成果《区域经济学原理》作为一本区域经济学者的理论研究著作，在主体内容结构上，包含了区域经济发展的要素禀赋、区域经济发展动力机制和区域发展中社会经济要素空间结构及其演变两大组成部分。在这两个主体部分之下，又包含了现代区域经济学家的主要理论领域，如均质空间和非均质空间的划分，要素禀赋的空间分析，区位、区位选择与集聚经济，集聚经济与经济区的形成，区域经济发展及其不平衡，区域经济的自组织功能，区域治理等。因此，在内容结构上，系统性和理论性均比较强。应该说，该书概括了区域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和新的领域。作者对国内外这个领域的发展有清楚的分析脉络和理解，也具有自己的评价。该书还在一定程度上结合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例如，将地理要素差异和环境特点作为非经济因素用于对区域发展的评价；针对不平衡问题，分析区域经济发展的周期演变规律，揭示了不平衡发展的内在机制，探讨了协调发展的路径，也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问题。

在分析要素禀赋时，该书强调了先天的自然要素和环境状况作为经济性要素对于经济活动的影响，作出了很客观而中肯的论述。作者认为这些要素属于非经济性要素的基本范畴。我相信，经济地理学家也是同意的。

该书作者郝寿义教授提出了“均质和非均质”相结合的统一的空间分析方法，认为经济学中只是强调均质空间而不考虑现实空间（区域）中的种种差异因而无法解释真实的经济事象。而地理学中强调空间的非均质特征，又难以解释经济区域的形成。针对两者发展的“困境”，作者认为加强区域要素禀赋的空间分析的研究就可以实现这种统一。

在关于区位理论和区域发展理论的关联方面，作者认为，区位理论是关于经济要素的区位选择，区域发展理论是关于经济要素在区域内的集聚规模和集聚形态的理论，同时还涉及产业结构及产业之间的相互关联等内容。实践中它们之间的关系往往很少被解释得很清楚。本书作者提供了研究这种关系的范式和框架，在两者结合的基础上构建了区域形成理论。

关于集聚和区域经济的发展方面，作者重点对集聚的效应进行了分析。提出和解释了集聚过程的三种效应，即流入效应、乘数效应、流出效应。借此揭示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阐述非常深入，很有启发。

作者认为，在研究区域发展问题时，需要进行社会经济要素的空间结构的研究。这也是影响经济活动的因素。关于空间结构和中心城市的形成等问题的论述也给人以新的启发。

最后作者强调了区域治理问题。阐述了在市场失灵情况下，政府在区域政策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提出了制定和实施区域政策的重要性，并认为区域治理方面的研究可能构成区域经济学者研究区域问题的归宿。

这套丛书系统地阐述了当代区域经济学的主要议题，有相当部分是对西方学术成果的评述。中国的自然资源基础、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管理体制等与西方发达国家差异较大，必须寻找符合我国发展实际的研究对象和目标，确立相应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学者们最为关注的是各种理论和方法如何在研究中国的发展问题中加以运用，同时结合中国的实践发展新的学术思想和观点。当然，学者们关注的科学问题的本质是相通的。因此，我们非常需要了解国际同行工作的发展、创新和学科发展的前沿。

无论是区域经济学者还是经济地理学者，都非常重视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在面对这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时，学者们既要具有坚实的理论知识，也要有丰富的实践知识。如何看待中国区域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有些因素的影响不是人的努力所能改变的。本丛书阐述了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基础和特征，以较大的篇幅论述了如何度量区域发展的不平衡，非常有理论意义。我们认为，区域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是正常的，平衡是相对的。

我们中国，各地区的发展基础和发展潜力差异很大。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区域发展的实践非常丰富。在国家的宏观层面上，不同时期的区域发展战略方针经历了大幅度的演变，如区分沿海与内地，一二三线的划分及三线建设，沿海地区发展战略，三个地带发展战略，协调发展战略等等，以及“西部大开发”、“东北地区振兴”、“中部地区崛起”等。如何认识、评价这些大区域发展战略和方针？哪些可以看作是“问题区域”？区域政策和管制措施如何？在中观和微观尺度上，区域分工、区域优势和特色产业、区域之间的联系与区域之间的竞争力等，都是学者们需要去研究的。

应该提倡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交叉和融合是发展学科的重要途径。在我国，无论是区域经济学家还是经济地理学家，尽管各自工作的特点不同，考察问题的视角有异，但不妨碍他们在同一平台上就共同的对象进行观点的交流。对于一系列前沿领域和重要议题，他们彼此的看法有分歧，但并不是以专业和学科为基础的。这可能是一种追求真实的科学精神。

我强烈地感到，我国区域经济学者和经济地理学者都需要学习理论著作，了解区域经济学这个学科理论思想的发展态势，提高对实际区域经济问题的分析能力。从三到五年的尺度考虑，无论多么忙，也应该看书。如果在忙了几年后同时认真读些优秀的方法论著作，并进行一番认真的思考，那就一定会感到有很大的收获：视野开阔了，理论水平进了一步。这是我多次得到验证的体会。十多年来我国在区域经济学、经济地理学、区域发展研究、产业集群研究、城市体系及大城市都市区研究、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等等方面，已经出版了大量的著作。我们等待不断有新的理论著作问世。我们处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大背景下，剧烈的社会经济变革，使全球的和国家的以及区域的经济发展问题层出不穷。生机勃勃的区域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发展的空间极为开阔。

感谢本丛书作者郝寿义教授及其研究团队的辛勤工作。他们在研究和教学工作任务很重的情况下，以极大的热情和努力撰写了这套好书。

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

中国科学院院士

陆大道

序　二

区域经济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说它古老，是因为早在1826年，德国著名经济学家杜能就已经关注和研究空间经济问题；说其年轻，是与微观经济学等经济学分支相比，区域经济学至今仍未形成一个成熟的、被多数学者认同的分析框架。在中国，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伴随着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浪潮，各种区域问题大量涌现，研究新形势下的区域经济问题成为摆在我国学者面前的现实课题。正因如此，我国的区域经济学研究在近三十年来得到了迅速发展，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尽管如此，我们不应忘记中国区域经济学仍处于发展中阶段，特别是基础理论的研究相对不足。

南开大学郝寿义教授率领其研究团队，长期致力于区域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充分发挥并依托南开大学“985工程”区域经济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这一平台，持续追踪、把握国际研究最新脉络，结合区域经济发展实践，推出了这套“区域经济学丛书”。该套丛书以《区域经济学原理》为基础和核心，以另外五本著作为支撑和扩展，共同形成了一个结构严谨的整体分析架构和学科体系，其注重理论性的特点非常突出，是近年来国内区域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方面难得的成果。

我想借这套丛书出版之际，就该套丛书谈些自己的看法。我认为，丛书所体现的新的分析研究框架与大量原创性理论亮点是其最大的特色，下述几点尤其值得肯定。

一是，均质空间与非均质空间有机统一的分析理念，科学地吸收了经济学和地理学的相关研究成果。在我国，区域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由于研究内容的部分重合性，经常存在一些学科间的争议与讨论。如何科学、合理地结合彼此的研究优势，努力分析和研究中国区域经济问题，是很多学者关心的话题。郝寿义教授

带领其研究团队，敏锐而准确地抓住了空间问题的本质，提出均质与非均质对立统一的分析理念，并从要素、要素禀赋等微观基础出发，提出了一个较为完整、合理的区域经济学分析框架，这对于我国区域经济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二是，以区位为逻辑起点，向经济区域演化的路径分析，是重要的创新。区域经济学起源于对区位问题的研究，并以区位理论作为其理论基础。遗憾的是，作为理论基础的区位论如何融合到区域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却一直未能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从区位选择到经济区域形成的机理和路径研究，始终是区域经济理论研究的一个难题。以《区域经济学原理》为核心的这套丛书，将聚集经济和经济功能区引入这一问题的分析中，通过标准的经济学术语，为我们诠释了从区位到经济区域演化的完整路径，亦为该套丛书构建新的区域经济理论框架，奠定了重要基础。

三是，区域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具有新意。现有的对区域经济发展问题的分析与研究，大多套用发展经济学等经济学其他分支学科的理论和工具。例如，分析区域经济增长的时候，往往沿用宏观经济学的增长模型，辅之以一些区域经济发展规律；在分析区域经济产业结构的时候，套用产业经济学的分析理论和工具；而对区域空间结构问题的研究则自成体系。很显然，现有的对于区域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还没有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经济发展理论。该套丛书试图在这方面作出有益尝试，将时间和空间因素有机结合，提出了时空结合的区域发展观，并在此基础上就区域经济发展的循环规律进行了深入分析，揭示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与动力机制。同时，也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问题进行了分析，指出协调发展一方面需要考虑人与自然的和谐；另一方面要注重区域间的社会福利的均等化。上述创新性的理论探索，值得充分肯定。

四是，区域主体的研究对于构建区域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具有重要意义。微观经济学针对微观个体行为进行研究，是经济学科体系中相对最完善和严谨的分支。反观我国的区域经济学研究，大都是从区域问题到区域问题的对策式分析，这种分析对于认识区域问题是有益的，但由于缺乏对微观主体利益的分析作铺垫，使对策研究往往显得“苍白无力”。以区域微观主体利益的分析为基础，揭示区域演化和发展的微观机理，将有助于区域经济学建立自己的微观基础。丛书中有关区域主体与空间经济自组织的分析，吸收了新经济地理和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成果，从区

域主体及主体行为的视角，探寻区域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对于推进学科向成熟方向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这套以《区域经济学原理》为核心的“区域经济学丛书”，一方面突出系统性，重视经济学方法和方法论的使用；另一方面，兼顾前沿性和应用性，落脚于现实区域经济问题的解决，是对推进我国区域经济学学科的建设、发展、成熟有着积极作用的高水平的学术著作。丛书可用作高等院校区域经济学及相关学科的研究生教材，也可作为区域经济研究工作者的重要参考性著作。该套丛书是南开大学“985工程”区域经济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科研人员的第一批研究成果，衷心祝愿作者们今后有更多、更新的成果问世，贡献于我们伟大的时代。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序　三

区域经济学，又称为区域科学、地域经济学、地区经济学、区位经济学、空间经济学、地理经济学，是一门关注“空间”的经济学分支。尽管几乎每一个区域经济学家或每一本区域经济学教科书都有自己关于这门学科与众不同的定义，但归纳起来，我个人认为无非可以分为描述性和分析性两类。从描述角度讲，区域经济学是关于满足人的自身需要、有目的的人类空间活动的经济学分支；从分析角度讲，区域经济学研究社会如何管理它的稀缺空间配置。“空间配置”即“空间组织”，是指在各种竞争性用途间安排稀缺空间使之具有一定系统性的行为或过程，包括企业、家庭/个人、公共部门的区位选择，以及这些选择对社会资源空间配置方式的决定。因此，我们也可以进一步将区域经济学定义为研究企业、家庭/个人、公共部门如何进行区位选择，这些选择如何决定社会资源的空间配置方式以及空间配置方式变化的后果。根据我个人的观察，自 1826 年德国古典经济学者杜能（J. H. Von Thünen）发表《孤立国》以来，区域经济学在理论和实践上经历了前艾萨德（Walter Isard）（1826 年至 20 世纪 40 年代）、艾萨德（20 世纪 50 年代至 80 年代）和后艾萨德（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三个不同时期。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前，受苏联影响，我国结合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发展了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生产力布局学。从原则和方法讲，生产力布局学在宏观上强调均衡抑或不均衡发展的选择，在中观层次强调地域生产综合体，在微观上强调生产布局最大限度地接近原料地、燃料地和消费地。然而，随着改革开放，传统的社会主义生产力布局理论和方法越来越不适用新的不断市场化的经济，于是，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从介绍西方区域经济学前艾萨德、艾萨德时期的经典区位理论、区域经济分析方法起步，我国的区域经济学开始逐步发展起来。纵观我国区域经济

学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引进应用、正式建立和前沿创新时期。

20 世纪 80 年代是区域经济学的引进应用时期，也可以称为从生产力布局学向区域经济学转型的时期。其基本特点是，虽然在宏观上转而强调不平衡发展，但传统的生产力布局理论和方法继续发挥作用。然而，一方面，由于深受计划经济影响，以及 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初对“生产关系决定论”的彻底批判，当时生产力布局学几乎完全无视改革过程中生产关系变化对空间配置的影响，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以计划经济世界观和方法论观察、分析体制转轨条件下的空间配置及其后果，失去了对我国体制转型过程中提出的新的区域经济问题的敏锐观察和研究，难以满足实践对理论研究的需要。另一方面，当时中国的生产力布局学主要停留在分类描述及政策构想上，经济分析十分薄弱，其成果难以令人信服。为了弥补传统理论和方法的不足，随着改革开放，区位论、区域经济分析方法等区域经济学内容开始被翻译介绍到我国，如沃尔特·艾萨德的《区域科学导论》、埃德加·M. 胡佛的《区域经济学导论》、哈利·W. 理查森的《区域经济学概论》、巴顿的《城市经济学理论和政策》、沃纳·赫希的《城市经济学》，以及陈振汉、厉以宁的《工业区位理论》、杨吾扬的《区位论》、周起业的《区域经济学》等关于西方区域经济学的研究著作。与此同时，把西方区域经济学理论和方法与我国实践结合起来的理论与政策研究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迅速发展起来，并取得了较丰富的成果，如拙著《中国区域发展研究》。然而，这个时期，我国的区域经济学并没有取得正式独立的学科地位，而是依附于经济地理学、生产力布局学以及国民经济学。

20 世纪 90 年代是我国区域经济学的正式建立时期。作为一门正式的学科，中国区域经济学亮相于 90 年代，这有两个重要标志。一是有关区域经济学的学术团体成立。1989 年著名经济学家孙尚清、著名生产力布局学家陈栋生发起成立了中国区域经济学会。1991 年在著名经济学家马洪、孙尚清、吴树青，著名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吴传钧、陈述彭、陆大道，著名地理学家陈传康、杨吾扬、胡兆量、胡序威、李文彦，著名生产力布局学家刘再兴、杨树珍，著名城市规划专家邹德慈以及现代西方区域经济学之父瓦尔特·艾萨德(Walter Isard)，区域经济学大师玛纳斯·恰特季(Manas Chatterji)、阿朗索(William Alonso)、马丁·贝克曼(Martin J. Beckmann)、藤田昌久(Masahisa Fujita)等一大批国内外学者的支持下，我在北京大学组织成立了我国区域经济学的旗帜性全国学术团体——中国区域科学协会(RSAC)。1993 年又在北京大学组织召开了发展中国家区域科学国际

会议，并以北京大学为依托主办了区域科学国际高级研讨班，上面提到的各位西方学者均与会并在研讨班上讲授了区域经济理论和方法。二是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位专业目录调整，区域经济学正式成为应用经济学的二级学科，从此区域经济学硕士、博士点在全国许多高校建立起来。在这一时期，适应区域经济学不同层次的教学需要，我国学者相继编写出版了多部区域经济学教材。

2000年以来是我国区域经济学的前沿创新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显著特征是，我国区域经济学界，特别是其中一些研究团队，开始把后艾萨德时期国际区域经济学发展的前沿研究问题与我国的区域经济实际结合起来，开展了大量与国际前沿接轨的自主创新研究。综合考虑学科发展趋势和国家需求，我国区域经济学从现在到未来一段时期内的前沿课题包括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经济集聚。我国区域经济无论在单个城市、城市群的层面上，还是在经济地带的层面上，都表现出明显的集聚趋势，可以说进入到一个大都市圈化和新一轮沿海沿长江化的阶段。如何定性定量地描述这种经济集聚？经济集聚的机理是什么？经济集聚与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的一体化、全球化的关系如何？经济一体化、全球化对于不同产业集聚的影响有什么差别？经济集聚如何影响区域差异的变化？经济集聚与经济增长是什么样的关系？经济集聚与环境可持续性的关系怎样？如何利用和管理这样一种经济集聚？这是我国区域经济学理论与实践面临的第一个前沿性课题。

第二，促进落后地区发展，缓解区域差距。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差距越来越大，现在已经达到了美国等西方国家历史上区域差异最大时的水平。鉴于这种形势，我国已在1999年、2004年、2007年先后启动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以及促进中部崛起的战略。那么，在市场化、一体化、全球化条件下究竟应如何有效促进落后地区的发展？过去我们主要通过各种优惠政策向目标地区转移资源来实现地区发展的目标。随着国民经济的市场化、一体化、全球化，这种模式的局限性日益暴露出来，所以，进入“十一五”规划时期以来，促进地区发展的中心环节开始转向提高区域竞争力上来了。那么，什么是区域竞争力？怎么定量地描述区域竞争力？区域竞争力是由什么决定的？如何提高区域竞争力？谁来提高区域竞争力？OECD国家的区域政策在20世纪90年代就进行了类似的转移，即从以区域间资源分配为中心转向以提高区域竞争力为中心，在这方面进行了许多理论和实践上的探讨。借鉴

OECD国家的区域政策理论和实践，探讨以区域竞争力为中心，促进落后区域发展，缓解区域差距，是现阶段我国区域经济学的前沿性课题。

第三，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空间成长管理。随着经济发展，我国资源和环境的压力越来越大，节能降耗减排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和政策的重大取向。如何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出发，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地、高度有效地进行空间成长管理，有效地实现我国城市和区域的“聪明增长”（smart growth），国家“十一五”规划提出了“主体功能区”的主张，目前我国正在开展全国和省市自治区两个层面的主体功能区划，这是实现我国城市和区域的“聪明增长”的重大举措。但是，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空间成长管理，无疑仍然是我国区域经济学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即使主体功能区划也存在诸如最小空间单元选择、区划原则和指标以及不同类型的主体功能区的政策等一系列问题。

第四，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的新型城市化。直到20世纪90年代，我国的城市化方针是“控制大城市，发展中等城市，大力发展小城市”。20世纪80年代以来开始推动农村城镇化（rural urbanization），进入“十五”时期，城市化方针开始转型，《“十五”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纲要》提出，推进城镇化要遵循客观规律，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发育程度相适应，循序渐进，走符合我国国情、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多样化城镇化道路，逐步形成合理的城镇体系。为了避免单个城市无节制的扩张所带来的各种“城市病”和分散城市化的规模不经济，最大限度地获取经济集聚的好处，我国“十一五”规划提出要推进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的城市化，我称之为新型城市化。如何对城市群进行定性定量的描述？城市群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什么因素影响中国城市群的发展？这些因素怎样影响城市群的发展，又如何促进城市群的发展？这些显然是新型城市化给我国区域经济学提出的重要的理论和实践课题。

第五，区域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机制的设计与选择。为了实现我国区域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十一五”规划提出建立健全四种区域协调发展机制，即全国统一的市场机制、区域合作机制、区域互助机制以及中央扶持机制。这些机制的设计和公共选择涉及众多的政治经济因素，对此进行持久的深入、系统研究，发展区域的新政治经济学以及经济机制设计理论和方法，是我国区域经济学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

第六，空间整合模拟。目前，我国的区域土地利用、城市、交通、环境、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各自为战，矛盾非常突出。为协调一致，近些年来，国家发改委开始探索所谓土地利用规划、城市规划和经济社会规划“三规合一”的方法，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现在不再提“三规合一”而改提“三规融合”。在我个人看来，不论是“三规合一”还是“多规融合”，都不仅仅涉及体制问题，也涉及有没有相应的技术支持系统——空间整合模拟系统。我国的区域经济学者已经开始注意这方面的研究，并在空间经济建模理论和方法，如基于元胞、多智能体等复杂性理论和方法的建模理论和方法，以及空间经济演化的计算实验理论和方法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总体来讲，迄今为止在这方面我们基本上还属于空白。

以郝寿义教授的新著《区域经济学原理》为核心的这套“区域经济学丛书”立足于我国区域经济学发展前沿，借鉴国际区域经济学研究成果，对区域经济学的原理进行深入、系统的阐述，可谓应运而生、弥补不足。总而言之，我认为这套“区域经济学丛书”在以下两个方面作出了十分有益的探索和贡献。

首先，尝试构建了区域经济学内容体系。由于区域经济学在我国发展较晚，同时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许多高校的区域经济学专业都是“打包”其他相关学科而建立起来的，相当一部分师资是由其他专业直接转行过来的，缺乏应有的区域经济学专业训练。因此，尽管我国撰写和出版了大量不同层次的区域经济学专著和教材，但迄今对区域经济学的范围和内容仍是众说纷纭，尚没有比较统一的认识，区域经济学尚给人某种程度的“大杂烩”之感。这是区域经济学不时为人诟病的地方。这大大制约了区域经济学科在我国的发展。本丛书从均质与非均质空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入手，从微观到宏观，从区域经济分析到区域治理，对区域经济学原理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形成了一个具有内在逻辑的区域经济学内容体系。这可为区域经济学理论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范式。

其次，对区域经济学基础理论中的核心问题进行原创性分析。近些年来，作为我国区域经济学的杰出研究团队之一，郝寿义教授领导的研究小组对我国区域经济学的一些前沿课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系统探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本丛书基于这些研究，较系统地体现了区域经济学的前沿进展，进一步指出了均质空间和非均质空间的有机统一关系、区位和区域理论的逻辑关系，尝试构建了有关空间、区位选择与聚集经济关系的理论，有机结合时间因素和空间因素的区域发展理论与模型，以及区域主体概念和区域边界理论，在一些重要的区域经济学问题上取

得独到的认识。

经济学有一条基本原理：需求能够创造自身的供给。本丛书高屋建瓴、钩深致远，既自成一体又富于创新，她的问世，再一次验证了这条基本原理。作为一名区域经济学者，我十分乐意向广大区域经济理论与实际工作者推荐这套丛书，并祝愿本丛书与读者们一道开启我国区域经济学不断发展的新纪元！

中国区域科学协会会长

北京大学教授

序　四

区域经济学，本质上属于空间经济学的范畴。研究资源的空间配置和关注“何地”、“为何”是空间经济学的特点，而如何描述经济空间则是空间经济研究的重要逻辑起点。在经典的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框架中，由于无法包容运输成本和收益递增特征，经济空间被视为一个均质体抽象掉了。很多经济学家据此认为，区域经济学根本无法融入主流经济学。研究均质空间、沿用规模收益不变假设，使得区域经济学长期以来难以取得重大进展和突破。而作为地理学分支的经济地理学，从非均质空间入手，融合了地理学和经济学的相关研究方法，在近些年获得了快速发展。如何吸收并创造性地运用相关研究成果，促进区域经济学理论体系建设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作为应用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必须能够有效解决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实际问题，并通过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践获得自身进一步的理论发展。在国内，区域经济学的已有研究成果大多偏重于中国区域经济的实际问题与对策研究。由于理论基础相对薄弱，区域经济学呈现出理论严重滞后实践的现象。这种状况不利于区域经济学作为一个学科的理论建设，也不利于增强区域经济学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和指导力。

因此，构建适应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同时与国际经济学研究前沿接轨的区域经济学分析框架，是摆在我们理论工作者面前的重大课题。长期以来，南开大学的郝寿义教授及其研究团队一直致力于区域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他们高度关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践，重视将实践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和表象进行理论抽象、提炼和深入研究；密切注视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区域经济理论研究带来的深远影响；努力追踪并掌握国际研究最新脉络；潜心研究近十年，终于完成了呈现

在读者面前的这套“区域经济学丛书”。

多年来，我始终关注着这套丛书的研究工作，并且有机会多次参加有关的学术讨论，因而比较了解问题的提出、研究和解决的全过程；同时，我也是该套丛书初稿的最早阅读者之一。郝寿义教授及其研究团队勇于开拓创新、严谨求实和锲而不舍的治学精神，以及取得的高水平成果，使我深受鼓舞，获益良多。下面，我想就这套“区域经济学丛书”在理论上的突出贡献谈几点看法。

第一，《区域经济学原理》一书形成了一个新颖、完整的分析框架。

该书将区域经济学研究的空间属性界定为均质和非均质的有机统一，一定意义上平息了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关于这一问题的长期争论。对于均质和非均质有机统一的基础，《区域经济学原理》一书从挖掘和深入理解斯密的经典理论中获得启示，将要素禀赋作为联系均质和非均质的纽带，构建了一个严谨、完整的全新分析体系。该框架的构建既联系了中国区域及国际发展的实际，又以坚实的理论演绎为基础，其成果必将在区域经济学研究中起到重大的积极作用。

在我国的经济学科体系中，区域经济学既是成长快的，也是不成熟的。虽然目前国内已经出版了多本区域经济学专著和教材，但它们的研究内容、体系和方法却存在明显差异，区域经济学缺乏统一的研究语言和研究范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反观微观经济学，无论何种场合，大家都使用统一、规范的语言和共同的分析框架来探讨问题。没有统一的研究语言和研究范式，不同学者之间就难以展开有效的交流。该套“区域经济学丛书”，吸收了国际上区域经济学、城市经济学、新经济地理学的先进研究成果，构建了一个从区位到区域形成、发展且具有微观基础的分析框架，这对于我国区域经济学研究语言和范式的统一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二，从区位到区域的理论演绎具有原创性和突破性。

区域经济学起源于区位理论，而其核心研究对象则为区域，区位和区域之间存在怎样的关联是区域经济学长期未能解决的难题，理论基础和研究内容的“两张皮”现象一直困扰着区域经济学的发展，这也是构建内在逻辑一致的分析框架的重要障碍。《区域经济学原理》一书提出了从区位选择到聚集经济，再到经济功能区，最后演化出经济区域的这一全新分析路径，并用规范的经济学分析工具和语言进行了深入研究。

第三，对于探寻区域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具有重要意义。

区域经济学一直就被缺乏微观基础而困惑着，区位选择理论像是微观经济学

的分支，而区域经济活动的空间组织与分布则又像宏观经济学。在现有的区域经济学研究中，区位理论往往只是作为区域经济分析的背景理论，难以发挥其空间经济学基石的作用。区位理论与区域经济理论之间存在严重的脱节。《区域经济学原理》从区位概念的重新界定入手，探讨非均质空间条件下的区位选择模型，进而分析区位主体行为导致的区位聚集问题，构筑全新的“经济功能区”概念，搭建了区位理论与区域经济理论之间的桥梁。在这一路径的实现过程中，《区域经济学原理》深入探寻了区域经济学的微观基础，重视对经济微观主体的分析和研究，这将对我国的区域经济学研究和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第四，区域治理的研究把握了国际最新前沿。与以往的区域经济学教材和著作不同，《区域经济学原理》一书的落脚点不再是区域经济政策，而是针对区域治理进行了深刻分析，这种转向代表了未来区域经济研究的最新趋势。该书提出了区域主体及其空间行为这一新的研究领域，而区域治理恰是对多区域主体行为互动的一种体现。区域治理强调不同区域主体权益的交互作用，既包括了制定区域政策的政府行为，也涵盖了其他区域主体的作用和行为。

《区域经济学原理》这部著作在深刻把握区域经济问题的症结所在的基础上，构建了大量原创性理论，这对于我国区域经济理论的研究具有填补空白的作用，也体现了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力与赶超国际学术前沿的勇气和努力。就我对国内外区域经济学研究现状的了解与判断，该成果不仅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在国际上也处于领先地位。

特别要提到的是，这一套“区域经济学丛书”以《区域经济学原理》为纽带，与其他五本著作相互支撑、有效衔接，浑然一体地共同构建了一个崭新的区域经济学研究体系。这种做法也是一次很有意义的创新。令人欣慰的是，今年 4 月在南开大学组织召开的《区域经济学原理》研讨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知名专家和学者对该项研究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获得学术界认可，这是对作者最好的回报。

该丛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对国际上的前沿理论进行了全新的梳理和反思，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具有前瞻性、创新性，理论上有深度，对解决现实区域经济问题有借鉴作用。对于我国区域经济学、经济地理学等相关专业的硕士与博士研究生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也可供区域发展战略研究、规划等机构和人员参考。

国际区域经济理论研究越来越体现出多学科的交叉性，主流经济学和经济地

理学在解决区域问题的过程中找到了很多共同的兴奋点，不同学科如何有效互动、协作，共同解决中国区域经济问题是本套丛书进行的一个尝试。作者们试图构建一个能够包容相关学科的区域经济学分析框架必然涉及诸多复杂问题，这一探索不可能一蹴而就。另外，面对很多实践问题，应用经济学研究还应该接受实践检验并反复修正。因此，本套丛书的继续研究还有很长、很艰难的路要走。

我想，通过该套丛书的问世，引起国内更多学者的关注和研究，共同致力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经济理论研究体系，才是出版本套丛书的最大意义所在。

中国城市经济学会顾问
南开大学教授
慕孝箴

目　录

导论……1

第 1 章　均质与非均质空间分析……13

1.1　**空间问题与经济学**……13

1.2　**均质与非均质空间的含义**……22

1.3　**传统空间分析路径的特征与局限**……26

1.4　**经济空间——均质与非均质的有机统一**……35

本章小结……39

思考题……40

参考文献……40

第 2 章　要素禀赋与经济空间……45

2.1　**斯密的要素禀赋观**……45

2.2　**要素和要素禀赋**……52

2.3　**要素禀赋与空间分析**……57

本章小结……62

思考题……62

参考文献……63

第 3 章　区位……65

3.1　**区位与区位理论**……65

3.2　**基于要素禀赋的区位内涵和特征**……71

3.3 要素禀赋与区位变迁……81
3.4 区位差异与区位主体偏好……85
本章小结……94
思考题……94
参考文献……94

第 4 章 区位选择与聚集经济……96
4.1 从区位选择到聚集经济的演绎分析是区域经济学的重要微观基础……96
4.2 均质空间下从区位选择到聚集经济实现的路径……99
4.3 聚集经济的微观机理——一个非均质空间下的区位选择假说……113
本章小结……121
思考题……121
参考文献……122

第 5 章 聚集经济、经济功能区与经济区域形成……124
5.1 经济功能区……124
5.2 要素禀赋、聚集与经济功能区……127
5.3 经济区域形成……134
5.4 经济功能区裂变与经济区域空间结构演进……142
5.5 经济区域特征及其边界……149
本章小结……151
思考题……151
参考文献……152

第 6 章 区域经济发展……154
6.1 区域经济发展的内涵与本质……154
6.2 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与动力机制……157
6.3 区域经济发展模型……169

6.4 区域经济发展的循环规律……177
本章小结……188
思考题……188
参考文献……189

第 7 章 区域经济的不平衡发展……191
7.1 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的概念、特征与衡量……191
7.2 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的内在动因……203
7.3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理论的窘境与反思……209
7.4 要素适宜度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211
本章小结……215
思考题……216
参考文献……216

第 8 章 区域主体与空间经济自组织——基于厂商和居民的分析……223
8.1 区域主体及其特征……223
8.2 区位主体与区域主体……229
8.3 区域主体经济活动的自组织——基于厂商和居民的分析……235
8.4 空间经济自组织诱致的区域经济一体化……250
本章小结……255
思考题……255
参考文献……256

第 9 章 区域主体与空间经济自组织——基于地方政府的分析……258
9.1 福利型地方政府与空间经济自组织……258
9.2 经济人地方政府与空间经济自组织……266
9.3 双目标地方政府与空间经济自组织……276
本章小结……280

思考题……280
参考文献……281

第 10 章　区域协调组织与区域治理……283
10.1　**区域政府**……283
10.2　**区域治理**……291
10.3　**区域治理的参与者**……295
10.4　**区域治理的运行分析**……302
10.5　**中国的区域治理分析**……315
本章小结……320
思考题……320
参考文献……321

后记……323

导　论

区域经济学，作为应用经济学的一个重要领域，其理论渊源历史悠久。古典经济学、古典区位理论、古典贸易理论构成了区域经济学的理论基石。经济学、地理学的发展为区域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众多的理论和分析工具。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世界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众多世界性问题的不断出现，区域问题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从而为区域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也为其开辟了十分广阔的实践领域。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带来了更多、更为复杂的区域经济问题，同时也对已有的区域经济基础理论提出了越来越多的挑战。特别是发展中的中国，其经济的快速发展面临着经济转型和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双重任务，区域经济问题更为突出和复杂，这为中国乃至世界的区域经济研究学者深入研究区域经济理论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遗憾的是，区域经济学长期未能纳入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区域经济的理论发展和实践研究相对落后。区域经济学的发展至少存在如下一些问题：

第一，区域经济分析的逻辑前提问题。区域经济是经济学和地理学共同关注的核心课题之一。经济学对于区域经济的研究，通常以“均质空间”为逻辑前提，主要探索均质空间上要素的分布规律及经济主体的空间行为问题；地理学对于区域经济的研究，则以“空间差异”为逻辑前提，主要分析非均质空间上要素和经济活动的分布。区域经济学研究的逻辑前提究竟应该是“均质空间”还是“非均质空间”呢？

第二，区域经济学的核心概念问题。长期以来区域经济学以区位理论为基石，更多地讨论区域经济发展问题、区域规划问题以及区域政策问题等。但是对于概念的认识和理解，学者们则大多根据自己的知识背景和分析问题的需要进行定义。

关于区位、区域这两个区域经济学的核心概念，至今没有形成一个比较统一的共识。

第三，区位理论与区域理论的关系问题。区位理论作为区域经济学的基石，在区域经济分析中却无法真正地融入区域经济学并名副其实地成为其基石。在现有的大量区域经济学文献中，对于如何处理区位理论与区域理论之间的关系，尚没有形成一个相应稳定的理论研究范式和研究架构。

第四，区域经济发展理论问题。区域经济发展是区域经济的核心，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理应构成区域经济学理论的核心部分。但是，目前的区域经济学分析中，对于区域经济发展问题的讨论，往往将区域经济发展划分为“时间维度上”的区域经济增长与区域产业结构问题和“空间维度上”的区域空间结构问题。对于区域经济增长与区域产业结构问题，大多以宏观经济的增长理论、产业结构理论来加以解释；而对于区域空间结构问题，则大多以地理空间结构理论来进行说明。那么，区域经济发展问题有没有自己特有的理论呢？

第五，区域经济主体问题。经济学的分析强调主体行为的分析，但长期以来区域经济分析则很少研究区域主体问题。主体问题研究的缺失，使得已有的区域经济理论解释力不足。其实，区域主体和区域主体行为的研究涉及区域经济学的主要领域，区域主体行为理论更强调区域经济学的微观基础，突出主体间经济行为的联系分析，理应成为区域经济研究所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

第六，区域治理（regional governance）[①]问题。对于区域经济问题的解决，以往主要强调区域政策层面的分析。其实，区域经济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区域经济发展主要是区域主体的空间自组织行为，通常这种空间自组织是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的。但是，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这种市场机制会出现失灵的情况，市场失灵会导致空间经济自组织在空间上资源配置的无效率，表现为空间失灵。这种空间失灵仅通过宏观的区域政策是难以克服的，这就需要一种区域协调机制来加以解决。区域治理则是与空间经济自组织相适应的自主协调机制，因而迫切需要研究区域治理问题。

在对上述问题逐一进行较为系统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本书提出了解决思路和区域经济学分析框架。融合、借鉴经济学、地理学对于空间问题分析的思路和方法，以空间的均质与非均质对立统一为分析的逻辑起点，从要素与要素禀赋出发，

① 国内也有学者把“governance”译为“管治”或“管制”。

构建了区位理论与区域理论相统一的区域形成理论，以及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理论、区域主体和主体行为理论、区域治理理论，这些构成了本书的研究主线和主要内容。值得一提的是，上述每个理论都有专门的研究成果作为支撑，在一定意义上说，本书是对这些研究成果的提炼和浓缩。

具体来说，本书的主要内容包括五大部分。

第一部分，区域经济研究的逻辑前提及“均质与非均质统一”的分析思路。区域经济学研究要素在空间上的分布规律，因此，区域经济研究的逻辑起点应该是对要素及要素禀赋的理解。这一部分，本书从亚当·斯密对于要素的理解出发，回顾了经济学、地理学对于要素及要素禀赋理论的发展，提出自己对于要素及要素禀赋的理解，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基于要素分析的“均质与非均质统一”的空间分析方法，为后面对于区域经济的分析提供一个分析思路和框架。

第二部分，经济区域形成理论。以往的区域经济研究，对于区域概念的理解因人而异，对于区域形成的内在机理及其边界问题，探讨很少。本书在这一部分试图作出两个尝试。第一，对区域经济研究的核心概念——区位、经济功能区和经济区域，逐一进行界定；第二，从区位理论出发，推导出经济区域形成理论，说明经济区域的性质，进而建立区位理论与区域理论有机融合的一体化理论体系，使得区位理论名副其实地成为区域经济理论的基石。

第三部分，区域经济发展理论。该部分是在第二部分经济区域形成理论的分析基础上，进一步探索经济区域的动态演化机理和规律，主要包括：(1)构建区域经济发展的“时空结合”的内在动力模型；(2)提出区域经济发展的循环规律及周期发展理论；(3)阐述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内在机理，提出“要素适宜度”概念，探索区域协调发展的新路径。

第四部分，区域主体和主体行为理论。与成熟的主流经济学相比，区域经济研究一直以来对于“主体”问题的探讨较少，这是区域经济学不成熟的主要表现之一。该部分对经济区域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主体和主体行为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并从经济区域主体行为出发，探索空间的自组织理论，使其对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许多问题更有解释力。

第五部分，区域治理理论。在以往区域经济学着重探讨区域政策的基础上，本书进一步从区域治理的视角，探索区域经济的协调机制和管理问题。

本书的主要观点有：

一、要素分布规律及空间的均质与非均质统一。

区域经济学研究一定空间范围内的要素有效配置及其空间结构问题。我们在这里强调区域经济学的分析应该从要素与要素禀赋概念出发，进而探讨空间的均质与非均质问题。

本书从亚当·斯密(Adam Smith)对于要素及要素禀赋的理解出发，寻求要素与要素禀赋理论的内涵。要素禀赋(factor endowments)是指一个国家所拥有的资源状况。对于要素的概念，不同的学者则有不同的界定。本书中，我们提出要素可以分为经济要素与经济性要素。经济要素是指直接影响经济行为的要素，其包括资本、劳动、土地、技术、知识、制度等，这些要素都是决定经济行为的主要因素。但是，自然要素和地理特征状况等非经济要素同样会影响和制约人们的经济行为，对社会经济活动产生经济影响。后天的经济要素与先天的自然要素和地理特征状况等非经济要素共同构成了经济性要素。从经济性要素与经济活动的相互影响角度来看，经济性要素影响或者决定经济活动和行为，而经济活动同时影响经济性要素，特别是其中的后天经济要素。经济性要素是动态的，随着经济性要素与经济活动的相互影响，经济性要素不断地增强自己的总量和质量。

要素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体现了聚集与扩散的规律。具体来说：

从时间维度上来看，要素禀赋可分为原始要素禀赋、初始要素禀赋、现时要素禀赋和预期要素禀赋。所谓原始要素禀赋是指特定的地域空间在未有人类活动干预的情况下，各种要素的赋存状态，即特定地域空间纯自然状态下的要素禀赋。原始要素禀赋决定人们最早的区位选择和区域选择行为。初始要素禀赋是指特定的地域空间在给定时点的要素赋存状态。由于不同地域空间的要素禀赋条件的差异，以及人类经济活动开始的时点不同，始于不同时点的要素禀赋之间往往不具有比较意义。因而，初始要素禀赋是进行不同空间要素禀赋比较研究的基础。现时要素禀赋是指特定的地域空间在当前时点下要素的赋存状态，我们通常讲的要素禀赋即指现时要素禀赋，现时要素禀赋是进行区域经济研究的最直接的依据。预期要素禀赋是指经济活动主体对特定地域空间未来时点要素赋存状态的预测或估计，预期要素禀赋对经济活动主体的区位选择和区域选择行为具有重要影响，现时要素禀赋和预期要素禀赋是经济活动主体进行区位与区域选择决策的主要依据。

从空间维度上来看，空间是人类经济活动的载体，任何经济活动都不能离开空间而存在。由于要素在空间上的非均质分布，不同空间点满足人类经济活动的要

素禀赋条件不同，基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选择具有比较优势的空间是经济活动主体的必然选择。单个经济活动主体选择的对象是区位，其经济活动的过程使与其经济活动相关的要素在特定区位上聚集，形成区位要素聚集；在聚集动力的作用下，与占据优势区位的经济活动主体具有密切关联或具有共同的要素需求的经济活动主体将选择与之毗邻的区位，其结果是在特定的空间上由具有共同的要素需求或密切关联的经济活动主体形成经济功能区。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人们的需求是多样的，单一经济功能区无法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因而在特定的经济功能区周边将形成与其功能互补、具有有机联系的其他类型的经济功能区，由多个经济功能区组成功能互补和完善的经济区域。

因此，对于区域经济的分析，我们强调既要考虑要素在空间上的非均质分布，又要考虑在一定范围内要素的相对均质分布。只有这样，才能够完整地分析区域经济问题。经济区域是一个均质与非均质空间的有机统一体，既要分析均质空间的形成规律及其对于经济活动的影响，又要分析非均质空间的形成及其对经济活动的影响。

二、经济区域形成理论。

区域经济学一直就被缺乏微观基础而困惑着，区位选择理论像是微观经济学的分支，而区域经济活动的空间组织与分布则又像宏观经济学。这种窘境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逐渐被打破。以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派对于经济聚集和区域空间的分异进行了微观分析，为探寻区域经济的微观基础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近十年来，区域经济学越来越重视对区域主体行为的微观分析。

这里，我们尝试构建从区位到区域的一体化理论体系。在现有的区域经济学研究中，区位理论往往只是作为区域经济分析的背景理论，难以发挥其空间经济学基石的作用。区位理论与区域经济理论之间存在严重的脱节。本书从区位概念的重新界定入手，探讨非均质空间条件下的区位选择模型，进而分析区位主体行为导致的区位聚集问题，在此基础上，阐述和发展了“经济功能区”的概念，“经济功能区”将能够有效地搭建区位理论与区域经济理论之间的桥梁。

（一）区位的理解。

长期以来，区位理论与经济聚集之间一直存在着明显的断沟，人们关注经济主体的区位选择问题，也分析聚集经济问题，但是由区位选择如何形成空间聚集的问

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基础理论与核心问题的断裂以及区域经济学缺少微观分析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学的主要困境。从国内的区域经济理论研究看，经济区域的形成常被认为是先验的存在，而这种区域又是通过宏观视野来界定的，经济区域的先验存在也暗含了聚集经济的存在。于是，对于聚集经济的研究往往集中在效应和特征上，而很少涉及聚集经济形成的微观机理。这样，区位选择强调微观主体的空间行为，而区域经济理论则更像宏观经济理论，区位选择理论和区域经济的其他理论形不成有机联系，区域经济学缺乏相应的微观基础。这个微观基础的缺失主要表现在从区位选择到聚集经济路径的阻塞。

基于此，我们在探索经济区域形成理论的开始，首先对区位进行分析和重新解释。在本书中，区位被理解为一种经济空间场。“区位是依托于土地的特定经济空间场的自我维系系统。区位的本质是对经济空间场所承载的社会经济关系的一种浓缩性表征，该表征应该被所有相关的经济行为主体所感知，但是重要性会因人而异，有所差别。这样，区位就以一种自我实施的方式制约着经济行为主体的区位选择，并反过来又被他们在连续的变化的环境下的实际决策不断再生产出来。”区位可以作为一种独特的要素存在，其产出规律不同于一般要素，具有很强的报酬递增效应。

由于要素在空间上的非均质分布，造成了不同区位之间的客观差异。正是这种差异导致不同区位对于不同经济行为主体的吸引力是不一样的。经济行为主体根据其自身的约束条件和区位的客观差异，进行合理的区位选择，这种区位选择的结果与客观的区位之间相互结合，形成了一定的经济功能区。

（二）区位选择、聚集与经济功能区。

本书在回顾研究均质空间条件下聚集的内在机理的各种路径基础上，提出非均质空间条件下的区位选择导致聚集的基本模型，认为在区位概念的界定基础上，对区位这一要素的使用，也存在权衡和机会成本的问题，这种对区位要素的权衡与机会成本的选择导致了初始聚集的空间差异，同时构成了后续聚集的空间约束条件。

在这种对区位选择与聚集的分析基础上，提出区域经济研究中的经济功能区概念。亦即，经济功能区是由同类的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高度聚集，连片分布形成的空间区域。这种功能区一般是以某种经济功能为主，兼有其他功能。由于各种经济活动需要占有或利用一定的地域空间，而地域空间因其附着的要素的差异而

表现为异质性，因此各种经济活动之间必然发生空间竞争，导致各种经济功能区的形成。

（三）经济区域的形成。

在经济功能区的分析基础上，本书提出“同能性的经济功能区存在着等级网络结构，形成经济功能区之间的纵向分解网络结构；而不同能性、相对同等级的经济功能区则通过部门分工、地域分工，形成横向联合网络结构；这种纵向的分解网络结构与横向的联合网络结构是彼此并存，相互重叠的，构成了我们所说的经济区域”。

我们知道传统意义上的区域概念强调的是一种空间，而近年来一些经济学者（特别是一些新兴古典经济学研究者）的概念则强调是一种经济组织。我们认为，这种将区域抽象为一种经济组织，有其科学性和逻辑上的可接受性，但是，却丢失了区域（或经济区域）的概念本身所蕴含的特有的空间内涵。我们不能因为空间内涵不便于清晰的表述，就舍弃这一核心。因为不管怎么说，区域的概念脱离不了“空间”。区域概念不可能，也不应该像“企业”概念那样被无限度地抽象为制度或组织。但是，上述学者对于区域的概念的定义，给我们两点重要的启发。第一，经济学，特别是区域经济学研究的区域，应该是市场自发形成的经济区域；第二，区域经济学所研究的区域具有网络结构和网络性质。

因此，经济区域是由不同种类、不同等级的，具有较强自组织能力、相对独立却高度开放的经济功能区，彼此之间交互作用，形成的一种具有网络特征的经济空间。

在这一定义中，居住区可能是一种经济功能区；商业区可能是一种经济功能区；农村地区也可能归类于一种经济功能区。而且这些功能区可能有其自身的等级性。一方面，每一类经济功能区不同等级构成一种网络结构；另一方面不同种类的经济功能区之间彼此联系，形成另一种网络结构。正是这种不同的网络结构彼此之间的叠加，才形成了相应的经济空间。

这部分对于从区位到区域的内在逻辑关系的推导，形成了经济区域形成理论，为后续的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理论、区域主体与主体行为理论、区域治理理论奠定了基础。

三、区域经济发展理论。

在经济区域形成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本书进一步从动态研究的角度，从时间、

空间及区域间的交互作用等多个层面，探索始于要素禀赋，动力源于要素聚集的区域经济发展规律。同时，对区域经济不平衡和协调发展问题进行了讨论。

（一）区域经济发展的本质。

区域经济发展作为区域经济学研究的主要领域之一，有别于一般的经济发展，表现出如下本质特征：

1. 时间维度上表现为区域经济增长。

所谓区域经济增长是指特定区域商品和劳务的增长。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要特征是数量化和模型化，即利用数学计量手段将与经济增长有关的变量联系起来，构造模型，并以此来推导结论、预测未来。具有代表性的理论主要有：哈罗德—多马模型、新古典增长模型、新剑桥增长模型和新增长模型等。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是主流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理论分支，其秉承了主流经济学的一贯传统，以时间序列数据为构建模型的基础，沿时间维度推导结论、描述未来。区域经济学尚未形成独有的区域经济增长理论，在解决区域经济增长问题时，基本上是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在区域范畴内进行应用。

2. 空间维度上表现为空间结构的演化。

空间作为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场所，各种社会经济活动都会在空间上反映出来。经济活动在多种因素影响下的集中与扩散，会构成并推动着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增长，而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增长，又会使一定空间范围内原有的各种社会经济客体和现象的位置、相互结合关系、聚集规模及其形态发生相应的变化。

区域经济空间的运动，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区位选择的结果；是各种社会经济活动在地域空间分化、组合、聚集的动态过程；是社会经济系统与其环境之间、系统内部各子系统之间经常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在地域空间的表现；也是它们之间的人流、物流、资金流、能源流、信息流等传输的动态的过程。区域经济空间的运动过程，即是区域空间结构的演化过程，同时考察区域经济增长与区域空间结构演化，并寻找两者的内在联系是区域经济学有别于其他经济学研究的显著特征。

3. 区际关系上表现为吸引与辐射的交互作用。

由于要素禀赋在空间上的非均质分布，出现了区际劳动分工，又由于人类社会的制度性空间分割的出现，即带有一定程度或范围的排他性产权的建立，其表现形式为具有行政管辖疆界的区域或国家的出现，扩大了生产的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劳动分工的演进，实质上是不同空间区域资源配置变换和制度变迁的过程，这种过

程同时又促进了不同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区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区域之间存在合作与竞争的双重关系。区域之间既相互吸引，又相互辐射。所谓吸引是指在聚集力的作用下，特定区域从其他区域聚集经济发展所需的要素和资源，辐射则指特定区域的经济活动在其他区域的扩展和影响。由于区域间要素禀赋、分工与专业化程度、产业结构等的差异，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处于不平衡状态。具有比较优势的强势区域在区际关系中表现出具有较强的吸引与辐射的能力，弱势区域则表现出较弱的吸引和辐射能力。

在此基础上，本书建立了聚集—区域经济增长模型、聚集—区域空间结构演化模型、聚集—区域辐射模型。

（二）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与协调发展。

在本书中，对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理解，也不同于以往的研究。以往对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研究，大多侧重于分析这种不平衡发展的收敛性问题或者分析影响不平衡的各种要素及其贡献率问题，同时将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与区域经济的不协调发展等同起来。这里对于经济区域之间的不平衡发展，是前面关于经济区域形成、区域经济发展的延续。经济区域形成主要讲静态的经济区域是什么样的和怎么形成的；区域经济发展问题，则是研究这样的一个经济区域形成之后，它是如何不断发展演化的；接下来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则是这种不同区域间经济动态发展演化的结果。

这里，我们强调区域之间的不平衡是一种常态，不同于区域协调问题。从我们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解和研究来看，区域之间因为要素及要素禀赋的差异，必然导致区域经济发展的起点不平衡；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在核心动力——聚集机制在空间上的差异性，直接导致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不平衡；制约聚集机制发挥效果的外部环境、政策的差异导致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不平衡。总之，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具有一个长期、相对的特征，同时这种不平衡发展具有固化和强化的趋势。

对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之间关系的理解，是本书有别于以往研究的差异点。在本书中，我们强调区域协调是一种社会政治层面的区域之间的公平性问题以及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承载力之间的匹配问题。前者直接反映为区域之间的公平性问题，更多地应该通过相应的财政转移来解决。后者则落

实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科学可持续发展层面上。为此，我们提出了“要素适宜度”概念，指出区域的发展要慎重考虑“要素适宜度”问题，即一定的区域应该承接什么样的要素，要素之间的组合结构是什么样的，要素的累积叠加度应该是什么样的，等等。

对于“要素适宜度”的分析，有利于我们准确认识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同时对于国家现行的“主体功能区”的划分和推进实施，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佐证。这里，我们还要特别指出的是，解决区域之间的不平衡，不应该过分强调增长或发展的一致性，而应该强调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问题。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则应该侧重于社会公平和人与环境的和谐。

四、区域主体与空间经济自组织。

无论是区域经济发展还是经济空间演化，都需要明确的实施主体，区域经济政策也是以区域主体的空间活动为基础而实现的。那么，究竟什么是区域主体？经济空间演化与发展和区域主体行为存在怎样的关系？这种关系在空间上又体现为什么样的机理？本书力求从理论上对上述问题作出回答。

我国的区域经济学研究很大程度上是从生产力布局学演化而来的，而生产力布局学侧重于宏观视角，没有考虑和研究区域微观主体也是自然的。由于没有考虑区域微观主体的最大化利益需求，我们研究制定的区域经济政策的实施效果总是差强人意。我国的区域经济研究亟需转向针对微观主体的研究。

我们从要素禀赋的视角分析认为，区域性要素的差距是导致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原因。而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则认为，即使在要素均质的条件下，微观主体的行为差异同样可以导致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由此可见，全面揭示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问题还需要考虑到对区域主体与区域主体行为的分析与理解。

对区域主体行为展开研究，首先要深入理解区域主体的概念，这是分析和研究的逻辑起点，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够明确主体分析对象，进而展开其空间行为的分析。在这里，界定的区域主体就是能够实现一定经济空间（经济区域）组织和运行的最少类别的微观承载对象。按照斯密的观点，分工与专业化是经济发展研究的主线，而在区域经济学中，分工与专业化又表现为经济功能区的形成，我们对区域主体行为的展开分析正是置于一定的经济空间中实现的。

按照我们研究确定的原则，区域主体主要包括企业、居民和地方政府，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区域主体还应该包括区域协调组织（我们称之为区域自组织）。区

域主体具有系统性、结构性、动态演化等特征，区域主体行为分析就是将具有这些特征的微观个体纳入到一个统一的空间框架研究其组织机理。这种空间分析保证了我们的研究既不同于区位选择理论中的主体分析，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微观经济学的分析，而是强调不同微观主体在空间上累积因果的空间组织机理——空间经济自组织。

区域主体行为分析的理论基础之一是新经济地理学，我们将经典核心—外围模型所揭示的微观主体的空间关系称之为空间经济自组织。任何经济空间在厂商和居民的活动下，都存在自我生长的演化组织机制，这种自组织机制的本质是区域主体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过程中形成的三种相互关联的空间力量——市场临近效应、成本关联效应和拥挤效应。空间经济自组织机制分析在探寻区域经济的微观基础的同时，认识了区域经济演化的微观机理——区域经济自组织，进而认为区域经济政策的制定应该以认识、遵循这种自组织规律为前提。不过，作为转型经济国家，仅仅认识居民和厂商的空间经济自组织行为是远远不够的，地方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只有研究了区域地方政府，才能够将区域主体的行为机理真正解释清楚。

在如何将地方政府纳入空间分析框架问题上，我们既分析了地方政府制定的区域政策、区域空间规划与空间经济自组织的关系，也分析了区域一体化中区域协调组织的演化形成问题。更重要的是，将公共选择理论的思想融合进空间经济研究，将地方政府假设为以追求可支配收入最大化为目标的理性经济人，考察作为区域主体的地方政府的行为与空间经济自组织之间的关系。这一分析能够很好地解释我国一些地区存在的区域不和谐、恶性竞争现象。

研究结论表明，追求自身利益的区域地方政府行为必然形成以行政区划为基础的“地方政府经济区”。空间经济自组织作用下经济功能区的形成就会受到这种行政区划下“地方政府经济区”的制约，二者的矛盾会随着经济的演化和组织程度的不断提高而日益激化。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着力打破行政区划的诸多壁垒，形成以协调互补、分工合作为特征，以经济功能区为基础地域空间单元的区域经济新格局已经成为一种历史的选择。将行政区划按照经济自组织的内在需求进行调整，使行政区政府和经济功能区政府的行为边界相吻合，是实现从行政区经济向经济功能区转变的路径之一。

关于区域主体和空间经济自组织的分析，一方面为研究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

提供了新视角；另一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讲，在探寻区域经济学的微观基础的同时，还为我国未来可能的行政区划调整奠定了理论基础。

五、区域治理问题。

不同于其他区域经济学著作，在本书中，我们并没有花大的力气去分析和研究区域经济政策问题，而是着重探讨区域治理问题。这是因为区域经济活动中，市场失灵会导致空间经济自组织在空间上资源配置的无效率，表现为空间失灵。这就需要一种区域协调机制来加以解决。这种协调机制主要有两种形式：区域政府和区域治理。

区域政府是指在区域层次成立一级政府，作为区域公共事务的应对之道。这种应对公共事务的思路在区域这一层次遇到了一些困难，原因在于经济区域范围的不稳定性，即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经济区域的边界可能会发生变化。这就造成区域政府管辖的行政区域与经济区域可能会存在不一致，以至于区域政府难以有效处理区域问题，而如果通过调整行政区域边界来适应经济区域的变化，则可能会由于行政区域调整的不灵活而产生问题。

区域治理指的是内生于一个区域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安排，通过这些制度安排，区域主体可以实现区域内部的集体行动，包括设定区域的目标和规则，作出区域公共决策，组织并协调区域的集体活动等。本书在对治理和区域治理的概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集中讨论了区域治理参与者、区域治理的权威性、区域治理的运行、区域治理的模式和中国的区域治理等问题，提出了中国区域治理制度创新的一些方向。

第1章

均质与非均质空间分析

作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区域经济学是因为关注空间问题而得以分异。本章首先对空间问题和经济学的关系进行回顾，这是本书立题的重要基础之一。其次，通过对以往的研究和分析路径的考察，指出区域经济学研究的本质在于针对要素以及要素禀赋的空间分析，而要素的空间分布问题需要正视区域的均质、非均质问题。以往的经济学对于空间问题的研究大多以均质空间为基础，而地理学则是以非均质空间为研究起点，本书则尝试从均质与非均质的有机统一中把握空间特性，展开区域经济理论分析。

1.1 空间问题与经济学

在探讨均质与非均质空间之前，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经济学对于空间问题究竟是怎样处理的。这是因为，本书所关注的均质与非均质空间的统一正是基于经济学对空间问题研究的演变轨迹得出的。准确把握这种发展脉络和轨迹，有助于深入理解均质与非均质空间统一问题提出的理论背景。

1.1.1 经济学忽视空间问题吗

有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学对于空间问题研究长期忽视，进而导致经济学的分析处于一种“无维度的仙境”之中。主流经济学的一般分析中，时间被认为是最关键的因素，空间则因主流经济学对要素的完全流动性和自由竞争机制的理想化假设而被忽视。“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就明确提到：问题的不同处主要在于空间的区域变化和市场扩展的周期，其时间的影响因素相对于空间来说更为重要。”①新

① T. B. Foust and A. R. Desouza, 1978, *The Economic Landspacape: A Theoritical Introduction*, A Bell & Howell Company Press, p. 3.

古典学派偏好边际理论，其研究的对象必须是连续且能微分的，而空间因素的系统结构往往不具有连续性而被排斥在外。同样，新古典学派一般假设要素有完全的流动性，若此假设成立，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各个要素的供给自然就从富集地区流动至稀缺地区，以致要素价格、成本和收入最终趋于均衡化，也就不存在所谓的区域经济。①而在微观经济学研究中，由于空间要素无法顺当地装配到阿罗—德布鲁（Arrow-Debreu）类型的竞争性一般均衡模型中②，同样也被排斥在主流之外。

具体来说，将空间引入经济学也有其特殊的困难。在空间维度上分析资源配置问题的时候，至少有四个障碍：

第一，空间自身的复杂性。将空间引入经济学分析中首先要面对的就是空间自身的复杂性。这一方面包括空间要素分布的差异性；另一方面包括空间的相互影响。

第二，空间维度的相对固定性。行为主体的经济行为可以较为及时地改善和调整，时间维度的分析可以拆分成时点、短期和长期来分析，而空间维度上的空间形态则很难改变。即使空间维度的分析在一定意义上说，可以拆分，但是这种拆分往往导致分析的理想化和失效。例如，在分析一定的区域经济问题的时候，如果你无限地拆分区域，则有可能导致所进行的分析偏离初衷或者不合现实和无意义。

第三，空间维度上，时间的不确定性。与空间的相对固定性相比，时间则是永不停息的流逝过程。我们在探讨空间维度上的资源配置的时候，必然要面对时间序列这样的变量。而我们在研究时间维度上的资源配置的时候，空间维度相对稳定。这种时间不确定性的引入也使得空间配置资源问题变得更为复杂。

第四，空间维度上，行为主体经济行为的错综复杂和相互关联性。经济行为主体的经济活动都占据一定的空间资源。而这种对空间资源的支配具有相对的垄断性、独占性和外部性，这使得经济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错综复杂。

1.1.2 经济学对于空间问题的关注

我们认为经济学一直也没有忽视对空间问题的探讨。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可能很少强调空间理论，但是它们并没有完全忽视空间问题。

---

① 魏后凯：《西方区域经济及其发展——西方区域经济学评析》，《开发研究》1996 年第 2 期，第 26 页。

② 伊特韦尔、米尔盖特、纽曼：《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四卷，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24 页。

1. 配第的空间概念

事实上，被称为政治经济学之父的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从一开始就注意到空间问题。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认为："配第发现了区位地租。"[①]实际上，在地理学的文献中，也可以看出来配第对于区位地租的发现，是杜能理论的思想来源。克斯奥姆（Chisholm）认为，经济地租的思想，"特别是杜能的区位地租概念，最早是……由威廉·配第提出的"。[②]配第认为每英亩的地租量是由人口的密度所决定的。亦即土地的地租依赖于"位置"而不是肥力。

2. 斯密对于空间问题的关注

古典经济学家斯密也对空间问题进行了分析。虽然冯·杜能（Von Thünen）在其《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一书中，"几乎用了一章的篇幅来批评亚当·斯密的地租理论，但却没有提到斯密的区位地租理论"。[③]事实上，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中关于土地地租的一章中，斯密明确地阐述了区位地租问题：

> 土地的地租不仅因为其肥力的不同而不同，而且与其位置有关。临近城镇的土地与同等肥力的乡村土地相比，能够提供更大的地租。虽然在投入的劳动方面不会有所差异，但是把产品运输到市场的距离有所不同，所耗费的费用也有所不同。[④]

斯密给出了一个明确的"位置"地租的例子，同时斯密还强调了运输成本的重要性：

> 煤矿对于所有者的价值，往往既取决于其位置，又取决于其丰度。而金属矿藏的价值更多取决于其丰度，而较少取决于其位置。那些从矿石中分离出来的稀有金属，往往更为珍贵，它能够承担长距离，甚至是海洋运输带来的成本。[⑤]

---

① Joseph A. Schumpeter, 1954, *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214.

② Michael Chisholm, 1962, *Rural Settlement and Land Use: An Essay in Location*, Aldine Publishing Co., p. 21.

③ von Thünen, 1826, *Isolated State*, trans. by Carla M. Wartenberg, edited by Peter Hall, Pergamon Press, pp. 18—22.

④ Adam Smith, 1776, *The Wealth of Nations*,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p. 147.

⑤ 同上书，p. 167。

其实，斯密对于杜能的影响可能要比其所承认的那样要更多一些。当讨论运输效率提高对于生产的影响时，斯密作了如下的重要论述：

> 好的道路、运河以及适合航行的河道往往能够缩小运输成本，从而拉近偏远乡村与邻近城镇的农村进入城市的运输费用，进而促进偏远农村地区的耕种，形成最外围的农村圈层。这样不仅可以打破原来临近城镇地区农产品供给的垄断，也有利于其他农村地区……①

很显然，“最外围的农村圈层”对于杜能来说，是一种灵感的激发。

3. 杜能对于空间经济学的贡献

相比配第和斯密，杜能对于空间问题以及经济学的贡献，则是越来越被经济学家们所推崇。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认为杜能是最伟大的经济学家。杜能不仅开创了区位理论，而且被看成是边际主义的创始人。埃克伦德和赫伯特(Ekelund and Hebert)更进一步认为，凭借其非凡的才能和敏捷，杜能事实上创造了现代经济“模型”，这一模型包含有逻辑演绎和事实验证。另外，由于空间既被看作是一个经济物品，又被看作是经济活动的基础，杜能的分析对于经济地理学发展的重要性更是双重的。

4. 新古典经济学并没有忽视空间问题

新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阿尔弗莱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认为，经济分析中，时间要素要比空间要素更值得关注。对于区位理论和空间经济学的发展来说，这种论断是一个不幸的开始，以后的经济学家更多地关注“时间维度”，而忽视“空间问题”，经济学进入“同质性假说”②时代。

实际上，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中，特别强调“空间问题”，这可以从其“外部性”和“产业区位”的分析中看出。马歇尔用“位置”来代替“区位”，认为“位置的价值”取决于人口的增长、运输效率的提高、与现有市场的交流的增强等。马歇尔认为，“位置”和其他要素(例如，靠近劳动力市场)的价值可以转换为货币价值。当这种转换实现时，“位置的优势”的货币价值将不断得到累加，一个商业活动的“特殊位置价值”的货币体现，可以被称之为“特殊位置地租”，它来源于“位置价值”。马

---

① Adam Smith，1776，*The Wealth of Nations*，New York：Modern Library，p. 147.

② 指主流经济学抽离了空间差异，把行为主体和产品同质化，从而为完全竞争分析框架提供了基础。

歇尔对于外部经济的分析很大程度上受到区位理论的影响。同时，马歇尔用了一章的篇幅来论述产业区位问题。在他的著作中还强调运输成本问题、市场区位问题、人口和产业迁移问题。总之，马歇尔对于区位和空间问题给予了足够的重视。

与马歇尔同时代的约翰·阿特金森·霍布森(John Atkinson Hobson)，强烈反对马歇尔的经济思想主张，但是同样对区位理论和空间经济给予了更多的重视。他从市场区、专业化、区位的决定要素以及运输成本四个方面对此作出了贡献。

1.1.3 经济学对于空间问题的两次舍弃

在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中，虽然一直没有忽视对空间问题的探讨，但是至少我们应该承认长期以来经济学没有给予空间问题应有的地位。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可以归结为经济学发展历程中对空间问题的两次舍弃。

1. 李嘉图的抽象

根据埃克伦德和赫伯特的说法，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对于经济学忽视空间问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李嘉图的经济学在空间理论的历史上形成了一个消极的分水岭。通过将环境差异弱化为土地生产力的差异，李嘉图有效地将对空间的考虑从他的分析体系中删除了。另外，他定义的运输成本与其他形式的成本毫无差别，并且，在李嘉图之前的国际贸易理论中，空间因素是受到优先考虑的，他却用比较成本将此因素替代掉，并使比较成本成为了至关重要的因素。李嘉图模型及其分析创新在实践中的影响，是将空间因素从主流经济理论中驱逐出去的，因此从那以后相当长的时期里，空间因素既使被研究过，也是在英国古典经济学的主流演绎模型之外处理的。①

2. 马歇尔论断与阿罗—德布鲁模型的影响

新古典经济学创始人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中明确提到："问题的不同处主要在于空间的区域变化和市场扩展的周期，其时间的影响因素相对于空间来说更为重要。"②虽然马歇尔本身对空间问题还是比较重视的，但是他的这一论断常常

---

① 小罗伯特·B. 埃克伦德(Robert B. Ekelund, Jr.)和罗伯特·F. 赫伯特(Robert F. Hebert)：《经济理论和方法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25 页。

② T. B. Foust and A. R. Desouza, 1978, *The Economic Landspacape: A Theoritical Introduction*, A. Bell & Howell Company Press, p. 3.

被认为是主流经济学忽视空间问题的直接反映。马歇尔倡导的新古典经济学以边际主义为主要分析工具，借助于微分数学的方法，也在事实上使得空间要素难以融入到经济学分析框架中。

在另一方面，阿罗—德布鲁模型（Arrow-Debreu model）强化了一般均衡分析方法，确立了一般均衡分析在经济学中的地位。自斯密提出“看不见的手”的竞争市场的重要性原理以来，经济学家就一直希望对其存在性、真实性进行证明。19世纪，法国经济学家列昂·瓦尔拉斯（Leon Walras）发现了一般均衡的理论和方程。然而，他没能提供一个有力的证据来证明这种体制下确实存在一个均衡点。到了20世纪中期，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罗（Kenneth Arrow）和德布鲁（Debreu），运用了如拓扑学和集合论这样强有力的数学工具，对竞争均衡的存在性给出了一个完整的证明。这个革命性的发现表明，即使在许多不同的地区存在成千上万种投入品和产出品，即使货物生产和销售的时间并不相同，但在一定的限制条件下，总是存在至少一组价格使得所有的投入品和产出品的供求实现完全均衡。当人类进入计算机时代时，“哈伯特·斯卡夫（Herbert Scarf）发展了第一个实际计算一般经济均衡的方法——这就产生了经济学中的一个新领域：可以计量的一般经济均衡模型”。[①]很显然，在这一分析框架体系中，空间问题可以通过界定商品的物理属性来加以处理，同样也可凭借制造商品的地点（时间）来加以处理，因此一旦我们有了这些标准化了的商品，经济学理论中就可以根本忘记空间和时间。这种标准的一般均衡分析回避了对规模的不可分割性或递增报酬的考虑，当研究到经济活动的空间配置时，它就无法理解运输和土地的实质影响。

一般均衡分析框架长期以来成为主流经济学分析的基础框架。那么在这一框架中，是否可以讨论空间问题呢？在对此问题的长期争论中，斯塔雷特（Starrett）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其中的本质问题就是，竞争价格机制是否能够用来解释经济聚集的内生性呢？要检验一个空间模型在此方面的解释能力，最好的办法就是考虑一个均质空间的例子，在此空间中经济行为人自由地选择他们的位置。假如某种经济活动出现集中现象的话，它必然是源于内生的经济力量。斯塔雷特说明了，如果空间是均质的，并且运输是有成本的，那么竞争均衡的任何结果都会是：没有

① 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第十六版），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223页。

运输行为产生。换句话说，其结果是，经济体退化为各个相互分离的孤立的行为人群体，同时所有的贸易都是在群体内部而非群体之间发生。因此，仅仅依靠完全竞争的价格机制是无法同时解决城市和贸易问题的。当我们要对空间经济加以模型化的时候，这一事实便会给出一个基本的隐含意义：如果我们目的是想建立一个理论，并用这一理论来解释经济聚集的形成，那么这个理论就必须从一般竞争分析中脱离出来。竞争均衡模型不可能成为空间经济学的正确分析基础。

因此，主流经济学长期以来不可能对空间问题给予更多的关注和解释。

1.1.4 经济学整合空间问题的三次尝试

长期以来，经济学者越来越认识到经济学中的“空间缺失”问题，不断有人试图尝试将空间要素纳入到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架构中去。至今，至少有三次有力的尝试，且都做出了令人惊叹的成绩。

1. 艾萨德的区域科学

第一次把空间纳入经济学的重大努力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由著名的区域科学家沃尔特·艾萨德(Walter Isard)领导。艾萨德批判一般均衡分析，认为一般均衡分析学者是将自己局限于“一个没有维度的仙境”之中。他对当时的一般均衡分析的倡导者希克斯进行批判，从而还引起了约瑟夫·熊彼特对于约翰·希克斯(John Richard Hicks)的维护。熊彼特认为希克斯的分析中运输费用是暗含在生产成本之中的，分析是比较全面的。但是艾萨德则认为：

> 生产理论……不能明确地以充分的理由来论述某些生产成本，也不能以暗含的方式论述其他一些重要的成本。因为该理论想避免在分析后者代表了什么这一问题时所碰到的障碍。作为一个权宜的处理方法，在将生产者相互分离时，运输成本和空间成本的特殊效应就必须被考虑。它们是如此地至关重要，以至于无法通过暗含的处理方式来加以回避，后者正如希克斯以及其他学者所提供的解释。①

很显然，艾萨德的解释更为令人信服。

然而，艾萨德发现了问题，但终究没有能够解决问题。他创造了一个交叉学科——区域科学，区域科学在现实生活中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但是“把空间问题

① 转引自藤田昌久，雅克·弗朗克斯·蒂斯著：《集聚经济学》，刘峰等译，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21页。

带入经济理论的核心”的目标却没能实现。艾萨德并没有对理论进行深入的研究，相反，他开创了一个折中的应用领域：区域科学。不能否认区域科学对于许多实践目的来说是有用的，如对于一个正在考虑在何处修路或建港口的地区计划者来看，一套扼要或提示性的学术工具，尽管从学术上来看它的结构不能令人满意或不够紧凑，但只要能更好地描绘他们的问题，他们都愿意使用它。区域科学不是一个统一的学科，最准确地讲，它是一个工具收藏箱，其中一些工具非常原始，而另一些则相当先进，它可以帮助人们解决实际中出现的涉及空间的问题，而无需等到我们有了一个出色的理论才来解决。区域科学的折中做法不能取代一个真正完整的理论，艾萨德所做的伟大的工作未形成一个真正完整的理论。

但是艾萨德给出了空间进入经济学的分析思路。艾萨德认为：“由于在空间关系中总是会出现垄断性因素，那么，一个定义宽泛的垄断竞争的一般理论就可以视为等同于区位和空间经济的一般理论。”①

2. 新城市经济学对土地问题的再思考

继艾萨德之后，第二次把空间纳入经济学的重大努力是 20 世纪 60 年代末和 70 年代初的“新城市经济学”(new urban economics)。新城市经济学研究的是城市的内部空间结构，最经典的模型是单中心城市。在这个城市，至少一部分人口不得不每天乘车去一个外生给定的中心商业区。这个模型的问题是同时决定中心商业区周围的土地使用情况和地租，通常来讲，这个问题可以简化为决定一条均衡的出价竞租曲线——它是与中心的距离的函数。

新城市经济学试图建立一般均衡模型，就是包括空间变量的一般经济模型。但事实上，这个模型完全是杜能模型的翻版，不过农民变成了经常往来于城市和农村的人。而且新模型与杜能原来的模型一样有许多优点：它描绘了一幅更令人满意的图景，包括市场力量是如何权衡对土地的分配，空间如何演变为有不同活动的区域，以及经济学在存在对稀缺资源的竞争时所具有同时性、一般均衡等。

不幸的是，这个模型同样具有杜能模型的基本缺点：模型只提到有一个中心，但没有解释为什么存在一个中心商业区，在它的周围形成了城市。当然可以借助

---

① 转引自藤田昌久，雅克·弗朗克斯·蒂斯著：《集聚经济学》，刘峰等译，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2—23 页。

“模糊的聚集经济”来完成模型，但那不是一个让人十分满意的结果。而且我们需要理解的首要问题是这些相互竞争的中心位于何处——而这个问题正是杜能和新城市经济学的模型所没有回答的。他们之所以不回答又是因为这个问题不可避免地与收益递增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3. 新经济地理学的尝试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派对“将空间问题纳入主流经济学”进行了新的尝试。

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以后，经济全球化趋势使一些杰出的经济学家开始重新发现经济地理学的价值。克鲁格曼在《地理学与贸易》一书中首先提出“新经济地理学”这个存在争议的新科学名词。此后，他又在其《发展：地理学和经济学理论》、《自组织经济学》和 1999 年与他人合作的《空间经济学》以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都试图致力于创建“新经济地理学”。他试图“使人们接受经济地理学作为经济学的一个主要分支学科”。其他一些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也赞成他的看法，如商业经济学家波特认为：一个国家的产业链对于决定该国在国际竞争中的比较优势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与克鲁格曼的看法相类似，迈克尔·波特(Michael E. Porter)也认为：有必要将经济地理学带入经济学的主流之中，并使其成为经济学核心的分支学科。①其他许多经济学家，也纷纷加入到建设“新经济地理学”的运动。随着建设“新经济地理学”运动的扩展，一些经济学家开始认真地评论起这次“经济地理学的经济学回归”。由于经济学家的研究兴趣有所差异，因此他们对地理学所关注的焦点也有所不同。但是尽管如此，他们的基本原则是相同的，即：位置和场所与经济过程相关，经济地理学应该作为经济学的一个核心分支学科回归到主流经济学中来。

在此基础上，克鲁格曼认为：将空间问题纳入主流经济学的时机也已经成熟。他之所以这样说，是有其理由的：

第一，可以用规模收益递增来解释极化区位的形成，从而说明区位的差异性形成机理。用规模报酬不变解释同质区位。

第二，可以用迪克西特—斯蒂格茨(Dixit-Stiglitz)的不完全竞争模型表示空间

① Porter M.，1996，“Competitive Advantage，Agglomeration Economies and Regional Policy”，*International Regional Science Review*，119(1—2)，pp. 85—90.

上的差异性，从而用一种数学方法来表示空间上的差异。

当然，克鲁格曼及其追随者的研究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们所做的工作也存在诸多问题，尚未构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是，自 1991 年以来，他们一直朝着“将空间纳入主流”的方向努力。

新经济地理学采用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模型的建模技巧，对空间经济结构与变化过程重新进行了分析，对传统经济地理学进行改造，将空间因素纳入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丰富了主流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也进一步深化了新贸易理论的研究，为研究国际经济问题提供了新视角。它对传统经济地理学家的某些问题的直观表述，进行了比较严格的数学论证，有利于人们理解历史事件如何影响经济地理的形成，以及潜在参数的变化是如何导致空间结构的渐进变化。但是，不少西方学者认为，新经济地理学只是对区域科学和城市经济学模型的一种修订而已，新经济地理学用高深数学所建立的模型，不过是地理学家多年前就已有意识地抛弃了的分析方法，它所得出的结论并无特别的新意，经验应用更是奇缺。但是不管怎么说，新经济地理学是三次真正试图将空间问题引入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来的最为有力的一次。

1.2 均质与非均质空间的含义

在本章 1.1 节中，我们梳理了经济学对于空间问题研究的历史脉络。更进一步，经济学研究的空间究竟是什么样的，这正是本节的研究内容。

1.2.1 均质与非均质的含义

在 1.1 节分析一般均衡框架和空间问题时，我们已经使用了均质与非均质概念。其实，均质和非均质都是空间特征，也是区域的特征。区域经济学自从建立以来一直把空间分析当作区域经济理论的出发点。从而，带来一系列的理论问题，空间是什么，区域是什么，空间和区域是什么关系，空间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①]又是什么关系等。虽然空间和区域间的概念上的矛盾影响着区域经济理论的发展，但是空间分析对区域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理论空间。尤其是在区域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空间一直是理论的出发点。

我们认为空间是区域的抽象。区域是实际的，也是客观存在的实体。在经济

① Vinod, D., 1964, “The Definition of Regional Economics”,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5(2), pp. 25—29.

问题研究中，当关注于区域经济发展和空间结构演化的内在机理时，更适宜使用空间这一抽象概念；而当研究具体区域经济政策等时，则需要使用区域这一概念。也就是说，区域经济学在经济学的框架内分析区域问题的时候需要抽象化，在这个意义上说，区域是具体的，而空间则是区域的抽象。区域的抽象化就会面临如何界定其本质特征，也就是空间的特征。对这一问题涉及两个层面：首先，区域或者空间具有一定的地理特征，这个地理空间是否平坦是需要明确的；其次，承载经济主体活动的空间蕴含了丰富的经济要素，这些要素的分布是否均等也是需要回答的。针对地理特征和要素的分布这两个特征，区域研究中关于空间的界定就可以分为均质和非均质两种。

均质和非均质的含义可以通过表 1.1 来体现。空间均质①的含义可以从表 1.1 的两个不同层面得到体现。首先，空间均质假设抽象掉了所有的地理和地貌特征，只研究一种平坦的空间。其次，作为关注资源配置的经济学，要素的分布是一个重要变量，是引入要素分布函数还是进行简化的技术处理是我们必须解决的。区域经济学的研究采用了后者，将空间假设为要素均匀分布，从而避免了引入要素密度函数等变量所带来的技术障碍。因此，空间均质假设从距离的角度来考虑经济活动的空间特征，从而，空间问题特别是区位选择归结于距离问题。空间均质假设能够提供较方便的理论基础，但是，空间均质假设并不完全符合实际。尤其是在空间惯性起到关键作用的时候，空间均质假设很难说明现实区域。空间非均质的含义是不平坦空间上的经济要素禀赋是非均等的。

表 1.1　空间均质与非均质的特征 I

	均　质	非均质
地理特征	平坦空间	不平坦空间
要素禀赋	均等分布	非均等分布

1.2.2　均质空间分析假设

均质空间分析假设是指经济空间是一片平原，其空间没有凹凸，也不存在地理

① 空间均质和空间同质是不同的概念。空间同质是空间的性质，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划分不同性质的空间，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可以划分区域性质。无论是空间同质还是空间异质，也就是无论哪种空间性质，空间均质都可以存在。

上的特征，要素禀赋的空间分布是均等的。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把距离和运输成本引进到分析框架里。[①]要是经济空间不是平原，距离和运输成本变量不会是线性变化，很难分析其变量的作用。

均质空间分析假设的好处就是容易进行技术处理，但却很不全面。尽管如此，我们不能说这种方法是不对的，而只能说不全面。杜能的农业区位理论假设在一个大平原中央有一个城市，它与周围农业地带组成一个孤立的地区，该地区既无河川、亦无运河，并且，该区位中，具有同样适宜的气候和肥沃的土壤条件。而且，运输费用同运输的重量和距离成正比。如以 R 代表单位面积的区位地租，Q 代表单位面积的产量，P 代表单位产品的销售价格，C 代表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t 代表运费率，K 代表距离市场的英里数，于是，区位地租可由下式得出：

$$R = Q(P-C) - QtK = Q(P-C-tK)$$

当 K 为零，即距离为零时，区位地租亦为零，即 $R = Q(P-C-tK) = 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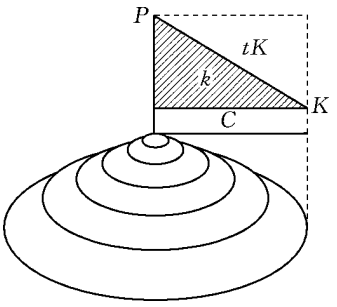


图 1.1　杜能的同心圆理论

杜能研究，因为土地位置不同导致农业成本在空间上的差异，从而，对地租发生影响，所有这些因素如何，决定了围绕着一定市场的经营类型，以及经营强度在空间上的分布。其空间分布不仅取决于自然因素，更取决于经济因素，即与市场的距离。杜能的同心圆理论假设是典型的均质空间假设。其结果就是把空间变量转成距离和运输成本变量。

奥古斯特·廖什(August Lösche)市场区的出发点亦是均质空间。在平原上有经济价值的原料是均匀地分布。这个平原各方面都是同质的，含有的只是有规则分布的自给自足的农场。这样的出发点如何导致空间的差异呢？这就是廖什的理论空间。从中，廖什得出有规律的市场区。

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着大量的均质空间，例如软件产业园区，这一园区内发展的都是软件产业，面临着相同的资源、政策和制度环境，甚至不同企业所使用的建筑都相同。

---

① John Luke Gallup, Jeffery D. Sacks, Andrew D. Mellinger, 1998, "Geograph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NBER Working Paper*, No. 6849, p. 19.

均质空间分析中，将地理特征和经济要素特征进行了界定，地理特征的均质抽象是为了顺利使用距离和运输成本变量，而经济要素的均质抽象则将距离和运输成本置于了空间经济研究的核心地位。然而，这种要素的外生化假设和处理，使我们无法回答杜能的中心地究竟是怎样形成的等一系列问题。

1.2.3 非均质空间分析假设

非均质空间分析假设强调经济要素在不平坦空间上的非均匀分布。从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到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都假设要素禀赋的非均质特征，要素禀赋的差异才是贸易的基本条件之一。不同的空间区位具有不同的要素禀赋。如果要素禀赋不是均质的，那么市场结构，尤其是生产要素的市场结构就不再是完全竞争。不同区位的要素禀赋的差异必然造成不完全的要素市场结构。

非均质空间分析强调的是初始条件的非均质，而不仅仅是在抽象平原上经由经济活动累积而成的非均质。以往的经济学研究大多忽视了这种初始条件的非均质，而只研究了由经济活动累积而成的非均质空间。我们要注意，从市场结构角度来看，非均质空间假设意味着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包括要素市场的不完全竞争和消费市场的不完全竞争。这些特征比较可以通过表 1.2 来体现。

表 1.2 均质与非均质的特征Ⅱ

	均　质	非均质
要素禀赋	均等分布	非均等分布
市场结构	完全竞争	不完全竞争

当我们研究一个初始条件即处于非均质的空间时，地理特征的凹凸不平等问题就需要进行技术上的处理，否则经济学上的距离和运输成本变量就无法使用。这也是为什么早期的地理学研究中难以有效和规范使用这些变量进行分析的原因。经济学主要研究资源配置问题，抽象演绎和建模是其揭示经济演化的内在机理的重要方法。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进行必要的简化和抽象就成为经济学研究的逻辑起点。主流经济学的主要成就大多是在工业社会取得，自然要素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已经变弱，对自然要素加以均质化假设，而将工业社会中的核心要素资本、劳动力置于生产函数的框架进行模型分析就成为经济学研究的选择。然而，随着后工业时代和信息时代的到来，制度、文化和信息对于经济发展越来越重要，主流经济学的生产函数难以容纳这些要素变量，于是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应运而

生且得到了迅速发展。

但是，在空间经济研究中，当我们研究某些经济活动究竟是如何在特定空间被“锁定”进而实现聚集时，就需要关注这些经济活动的历史脉络和变迁，这又必须关注初始空间的自然要素禀赋和地理特征。于是，经济学家在进行历史分析时，又会外生地引入这些地理变量，这种处理对于擅长和喜欢将变量内生化处理的经济学家来说仿佛是在其研究成果上打了个“补丁”。面对这一难堪，空间经济选择了对均质与非均质属性进行回避化的处理，人们不再或者很少关注经济空间的属性，而是根据研究需要忽而是均质空间，忽而是非均质空间，空间分析形成了不同的研究路径。

1.3 传统空间分析路径的特征与局限

无论是古典经济学，还是现代经济学研究，空间因素都是不可回避的变量之一。由于种种原因，空间因素在主流经济学中的表现不太突出，不过，城市经济学以及区域经济学一直把空间变量当作理论的基本变量。

1.3.1 主流经济学对空间问题的处理

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和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假设不同区位的要素禀赋的非均质分布，其结果就产生贸易。贸易理论的出发点就是非均质空间。不同的区位按自己的要素禀赋条件生产优势商品。但是，到了马歇尔的经济理论，主流经济学对空间问题的处理就是单纯化或抽象化，其结果抛弃了空间因素。但是，严格来讲，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并没有完全放弃空间因素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尤其是他的地方化经济的发现成为后来空间研究的出发点。贝蒂·俄林(Bertil Ohlin)的贸易理论充分说明了新古典经济学的长期均衡和空间因素之间的关系，就是虽然其出发点是非均质空间，但是通过不同区位之间的贸易最终能够达成商品相对价格的均等化以及要素相对价格的均等化。

从经典的微观经济学理论来看，主流经济学不涉及选择消费和生产区位的问题。其基础理论不包括区位选择的对象，只包括生产要素和商品的选择，生产要素的选择构成生产理论，商品的选择构成消费理论。主流经济学的市场结构主要是生产要素市场和商品消费市场，这些市场并没有涉及空间上的范围问题。但是，我们不能忽视国际贸易理论或者发展经济学的绝对优势理论或比较优势理论涉及市场的不同区位所带来的影响。不过，这时候的空间的含义并不是空间选择的问题，而是不同空间或区位的假设。

1.3.2 区位理论分析的路径

从理论角度来看，区位理论发展就是传统区位理论假设的缓解过程。传统区位理论的发展可以说是从杜能的农业区位理论开始。后来，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 Weber)根据农业区位理论建立工业区位理论。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由菲特(Frank Fetter)来发展为商业区位理论，再发展为俄林的一般区位理论，廖什的市场区位理论等。二战后，传统区位理论由艾萨德和威廉·阿郎索(William Alonso)来继续发展。

杜能区位理论的要点是，因为土地位置不同，即距离城市市场远近的不同，导致农业成本在空间上的差异，从而，对地租发生不同的影响。这是他的有名的位置、地租和土地利用三者关系。韦伯认为，最低成本的位置就是企业区位选择的最佳位置，只有经济因素影响工业区位，经济因素主要是成本因素。成本因素有多种，他认为真正起作用的只有运输成本和劳动成本。韦伯认为，产业区位就是对两个影响因素的反应：产业区域分布的原因(区域因素)；产业再配置的原因(聚集和分散因素)。区域因素是从运输成本和劳动成本角度来进行分析的，聚集和分散因素是从规模经济角度来进行分析的。为了发现空间规则，韦伯假设：地表空间是同质的；运输成本与距离正比；市场价格完全竞争、固定的市场价格；利润最大化经济人；没有技术发展；劳动供给完全竞争市场。但是，韦伯的工业区位论具有现实应用上的弱点：理论的静态性不能考虑市场需求变化以及原料供给的空间变化；运输成本转变为重量—距离概念，不能考虑最终成本(terminal Cost)；空间当成地点(point)，不能考虑区域面积(area)；不考虑劳动力的流动性和有限供给等。帕兰德(T. Pälander)和胡佛(E. M. Hoover)进一步发展了韦伯的最小运输成本理论。帕兰德将市场区的概念引进来，他认为企业利润取决于从区位地点到市场区的距离比例。并且，空间竞争与交通体系的改善影响市场区的范围，进一步发展韦伯的静态分析。胡佛将韦伯的运输成本概念修改为边际线(marginal line)，并引进最终成本的概念。

俄林将贸易理论和价格理论结合起来试图形成一般区位理论。其观点有两部分。第一部分考虑的是，在假定资本和劳动力生产要素能够自由流动下，工业区位如何决定？其结论是商品在区域间流通或区域内流通取决于运输成本，即运输成本对工业区位决定非常重要因素。俄林和韦伯的观点基本上一致，但俄林弥补了韦伯的两个不足之处：一是原料产地、工业区位和消费者市场三者间的相互依存关

系，互相影响关系；二是运输边界程度的差异，韦伯的假设为距离相同等于运费相同，俄林假设虽然距离相同但是运费会不同。俄林区位理论的第二部分是资本和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下的工业区位问题。第二部分的特点是利用一般均衡方法来研究一般工业区位的决定。他认为利息率和工资水平的区域差异是工业区位的重要因素。它们区域间差异成为工业区位决定的前提。另一方面是工业区位所造成的结果。为什么会存在利息率和工资水平的差异？资本和劳动力本身存在区域差异，而这个差异不能自由流动。如果配置要发生变化，就依靠三个因素的作用：一是人口增长率的变化；二是储蓄率的变化；三是各区域价格比率的变化。价格比率发生变化，意味着原来均衡的破坏，而价格比率变化的结果形成一个新的均衡关系，这变化会影响工业区位，即工业区位变动是生产要素各地之间重新配置的结果，或者原来均衡关系变动的结果。

廖什的市场区位理论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含义是最重要的区位因素是市场，也就是市场利润。第二个含义是从宏观经济上解释何谓市场区。从第一个含义来看，有两个特点。特点一是最低运输成本和劳动工资成本并不是起决定作用的，利润起决定作用，即工业区位主要是由它的销售大小、需求量来决定①。若有足够的消费者就会有利润。唯一的区位决定因素是纯利润，即个别企业寻找纯利润最大的地点。廖什否定了韦伯的最小成本观点，提出了最大收益区位理论②。特点二是区位体系的平衡。廖什区位理论的第二含义是市场区，市场区是蜂窝状六边形。中心的周围有小市场区，市场区是在经济空间上最佳的配置。

艾萨德批评廖什的理想空间模式。要是人口在空间上不均等分布，廖什的六

---

① August Lösche 的需求最大理论的核心思想是“spatial demand cone”，需求集中在市场中心，并且距离与市场需求的关系表现在“spatial demand cone”，市场中心距离越远，其需求越小。“spatial demand cone”发展成“小市场圈域”，“小市场圈域”的结合形成 Walter Christaller(1933)的六角形(hexagonal system)。August Lösche 的理论进一步发展为最小成本理论，强调需求圈域与市场领域的重要性。产业区位取决于竞争与需求最大化的结果，即产业区位取决于成本最小与市场需求最大。因此，企业为了需求最大化并聚集经济利益靠近市场中心。

② 最大收益区位理论是最小成本区位理论与最大需求理论的结合。M. L. Greenhut (1956)、E. R. Rawstron(1958)、D. Smith(1966)、M. L. Greenhut & H. Ohta(1975)等人主张此观点。M. L. Greenhut 认为最佳区位取决于最小成本与最大需求的差异最大。D. Smith 认为产业区位取决于边际收益的最大化(空间成本曲线与平均收入的关系)。

边形会变化多样规模的非规则的形状。艾萨德将杜能的农业区位理论、韦伯的最小成本区位理论和廖什的最大需求区位理论综合，并试图建立一般空间区位理论[①]，并且将区位理论和替代原理结合起来，像经济理论中资本和劳动的替代关系一样，区位选择之间也存在替代关系。艾萨德认为，之所以一般均衡理论是一般空间区位理论的特殊现象，是因为一般均衡理论假设运输成本等于零并且生产要素都是完全移动。艾萨德将区位因素分类三种群；第一群是运费成本和转移成本；第二群是劳动，电力，水力，税种，保险，利息，气候，地形，社会和政治环境等；第三群是聚集经济和非聚集经济。聚集经济包括规模经济，地方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非聚集经济包括规模不经济，地租上升，城市服务成本的上升，拥挤成本的上升。艾萨德认为，可以把厂商看作是在权衡运输成本和生产成本，就像它们做出其他任何成本最小化或利润最大化的决策一样。但是，他从这个看法中得出的结论是，只需把区位看作是在经济学分析中逐渐占据统治地位的竞争的一般均衡模型中的另一个选择变量就可以了。

他们的主要假设是完全竞争市场、收益递减、利润最大化和完全理性经济人。在二战以后，区位理论的主要变化是这些假设的放松。行为区位理论放松理性经济人假设。[②]经济人不会知道所有的信息，而且，他们所做的经济行为的目标并不单纯是为了利润最大化，例如，为了满足最大化等。格林哈特(M. L. Greenhut)认为，个人行为不可能是千篇一律的。西蒙(H. A. Simon)还认为，在有限信息条件下，区位决定行为就是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的行为，并且在理性合理性条件下，经济人会追求利润最大化，在有限合理性约束下，每个人的约束条件都不一样，有些人还会追求满足次优(the second best)。他把“利益的空间界限(spatial

① 严格来讲，W. Isard 并不是最早试图建立“一般空间区位理论”的人，Whihelm Launhardt (1885)、Oskar Engländer(1926)、Hand Ritschl(1927) Andreas Predöhl(1927)、Hans Weigmann(1931)、Bertil G. Ohlin(1933)、August Lösche(1938)、R. Triffin(1940)等人均从不同的角度试图将空间与一般均衡理论相结合。

② 人类与组织的经济行为并不像新古典经济理论假设所说的那样静态，而是动态。适应经济学(adaptive economics)、行为经济学(behavioral economics)、演化经济学(evolutionary economics)都认为，人类与组织的经济行为的特征是“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的动态性，也就是说选择是不断的调整过程(adjustment processes)。Richard H. Day(1975)认为，有限理性意味着不完全信息(imperfect information)、有限预测(limited foresight)、有限认识能力(finite cognitive power)、动态偏好(changing preferences)等。

margins of profitability)”应用于区位理论，企业的区位并不在单一地点决定，而是能够得到利润的任何地点都可以成为区位客体，就是“准最佳区位”(suboptimal location)概念。麻斯(J. G. March)也认为，组织是由很多个人和部署来组成的，并且组织会有重叠目标或相互对立的目标。普雷德(A. R. Pred)研究信息水平和信息利用能力水平会给予区位选择影响，虽然每个人都具备同样的信息水平，但是难以保证最佳区位的选择。汉密尔顿(F. E. I. Hamilton)也批评传统区位理论并不考虑企业管理和组织形式的差异，认为企业的区位选择取决于组织管理目标的相互作用。伍德(P. A. Wood)总结，行为区位理论是研究个别企业所形成的空间结构。

以新古典区位理论为主的传统区位理论的假设具有局限：(1)最佳区位选择要求区位主体的完全信息和完全知识；(2)区位选择的目的局限于成本最小化和收益最大化，就是利润最大化；(3)企业组织是静态的和单一的。行为区位理论是将组织理论和心理学当成理论基础并重视区位主体的区位动机和选择过程的，也就是行为和区位的相结合。行为区位理论解释区位主体在企业内外环境下如何呈现出空间形态。传统区位理论与行为区位理论的差异有：(1)行为区位理论，在区位决定过程中，不假设理性合理性的经济人；(2)行为区位理论假设区位选择主体有多样的动机和目标；(3)传统区位理论不考虑企业结构与管理组织的差异，但行为主义区位理论很重视其差异，尤其是行为区位理论重视企业内部区位选择主体的作用，还考虑内部组织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传统区位理论的区位因素大部分是外部因素，如运输成本、原料和市场等。行为区位理论打破了传统区位理论的局限，内外部因素都考虑进去了。

传统区位理论以及行为区位理论都假设均质空间，即平坦空间、要素禀赋的均等分布、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以及收益递减等。韦伯是从供给角度来解释区位选择问题，而廖什是从需求角度来解释区位选择问题，艾萨德试图供给区位选择和需求区位选择的相结合，建立一般区位模型和理论。传统区位理论的主要假设之一就是平坦的地表，这样一来，距离才具有分析意义，距离直接影响运输成本的大小。行为区位理论在传统区位理论的基础上调整了个人行为的最大化目标，但是，有关空间的假设还是与传统区位理论一样。传统区位理论的空间分析方法是在平坦的空间上寻找最有效的区位，从而，距离成为传统区位理论的最重要的变量。

1.3.3 新区域经济学的空间分析

新古典区域经济增长模型表明稳定均衡点的存在以及稳定的增长曲线的存在，并且，无论资本和劳动的初期条件，通过生产要素的区际移动，区域经济将会达到长期稳定的均衡点。以索罗(Solow)模型为基础的区域经济增长模型假设同质区域，因此，区际存在异质性，表现为区域性要素的比率。但是，实际上，区域间异质性取决于更多因素，如生产技术、生产要素的质量、聚集经济和聚集不经济、商品的异质性、区域居民的偏好等。要是模型考虑这些因素的作用，新古典区域经济增长会出现不同的情况。

城市与区域经济学经常提到城市存在的内在机制来自聚集经济或外部效应。从空间角度来看，外部经济就是聚集经济和聚集不经济。模型的基本问题是模型如何表现出聚集经济或聚集不经济效应。奇普曼(J. S. Chipman)、瑞比纳(B. Rabenau)、梅奥(T. Miayo)和吉姆(H. B. Kim)等人认为，外部效应就是区域生产力的变化。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要是区域生产力增加，其区域内部存在聚集经济，要是区域生产力减少，其区域内部存在聚集不经济。但是，模型假设，虽然外部经济存在，但是个别生产者的生产技术还是收益不变的，是因为市场是完全竞争，并且完全竞争市场内的生产技术是收益不变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解释区域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和收敛。但是，区域经济增长差距是长期存在的客观现实。“新区域经济学”(new regional economics)在新增长理论的基础上重新探讨区域经济增长差距的根源。格兰瑟(E. L. Gleaser)把新区域经济学的主要主题概括为：信息的扩散；知识投资及其转移过程；人力资本的作用。

区域经济增长模型的难题就是如何将空间因素或区域因素引进模型来，萨洛普、萨克斯和梅林格(J. L. Gallup，J. D. Sacks，A. D. Mellinger)以距离为基础的运输成本当作主要的空间变量。他们解释运输成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萨洛普、萨克斯和梅林格模型的基本结构是 AK 模型和运输成本的相结合。该模型认为，经济增长的差异取决于以下三种变量：总要素生产力，其差异取决于地理因素，例如，温和地区农业生产力和热带地区农业生产力的差异、不同地区健康水平的差异等；运输成本，反映距离和贸易的物理上接近程度，例如，离海岸的距离等；储蓄率及政府的经济政策。萨洛普、萨克斯和梅林格模型在新古典经济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以运输成本为基础的区域经济增长模型，将空间因素引入到经济增长模型里，并解释经济增长率与区域因素之间的关系。

新区域经济学的区域经济增长模型突破了新古典区域经济增长模型的一些局限，如市场结构，要素禀赋条件等。以新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的区域经济增长模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和收益递增的条件下重新探讨区域经济增长问题。萨洛普、萨克斯和梅林格模型还把地理因素引入到区域经济增长模型里，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区域经济增长模型的某些不足之处。

1.3.4 经济地理学的空间分析

德国地理学家阿尔弗雷德·赫特纳(Alfred Hettner)认为地理学更确切地说只是关于地表就其地点差别研究大陆、地区、地方和地点的科学。美国地理学家哈茨霍恩(R. Hartshorne)在其名著《地理学性质的透视》一书中，从哲学高度上总结了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明确提出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区域差异，并认为部门地理是研究的起点，区域地理则是研究的终端。根据经典文献的研究，地理学是从非均质的视角研究区域的，特别地，从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视角出发，造成经济空间分布有疏有密的根本动力是自然环境本底的非均匀分布以及经济自身的集聚和扩散力量。

在早期的地理研究中，主要是强调自然要素的非均质分布。随着经济地理研究的深入和发展，文化和制度转向(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turn)的经济地理研究越来越繁荣。迪肯和史瑞夫特(Dicken and Thrift)把“嵌入”引入经济地理研究，使这个学科融入文化、社会和制度背景之中并从中获得新的研究内涵与发展方向。地理学关于非均质空间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但是，由于学科的门类限制，经济地理学以地方为主“极级引论”推理，忽视企业策略行为归纳思考，对于区域问题强于归纳而短于对空间组织机理的演绎分析，而后者则恰是经济学所长于分析的。

经济地理学研究区域空间的差异化原因，非均质空间是其研究的逻辑起点，这是一条从非均质到非均质的研究范式；而在经济学中，则是以均质空间为逻辑起点，试图揭示区域差异化和组织运行的内在机理，特别是空间聚集的实现路径，由此形成了从均质到非均质的分析范式。不过，无论哪一种分析，从方法上看，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都大量借鉴了彼此的研究成果，共同推进了空间问题的研究。

1.3.5 新经济地理学的空间分析

新经济地理学(new economic geography)也试图建立包括空间变量的一般均

衡模型。新经济地理学特别发现空间的特殊性，就是市场结构的非完全竞争结构和生产函数的非规模收益不变，某种意义上，这就是有现实意义的理论模型。克鲁格曼建立的空间分析模型，包括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假设：

（1）假定一个经济有制造业和农业两个部门，对于两类产品每个人有相同的柯布—道格拉斯效用函数；

（2）假定存在一种同质的农业产品，而制成品是一个由大量的对称产品种类构成的复合物，其中任何两种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均为常数；

（3）假定任意给定时点生产要素分布在许多地区，两部分均使用可流动和不可流动的生产要素；

（4）土地—劳动力替代问题；

（5）假定两个生产要素都是劳动力，即工人和农民；

（6）耕种是一项规模报酬不变的活动，制造业是存在规模经济，在任一个地区生产任一种产品都有一个固定成本；

（7）假定农业劳动力分布是外生给定的，制造业劳动力分布会随时间而变化；

（8）在任意一个时点上，对于所有要素和部门都有各地区的充分的就业；

（9）只有制成品有运输成本，“冰山”形式存在，任何制成品在运输途中就有一部分丢失了，而不是设计一个单独的运输行业；

（10）农民是完全不流动的，工人向提供更高工资的地区自由流动；

（11）任一种产品的生产者都面临一个不变的需求弹性，利润最大化就是价格等于在边际成本上的一个固定价格。

克鲁格曼还加以收益递增的假设：所有的产品都以同样的规模生产，一个特定地区所生产的产品种类的多少就会与那个地区的制造业劳动力数量成比例。模型的短期均衡方程中收益递增并不那么显而易见。收益递增的作用就是使每一种产品只在一个地区生产才有利可图，这样一来不同地区就不会产生同一个集合的产品，而是生产差别产品。在以上假设的基础上，克鲁格曼通过模拟分析，得出结论：运输成本越低，制造业在经济中的份额越大，厂商的规模经济越明显都有利于聚集。

克鲁格曼认为，哈瑞斯（Harris）的市场潜在力模型，普雷德的累积循环模型忽视了微观基础，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和廖什的模型忽视了市场潜在力和累积循环的作用。克鲁格曼认为经济地理模型应该包括两个力量，向心力和离心力，向

心力就是产生聚集的力量，离心力就是产生分散的力量。克鲁格曼的模型表明在地理上这些空间力量的相互作用，其力量包括：市场接近的作用，以市场潜在力度量，市场接近决定制造业的区位；产生聚集的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对外生变量的小的变化所发生的非连续性变化；经济体系是自我组织体系，并使进化自我维持区位结构。克鲁格曼还认为，聚集是生产的收益递增、运输成本、要素移动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反聚集的唯一力量是为了服务分散的农业腹地而设新厂的动机，并不是城市土地地租。

克鲁格曼模型解释在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和收益递增的前提下运输成本对产业聚集的影响。这是很重要的理论突破。克鲁格曼在非完全竞争市场结构假定下，利用两部分经济模型来导出多重城市区位均衡。他的主要结论有两点：第一，运输成本和相对实际工资率对区位的影响，运输成本和相对实际工资率来决定均衡，并且城市的均衡点以这两个因素的变化而变化；第二，变化的范围，即均衡的范围，有可能性的城市的范围，主要影响因素是总消费中制造品的比重和替代弹性。总消费中制造品的比重和替代弹性越大，范围也越大，即有可能性的城市的范围也越大。

克鲁格曼打破了传统空间分析的局限，引进了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和收益递增的假设，更接近现实。并且，他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区位决定和产业聚集的内在规律。在某种意义上，克鲁格曼的空间分析是非均质空间分析，因为他假设经济要素在空间上不均等分布，但其实质依然是均质空间分析。

谢泼德(E. Sheppard)认为："在新经济地理学的几乎所有理论中，空间都被当做一个均质体来看待。一方面，空间被假设为廖什区位论中所用的空间，即行为主体在空间上相互分离，没有中心区位与边缘区位。所有区位与其他区位的相互关系都一样，这消除了相对区位形成的竞争优势。空间是均质的、没有边限制的。虽然以垄断竞争为分析框架的新经济地理在一个即使均质的空间中，由于经济主体之间的空间相互作用，也会形成空间分异，核心和边缘区位同样能够形成，但却没有相对区位的优势和劣势。"①而这显然有违现实情况。

---

① E. 谢泼德：《地理学还是经济学？空间、时间、相互依赖和经济人的概念》，载《牛津经济地理学手册》，[英] G. L. 克拉克，[美]M. P. 费尔德曼，[加]M. S. 格特勒主编，刘卫东等译，商务印书馆 2005 年版，第 107 页。

1.4 经济空间——均质与非均质的有机统一

均质和非均质都是经济空间的属性，地理学侧重非均质空间，而经济学则侧重于均质空间，同时因为使用不同的分析方法而分异出不同的学科分支。但是，由于对经济空间均质与否这一属性的认识和处理不同，经济学和地理学的空间分析都存在无法回答的难题。

本节从均质和非均质空间分析存在的问题入手，试图从均质和非均质的有机统一中全面把握经济空间，为本书形成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奠定基础。

1.4.1 经济学中均质空间分析的困境

经济学中均质空间分析大大简化了分析难度，在一定意义上似乎也没有影响其理论的解释力。胡佛就以廖什的研究为例，指出在一个假设的、没有任何自然资源差异的世界里，亦即在一块资源均匀分布的平原上，依照逻辑判断会出现何种区位呢？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凭想象推测：(1)所有的活动都集中在一个地点；(2)所有活动在整个区域内呈均匀分布(即完全是同质的)；(3)经济活动毫无系统模式，而只是随机的散布。然而，实际出现的合乎逻辑的结果不属于以上任何一种推测，而是显示出与现实世界中的城镇分布模式的某种相似性。按照胡佛的说法，区域的分异和空间结构的形成完全可以在一个均质空间中实现和完成。

廖什也说过，即便地表是完全均一的，城镇依然会产生。经典著作的研究仿佛告诉我们，均质空间假设在简化问题的同时并没有影响到其理论的正确性，事实是这样吗？

1. 强调自然资源的均质，但忽视了区域性非自然要素的作用

无论是胡佛还是廖什，其假设中都只是特别关注了自然资源的均质化，而没有涉及区域性非自然资源如历史、文化和制度等的作用。而事实上，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历史、文化和制度等要素正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从一定意义上讲，大多数经济学家所做的均质空间假设都只是对其地理属性进行了均质抽象，而忽视了区域性非自然要素在空间的作用。在第 2 章我们将会看到，区域性非自然要素对于空间属性和动态演化的作用。

2. 均质假设的方法存在难以克服的障碍

区域经济学也需要解释一定空间中城市是如何形成的。传统研究大多将其原因归结为比较利益、规模经济和聚集经济。但是，上述三个原因都与均质空间的假设存在内在的逻辑冲突。

第一，比较利益的存在本身就否认了均质化假设。假如人们的生产能力、所处的资源条件和技术条件完全相等，生产效率完全一样，那就没有可能产生劳动分工，从而也就不可能产生建立在专业化分工优势的基础上的比较利益。经济学家们在处理空间问题时，一方面做了均质化简化假设，另一方面又强调比较优势和分工与专业化的作用，存在前后不一的逻辑矛盾。

第二，空间中规模经济的作用和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不相容。如果不存在规模经济，产出与投入规模无关，从而商品生产可以在任意小的规模上靠近消费者分布，此时在没有任何特征、平坦的平原上，人口和生产会均匀地分布，因为集中不仅不会带来好处，相反会因为竞争土地而使地价上升。在空间经济中，规模经济的存在，保证了企业存在规模报酬递增的属性，而这和新古典经济学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的分析框架不相容。

第三，用外部性解释聚集经济将区域经济学置于“黑箱”之上。聚集经济是区域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和重要的理论基础，经济学家们普遍使用马歇尔的外部性理论来解释聚集经济的形成原因。但是，我们可以设想，在完全均质的空间中，这种外部性从何而来呢？另外，外部性的分析舍弃了基于经济主体的选择行为分析，聚集经济的成因犹如一个“黑箱”，区域经济学从某种意义上也被置于这一“黑箱”之上。

3. “在哪里”的问题依然悬而未决

传统经济理论都从不同路径希望解决主流经济学忽视的“在哪里”问题。但是，在哪里聚集、城市究竟在哪里形成等一系列问题依然没有获得满意的解释。克鲁格曼另辟蹊径，在抽象的均质空间中为我们展示了主体空间活动的累积效应如何诱致了空间的非均质结果。对于“在哪里”问题，以克鲁格曼为首的新经济地理学家归结为“历史”和“偶然”，而空间经济的正反馈机制则可能锁定(lock in)这种偶然事件进而形成累积性优势，产生空间聚集。克鲁格曼在《地理和贸易》一书中通过纽约特洛伊城的衣领和衣袖的聚集、新泽西帕特森的丝织品聚集以及罗德岛普罗维登斯的珠宝业聚集等案例，表明了历史和偶然对于“在哪里”问题的有效解释。

不可否认，在历史上很多偶然事件确实能够在正反馈机制的作用下放大成为一些确定性事件，并形成自我演化。但可以肯定，决不是所有的空间聚集都可以通过这种“偶然”来解释。为什么文明在“两河”流域最先出现？为什么区域经

济一体化率先在欧洲实现？偶然性事件被放大锁定为确定性事件，其背后必然有更加深刻的原因，不对这些深层次原因进行研究，“在哪里”的问题仍然还是悬而未决。

所有这些问题和矛盾都表明均质空间假设对于真正解决区域经济问题存在不足，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凸显了要素的功能，要素空间的非均质分布成为这种全球化浪潮下的一个突出景观——技术创新在全球呈现出极强的非均质性，发达国家和发达地区的制度创新更是领先于欠发达地区，甚至一些地区的组织行为创新也已经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作用。仅仅用均质空间假设的分析已经不能适应这种浪潮，把均质空间分析与非均质空间分析有机结合起来，已成为新形势下区域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经济学特别是新经济地理学从均质的原始空间入手，分析展示了经由经济主体活动从均质向非均质空间演变形成的深刻画面，但是，上述困境的存在表明均质视角的分析仍存在难以克服的障碍。因为，经济学对于要素的分析集中在劳动和资本等非区域性要素上面，这种取向注定了经济学家无法将其分析视角拓展至非均质空间。

1.4.2 经济地理学中非均质空间分析的问题

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具有差异的区域，这是一类典型的非均质空间。需要注意的是，地理学所研究的区域，比较强调其地理特征，和经济学研究的抽象经济空间有所差别。经济地理学在解释人地关系、全球化力量和地方化力量关系、区域差异化发展以及企业与区域经济发展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但是，由于研究对象集中在非均质的空间层面，经济地理学也面临一些无法解决的问题。

1. 难以回答经济区域是怎样形成的问题

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经济区域，这种经济区域在现实生活中往往是与行政区域相关联的，并且抽象掉了地理特征。在经济学家看来，经济区域有其形成和演化的内在规律，区域经济学需要对经济区域的形成问题作出正面回答。

作为地理学一个分支的经济地理学，一直将真实世界的地域空间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这是地理学成为自然科学的一个前提。近年来，经济地理学者越来越关注于区域问题的研究，这里的区域不同于自然地理的区域空间，而是有着复杂经济关系的经济空间。那么，这个复杂的经济区域是如何形成的？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完全不同、形态各异的，针对具体的、真实世界的区域研究很难揭示其深层

的一般机理。

科学揭示经济区域的形成与演化机理，必须进行高度的经济抽象假设，抽象出一般意义上的空间，舍弃掉对于揭示内在机理无关宏旨的一系列具体地理特征，而这种研究方式是善于运用精确描述方法的地理学所难以运用的。

2. 揭示经济区域的微观组织机理时存在困难

经济地理学以真实世界的地域空间为研究对象，使得对经济问题的研究缺乏微观主体的支撑，这就会在揭示经济区域的微观组织机理时存在困难。另外，经济地理学中基本不涉及市场结构的研究和限定。我们知道，对经济问题的研究，面对不同市场结构其结果完全不同。忽视市场结构的经济研究，或者所得结论与现实相距甚远，或者对某些经济问题无法分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克鲁格曼认为，经济地理学致命的问题是其领域的先驱没有明确地说明市场结构，即在他们所描述的假想经济中的竞争状况。在对传统的区位论进行分析后，克鲁格曼认为，一些经济学家对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和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的批判是正确的，即需求分布、运输成本和距离之间的关系等假设不符合现实，似乎是关于几何学的，与经济学无关。因为它没有告诉经济决策主体是谁，以及厂商或企业之间的决策是如何相互影响的。中心地理论并未对市场结构做出任何明确的描述，没有考虑不完全竞争。

概括说来，客观事物的地理分布及其与空间环境的关系始终是经济地理学研究的核心领域。虽然，在研究中，经济地理学融合了许多经济学的方法和思想，但是，经济学始于抽象假设，强调演绎的方法毕竟与地理学相距甚远。经济地理学中，强调理论和概念发展(emphasis on theoretical and conceptual developments)，偏向定性和解释、说明性研究(preference for qualitative and interpretative research)，调研方法、地图与遥感方法都是其重要的工具。在研究中，更加侧重于地理信息的搜集与运用；注重规划设计等形象直观的表达方法。所以，经济地理学长于描述、表现在其对宏观性问题的解释能力，相比而言，对于许多涉及微观问题的经济组织机理研究就显不足。

在现实生活中存在诸如高新技术区，临港工业区等一类经济空间，各种不同要素分布呈现很强的均等性，同类或者相关企业也都表现出相同的区位选择指向，和经济地理学关注的非均质空间不同，这是一种均质空间。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和视角难以将区域和上述功能区的研究实现兼容。由此可见，经济地理学的空间

分析始于非均质空间，但强调自然要素的非均质视角对于很多问题难以有效解决。制度和文化转向的经济地理学研究尝试将经济学的方法和内容引入其中，拓展非均质的内涵。但是，经济地理学是将要素“嵌入”非均质空间，却无法实现分析框架的统一。

1.4.3 经济空间——均质与非均质的有机统一

传统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都面对空间问题展开研究，各自强调了空间的一种属性，但对于全面解释现实世界都有不足。经济学长于分析具有均质特性的经济功能区的形成和演化机理，在微观区位选择问题上有着独到成就；而经济地理学则长于分析具有非均质特性的经济空间，擅长研究区域差异等问题。

在现实经济中，既存在大量的均质空间现象，也存在大量的非均质空间现象，因此，对于区域经济的分析，我们既要考虑要素在空间上的非均质分布，又要考虑在一定范围内要素的相对均质分布。只有这样，才能完整地分析区域经济问题。区域经济学研究的经济空间是均质和非均质的有机统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有在对均质空间和非均质空间的有机统一分析框架中，区域经济学对经济空间的分析才能更加真实和全面，才能更为准确地把握经济空间的特性和本质，揭示要素空间分布和变化的内在规律。

经济空间是均质与非均质的有机统一，但传统的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却各自强调了经济空间的一种属性。那么，究竟存在什么样的问题让传统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都只能徘徊在各自的视野不能突破呢？换言之，若想实现均质和非均质分析框架的统一，我们需要解决的关键点是什么呢？在下一章，我们将对此进行分析。

本章小结

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始于对空间问题的关注。对于经济空间的属性进行界定就是区域经济学研究面临的一个首要问题。作为研究区域问题的两个重要分支，经济地理学强调空间的非均质性，并将非均质空间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而大多数区域经济学家们则使用规范的经济学分析工具，一般都假设空间为均质的。

通过本章的文献回顾，我们可以看到，单一的均质空间分析和非均质空间分析都存在自身难以克服的不足，这种不足深刻反映了单一属性假设下的空间研究具

有内在逻辑矛盾。本章提出区域经济学研究的经济空间应该是均质与非均质的有机统一。认为只有这样，区域经济学研究的空间才会更加真实和全面。这种认识，也让我们有可能从更加宽阔的视角构建区域经济学的分析和研究框架。

思考题

1. 主流经济学对空间问题的分析可以分为哪几个阶段？
2. 主流经济学的一般均衡框架为什么不能包容空间经济分析？
3. 经济学中的均质空间分析存在哪些困境？对此，新经济地理的学者们是怎样处理的？
4. 经济地理学强调非均质空间分析，这种分析有什么优点和不足？

参考文献

高进田：《区位的经济学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金相郁：《中国区域经济不平衡与协调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金丽国：《区域主体与空间经济自组织》，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第十六版）》，华夏出版社 1999 年版。

陈栋生：《区域经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陈秀山、张可云：《区域经济理论》，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版。

郝寿义、安虎森：《区域经济学》（第二版），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金相郁：《20 世纪区位理论的五个发展阶段及其评述》，《经济地理》2004 年第 3 期，第 11—16 页。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商务印书馆 1965 年版。

藤田昌久、雅克·弗朗克斯·蒂斯：《集聚经济学》，刘峰等译，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魏后凯：《西方区域经济学及其发展——西方区域经济学述评》，《开发研究》1996 年第 2 期，第 23—28 页。

魏后凯:《现代区域经济学》,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6 **年版**。

小罗伯特·B. **埃克伦德、罗伯特·**F. **赫伯特:《经济理论和方法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伊特韦尔、米尔盖特、纽曼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四卷,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Alonso, W., 1966, *Location and Land Use: Toward a General Theory of Land Rent*, East-West Center Edition.

Arthur, W. B., 1994, *Increasing Returns and Path Dependence in the Economy*,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Bailly, Antoine and Lay James Gibson, 2004, "Regional Science: Directions for the Future", *Papers in Regional Science*, 83, 127—138.

Blair, J. P., 1991, *Urban and Regional Economics*, Richard D. Irwin, Inc..

Boyce, David, 2004, "A Short History of the Field of Regional Science", *Papers in Regional Science*, 83, 31—57.

Chisholm, Michael, 1970, *Rural Settlement and Land Use: An Essay in Location*, Aldine Publishing Co..

Crosby, R. W., 1983, *Cities and Regions as Nonlinear Decision Systems*, Westview Press, Inc..

David, P., 1999, "Krugman's Economic Geography of Development: NEGs, POGs, and Naked Models in Space", *International Regional Science Review*, 22(2), 162—172.

Dymski, G. A., 1996, "On Krugman's Model of Economic Geography", *Geoforum*, 27 (4), 439—452.

Foust, T. B. and A. R. Desouza, 1978, *The Economic Landspacape: A Theoritical Introduction*, A Bell & Howell Company Press.

Foust, T. B. and A. R. Desouza, 1978, *The Economic Landspacape: A Theoritical Introduction*, A Bell & Howell Company Press.

Fujita, M., Krugman, P., Venables, A. J., 1999, *The Spatial Economy: Cities, Regions, and Internationsl Trade*, The MIT Press.

Gallup, J. L., Sacks, J. D., Mellinger, A. D., 1998, "Geograph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NBER Working Paper, No. 6849.

Gibson, Lay James, 1998, "Institutionalizing Regional Science", *The Annals of Region-*

al Science, 32, 459—467.

Glaeser, E., H. Kallal, J. Scheinkman and A. Shleifer, 1992, "Growth in Citi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0, 1126—1152.

Glaeser, E. L., 1994, "Cities, Inform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Cityscape*, 1(1), 9—47.

Gore, C., 1984, *Regions in Question: Space, Development Theory and Regional Policy*, Methuen, New York.

Greenhut, M. L., 1995, *Spatial Microeconomics*, Edward Elgar.

Henderson, J. V. and A. Mitra, 1993, "Edge City Economics", Mimeograph.

Hoover, E. M., 1975, *An Introduction Regional Economics*, Alfred A. Knopf, Inc..

Isard, W., 1956, *Location and Space-Economy: A General Theory Relating to Industrial Location, Market Areas, Land Use, Trade, and Urban Structure*, The MIT Press.

Isard, Walter, 1999, "Further Thoughts on Future Directions for Regional Science: A Response to Fujita's Remarks on the General Theory of Location and Space-economy", *The Annals of Regional Science*, 33, 383—388.

Isard, Walter, 1999, "Regional Science: Parallels from Physics and Chemistry", *Papers in Regional Science*, 78, 5—20.

Isserman, Andrew M., 2004, "Intellectual Leaders of Regional Science: A Half-century Citation Study", *Papers in Regional Science*, 83, 91—126.

Krugman, P., 1991,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9, 483—499.

Krugman, P., 1992, "A Dynamics Spatial Model",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s No. 4217.

Krugman, P., 1993, "First Nature, Second Nature and Metropolitan Location",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33(2), pp. 129—144.

Krugman, P., 1995, *Development, Geography and Economic Theory*, MIT Press.

Krugman, P., 1996, *The Self-Organizing Economy*, Blackwell Publishers.

Lucas, R., 1988,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2, 3—42.

Lösch, A., 1954, *The Economics of Location: A Pioneer Book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Economic Goods and Geography, translated from the second revised (1944) edition by Willian H. Woglom with the assistance of Wolfgang F. Stolp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McCann, P., 1996., "Logistics Costs and the Location of the Firm: A One-dimensional Comparative Static Approach", *Location Science*, 4, pp. 101—116.

McCann, P., 2001, *Urban and Regional Econom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cDonald, J. F., 1997, *Fundamentals of Urban Economics*, Prentice-Hall, Inc..

Mera, K., 2004, "Regional Science for What?: Policy Orientation of WRSA", *Annals of Regional Science*, 38, pp. 349—356.

Mera, Koichi, 2004, "Regional Science for What?: Policy Orientation of WRSA", *The Annals of Regional Science*, 83, 349—356.

Mills, E. S., Mackinnon, J., 1973, "Notes on the New Urban Economics",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ience*, 4(2), pp. 593—601.

Moses, L. N., 1958, "Location and the Theory of Produc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78, pp. 259—272.

Ottaviano, G. I. P, D. Puga, 1998, "Agglomeration in the Global Economy: A Survey of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 *The World Economy*, 21, 707—732.

Porter, M., 1996, "Competitive Advantage,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and Regional Policy", *International Regional Science Review*, 19, 85—90.

Rauch, J., 1991, "Productivity Gains from Geographic Concentration of Human Capital: Evidence from Cities", NBER Working Papers #3905.

Rees, John, 1999, "Regional Science: From Crisis to Opportunity", *Papers in Regional Science*, 78, 101—110.

Richardson, H. W., 1978, *Urban Economics*, The Dryden Press.

Richardson, H. W., 1979, *Regional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Rietveld, P., Vickerman, R., 2004, "Transport in Regional Science: The 'Death of Distance' Is Premature", *Papers in Regional Science*, 83, pp. 229—248.

Romer, P., 1986,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 Run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4, 1002—1037.

Saxenian, A., 1996, *Regional Advantage: Culture and Competition in Silicon Valley and Route 128*,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chmuztler, A., 1999,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 *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 13(4), 355—379.

Schumpeter, Joseph A., 1954, *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heppard, E., 2002, "The Spaces and Times of Globalization: Place, Scale, Networks, and Positionality", *Economic Geography*, 78(3), pp. 307—332.

Thünen, Von, 1966, *Isolated State*, trans. by Carla M. Wartenberg, Pergamon Press.

Vinod, D., 1964, "The Definition of Regional Economics",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5(2), 25—29.

第 2 章

要素禀赋与经济空间

本章试图通过对要素和要素禀赋进行较为系统的分析和重新诠释，使其成为联系均质和非均质空间分析的纽带，进而在其基础上构建一个均质和非均质有机统一的空间分析框架。

2.1 斯密的要素禀赋观

现代经济学可溯源至斯密的《国富论》。现代经济学的很多流派都能够在《国富论》中找到立论依据，我们研究要素禀赋，有必要回到斯密那里寻找启示。

2.1.1 斯密的要素禀赋理论

斯密的《国富论》中并没有专门的章节阐述要素禀赋理论，而是散布在关于分工理论和各国财富增长的研究中。作为古典经济学家，斯密以广阔的视野分析了要素和要素禀赋的相关理论。斯密的要素和要素禀赋理论既涵盖了地理、自然要素禀赋，也包括了劳动、土地和资本等经济学始终关注的经济要素，甚至还涉及了技术和制度等为当代经济学所重视的新型要素范畴。

斯密首先非常关注地理条件特征和自然要素禀赋的作用。他认为："有些种类的产业，即使是最低级的一种，只能在大城市中进行。例如，一个搬运夫在其他地方就找不到工作和衣食。一个村庄对他来说，范围太狭小了；即使是一个普通的集市，也很少大到足以为他维持固定的职业。"[①]在斯密看来，一个人分工的选择受到其所在的地理区位影响，城市作为一种地理要素影响甚至决定着分工与专业化的结果，进而影响了经济发展。

对于区域经济会在什么地方率先获得发展，斯密特别强调了水运的作用。"由

①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杨敬年译，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2 页。

于水运的好处如此巨大，工艺和产业的最初改进自然是在这种便利使全世界开放，成为每一种劳动产品的市场的地方，而这种改进要推广到各国的内地总是要晚得多。一国的内陆，除了位于它的四周，并将它与海岸和巨大通航河流隔离开来的那个邻国以外，在长时期内不可能为自己的大部分货物找到其他的市场。因此，他们的市场的范围，必然与该邻国的富裕程度和人口多少成比例，他们的改进也必然总是要落后于邻国的改进。在我们的北美各殖民地，种植园经常是建立在海岸或通航河流的两岸，很少有扩大到离这些岸边很远的地方。”①良好水运资源的存在对于区域市场的形成至关重要。事实上，从世界区域经济发展历史看，中国的两河流域，欧洲的地中海地区都是人类文明和经济增长的发源地。

在今天，我们知道人类的劳动可以改变许多自然禀赋的作用，令贫瘠的土地变得肥沃，让沙漠变成绿洲已经成为现实。而在斯密的论述中：“一块中等肥沃程度的谷地，为人类生产的食物数量比一块同样大小的最好的草地要大得多。”②那么，斯密的论述是不是已经过时了呢？根据克鲁格曼的观点，一种经济活动一旦被“锁定”，就会形成空间的累积因果循环，而要打破这种局面，需要超过一定阈值的力量，才能够克服区位的黏性。由此可见，最初的空间地理要素特征和自然要素禀赋状况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除了自然要素禀赋，斯密对于劳动、资本等要素也有深入和独到的认识。斯密将劳动分为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有一种劳动，加在物上，能增加物的价值；另一种劳动，却不能够。前者因可生产价值，可称为生产性劳动，后者可称为非生产性劳动。制造业工人的劳动，通常会把维持自身生活所需的价值与提供雇主利润的价值，加在所加工的原材料的价值上。反之，家仆的劳动，却不能增加什么价值。”③这表明，我们强调的经济要素指的是生产性劳动，而不是非生产性劳动，只有生产性劳动才能够进入生产函数。

对于资本，斯密既分析了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更加强调了资本的动态累积特征。斯密认为，按照事物的本性，资财积累必定在劳动分工以前；只在预先积累的资财越来越多时，劳动分工才能越来越细。另外，资本的动态累积也是经济增

---

①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杨敬年译，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4 页。

② 同上书，第 185 页。

③ 同上书，第 371 页。

长的重要源泉。由于资财积累是进行劳动生产力这种巨大改进所预先必需的，所以积累自然会导致改进。

后来的很多学者认为，在古典经济学中，财富来自三要素，即资本、土地和劳动力。其中资本不同于劳动力，因为它可以积累，也不同于土地，因为它可以流动。资本、土地和劳动三要素就是古典经济学依据其所在的经济环境，提出的要素禀赋理论。但是，我们的研究表明，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斯密的要素禀赋理论却并非局限在这三要素之上。

在关于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问题上，斯密提出绝对优势理论。他认为，分工与贸易之所以发生，其基础在于各国生产成本上的绝对差异。斯密认为，每个国家都有导致生产成本绝对低下的、绝对有利的、适于某些特定产品的生产条件，如果每个国家和地区都按“绝对有利的生产条件”进行专门化生产，然后彼此通过贸易交换，将使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资源、劳动力、资本得到最有效的利用，从而使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社会财富增加。基于此，随后的李嘉图在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基础上，首次在其著名的《政治经济及赋税原理》中提出比较优势理论。该理论认为，每一个国家都应专门生产具有相对优势的产品，生产那种成本相对低的商品，用以同别国交换。很显然，无论是斯密还是李嘉图，都已经认识到一个国家的生产成本的节省，与其拥有的特定的要素禀赋资源和生产条件密切相关；要素禀赋在分工和贸易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古典经济学家特别强调土地等固有自然资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例如英国古典经济学之父配第就认为“土地是财富之母”。斯密和李嘉图的劳动分工理论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强调的是自然禀赋的差异基础。古典经济学在强调土地的重要性基础上，深入分析了劳动力与资本两种要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他们通常将这两种要素都看作是非流动的。

在斯密的思想中，所有能够影响到经济主体行为的资源赋存、地理特征状况、劳动、资本以及制度和技术等都可以形成要素禀赋的范畴，这里，我们将其称为经济性要素。这种经济性要素包括了不同流派经济学所研究的要素，也包括了地理学（含经济地理学）所强调的自然要素和地理条件。

2.1.2 斯密要素禀赋理论的延续

作为一部划时代的巨著，斯密的《国富论》对于要素禀赋的理论贡献可谓博大精深。然而，斯密之后的经济学家却对要素禀赋进行了不同的阐述。李嘉图的相

对优势理论就是一道分水岭。在李嘉图那里，由于相对优势概念的提出，无形中就将自然要素禀赋“过滤”掉了，因为自然要素如矿产资源和地理特征要素只存在绝对优势，而不存在相对优势。在很长一段时间，人们都认为相对优势理论要优于绝对优势理论，李嘉图的要素禀赋观逐渐被经济学家们所认可和发展。资本、劳动、甚至技术和制度都陆续进入了经济学家的研究范畴，而自然要素禀赋和地理特征要素却逐渐被遗忘，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能力的不断增强也强化了很多经济学家的这种要素禀赋观。

不过，也有一些学者却对斯密的要素禀赋理论进行了继承和发展。著名经济学家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在其《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开篇中就认为：生产要素有两种：劳动和适当的自然物品。在该书第四章中，穆勒进而认为：“除了劳动和自然力这两种基本的和普遍的生产要素外，还有另一种生产要素，若没有它，工业便只能处于最初的原始而简陋的状态，而不可能进行任何其他生产活动。这就是以前劳动产物的积累。这种劳动产物的积累称为资本。”①

穆勒在其著作中还特别分析了技术这一要素的作用，“自然科学和技术方面可能取得的进步，加上财产保障的增加和处置财产的自由的扩大(这些都是现代国家文明的显著特征)，以及合股原则更加广泛和熟练的运用，为资本和生产的无限增加，并为伴随这种增加而出现的人口增长，提供了充分的余地”。②

斯密和许多古典经济学家囿于时代等的原因，并没有形成系统而条理化的要素禀赋理论。这一工作是瑞典著名经济学家俄林和他的老师伊·菲·赫克歇尔(Eli F. Heckscher)提出的，后经萨缪尔森等人不断完善。赫克歇尔和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是对斯密要素禀赋理论的继承和发扬。他们认为地区是分工和贸易的基本地域单元，全球可划分为几个大区，大区又可逐级细分。他们以新古典经济学作为地域分工和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认为生产要素的不平衡分布导致贸易产生，国内要素价格的差异导致国内劳动地域分工和区际贸易的产生；各国要素价格的差异导致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产生。“生产要素配备的不平衡使贸易产生了，贸易又会大大提高比较丰富而便宜的生产要素的价格，并降低其他要素的价格。……最后显然会出现国际间要素供给的更大不平衡以及越来越强大的贸易倾向。鉴于

① 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赵荣潜等译，商务印书馆 1987 年版，第 53 页。

② 同上书，第 97 页。

要素供给的现有差别增大了贸易的性质没有什么变化，但贸易量更大了，各国的分工会进一步发展”。[①]如果李嘉图模型所假设的劳动是唯一生产要素，那么产生比较优势的唯一原因就是各地区之间劳动生产率差异。然而，现实中地区间劳动生产率的不同只能部分地解释贸易产生的原因。贸易还反映了各地区间的资源差异。

赫克歇尔和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在理论和实际运用中的成功使其在 20 世纪前半叶至 70 年代末这段时期内在国际贸易理论中占据重要地位。赫克歇尔和俄林所运用的分析工具是由新古典经济学所建立起来的等产量线、无差异曲线、生产可能性边界等，该理论也被称之为新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与古典贸易理论相比，不仅在于它承认比较利益是国际贸易发生的基本原因，更重要的是它找到了比较利益形成的源泉，即贸易双方要素禀赋的差异。

要素禀赋的基本模型又称为 $2\times2\times2$ 模型，因假设两地区、两产品和两要素而得名。模型的基本假设为：(1)两地区相同部门的生产函数相同；(2)两地区消费者偏好一致；(3)规模收益不变；(4)所有商品市场、要素市场完全竞争；(5)两地的生产要素供给既定不变；(6)存在两种生产要素，A 地为资本丰富的地区，B 地为劳动丰富地区；(7)生产要素在同一地区可以自由流动，在地区间不能流动；(8)X、Y 的生产技术不同，其中假设 X 为资本密集型产品，Y 为劳动密集型产品；(9)不存在运输成本和其他贸易障碍。从这些假设条件可知，两地区只有要素禀赋不同，其他条件都完全一致。

在这样的条件基础上，产生了 H-O 理论。即：两个地区由于要素禀赋的不同，导致了供给能力的差异，进而引起商品相对价格的不同。根据比较优势原理，一个地区出口密集使用其丰富要素的产品，进口密集使用其稀缺要素的产品。

1. 要素禀赋差异与相对供给差异

在两地区生产技术条件相同的条件下，地区间要素禀赋的差异，最终会影响到两地区 X 和 Y 两种产品的生产能力，从而引起供给能力的差别。两地区供给方面的差别，可通过考察两地区生产可能性边界的偏向性来直观地加以判断。在图 2.1 中，E_A 和 E_B 分别表示两地区的要素禀赋点，对 A 地而言，当所有生产要素全部用于 X 部门时，所产出的 X 数量等于图 2.1 中通过 E_A 点的 X 等产量线所代表的产出水平 $\overline{X}_A$；当所有生产要素全部用于 Y 部门时，所生产的 Y 的数量等于通过

① 赫克歇尔、俄林：《地区间贸易与国际贸易》，王继祖等译，商务印书馆 1986 年版，第 75 页。

E_A 点的 Y 等产量曲线所代表的产出水平 $\overline{Y}_A$。根据图 2.1，我们可以在图 2.2 中标出 A 地区生产可能性曲线的两个端点，并用一条向外凸的曲线连接起来，便得到了 A 地区生产可能性边界线的大致轮廓，如图中 AA' 曲线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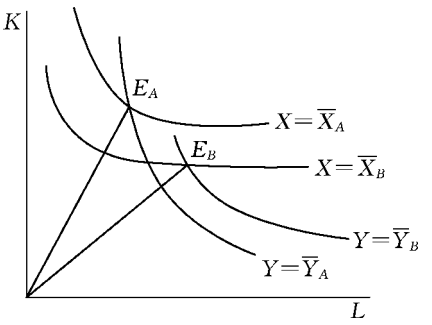


图 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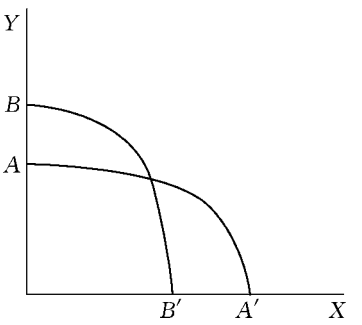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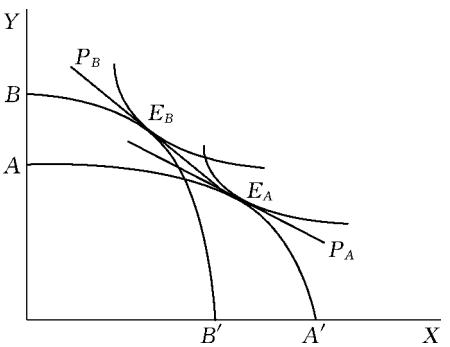


图 2.2

同样，B 地区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可用同样的办法确定。图 2.2 中，B 地区的生产可能性边界为 BB'。由图 2.1 和图 2.2 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生产技术相同条件下，A、B 两地区生产可能性边界的差异完全是由两地区要素禀赋的差异所造成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反映了一个地区的供给能力。A 地生产可能性边界相对偏向于 X 商品，这意味着在相同的商品相对价格下，A 地在 X 商品上的相对供给能力高于 B 地，而 B 地则在 Y 商品上的相对供给能力高于 A 地。于是可以得出结论：资本丰富的地区在资本密集型产品上相对供给能力较强，劳动丰富的地区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相对供给能力较强。

2. 存在完全地区壁垒条件下的相对价格

由于假设两地区需求条件完全相同。因此，在封闭条件下，两地区供给方面的差异将会造成两者相对价格差异。而供给差异又是要素禀赋差异造成的。所以，两地区相对价格差异完全是由要素禀赋差异引起的。



2.3 封闭条件下两地区相对价格的确定

图 2.3 中，A、B 两地区在封闭条件下的相对价格由社会无差异曲线与生产可能性边界相切决定。在封闭条件下，A 地的均衡消费点为 E_A，B 地的均衡点为

E_B。因为两地的消费者偏好相同，所以图中两地的社会无差异曲线形状相同。

通过 E_A 点的相对价格线 P_A 为 A 地区的均衡价格，通过 E_B 点的相对价格线 P_B 为 B 地区的均衡价格。不难发现，$P_A < P_B$，这表示 A 地区在 X 商品上具有比较优势，而 B 地区在 Y 商品上具有比较优势，即资本丰富地区在资本密集型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而劳动丰富地区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

3. H-O 定理

无区际贸易壁垒时，A 地区将输出 X 商品到 B 地区，因为 B 地区市场 X 的相对价格高于在 A 地区市场的价格。同理，商品 Y 将由 B 地区输向 A 地区。也就是说，A 地区出口 X，进口 Y；B 地区则相反。X 商品由 A 地区输入 B 地区的后果是 A 地区 X 的相对价格将上升，B 地区 X 的相对价格将下降，最终两地区 X 的价格趋向一致，即两地区面对相同的整个市场价格。

整个市场均衡价格由 A、B 两地区的相互需求共同决定。在图 2.4 中，A 地区 X 的过剩供给曲线（或出口供给曲线）与 B 地区 X 的过剩需求曲线（或进口需求曲线）的交点 E，决定了整个市场的均衡相对价格 P_{all}，图中整个市场均衡价格 P_{all} 处于 A、B 两地区封闭条件下的相对价格之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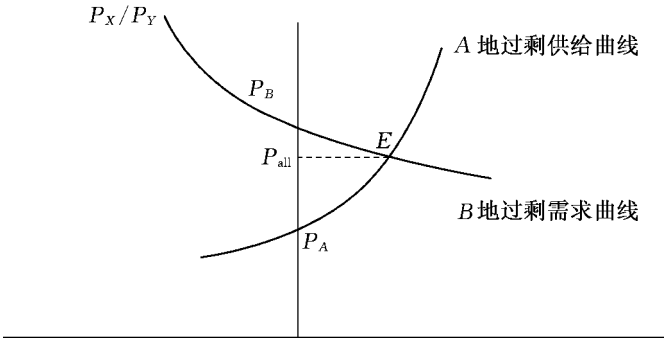


图 2.4　X 的过剩供给或过剩需求曲线

赫克歇尔—俄林理论认为，封闭条件下产品的相对价格差异导致国际贸易的发生。随着贸易的开展，产品的相对价格不断调整，贸易参加国国内的相对价格等于均衡价格，密集使用丰裕要素的产品的相对价格会因为出口的增加而上升，密集使用稀缺要素的产品的价格会因进口而下降。两个国家两种产品的价格最终会趋于一致。

产品价格的变化对要素价格的变化有重要影响。国际贸易可能导致要素价格均等化的论点首先由赫克歇尔首先提出。俄林则认为，虽然各国要素缺乏流动性使世界范围内要素价格相等的状态不能实现，但是商品贸易可以部分代替要素流动，弥补缺乏流动性的不足，因此，国际贸易使要素价格存在均等化的趋势。萨缪尔森于1948年发表《国际贸易与要素价格均等化》一文，在赫克歇尔—俄林定理的基础上，考察了国家贸易对生产要素价格的影响，论证了自由贸易将导致要素价格均等化(the factor-price equalization theorem)，该理论被称之为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定理(H-O-S定理)。萨缪尔森认为，在完全竞争和技术不变的条件下，产品的价格等于其边际成本($P = MC$)，边际成本由生产要素投入的数量和价格决定。国际贸易改变了产品的相对价格，必然也将改变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自由贸易将带来国际同质生产要素相对和绝对的价格均等。

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得出的结论建立在一国拥有的要素总量固定不变的基础上。但是在现实中，一国的要素数量经常在发生变化，比如人口的增长、资本的积累、自然资源的开发等。一般来说，要素总量的变化会导致一国生产可能性边界改变，从而影响国家的比较优势，甚至改变一国的国际贸易结构。

雷布钦斯基(Tadeusz M. Rybczynski)分析了在商品相对价格不变的前提下，一国要素数量的变化对生产的影响。他认为当商品价格不变时，一种要素禀赋的增加将导致需密集使用该要素的商品的产出量以更大的比例增加，同时会减少其他产品的产出。

要素禀赋理论虽然在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中获得了发展，但从理论上讲，要素禀赋理论的前提是各区域的供给条件、生产条件不变；各种要素在空间上具有不完全流动性。如果脱离了这一理论前提，要素禀赋理论是无法成立的。但现实中的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往往与该前提相矛盾，除了土地和一些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外，其他生产要素在区域间的空间流动是不受限制的。这也就是说，新古典贸易理论并不能很好地回答区域经济发展问题，这同时也说明传统的要素禀赋理论无法解释清楚区域尺度上的生产活动集中问题。

2.2 要素和要素禀赋

2.2.1 要素及要素分类

1. 要素

要素是经济活动的客观基础，是生产活动必须具备的主要因素或在生产中必

须投入的或使用的主要手段。经济学所要考虑的要素是动态变化的，其内容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

2. 经济要素与经济性要素

经济要素是指直接影响经济行为的要素。非经济要素是指不直接影响经济行为的要素。但是，严格来讲，对经济活动而言，无论是经济要素还是非经济要素，都发挥着作用。经济要素包括资本、劳动、土地、技术、知识、制度等，这些要素都是决定经济行为的主要因素。另外，自然要素和地理特征状况等非经济要素也影响经济活动主体的经济行为，但是经济行为不能支配自然要素的作用，只能接受自然要素所带来的影响。这些后天的经济要素和先天的自然要素、地理特征状况等共同构成了经济性要素。

从经济性要素与经济活动的相互影响角度来看，经济性要素影响或者决定经济活动和行为，而经济活动反过来也会影响经济性要素，特别是其中的后天经济要素。经济性要素是动态的。随着经济性要素与经济活动的相互影响，经济性要素不断地增强自己的总量和质量。

3. 区域性要素与非区域性要素

我们的经济活动或经济行为都离不开空间，比如，生产活动就关系到在哪儿生产，消费活动也关系到在哪儿消费。为了更准确地理解经济要素的空间含义，我们还可以建立“区域性要素”(regional specific factor)和“非区域性要素”(non-regional specific factor)的概念。与其他区分相比，这种划分具有更有效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有些要素是区域固有的，其他区域无法拥有这些要素，有些要素是普遍存在的，通过要素的空间移动，其他区域也可以拥有这些要素。前者就是区域性要素，后者就是非区域性要素。

如果说经济要素与非经济要素是从经济意义来划分的，区域性要素与非区域性要素则是从区域或空间意义来划分的。经济要素与非经济要素和区域性要素与非区域性要素之间不是矛盾的，而是存在相关联系。自然要素是非经济要素，也是区域性要素。资本和劳动是典型的经济要素，也是一般意义上的非区域性要素。

区域性要素与非区域性要素具有各自的特点。区域性要素具有非流动性、不可复制性、不可替代性、排他性、动态性的特征。但严格来讲，区域性要素的这些特征并不是区分区域性要素与非区域性要素的唯一标准。区域性要素与非区域性要素本身是相对的概念，也是动态的概念。

第一，非流动性。这是区域性要素的最明显特征之一。就空间角度而言，以往的理论把经济要素再区分为可流动要素和不可流动要素。与非区域性要素相比，区域性要素的流动性较低，并且，有的要素是根本不可流动的。

第二，不可替代性。经济要素可替代，资本可替代劳动，劳动也可替代资本，有些生产要素或资源可替代另一种生产要素或资源。但是，有些生产要素是不可替代的，只能在某个区位才可利用，这些要素应该是区域性要素。

第三，不可复制性。也就是不可模仿性。技术是一种重要的经济要素。但不可能全世界技术水平都是一样的，应该有高水平的，也有低水平的。要是一种技术谁都可以复制或模仿，这种技术就没有价值，也没有机会成本，不成为经济要素，更不是区域性要素。与此相反，有的技术就在某一个区位，其他的区位不会拥有这种技术，它就是区域性要素。

第四，动态性。区域性要素具有要素累积的特征，是因为它不是可流动的，也不是可替代的或可复制的。区域固有的或区域特有的要素不断地在某个区位累积自己的特征，并加强自身的价值。这也是自我累积或自我加强的过程。

2.2.2 要素的动态累加

要素是区域形成和发展、演化的客观基础。这一基础条件的变化也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就其本质来说，所有的要素都处于动态变化之中，无论是先天存在的自然资源、地理特征，还是劳动、资本等各种非自然要素。波特在赫克歇尔和俄林的基础上将要素分为低级要素和高级要素。其中，低级要素包括自然资源、气候、地理位置等，是自然赋予的；高级要素包括资本、通讯设施、掌握高技术的劳动力、科研设施和技术诀窍、制度等，是个人、公司和政府投资和其他行为的结果。低级要素能够提供最初的优势，这种优势可以通过对高级要素的投资得以加强和扩展；相反，低级要素的劣势可以促进高级要素的投资，如韩国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由政府投资建立国家科学技术研究体系并开展全民科技素质教育，为日后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事实上，波特的低级要素和高级要素和我们前面所说的先天自然要素、地理特征状况以及后天经济要素在内涵上是相同的，都属于经济性要素。

从短期看，矿藏等自然资源和地形地貌都难以改变或者不能改变，我们可以将其视为既定的。而除了这些自然性要素外，几乎所有的要素都处于明显的动态变化中，这种变化不仅在时间维度上有所体现，更能够体现在空间维度上的累加

效应。

这种累积效应可以通过图 2.5 来表示，图中分为时间维度和两个空间维度。在时间维度上，要素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处于运动变化中，劳动力的数量增加、质量的提高，制度的变迁以及资本的累积和内涵的扩展都会通过时间维度体现出来。在空间维度上，要素的累积可以表现如下一些效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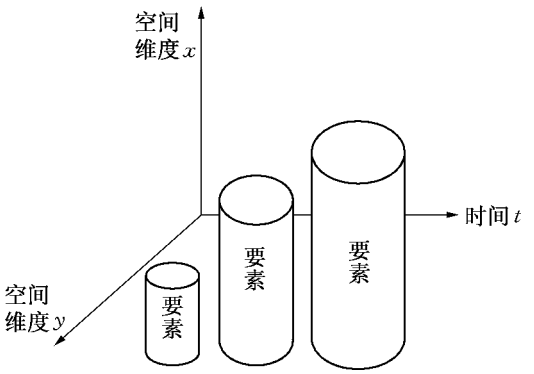


图 2.5　要素的空间动态累积

第一，资本和劳动力的空间聚集效应。资本和劳动力的累积可以通过空间的集中和分散得到表现。当资本在某一区位获得稳定的超额利润时，向该区位的资本聚集就不会停止，当劳动力可以在某一区位获得高额报酬或者很高的实际工资时，高质量的劳动力也会不断向这一区位聚集。

第二，土地的内涵式使用。土地是承载经济活动的物质载体，由于土地资源的有限性，土地在空间的累积不可能无限扩展，而主要体现在内涵式使用上，不断提高土地的经济承载力。

第三，技术的创新效应。根据新经济增长理论，技术创新和知识的溢出是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在一定地区，新知识的不断出现促进了技术创新，这种技术创新率先在某些企业和产业得到应用，之后向其他部门梯度转移，不断实现技术创新的企业和产业竞争力快速提高，会逐渐形成稳定的领先优势，而这又会促进其技术创新能力的进一步提升。

第四，制度的变迁效应。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一种独立的生产要素，制度创新和变迁也是经济变迁的重要力量。新制度的产生既可能是对原有制度的改良，但也有可能经过实践证明是不合理的制度。有效的制度变迁会产生累积效应，逐

渐形成稳定的制度结构，并成为进一步制度变迁的基础。

2.2.3 要素禀赋的内涵演进

要素禀赋(factor endowments)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拥有的资源状况。它是要素的客观基础条件，包括量的条件和质的条件。经济学是在既定的资源条件下追求最大化的，其资源条件就是要素禀赋条件。

经济性要素和要素禀赋所涉及的内容相同，既包括自然要素也包括各种后天形成的诸种要素，但这两个概念却并不雷同。要素是一个相对静止的概念，而要素禀赋却是经过要素动态演进而重新形成的稳定状态。图 2.6 描绘了经济性要素动态演变与要素禀赋的内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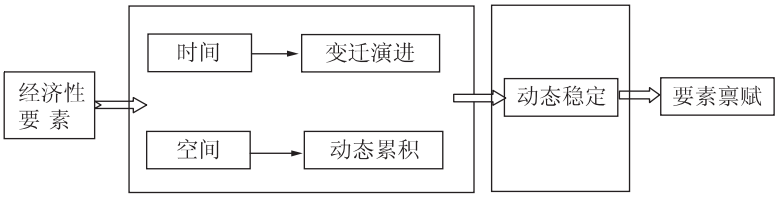


图 2.6 要素动态演进与要素禀赋的内涵

图 2.6 中，经济性要素同时在时间和空间维度动态演变，随着时间的延续，经济性要素或者出现数量上的变化，或者内容上的变迁，而在空间上则不断进行着动态的累积。这种变化不会呈现为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经常在某些时候表现出相对稳定的结构，此时的经济性要素就内化为要素禀赋的概念。当然，要素禀赋的这种稳定性只是相对的和暂时的，它会在新的层面表现为经济性要素的继续累积和演变，从而出现经济性要素→要素禀赋→经济性要素→要素禀赋这种螺旋式动态变化形式。每一次的经济性要素运动都是在更高层次的变化，区域经济的发展也伴随着这种螺旋式的要素变迁和运动。

要素禀赋是导致区域经济问题的根源。并且，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要素禀赋越来越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根本条件。

从要素的移动性来看，要素禀赋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自然资源等天然要素禀赋。第二类是人类投入固化在特定空间上所形成的后天要素禀赋。第三类是动态化的要素禀赋。第一类和第二类是区域性要素，第三类是非区域性要素。

有些要素是可移动的，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还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可以移动

的。这些要素可以称为非区域性要素。有些要素是不可移动的，或者是很难移动的，这些要素就称为区域性要素。正如前节所说，区域性要素是特定区域固有的要素，也是不可替代的要素。经济全球化使得我们重新认识要素禀赋。过去，要素禀赋是决定区域经济问题的或造成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条件。但是，经济全球化使得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地引来更多的（以前根本无法引来的）要素，与此同时，自己的要素也可以移动到世界各地。我们的现实似乎越来越接近主流经济学所假设的要素的完全流动性状态。但是，经济全球化越发展，我们越清楚地意识到有些要素是完全不可移动的，并且，是完全不可替代的。更高水平的技术之所以改变不了它，是因为这并不是技术的问题，而是经济的问题。

因此，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化，区域性要素与非区域性要素的区分越来越明显。要素禀赋对区域经济的影响不仅没有削弱，反而更加强了。

2.3 要素禀赋与空间分析

第1章中我们提出了经济空间是均质和非均质的有机统一，而要素禀赋恰恰是联系均质和非均质的纽带。本节将要素禀赋纳入经济空间，分析均质和非均质空间与要素禀赋之间的关系，并构建以要素禀赋为基础的均质和非均质有机统一的空间分析框架。

2.3.1 要素禀赋与均质空间分析

如果一定空间内，要素禀赋的差异较小，且其动态累积变化也相对均匀，那么这种空间就是均质空间。这种均质空间有两种状态，一种是所有经济性要素都呈现为均匀分布，地理特征相同、自然资源赋存一样，劳动力、资本基本同质，制度与技术的供给和需求也基本一致；另一种是某些先天性要素如地貌并不相同，但后天性的各种经济要素却一样，而分布不均匀的这些先天要素对于该空间的发展和演化不起主要作用（可以忽略）。

第一种状态下，均匀分布的自然要素对该空间的作用呈现同向，而由于自然要素变迁所需的时间极其漫长，相对静态的自然要素对该空间的经济行为具有一种不变的作用，针对这种空间进行分析研究，我们可以抽象掉自然要素，重点分析后天经济要素的作用，研究这些经济要素变化对经济空间的影响。在第二种状态下，自然要素虽然不均匀分布，但其作用可忽略，剩下只有后天的经济要素。

这种均质空间分析其实就是传统区域经济学、新经济地理学等研究的方法，它们或者不考虑自然要素禀赋的作用，或者对其进行了外生化假设处理。可以说，均

质空间分析是典型的新古典区域经济分析。各种要素在空间或区域上的分布是均质的，从而，我们可以建立完全竞争市场的理论框架，即生产所要的要素可以无限供给。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生产函数是规模收益不变，因而距离或运输成本是唯一的空间要素。

韦伯模型与后韦伯模型是以距离或运输成本为核心的。莫斯(Moses)引进要素替代并解释距离在区位选择中的作用。虽然要素禀赋或投入要素的可替代性在区位选择中具有重要意义，但是莫斯模型的局限是投入要素为固定的。莫斯在韦伯模型的基础上建立莫斯区位产量模型(Moses location-production model，以下称 MLPM)，两个模型的基本差异就是，韦伯模型假设投入要素的不可替代性，则 MLPM 假设投入要素的替代可能性。韦伯模型假设，生产一单位 m_3 所需要的每个投入要素 m_1 和 m_2 的数量是固定的，但是，我们都知道，微观经济理论中的替代性是企业行为的明显的特征，并且，微观经济理论中的效率条件意味着企业为了获得更廉价的生产要素随时都要调整其生产要素组合。

图 2.7 包括 M_1、M_2、M_3 和弧 IJ，M_1、M_2、M_3 分别表示投入要素 m_1、m_2 和产品 m_3 所处的地点，弧 IJ 表达离市场地点 M_3 的固定距离 d_3。如果我们假定企业只能位于弧 IJ 上，那么企业的 K 区位到市场地点 M_3 的距离没有变化。这样一来，MLPM 可以分析 m_1、m_2 两种投入要素的运输价格的变化所造成的影响。例如，假设企业位于 I 地点，生产要素 1 的运输价格为 $(p_1 + t_1 d_1)$，其价格之所以呈最低，是因为从 M_1 到 I 的距离 d_1 是最短的。而且，生产要素 2 的运输价格为 $(p_2 + t_2 d_2)$，其价格之所以呈最高，是因为从 M_2 到 I 的距离 d_2 是最长的。从而，在 I 地点，运输价格比率，$(p_1 + t_1 d_1)/(p_2 + t_2 d_2)$，呈最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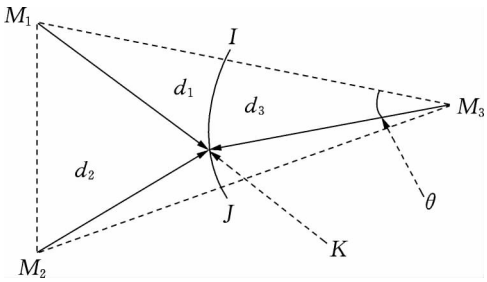


图 2.7　莫斯三角形

与此相反，要是企业移动到 J 地点，那么投入要素 m_1 的运输价格呈最高，投入要素 m_2 的运输价格呈最低，从而，在 J 地点，运输价格比率呈最高。运输价格比率形成预算制约曲线，并且，在弧 IJ 上的每个地点都可以形成一个预算约束曲线，从 I 地点移动到 J 地点，弧 IJ 上的每个地点都具有唯一的运输价格比率。这

意味着传统微观经济理论不适合于分析企业的区位行为。为了分析企业的区位特征，我们要建立包络预算制约，它包括在弧 IJ 上的全部预算制约。莫斯认为，包络预算约束线和等产量线的切点 E^*，就是最佳效率点，最佳投入组合就是 m_1^* 和 m_2^*，E^* 之所以意味着最佳区位 K^*，是因为最佳投入组合位于包络预算约束线上。预算约束线上的每个点都表明唯一的区位。从而，最佳投入组合和最佳区位应该同时决定。换句话说，当投入替代可能的时候，区位问题就是生产问题，生产问题也是区位问题。

企业的利润函数为 π：

$$\pi = p_3 m_3 - (p_1 + t_1 d_1) m_1 - (p_2 + t_2 d_2) m_2 - t_3 d_3 m_3 \tag{2.1}$$

$(\partial m_3 / \partial m_1)$是最优状态的投入要素 1 的边际生产，$(\partial m_3 / \partial m_2)$是最优状态的投入要素 2 的边际生产。式(2.2)是在最优状态中两个投入要素之间的边际替代率。式(2.2)是常数，即两个投入要素之间的边际替代率是固定的，意味着在运输方面不存在规模经济。在这个情况下：$(\partial t_1 / \partial m_1) = (\partial t_2 / \partial m_2) = 0$，并得出式(2.3)。

$$\frac{\left(\frac{\partial m_3}{\partial m_2}\right)}{\left(\frac{\partial m_3}{\partial m_1}\right)} = \frac{-m_2 d_2 \left(\frac{\partial t_2}{\partial m_2}\right) - (p_2 + t_2 d_2)}{-m_1 d_1 \left(\frac{\partial t_1}{\partial m_1}\right) - (p_1 + t_1 d_1)} \tag{2.2}$$

$$\frac{\left(\frac{\partial m_3}{\partial m_1}\right)}{(p_1 + t_1 d_1)} = \frac{\left(\frac{\partial m_3}{\partial m_2}\right)}{(p_2 + t_2 d_2)} \tag{2.3}$$

换句话说，以投入要素 1 的运输价格所除的投入要素 1 的边际生产等于以投入要素 2 的运输价格所除的投入要素 2 的边际生产。

那么，究竟什么样的空间能够满足上述两种状态，可以抽象成均质空间呢？

首先，根据斯密的分工理论，自然要素禀赋的结构对于决定分工结构具有重要作用，分工的转化受到自然要素禀赋的制约或者决定，舍弃或外生化自然要素禀赋的作用说明该空间具有特定的专业化分布，只有这样才能抽象掉自然要素禀赋的作用，因为一定的自然要素禀赋对于特定专业化分布的作用很难变化，故而我们可以忽视自然要素禀赋的作用。

其次，各种要素的均质分布必然导致具有相同区位指向的经济主体向该空间聚集，这一空间的经济主体特别是企业应该具有某些明显的共同性，例如相同的产

业属性，它们都偏好于这一经济空间均质化的制度、资本和技术环境。

满足上述特征的经济空间在现实生活中是存在的，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临空（港）经济区等等具有特定产业分工的经济功能区。经济功能区就是具有某种空间分工、各种要素相对均质分布的一类经济空间。

2.3.2 要素禀赋与非均质空间分析

在现实的空间中，既存在各种要素相对均质分布的经济空间，也存在着大量各种要素非均质分布的经济空间，因为不同区域的要素禀赋不可能是完全一样的，这导致其要素空间分布的差异。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仅看到并只研究均质空间，就不能解释和回答纷繁复杂且差异巨大的区域间的诸种问题和现象。现实区域存在的大量非均质现象要求我们还要关注和研究非均质空间。

从发达区域和欠发达区域来看，要素禀赋条件的差异是非常明显的。发达区域具有良好的要素禀赋条件，比如机制、制度、环境等。欠发达区域具有相对落后的要素禀赋条件。不同的要素禀赋条件让我们考虑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它的惯性。第二个问题是它的结果。初期要素禀赋条件决定该区域的长期发展路线，并且，良好的初期要素禀赋条件能够引进更多的要素，与此相反，初期条件落后的区域几乎没有这个机会。要素还可以分为可移动要素和不可移动要素。从而，要素本身不断地寻找更多机会的区域，而向它移动。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展，要素移动的机会和范围更加大了。但是，区域性要素则很难移动。

要素禀赋的差异造成区域差异，尤其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换句话说，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归根到底取决于要素禀赋的差异。这里，我们必须注意不同的要素禀赋形成不同性质的经济区域。比如，具有适合农业发展的要素禀赋的区域必然会发展农业，劳动要素丰富的区域应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以往区域经济理论体系最明显的弱点是不能回答区域是如何形成的，为此，只能假设区域是既定的。在此基础上，探讨区位选择问题，区域经济增长问题，区域经济发展差异问题等。但是，所有这些区域经济问题最终关系到要素禀赋，因为不同的要素禀赋条件形成不同的区位，而导致不同的区域经济增长方式的同时还造成增长或发展的差异，一旦形成了以初期要素禀赋为主的区域经济结构，往后的发展就受到其结构的惯性影响。

如果仍然从专业化和分工的视角分析，任何区域都是具有一定分工与专业化结构的空间经济组织。由于分工结构受到了要素禀赋的决定和制约，区域的差异

上经济要素的配置和分布问题，还要分析各种非经济因素对区域经济活动的约束和影响，以解释具体的区域经济现象，揭示具体的区域经济运行规律，解决相应的具体区域经济问题。

以要素和要素禀赋作为分析的起点，通过将各种具体要素进一步抽象，可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在此基础上，我们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将均质和非均质的空间分析有机地统一在一个空间分析框架中。在这个框架内，我们既可分析均质空间的形成、运动的规律及其对于区域经济的影响，又可以分析非均质空间的形成、运动的规律及其对于区域经济的影响。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和深入地把握经济空间的特性和本质，也有助于我们能较完整地分析区域经济问题。本书以下各章的分析都是循着这样一个思路进行的。

本章小结

空间均质和非均质的本质区别在于对要素分布的认识或者假设不同，这说明，要想将这两种不同的假设进行统一，关键在于重新理解和深化对要素和要素禀赋的认识。本章从亚当·斯密对于要素及要素禀赋的理解出发，重新诠释了要素和要素禀赋的内涵，并通过将各种具体要素进一步抽象，进行无量纲化处理，使其成为构建均质与非均质空间有机统一的分析框架。理解本章对要素和要素禀赋的分析对于把握全书的整体研究思路具有重要的意义。

思考题

1. 如何理解要素与要素分类？
2. 如何理解要素禀赋的涵义？
3. 本章所阐述的要素禀赋和国际贸易理论中的要素禀赋有何不同？
4. 要素禀赋理论对于本书构建均质与非均质有机统一的空间分析框架有什么意义？

参考文献

高进田:《**区位的经济学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金相郁:《**中国区域经济不平衡与协调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赫克歇尔、俄林:《**地区间贸易与国际贸易**》,**王继祖等译**,**商务印书馆** 1986 **年版**。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杨敬年译**,**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赵荣潜等译**,**商务印书馆** 1991 **年版**。

Acs, Z. J., 2000, *Regional Innovation, Knowledge and Global Change*, Pinter.

Alonso, W., 1966, *Location and Land Use: Toward a General Theory of Land Rent*, East-West Center Edition.

Arthur, W. B., 1994, *Increasing Returns and Path Dependence in the Economy*,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Calino, G. A., 1982, "Manufacturing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as Return to Scale: A Production Function Approach", *Papers of the Regional Science Association*, Vol. 50, pp. 95—108.

Chatterji, M. and Kuenne, R. E., 1990, *Dynamics and Conflict in Regional Structural Change*,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Crosby, R. W., 1983, *Cities and Regions as Nonlinear Decision Systems*, Westview Press, Inc..

Fridemann, J. and Alonso, W., 1964,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Planning*, The MIT Press.

Fujita, Masahisa, Krugman, P. and Venables, A. J., 1999, *The Spatial Economy: Cities, Region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The MIT Press.

Greenhut, M. L., 1995, *Spatial Microeconomics*, Edward Elgar.

Grossman, G. M. and Helpman, E., 1993, *Innovation and Growth in the Global Economy*, The MIT Press.

Hoover, E. M., 1975, *An Introduction Regional Economics*, Alfred A. Knopf Inc..

Isard, W., 1956, *Location and Space-Economy: A General Theory Relating to Industrial Location, Market Areas, Land Use, Trade, and Urban Structure*, The MIT Press.

Kawashima, Tatsuhiko, 1975, "Urban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in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Papers of the Regional Science Association*, Vol. 34, pp. 157—175.

Krugman, P., 1991, *Geography and Trade*, The MIT Press.

Krugman, P., 1992, "A Dynamics Spatial Model",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s No. 4217.

Krugman, P., 1996, *The Self-Organizing Economy*, Blackwell.

McCann, P., 2001, *Urban and Regional Econom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cDonald, J. F., 1997, *Fundamentals of Urban Economics*, Prentice-Hall, Inc..

Mitra, A., 1999,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as Manifested in Technical Efficiency at the Firm Level",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45, pp. 490—500.

Myrdal, K. G., 1957, *Economic Theory and Under-Developed Regions*, Gerald Duckworth & Co. Ltd.

Park, Sam Ock, 2000, *Modern Economic Geography*, Seoul: Arche.

Richardson, H. W., 1978, *Urban Economics*, The Dryden Press.

Richardson, H. W., 1978, *Regional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Richardson, H. W., 1978, *Urban Economics*, The Dryden Press.

Saxenian, A., 1996, *Regional Advantage: Culture and Competition in Silicon Valley and Route 128*,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Taaffe, E. J., Gauthier, H. L. and O'Kelly, M. E., 1996, *Geography of Transportation*, Prentice-Hall, Inc..

Tabuchi, Takatoshi and Atsushi Yoshida, 2000, "Separating Urban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in Consumption and Production",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es*, Vol. 48, No. 1, pp. 70—84.

Treyz, G. I., 1993, *Regional Economic Modeling: A Systematic Approach to Economic Forecasting and Policy Analysis*,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第 3 章

区　　位

区位是经济区域的构成单元和细胞，区位理论是区域经济学的理论基石。对区位的分析构成了区域经济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区域经济理论要得以发展必须始终贯穿把握空间问题，而区位恰恰能够充分体现经济活动的空间特征。如何从区位分析演绎出区域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构成了本书的重要任务之一。本章主要关注作为区域经济学研究基础的区位概念、特征及相关理论。

3.1　区位与区位理论

3.1.1　区位的相关概念

“区位”源于德文的 Standort，是 1832 年由 W. 高兹首次提出的。区位在 1886 年被译为英文“location”。日文译成“立地”，中文则译为“区位”。关于区位，研究的目的不同，其涵义也有所不同。“location”一词，除解释作空间内的位置（situation or position in space）外，还有放置和为特定目的而标定的地区两重意思。所以，区位与位置不同，它既有位，也有区，还有被设计的内涵。在传统区域经济学中，通常把区位理解为经济活动的场所。如企业活动的场所，就是企业区位。也有人将其理解为确定某经济活动场所的行为，即区位选择。

1. 经济区位与地理区位

地理区位是以地形、地貌特征表征的区位，强调在空间中的经纬度以及地理特征的差异性。经济区位则更多的强调由地理坐标（空间位置）所标识的经济利益差别。①

① 郝寿义、安虎森：《区域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3 页。

2. 区位单元

区位单元是指布局于某一区位上的某一社会经济统一体内的各个组成部分。它是经济区位的布局主体。根据研究的层次不同，区位单元的具体内涵也不相同。

3. 区位选择

区位选择是指经济活动决策主体为了追逐最大化的经济利益，根据自己的自身需要和相应的约束条件选择最佳区位的行为。

4. 现实区位和合理区位

区位可以分为现实的和合理的两大类，两者并不一致。现实区位不一定是合理区位。经济学的义务不仅在于解释现实，而更在于改进它。解决一个最优的区位比简单地描述一个现实的区位更有意义。

5. 区位因素

区位因素是指影响区位价值的不同影响因子。这可能既包括区位本身的内部性质，更强调区位的外部影响因子。区位条件的优劣是由三方面决定的：区位的位置条件、区位的交通条件以及区位的信息条件。有时候也被称为“区位条件”，即区位所持有的属性或资质。①

关于区位因素，韦伯认为：“作为区位的经济原因运作的力，即‘区位因素’。‘区位因素’是指经济活动发生在某个特定点或若干点上，而不是发生在其他点所获得的优势。优势是成本的节约，即在这个点上工业生产一定产品比其他地方生产的成本都低，在一地方实现一定工业产品的整个生产过程和分配过程比其他地方更廉价。”②韦伯还将区位因素分为：一般要素和特殊要素。运输成本、劳动力成本和地租是一般区位要素，这是因为它们以一种方式或另一种方式对各种工业都有或多或少的影响，所有的工业都应当考虑这些因素。另一方面，原材料易腐性、空气湿度对制造业过程的影响程度，对淡水的依赖等等为特殊的区位因素，因为它们只对特定工业有影响。韦伯还将区位因素分为：区域性因素和聚集或分散因素。韦伯称区位因素为区位因子(Standorts Factor)，哈特向与格林哈特称为区位因素(location factors)，艾萨德称之为区位力量(locational forces)。

---

① 李小建等编：《经济地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7 页。

② 阿尔弗雷德·韦伯：《工业区位论》，李刚剑等译，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第 33—34 页。

6. 区位指向

所谓区位指向(orienteering)[①]这一术语,在众多的区位文献中一般有两层含义。一层意味着区位选择的动机,也就是把考虑的因素看着是独一无二的或者是特别重要的;第二层含义意味着选择结果的记述或者同时提出选择的理由。

7. 边际区位[②]

边际区位(Grenglage)就是一个特惠点上的生产区位,它与区位指向的任何一种特殊类型相应。这样的特惠点也许是确定的、单一的,也许是不确定的、多重的。

3.1.2 相关的区位理论

区位论(location theory)是研究经济行为的空间选择及空间内经济活动的组合理论。简单地说就是研究经济活动最优的空间理论,即研究经济行为与空间关系问题的理论。19 世纪初杜能根据资本主义农业与市场的关系,探索因地价不同而引起的农业分带现象,创立了农业区位论。此后的半个世纪,西欧工业、特别是钢铁和机器制造业的蓬勃发展,以及交通运输水平的提高、尤其是铁路、轮船的普及,到了 20 世纪初,出现了以研究成本和运输费用为内涵的工业区位论。其先驱者是劳恩哈特(W. Launhardt),集大成者是韦伯,他创造性地提出了区位因子体系,从而创立了工业区位论,后来又由胡佛等人完善改进。20 世纪 30 年代初,德国地理学者克里斯塔勒根据聚落和市场的区位,提出中心地理论;稍后,德国经济学者廖什利用克里斯塔勒理论的框架,发展出产业的市场区位论,他们分别从市场和经济中心的角度发展了区位理论。此后,瑞典经济学家俄林把地域分工、国际贸易与区位加以综合分析,从而形成贸易区位论。

而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以艾萨德的《区位与空间经济》和贝克曼(M. J. Beckman, 1968)编辑出版的《区位理论》为主要成果标志,区位理论进入高速发展的时期,并扩展到区域科学和经济学的各个领域,一些经济学家从数学和其他学科引入多种方法和工具,不断对原有的区位理论进行修正和改进,构建新的模型,使区位理论更接近客观经济现实,为区域经济学等空间学科的不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

①② 奥古斯特·廖什:《经济空间秩序——经济财货与地理间的关系》,王守礼译,商务印书馆 1995 年版,第 35 页。

可以说，经济学的每一步发展都对区位理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和作用。从经济学发展历程看，我们可以归纳出如下几类产生了较大影响的区位理论：

1. 成本最小化的区位理论

成本最小化是很多学者们考虑区位问题的最初出发点。其理论核心是根据企业生产成本最低，确定企业的最优区位。杜能的农业区位论，将农业生产者的成本作为最重要因素考虑，但它只讨论了产品由产地到市场的运输成本，未涉及燃料原料及劳动力问题。从工业企业角度来讲，最早的成本学派代表人物是德国学者劳恩哈特，后由韦伯发展成系统学说。随后，许多学者紧紧围绕成本最小化的标准讨论区位问题。以成本最小化作为出发点的区位理论的基础是对于影响成本的区位因子的探讨和分析，从而得出工业（企业）的区位指向。例如，韦伯在一定的假定条件下，开始逐步提炼影响区位选址的区位因子，寻求运输成本最小化。他将区位因子分为：一般区位因子和特殊区位因子；区域因子和集聚因子。从而最终提炼出三个最为基本的区位因子：运输成本、劳动力成本以及集聚倾向。在这一基础上分析区位的“运输指向”、“劳动力指向”和“集聚指向”以及“总体指向”。帕兰德和胡佛进一步发展了韦伯的最小运输成本理论。帕兰德引入市场区（market area）概念，认为企业利润取决于从区位地点到市场区的距离的比例，并且空间竞争与交通体系的改善影响市场区的范围，进一步发展韦伯的静态的分析方法。胡佛将韦伯的运输成本概念修正为“边界线”（marginal line），并且引进了“最终总费用”（terminal cost）概念。边界线（market line）是“送达价格曲线”（delivery price curve），指生产成本和运输成本的总和。

2. 利润最大化为基础的区位理论

以韦伯为代表的成本最小化区位理论，在假定需求给定，而且对企业区位选择不产生影响，即不考虑需求因子作用的条件下，认为单一企业的区位选择的动机是追求费用最小。但是我们在分析企业行为时，发现企业选址关心的不仅仅是成本，还要关心其产品的市场需求，最终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在此基础上，廖什等人从需求出发，认为最佳区位不是费用最小点，也不是收入最大点，而是收入和费用的差最大点，即利润最大点，从而建立了利润最大化的区位理论。廖什认为区位的均衡取决于两个基本因素：对于个别经济而言，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就经济整体来说，是独立经济单位数量最大化。他认为后者是来自外部竞争的作用，前者是内部经营努力的结果。就是说个别经济单位如企业生产者会把自己的生产区位选择在能

够获得最大利润的地点，而消费者将自己的消费空间选择在价格最便宜的区位点。但就整个经济而言，通常存在许多的竞争者，当新的竞争者加入市场时，各经济单位所占有的空间会缩小到自己的利益消失点，这样经济整体内部存在两个力的作用：一是对空间的获取；另一是其他经济单位对空间的再夺取，各方的动机都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廖什认为区位是由这两个力的均衡点所决定的，区位间这种相互依存性带来的均衡，可通过区位一般方程式体系来表示。另外，最大利润区位理论与成本最小化区位理论相比较，其市场不再是韦伯等人研究的“点”状市场，而是蜂窝状的正六边形“面”状市场。廖什的区位理论在垄断竞争情况下，首先着眼确定均衡价格和销售量，即平均生产费用曲线和需求曲线的交点，在通过它来确定市场地域均衡时的面积和形状。也就是说在给定的经济空间内随着生产区位数量的极大化，使各区位得到的利润极大化，由这一条件出发来规定市场范围和形状。我们可以发现廖什在研究区位理论的时候更多地强调的是市场需求的作用。在廖什之后的纳斯（Hugh O. Nourse）和史密斯（D. M. Smish）则将利润最大化的区位理论发扬光大。纳斯分别研究了费用指向与区位选择关系和收入指向和区位选择的关系，指出不同的空间分布情况下，费用和区位、收入和区位有着不同的关系，进而指出从利润指向来分析，只有收入和费用的差最大的区位才有被选择的可能。史密斯则将韦伯的空间费用曲线和廖什的空间收入曲线进行叠加，得出利润空间差异曲线，进而根据利润最大化的原则，得出最佳的区位。

3. 空间相互作用为出发点的区位理论

空间相互作用为出发点的区位理论又被称之为“相互依存”区位理论。区位相互依存学派的代表人物是费特（Fetter）、霍特林（Hotelling）和张伯伦（Chamberlin）等经济学家。他们把不完全竞争理论引入区位论研究中，使区位论由完全竞争逐步走向不完全竞争。不完全竞争最简单、最典型的一种形式是空间竞争，即位置不同的生产者之间的竞争。

区位的相互依存学派假定生产费用一定，市场不是韦伯假定的点状市场，而是在地域中分布的市场（但在理论研究中，假定为线状市场）。企业产品的送达价格因区位不同而不同，各个企业都尽力以低于竞争企业的价格向消费者销售，而送达价格与克服企业与消费者间的距离所支付的运费大小有关。各个企业在选择区位时，都想尽量占有更大的市场地域，这样市场地域的大小受到消费者的行为和其他企业的区位决定行为的影响。某企业如果以低于竞争者的价格能够在某市场地域

销售产品，那么该市场就会被该企业所垄断。总之，该学派认为区位和市场地域间的空间模型产生于需求场所的差异和企业区位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相互依存区位论主要是研究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均衡状态的形成过程；探讨在直线市场条件下，存在两个竞争企业时，区位与市场地域的关系。费特主要研究了企业在尽可能将自己支配的市场地域扩大的竞争条件下，如何影响市场地域的形态。霍特林则用其经典的“沙滩卖冰”的例子，来说明相互竞争的供给者怎么选择区位问题。在霍特林之后，经济学者张伯伦认为，有第三个竞争者时，霍特林模型及其推演将会出现问题。两个供给者将在 1/4 地点布局，而第三者则在这两者之间的某地布局，并且随着企业数量的增加将会出现两个企业一组沿直线呈分散分布的趋势。这就是说，在需求无限且非弹性的条件下，生产区位向市场中央集聚，即霍特林的理论演绎是不可信的。另外帕兰德也对市场地域竞争问题进行了研究。后来对区位相互依存学派有重要发展的是格林哈特，他试图将最小费用区位和相互依存区位理论统一起来。格林哈特将区位因子分为：费用因子（运输、劳动和加工各费用）、需求因子（企业的相互依存或企图垄断特定的市场部分）、费用减少因子、收入增大因子、个人费用减少因子、个人收入增大因子以及纯粹个人考虑的因子。所谓费用减少因子是指集聚或分散产生的某种利益，如某种企业与其相同的行业在都市内部布局可得到某种外部经济。收入增大因子是指对销售产生影响的集聚和分散的各种作用力。个人的费用减少和个人的收入增大一般是指个人通过人际关系得到的利益。并且他指出对区位选择的影响也许纯粹属于个人的考虑，即满足度最大的区位通常会取代利润最大化区位。这一点已经显示出区位理论向行为分析方向的发展。

4. 行为—效用为出发点的区位理论

前面所论述的大都属于新古典区位理论，新古典区位理论一般都有三大假设：(1)最佳区位选择要求区位主体具有完全的信息和完备的知识；(2)区位选择的目的局限于成本最小化和收益最大化，亦即利润最大化；(3)企业组织是静态的和单一的。其实现实的经济活动中，区位主体实际上是在非完全竞争和非完全信息的条件下进行选择区位行为。行为区位理论一般将组织理论和心理学当成理论基础并重视区位主体的区位动机和选择过程，较为接近现实经济。行为区位理论使区位主体在企业内外环境下如何呈现出空间形态。

行为区位理论采用对个体主观因素的群体客观分析法，考虑了人的心理过程。

英国经济学者邓尼逊(S. Dennison)是最早提出者之一,他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对古典区位论提出批评,认为韦伯等人的区位是一种技术联系的空间或地域分析,而忽视了心理社会联系的另一面。实际上,只有同时考虑后者,才能对现实工业区位作出满意解释。1939 年,英国政治经济管理学会通过英国工业数量调查,作出《工业区位报告》,证明了社会因素的重要。由于心理社会因素难以定量化,或很难定量化,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美国学者普雷德,详细研究了行为因素对工业区位的影响。他发展了 D. 史密斯的空间成本曲线和赢利边际理论,完善了行为区位理论。

5. 强调政治经济、技术等外生变量影响作用的区位理论

长期以来,区位论的研究往往注重企业自身区位选择,而不去考察变化的政治经济、技术等外部环境。行为区位理论虽然涉及到企业内部组织和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但是其理论分析较为侧重于区位选择主体、组织内部结构以及管理特性等,而稍微忽略了产业区位的基本原因分析。20 世纪 70 年代的结构主义认为,产业区位的变化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物,也是对非空间经济现象的反映或者经济发展的结构产物。结构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或者生产过程就是企业行为或组织行为的整体结构框架。结构主义的另一种表现为依附理论。依附理论强调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对区位的影响,而批评其他区位理论尚未考虑资本主义体系对区位的影响。依附理论认为产业区位的变化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统治的副产物,其重要观点表明:企业区位形态并不是由企业或区域内部因素来决定的,而是由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结构与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来决定的。依附理论的核心是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所存在的剥削关系,依附区位理论是以这种剥削关系为特征的区位研究。结构区位理论的基本研究框架是宏观或整体角度,发现以往区位理论解释不足的"社会关系"和区位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空间形式。尤其是将"社会因素"(广义的意义)引进理论框架里。结构区位理论是从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角度来试图揭示区位的本质。

除了强调社会政治经济影响之外,还有一些人强调随着技术的变化,生产方式的转变,对于区位理论的影响。当然还有一些学者讨论其他的社会政治经济、技术等因素对于区位理论的影响。但大多侧重于这些因素的变化对于区位主体区位决策的影响。

3.2 基于要素禀赋的区位内涵和特征

上述理论大都集中在区位选择目标上,而对区位本身的概念很少涉及。这些

理论常常把区位与位置等同起来，这实际是个误解。区位与位置是两个既有联系又很不相同的概念。区位是位置和地域的整合，经济区位是位置与经济区域的有机结合，它既具有地域性和位置性，又具有二者整合的特性。区位既有位，也有区，还有被设计的内涵。经济区位是经济空间的细胞，是经济空间内用于区际联系的最小地域单元。地球表层上的任何事物与现象，只要我们从地理学的视角观察之，它就成为地理事物。而如果我们从经济学的视角去考察地球表面相应的人类经济活动及其作用物体，则可以将人、人类活动、人类活动之间的关系、人类活动作用的物体，看作为经济事物。经济事物具有两种基本存在形式，即经济实体和经济空间场。经济实体是指在地球表层系统中与人类社会经济活动有关的物质实体，如人、城市、企业、矿产等等，它们的显著特点就是具有内在的结构、独占的地理位置和相对高的密度，呈现相对离散分布状态。经济空间场则是经济实体作用空间的存在形式，是地球表层系统中与人类社会活动有关的可移动要素或因素组成的呈连续分布的动态系统，具有地理位置的非独占性和作用的选择性。经济空间是由经济实体与经济空间场共同组成的，是经济事物充填的地表空间。显然，从系统的观点看，区位作为地理空间的点，经济区位作为经济空间的细胞，必然是开放的和不稳定的。

区位之所以能够异于位置的概念，关键是区位蕴含了要素禀赋的所有内涵，我们对区位的研究就是在要素禀赋的基础上展开的，这种基础作用同时体现在区位的内涵和特征的界定上。

3.2.1 要素禀赋与经济空间场

人类经济活动的空间受到要素禀赋的约束，不同要素禀赋分布决定了其空间的属性。这里强调的经济空间的概念，要与自然地理空间相区别。自然空间是指未被人类劳动直接开发和利用的自然尺度的空间或地理空间，是一种自然物质运动的天然载体。但是经济空间强调的是空间资源被人类劳动开发利用。在商品经济条件下，这种开发利用还必须是社会所承认的。在这个意义上讲，空间满足人类需要并被人类加工利用，只是使空间具有了使用性，如果这种使用性仅仅是为了满足个人自己的需要，而没有受到社会广泛的认可，那么还不能算是商品经济意义上的经济空间。

经济空间的使用价值是由该空间要素禀赋的稀缺性所决定，空间要素禀赋的稀缺性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经济空间要素的供给缺乏弹性；不同空间的要素之间

不能或者难以相互替代。特别要说明的是，经济空间是由自然地理空间转化而来，这一转化历程也是要素禀赋动态累积的结果。

在一定的地理空间中，自然地理要素的不同区别了不同的地理空间。如果某一地理空间的初始条件能够满足人类经济活动，随着经济活动的展开，越来越多的后天经济要素就会在该空间动态累积，这种要素的动态累积伴随着经济主体的活动，弥漫了整个空间，形成了一定的覆盖范围，并向其周边辐射，这就形成一个经济空间场。要素禀赋和经济空间场的上述关系可以用图 3.1 来表示。在图中要素动态累积形成一定的辐射和作用范围，这就是经济空间场。这种经济空间场具有如下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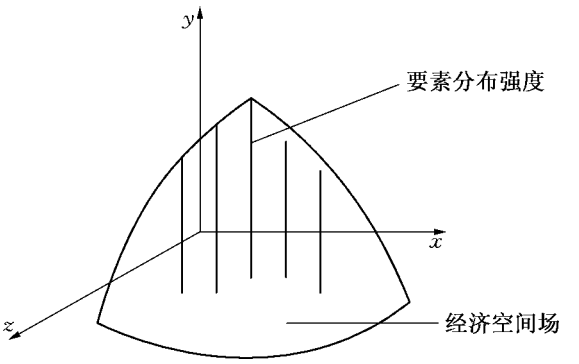


图 3.1　要素禀赋与经济空间场

第一，连续性。经济空间场不同于自然空间，它具有连续性特征。当然，这种连续性并不意味着经济空间场的强度是均匀分布。由于人们经济活动的非均匀性和要素禀赋的非均匀性，该经济空间场的强度分布必然不是均匀分布。但是，一个经济空间场的分异和独立应该表现为连续性。

第二，可累积性。经济空间场可以衡量社会生产力运动、经济运行的状况。一定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影响一定的经济空间场，生产力水平具有既得性，新的生产力可在既得生产力基础上得到发展，可以积累，因而经济空间场也具有可积累性。

第三，社会性。自然空间表征着宇宙世界物质运动的存在形式，毫无疑问它体现着空间的自然性。而经济空间场是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利用的稀缺资源和经济活动的产物，因而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不仅具有自然属性，而且还具有社会属性。

经济空间场代表了一种空间范围，是一定的要素禀赋及其作用的体现。一定

的经济空间场并不等同于一定的地理空间范围。

3.2.2 区位内涵重塑

在具体分析了经济空间场概念及相应特征的基础上，我们需要对区位与经济空间场之间的关系做一个比较客观的理解。这样才有利于我们对于区位概念的界定。

经济空间场是一个范围概念，其所涵盖的空间范围是一系列点的集合，这些点体现了所在位置的要素禀赋的性质和特征，并能够承载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这就是区位的含义。从宏观和微观视角讲，区位也是一种次级经济空间场。地理位置是“区位”的一般本意；而经济学所要讨论的“区位”则是有三个限定条件所决定，即区位是由内源、通道和外部影响（关于这三者将在后面的分析中给予界定）三方面决定的。从这也不难看出，在对区位的理解、分析上一方面要注重区位的内源分析，另一方面更需要关注的是其外部环境和条件。考察一定的地域空间，如果将其内部的结构和特征内化为其性质，而考察其面临的外部条件，就可以将这一地域空间看成是一个区位；如果考察一定地域空间的内部结构、自组织经济活动以及对外的经济关系，则可将这一地域空间视为一个区域来分析。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将一定区域内部的结构和经济活动内化为一定的性质，而考察其外部发展条件或对外部的影响时，可以将一定的区域看成是一个“区位”的概念。

区位选择思路的研究让区位理论逐渐从一个切入点慢慢融入到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研究经济活动主体的行为问题；另一方面，却使其逐渐丧失对区域经济，乃至空间经济的基石地位。区位理论被看作是区域经济、空间经济的基石，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永恒的真理。然后，正如前面我们所说，从现有的区位理论出发，越来越不能够解释区域经济和其他空间经济问题。最基础的问题，就是现有的区位理论很少注重区位与区域、空间关系的分析。在区域经济学、空间经济学研究中的零星的区位理论的运用，也难以承载“基石”的地位和作用。当然，不可否认，在这方面，宏观的区位理论要比微观的区位理论更有用。

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区位的经济研究，我们就需要一个新的视角。这一研究视角一方面要使其符合经济学分析的一般逻辑；另一方面要保证其对于区域经济、空间经济的指导意义。而这一视角的切入点正好可以从经济学的一般定义得来，即“经济学是研究资源配置的科学”。显然，对于区位的经济学研究，我们也许可以从“将区位作为一种资源或者一种要素”这一视角，进行“区位要素”的配置研究。本

章将从一个新的视角对区位问题进行分析，旨在剖析区位概念本身，进而指出：区位不仅仅是一个地理位置概念，也不完全是原有经济学研究认为的“区位代表经济主体在经济发展体系中所处地位”，而应该将区位（或者准确的说是经济区位）理解为“区位是经过人类物化劳动改造后的经济空间场，它代表一定的空间所承载的各种空间经济关系的总和”。这种“空间经济关系的总和”可以被看成是一种不同于土地的新的要素，或者是一种新的资源。

1. 区位的定义

根据这一思路，再基于前面的辨析，我们可以在经济空间场和经济关系概要表征观点的基础上，对区位这一直观的概念重新下一个定义。假定在一定的时间截面下，只考虑对一定土地支撑的单个区位进行定义，我们可以将区位定义为：区位既是空间的位置，也是各种经济性要素的有机结合体。

根据这一定义，我们可以对区位作出如下的理解：区位是依托于土地的特定经济空间场的自我维系系统。区位的本质是对经济空间场所承载的社会经济关系的一种浓缩性表征，该表征应该被所有相关的经济行为主体所感知，但是重要性会因人而异，有所差别。这样，区位就以一种自我实施的方式制约着经济行为主体的区位选择，并反过来又被他们在连续变化的环境下的实际决策不断再生产出来。

上述定义涉及区位的四个性质：内生性，信息浓缩特征，对于环境连续性变化和微小动荡的刚性和差异性。

具体地说，以上所定义的区位概念和研究方法具有如下一些重要的含义：

第一，区位是经济实体性与经济空间场性的统一。

经济空间是由经济实体和经济空间场这两种不同状态的经济事物组成的。在其细胞这个层次上，经济事物的这两种状态合二而一，从而使区位具有实体和场的二象性。区位的实体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它是依托于特定的土地资源；另一方面，它是对区位选择、区际联系有意义的最小地域单元。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区位具有内在结构和独占的地理位置。例如国家就是对国际而言的最小地域单元。在国际分析层次上，国家就是区位，而国内任何地域均不能称为区位。作为区位的国家具有特定的结构和独占的位置，也就是说国家是由区位的不可移动要素和因素相互联系而形成的所谓的经济空间场所，而且这一场所不允许另外国家占有。因此，人们通常认为区位是某种事物占据的场所，而场所的基本属性就是位置性，因此把区位理解为占有什么样位置，把区位论理解为位置论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

是，这种认识显然不够全面。之所以如此，原因是多方面的。长期以来地理学和经济学都过分注重实体问题的研究而对空间场问题有所忽视无疑是其重要原因。事实上，区位的场性，特别是经济空间场性的表现也十分显著。正是因为区位经济空间场性的存在，具有特定结构和位置的区位才能够在自己的周围建立起作用空间，即区位经济空间场。通过经济空间场的媒介作用和选择作用，实现区际联系和区际作用。由此可见，区位经济空间场是区位相互作用的媒介，其机理是组成区位经济场的流动经济要素或因素可在不同区位间流动，通过它们的相互渗透和组合，使不同的区位经济空间场叠加在一起，从而把不同位置的区位联系起来并实现区际联系。同时，这种经济空间场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通过聚集和辐射两种作用机理发生作用。依据场的通性，经济空间场不具备位置的独占性，但由于区位经济空间场是区位实体的作用空间，所以它虽不具有位置的独占性，却具有伴随区位实体的位置性。区位是其实体性与场性的统一，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为位置的独占性与非独占性的统一，是区位的地域性和位置性的统一。

第二，区位是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

经济空间不仅仅是经济事物充填的地表空间，而且这些经济事物通过相互关联并形成经济地理空间结构，即地球表层社会经济系统结构。这种结构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具体化，表现为主观经济空间与客观因素的相互关联。主观经济空间是人类在地表的经济活动空间，其载荷是人类及人类经济活动；客观地理空间是人类经济活动的地理环境空间制约，其载荷是地理环境所提供的各种资源因素或灾害因素。在地球表面，主观经济空间与客观地理空间在范围上可重合也可以不重合。因区位是经济空间的细胞，组成经济空间的主观、客观因素在经济区位这个层次上就合二为一，构成区位的双重属性，即主观性和客观性。这种统一性表现在区位的核心要素，即人的活动既受制于其主观需求又受制于客观环境供给。实际上区位活动本身就源于区位主观需求与客观供给的不一致。正是由于这种不一致，我们可把区位活动分为两部分：其一，区位主观需求与客观供给一致的部分，对应的是人类区内活动；其二，是主观需求与客观供给不一致的部分，对应的人类区际活动，也就是说要使这部分区位的主观需求与客观供给达到均衡，就必须超越区位的地域界线，实行区际活动。显然，区内活动由区位的实体性决定，而区际活动则由区位经济空间场性决定，但由于场的选择性，如果区位场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则由区位场性决定的区际活动也就不存在。这样尽管区位的

经济空间场性存在，但区位的主观性与客观性仍处在不均衡状态。要使区位达到均衡，就必须使区位的场性发挥作用。经济区位的主观性和客观性的统一，还存在于人们对于经济区位的评估和使用方面。同一经济区位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其客观的价值，但是其对于不同的经济活动来说，其价值不尽相同；不同的经济行为主体对于价值的认可也不尽相同。但是这不排斥经济区位价值的客观存在和客观标准。

第三，区位是动态性与阶段性的统一。

区位的动态性是指其空间范围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它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区位实体的内部结构、规模在不断变化，从而使区位场的强度处在变化之中，即使强度一定，其空间的影响范围也在变化；其二是区位在影响其他区位时所受到的阻碍作用在变化，这样即使区位实体不变，区位的空间场范围也处在变化之中。区位的这种动态性使我们很难把握区位的空间在某一时段的具体范围，但由于区位同时又存在阶段性，从而使我们至少可以把握空间在某一时段的变化幅度，由此可见区位阶段性的重要作用。区位的阶段性是指任何区位的发展均由若干阶段组成。这种阶段是由其发展的生命历程决定的，在这个由发生、发展、成熟到衰亡的生命历程中，存在若干发展的飞跃，不同的飞跃之间构成区位发展的一个阶段。也就是说区位，特别是经济区位也存在生命周期，只不过我们对其周期的阶段性把握不够。这与现实中的区位的兴衰与变迁是吻合的。

2. 区位的诸方面：内源、通道和外部影响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认为区位是一定的经济空间场，那么这一空间场包括哪些部分呢？我们认为一个完整的区位应该包括：内源、通道和外部影响。

内源是指区位依托的经济空间的要素禀赋、要素等级以及要素的聚集形态。要素是一个动态的概念，随着经济的发展，要素所包含的内容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说，要素至少可以分为：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人力资源、资本、技术、制度等。同时要素具有等级性，不同等级的要素对于区位价值的提升和创造的作用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说，由于其不可移动性和不可再生性，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可以被认为是最初级的要素；而资本、人力等要素则被看成是高一级的要素；至于影响作用更大、影响范围更广的技术和制度等则被认可为更高级的要素。另外，要素在一定经济空间上的聚集形态也构成了区位价值的本源。因此，就内源来说，聚集的要素等级以及聚集形态较为关键。

外部影响是指区位依托的经济空间所受到的外部性的影响及其对其他区位的外部影响的总和。外部影响构成了区位有别于土地与空间的一个重要特征。这种外部的影响可能是连续的,也可能是不连续的。而且这种影响是相互的。区位对于其他区位的外部影响是一种区位价值的体现和增值过程;而其他区位对于该区位的外部影响则构成了该区位的重要价值组成部分。这种影响可能是一种有形的,也可能是一种无形的;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通道则保证了区位所涵盖的经济空间场的完整性。前面我们指出区位的外部影响可能是连续的,也可能是不连续的。无论是连续的还是不连续的,彼此之间可能需要一个通道。这种通道可以是有形的,也可能是无形的。

3.2.3 区位的特征

在前面,我们分析了区位是一种经济空间场,是生产关系在特定空间中的浓缩表征,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要素资源。那么,区位有哪些重要的特征呢?

1. 区位的唯一性和相对垄断性

区位的唯一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每个区位都占有空间的特殊位置,具有不完全相同的经济空间场,所以不存在两个完全相同的区位;另一方面,由于要素禀赋分布的非均质性,不同区位的要素禀赋也不相同,并在一定意义上不移动、不可完全复制,于是每个区位相对于其他区位而言都具有唯一性。

区位的唯一性衍生了其相对垄断个性。区位作为一种经济空间场,其实也可以表示为各种社会经济关系所体现的制度的总和的影响。对于区位这种经济空间场的分析的基本单位构成可以看成是一个一个的经济行为主体。经济行为主体对于这种经济空间场,亦即区位的权利的有效性获得取决于三个方面:第一,有赖于该行为主体为保护这项权利所做出的努力(或者说为获得该项权利所愿意支付的费用);第二,其他行为主体企图分享这项权利的努力(或者说可以无偿享受该项权利的几率);第三,任何"第三方"所作保护这项权利的努力。对于区位来说这里的"第三方"可能更多的是指政府。当然,这些努力是需要付出成本的,特别是对于区位这种本身就是一个外部影响较强的"权利"载体和产物,其界定产权的过程和费用以及复杂程度有时都令人难以接受。因此,从这个角度出发,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不能界定出绝对的产权区位。区位这种经济空间场的产权的转让、获取和保护同样需要成本,这一方面因为获取这种"经济空间场"的各种有用性和潜在有用性的信息是有成本的;另一方面如何合理有效的界定和利用这种外部性极强的"经济

空间场”的行为是需要成本的。由于这些成本的存在,“经济空间场”往往被留置于“公共领域”里,由公共领域来负责培育和整合。例如,政府通过相应的规划等手段和措施来培育一个地区的“经济空间场力”,提升区位价值。很显然,这种区位产权具有相对的垄断性。

2. 区位的外部性

长期以来,空间在外部性的分析中,若隐若现,看似重要,又好像被忽视。例如,马歇尔所讲的外部经济,得益于“许多性质相似的小企业集中在特定的地方”;鲍莫尔所举的例子:“如一个地区本来鱼类资源稀少,任何一家鱼商如果在这里扩大作业,就会增加鱼的稀少性,从而提高其他鱼商的成本,这样就出现了负的外部性。”从中,我们发现区位由于其位置的相对固定性,是构成外部性的天然要素。所谓技术外部性、金融外部性只不过是外部性如何表现而已。而区位的外部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天然的,是外部性的基本类型和产生外部性的基本原因。当然这种区位外部性,不是简单地来源于空间的地理位置,而在于空间所承载的经济活动所带来的影响,或者说“就是我们所说的区位所代表的经济空间场”。这种经济空间场具有天然的影响和被影响特性,是外部性的根源。

从而,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得出几个相关的结论:

第一,区位外部性是最基础的外部性形式。根据我们的理解,空间(严格地说应该是经济空间)分布在一定程度上,是连续的,但一定程度上又是离散的。这就为区位外部性提供了存在基础。我们可以将空间依据其所依托的土地分割为一个一个单元即区位。这样每个区位由于其所代表的经济空间场,承载的社会经济关系的不同,构成了“经济空间场力”的不一样。这种不同的“经济空间场力”就会如同物理学上热量、能力不同一样,相互之间发生作用。而这种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又不可以通过“利益”的交换来实现,或者说隔断这种交换联系的成本和代价太高。这种“经济空间场能量”的彼此影响构成了最基础的外部性。在此,我们还需要强调事物的另一方面,那就是不同的“经济空间场”在另外的分析视角下可能又被看成同一个“经济空间场”。区位的外部影响是外部性存在的根源,不管是技术外部性,还是金融外部性都体现的是不同的空间位置上的经济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空间是各种经济行为主体和经济活动的载体。其独占性和不可重叠性注定了外部影响的存在,是外部性的根源。如果我们将一定空间上承载的各种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主体以及其相互之间形成的各种社会经济关系抽象为一定的经济空间场,

我们就可以认为外部性在某种意义上，是指这种经济空间场力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区位外部性是最基础的外部性形式。

其实这样来理解外部性并非本书的完整创新，例如澳大利亚华人经济学家黄有光教授就曾经有过类似的看法。黄有光教授认为，外部性是一种经济力量对于另一种经济力量的“非市场性的”附带影响，是经济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它反映这样一个事实，即经济效果传播到市场机制之外，并改变了接受效果的厂商的产生和由其操纵的投入之间的技术关系。

第二，空间成本的存在是区位外部性的基础。区位外部性是由于不同的“经济空间场力”相互之间的影响造成。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空间成本”在区位外部性问题中的意义和作用。空间成本是区位外部性存在的基础。这里所说的空间成本并不是指运输成本。虽然运输成本是因空间距离而产生，但是生产成本已包括了运输成本。科斯提出交易费用概念时没考虑空间的影响，没有涉及空间阻隔而产生的空间成本的付出。实际上只要存在空间距离，人们完成一笔交易时，总比位于同一经济空间内的交易者付出更多的费用，这种费用是由于不同的经济空间场力而产生的。跨“经济空间场”的交易一般来说，要显得更为困难。一方面，不同的经济空间场可能依托的土地是不一样的，所以空间距离上造成的交易频率和交易效率的下降，可能导致空间成本；另一方面，不同的经济空间场，可能的交易环境是不一样的。例如，不同的经济空间场，可能环境成本是不一样。这些环境成本可能是因不同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以及不同的自然条件所付出的额外成本。在具有不同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的地区以及不同的民族地区，对同一物品的认知是不同的，这样在这些物品的交易过程中必须付出额外的费用，或者有些物品是无法进行交易的。因不同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而引起的对某种物品的认知不同，因而所付出的额外费用构成了空间成本。

第三，聚集和辐射是区位外部性的具体体现。不同的“经济空间场”之间的相互作用，通常有两种方式，亦即聚集和辐射。这也就构成了区位外部性的具体体现。不同的“经济空间场”可以通过不同的“区位密度”来体现。区位密度既可以指某一特定要素在一定空间范围内的数量，又可以指整体的经济空间场力。由于“经济空间场”的连续和相对离散，不同密度的“经济空间场”之间必然发生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体现为聚集和辐射。

最后，我们特别要提到的是，在商品经济社会中，区位还具有商品的特性。商

品是需要经过交换、附载有各自相对优势的事物，它必须同时具有满足别人某种需要的有用性、交换性和相对稀缺性。商品具有价值与使用价值统一、分离的辩证属性。区位能够承载经济主体的行为活动而具有使用价值，同时，由于蕴含的诸种要素禀赋的和人类劳动的累积凝结而具有价值，所以，在商品社会中，区位具有商品的一般属性。

3.3 要素禀赋与区位变迁

地理学和经济学都使用区位的概念，二者的关键区别就在于经济区位更能体现经济主体行为和要素禀赋的结合。经济区位从形成到变迁都与要素禀赋密切相关。

3.3.1 要素禀赋与区位的形成

一定空间的地理位置都是和相应的自然要素禀赋相结合的。如果一些位置上拥有适宜的要素禀赋，那么某些经济主体就会选择在这些位置上活动。随着经济主体行为的展开，非自然要素也会形成累积效应。图 3.2 表示了自然要素和非自然要素在特定空间的累积和叠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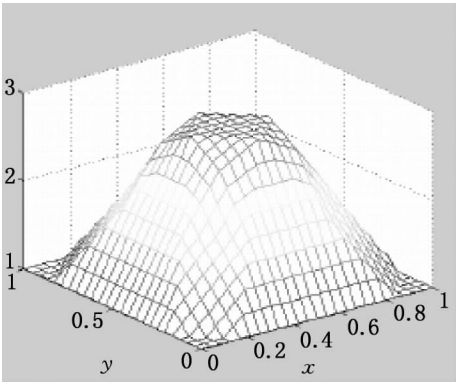


图 3.2 自然要素与非自然要素的空间叠加

在初始状态下，只有自然要素的分布，在图中 1×1 的空间范围内，相对均值分布。后来随着经济主体的活动，某些位置上出现了聚集效应，大量的非自然要素开始在这些位置形成累积，并和自然要素形成互动和叠加效应，图中的中心区域就是这样的一些位置。其实，有些要素是某些位置所固有的，其他位置无法拥有这些要素，有些要素是普遍存在的，通过要素的空间移动，其他位置也可以拥有这些要素。前者就是区域性要素，后者是非区域性要素。

区域性要素和流动的非区域性要素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程度上可以相互转换、相互替代。但是这种相互转换和相互替代往往是单向的。流动的非区域性要素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慢慢转换为区域性要素，而区域性要素却很难转换为流动的非区域性要素。反之，某些区域性要素能够实现对流动的非区域性要素的替代，而流动的非区域性要素却很难实现对区域性要素的替代。例如，资本、劳动和技术

相对来说是流动的非区域性要素；而制度、文化、历史积淀、地方金融、地方人力资本等则相对来说是区域性要素。要素重新选择区位时，存在空间成本问题，因此某些要素在特定区位上积淀之后，再重新选择区位的难度加大，逐步转换为区域性要素。在现实的社会经济活动中，区域性要素的作用变得更强了。

随着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复杂化，特定经济空间所表现出的经济空间场力在不断地增强，而区位正是这种场力的综合反映。因此，区位要素在时间维度上体现为量值的增大。要素沿时间维度上的累加性往往能够使得人文要素与自然要素之间形成一个密不可分的关系，也使得流动性要素向区位化要素转变。一定空间范围内这种要素在时间维度上的累加性可以通过下面的公式来表示：

t_0 条件下，生产由资本投资和劳动力投入决定，即产出 $Q = F(I, L)$。I 为资本投资；L 为劳动力投入。

t_1 条件下，生产则由资产、人力资本、追加投资、劳动力投入决定，即 $Q = F(K, H, \Delta I, \Delta L)$。$K$ 为资产，由部分的投资转化而来；H 为人力资本，由部分的劳动力固化在特定的经济空间内形成的；亦即 $I \rightarrow K$；$L \rightarrow H$。

t_2 条件下，生产除了要受到那些投入要素的影响之外，还会受到固化在特定经济空间上的空间场力的影响，而这种要素我们可以称之为区位。亦即：

$$Q = F(K, H, \Delta I, \Delta L, S)$$

S 为空间要素，具体体现为区位要素。这一过程就如同投资转化为资本、劳动力投入转化为人力资本一样。区位是各种要素随着时间的推移形成的综合场力。它会受到流动性要素的影响，但是更多由区位化要素所决定，而且一旦形成，改变则是缓慢的。

这种要素在时间维度上累加形成的综合空间场力构成了区位要素，区域性要素的形成与动态累积正是区位形成的关键。

3.3.2 要素禀赋与区位的变迁

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区位应该理解为特定的经济空间场，而且这种经济空间场的基本特征应该是一种共享的认知。同时，它产生于参与人（或活动）的互动均衡，并由此得以加强。区位的演进过程可能有两种路径。一种是自发的自组织增强或减弱；另一种则是在外力作用下，精心设计的演化。前者我们可以称为自主性区位变迁，后者则可以称为诱发性区位变迁。我们引入自主性和诱发性区位变迁

的概念的区分目的是为了强调单独的某项区位条件的变化并不是一个区位变迁的过程。其实在实际过程中，自主性区位变迁与诱发性区位变迁的区分并不是一目了然的。

1. 要素禀赋与区位自主性变迁

区位的自主性变迁实际上是跟区位的内生性有密切关联的。区位是一个自我维系、自我实施，不断再生产的过程。区位的自主性变迁是指构成区位所代表的经济空间场内的经济活动（或经济主体）以及其内在的相互作用机理之间，相互强化和同步稳定的演化过程。自主性区位变迁过程，实质上是将相应的区位要素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的一种固化过程，从而形成人们对该区位所代表的经济空间场的共识。这种固化后的区位又会形成自我增强的内在动力。区位稳定后，由于规模递增和网络外在性使得区位更为稳固。

区位的这种自主性变迁主要来源于区位内在的几个特性：

第一，区位的整体性。我们将区位界定为特定的经济空间场，是各种社会经济关系的概要表征。它作为共同认知，是区位涵盖的所有要素的综合，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它面对环境的微小而连续的变化是稳固和耐久的。同时，它作为一个整体，可以通过自身的、内部的交融或相互作用而不断增强。

第二，区位的历时关联性。区位作为一种经济空间场是存在于一定的时间维度内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区位在慢慢地演进。这里就存在区位的历时关联性问题。区位的产生可以被看成是各种要素相互嵌入和连接而形成。而固化各种要素，进而形成特定经济空间场的关系纽带，在时间维度上可以发生重新组合和重新捆绑。

对于既定的区位，其他要素的嵌入有两种可能：一种我们可以叫做“过渡性”区位嵌入；另一种则为“移植性”区位嵌入。对于区位自主性变迁起作用的应该是“过渡性”区位嵌入。

“过渡性”区位嵌入可以用图 3.5 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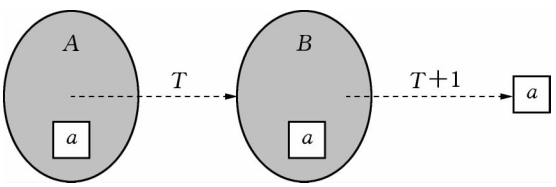


图 3.3 “过渡性”区位嵌入

图 3.3 中 A、B 代表两个不同的区位；a 代表某种要素；T 代表时间。

这种“过渡性”区位嵌入，并没有改变区位的内在要素，但是由于其历时关联性，其影响是保留下来的。区位 B 会因为要素 a 的“过渡性”区位嵌入的过程，而发生自主性变迁。这种变迁会影响到区位 B，同时影响相应的其他区位。

第三，区位的空间关联性。区位的空间关联性，是一种显然易见的事情。区位作为一种经济空间场既受到外部其他经济空间场的影响，又影响其他经济空间场。正是这种空间的影响使得区位可能会随着外部环境的细微和连续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与区位的这种自主性变迁相关联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区位惯性”。这里的区位惯性可能有两层含义，一方面是指这种自主性区位变迁，在一定时间段内或一定程度范围内，区位本身不会发生实质性改变。由于固有的区位稳定性，区位惯性存在。另一方面，是指区位内的经济主体（或者经济活动）因为其改变区位所要付出的代价的巨大，而沉淀于某一区位。

2. 要素禀赋与诱发性区位变迁

诱发性区位变迁，是指区位在外力或外部环境的巨大影响下，而发生区位变迁。例如，古航道的枯竭和衰落，使得周边的区位发生变迁；自然灾害、战争的破坏等等巨大外力的影响。除了这些非常明显的影响之外，还存在两种诱发性区位变迁。

第一，“移植性”区位嵌入与诱发性区位变迁。

我们前面在分析区位的历时关联时，曾经指出：对于既定的区位，其他要素的嵌入有两种方式。一种就是我们前面在分析区位自主性变迁时，所用的“过渡性”区位嵌入。这里，我们介绍另一种，即“移植性”区位嵌入。

“移植性”区位嵌入可用图 3.4 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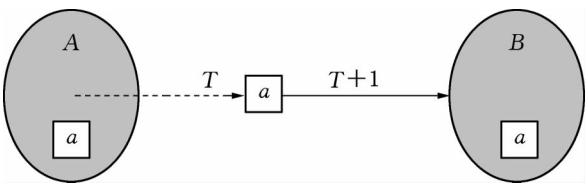


图 3.4 “移植性”区位嵌入

很明显，“移植性”区位嵌入，将会使得要素 a 停留在区位 B 内，从而诱发区位 B 中的各种要素的重新组合和重新捆绑，进而带动区位发生变迁。当然这里的要素 a 可能是资本、技术等有形、物质要素，也有可能是制度、文化等非有形要素。随着时间的推移，要素 a 将被融入到区位 B 中，不再明显显现出来。

第二，外部要素影响与诱发性区位变迁。

这种情况是指在具有较强互补或竞争的邻近区位发生巨大区位变迁时，可能诱发原有的区位发生变迁。这种外部影响还有可能体现为“通道”的变化。通道作为区位的诸要素之一，也会导致诱发性区位变迁。通道的改良或衰败，会影响到区位的影响价值和获益价值。因此，必然也会导致诱发性区位变迁。

当然，外部冲击本身也许不足以从根本上引起区位变迁。这种区位所代表的经济空间场的变迁，根本动力还在于区位自身的调整和变化。在这个过程中区位再选择成为了关键。例如，前面所看到的“移植性”区位嵌入，就是一个要素区位再选择的过程。也正是类似这样的过程，构成了区位的变迁过程。

3.4 区位差异与区位主体偏好

区位的唯一性决定了不同区位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集中表现为区位要素的异质性。而区位的差异化又与区位主体偏好的多样化相对应，区位的差异化和区位主体偏好的多样性共同决定了不同的区位选择行为。

3.4.1 区位的影响要素

从定义出发，我们知道区位的构成要素，也就是经济空间场的构成要素，亦即各种各样的社会经济关系，都与要素禀赋密切相关。

1. 自然资源禀赋及土地资本性投入

自然资源禀赋反映的是自然恩赐的结果；土地资本性投入，是指人类劳动固化到土地上的那部分资本。虽然这两项是构成元区位的主要要素，但是其产生的影响，例如原料地所带来的运输成本的节约、固有的资本性投入带来的交易成本的下降，都会对我们这里所讲的“作为经济空间场”的区位产生影响。

2. 经济行为主体

经济行为主体的经济活动直接产生经济空间场。经济行为主体也构成了区位的供给与需求，对于经济空间场的形成起到主观能动作用。同时，经济行为主体也形成了一定的产品供给和需求场力，对于区位的形成和发展具有至关重要

的作用。

3. 分工、专业化水平

分工与专业化带来了生产效率的提高，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从本质上决定了“经济空间场”的量能。分工、专业化水平越高，所代表的区位的“经济空间场力”越强。分工、专业化网络的形成，大大提高了交易效率，降低了交易成本，为经济空间场力的增强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特定土地依托下的区位所代表的“各种社会关系”更为复杂有序。这一区位对于其他区位的引力和影响力也就会增强。

4. 人力、技术影响

在现代经济发展中，人们似乎不再怀疑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了。良好的人力资本条件为经济空间场力的提升提供了主观的、源源不断的创造力；技术则通过改变其他要素的形态和质量来实现自身的价值。不同的技术决定了各种要素在经济活动中的结合方式；技术进步不断改变劳动手段和劳动对象；技术进步促进劳动力质量的提高；技术进步促进分工、专业化水平以及产业结构的优化。

5. 信息网络

伴随着技术革新而来的信息网络的构建，为经济空间场力的提升提供了便利的条件。通过信息网络组建、凝聚的经济空间场力可以消耗更少的人力投入，而且便利、快捷。

6. 制度

制度可定义为行为规则，这些规则是有关社会、政治和经济行为的。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以约束行为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个人行为的规则、守法程序、道德和伦理的行为规范。现代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资源的有效配置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要素的配置效率决定着经济增长速度，而经济制度又影响资源配置效率，进而影响经济增长。制度作为影响区位所代表的“经济空间场”的时候，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不仅包括成文的法律、法规等管理制度，还包括一些潜意识的习惯等本元制度。制度对于“经济空间场”的作用在于稳定。相应的制度能够在一定时段内稳定相应的经济空间场。

对于前面所说的区位的构成要素，我们可以通过图 3.5 来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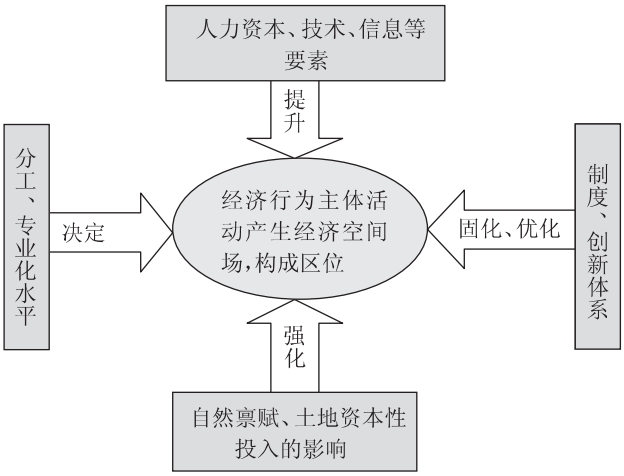


图 3.5　区位影响要素关系结构图

我们可以明确进一步分析的要素及要素禀赋对于全新的区位理解具有实质性意义。不同的要素从不同的侧面对区位产生影响。

3.4.2　区位差异

区位要素的异质性，是由其构成要素的差异性及其组合形态的不同而决定的。区位要素的异质性和区位差异性之间的关系可以表述如下。

1. 土地因子与区位差异性

区位要素作为经济空间场与土地这一载体之间密不可分，土地对于区位差异性的影响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土地的自然特性。土地的自然特性包括土地所处的空间位置（经纬度）、与其他自然环境要素的相互关系（气候、水文条件）、土地的形态（大小、地形、地貌等）以及土地的地表物质构成（如土壤、岩石、植被等）。土地的自然特性在空间分布上是不均质的，最为明显的表现为土地的经济区位差异。同样面积与自然特性相近的土地，在城市和农村的利用价值相差悬殊，正是这种差异性带来地租的差别。很显然，土地的这种自然特性差异就决定了土地承载的区位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差异性。

2. 原材料因子、能源因子与区位差异性

原材料因子、能源因子主要是通过区位蕴藏、运费大小、原材料的可运行、可替代性，以及价值尤其是在产品成本中的构成状况对区位要素施加影响。不同的区位本身所蕴含的原材料的种类、数量和质量都有可能不同，同时由于区位依托于一

定的地理空间，原材料的运输成本、替代性等也会存在差异。因此，原材料的地理空间不均质也同样造成了区位要素的差异性。

3. 资本因子与区位差异性

资本不仅仅指金融资本，也包括厂房、设备等固定资本。很显然，厂房、设备等固定资本不能轻易移动，这种不可移动性，导致了区位的差异性。另一方面，金融资本也会根据自己的法则在不同的区位之间进行流动，这种流动会改变区位要素的量能和内部要素组织结构，也必然会影响到区位的差异性。

4. 劳动力因子与区位差异性

劳动力无论是在质还是在量上都存在着空间的差异。劳动力的空间分布差异以及劳动力移动上的摩擦等因素导致劳动成本存在着空间差异。劳动力因子也是构成区位要素的重要影响因子之一。它在空间上的非均质直接导致了区位的差异性。

5. 市场因子与区位差异性

市场是经济活动生存的空间，是经济活动价值实现的场所，也是区位要素实现价值的途径。市场因子对于区位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市场规模差异，市场规模直接影响到经济活动的合理性，影响经济活动的类型和规模；第二，市场特性的差异，市场不仅有规模之差，更有内容之差，不同的市场特性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第三，市场环境的差异，这里就包括竞争、秩序、管理、意识等差异。一方面，区位所处的市场的差异决定了区位的差异性；另一方面，区位所蕴含的市场的差异性，也直接决定区位的差异性。

6. 环境因子与区位差异

这里的环境因子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自然环境更多地体现为区位的生态环境，人文环境则包括政府行为、政府政策环境、产业发展环境、市场经济环境、制度环境、社会环境等。不同的区位由于其演进的历程不尽相同，必然造成这种环境上的差异，而这种差异也必然反过来反映为区位要素的差异。

7. 交通因子与区位差异

交通因子，更广泛地说是区位的对外通道因子，对于区位的差异影响，也很容易理解。我们前面在强调区位概念的时候，就特别强调区位这种经济空间场，其本质的特性还在于其与外界的联系，亦即外部性特征。通道的差异直接会影响到区位的差异。

综上所述，区位由于其构成因子的差别，必然存在着差异性，而这种差异性导致了由区位组成的空间的非均质性。

3.4.3 区位主体偏好

所谓区位主体就是区位选择的主体，可能是企业、居民，也可能是各级政府组织等。不同的区位主体有着不同的区位主体偏好，一般来说，居民偏好于选择能够实现其效用最大化的区位；企业偏好于选择能够实现其利润最大化或者成本最小化的区位；政府则偏好于能实现居民福利最大化或者自身所得最大化的区位。

当然，在现实生活中，区位选择主体偏好的表现形式可能更加众多。例如，在居民的住房选址时，在收入和房屋价格一定的情况下，很多居民偏好于通勤成本最小化。而事实上，这一偏好并不与效用最大化偏好相悖。这是因为，经济主体最优化行为面临诸多要素约束，当约束条件发生变化时（如约束变量增加或者减少），可能会衍生出多种等价的最优化表现形式。下面我们以企业的偏好为例对几种典型的主体偏好进行分析。

1. 成本最小化偏好

成本最小化偏好可以集中体现在经典模型之一的劳恩哈特—韦伯模型中。对于那些预先没有指向一些特殊区位要素的厂商行为，该模型认为：厂商对市场和资源要素禀赋好的区位较为敏感，产出和投入的数量既定，且运输成本由厂商承担，在此条件下厂商将选择运输成本最小的区位为最佳区位。

2. 利润最大化偏好

以韦伯为代表的最小费用区位论，在假定需求给定，而且对企业区位选择不产生影响，即不考虑需求因子作用的条件下，认为单一企业的区位选择动机是追求费用最小。以霍特林为代表的区位相互依存学派，在假定线状市场上存在相互竞争的企业的情况下，认为能够占有更大市场份额（销售量）的区位就是最佳区位。与其不同的是，微观经济学认为，厂商追求的终极目标不在于费用最小化，也不是收入最大化，而是收入与费用之差，亦即利润最大化。因此，利润最大化是厂商进行区位选择的标准。韦伯假定，需求和价格是既定的，因此收入也就是既定的。实际上，需求随着价格的变化和市场区范围的不同而不同。各生产区位所依托的市场区范围不同，总需求也就不同，而总需求不同就导致收入的不同，结果最佳区位就会发生变动。

利润最大化偏好表明厂商如何同时选择其价格政策、区位和投入要素组合，使得其利润最大化。

3. 综合偏好

现代企业理论认为企业是一个复杂性的制度安排。企业的区位选择将是具有差异目标的多主体在不确定情况下的综合考量结果。因此，研究一个企业的区位选择不仅需要考虑其成本和直接的市场收益两方面，还需要考虑企业的组织行为和决策过程。我们可以利用图 3.6 来表示现代企业的区位选择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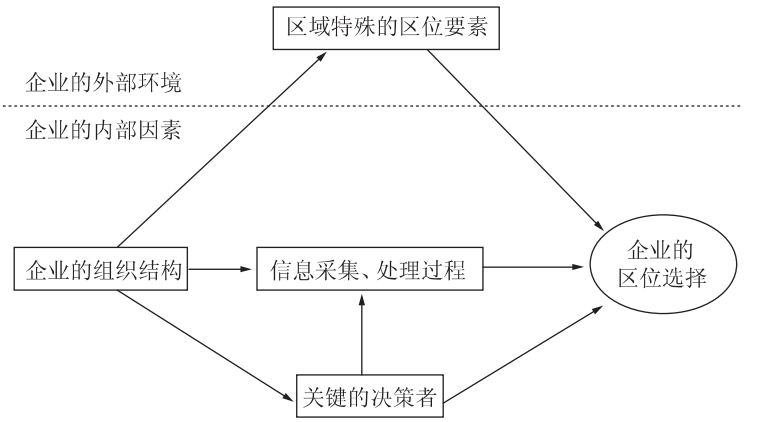


图 3.6　现代企业的区位选择

第一，区域特殊的区位要素。

区域特殊的区位要素可以理解为本章所讲的特定的“经济空间场”，亦即“经济区位”。它反映的是一定的经济空间的本质的经济条件。这种客观存在的经济条件，是可以比较的，而不需要考虑企业的行业类别和性质。当然，对于不同产业的企业来说，这种客观存在的经济条件中的某些要素的贡献作用或者说制约作用可能不尽相同。

对于这种区域特殊的区位要素，许多学者都通过相应的实证调查研究，总结归纳。莫里亚蒂(Moriarty)对 1969—1974 年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建立的 530 家制造业工厂进行了研究，并把注意力集中在来自北卡罗来纳之外的美国企业建立的 60 家工厂上。施梅纳(Schmenner)研究了在全美国建立分支工厂的大量企业，既考虑了区域/州的选择问题，也考虑了厂址的选择问题。霍奇金森等人(Hodgkinson、Nyland and Pomfre)对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 265 家企业进行了问卷调查，考

察影响企业扩张和区位重新选择的主要因素。他们挑选出影响企业建立新的分支机构或进行区位重新选择的 28 个因素，并要求企业对这些因素逐一进行打分，分值为 1—10 分。结果发现，基础设施、接近市场、生活质量和成本因素仍然是比较重要的区位决定因素。与 20 世纪 70 年代的一些经验调查相比，劳动力市场因素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而基础设施特别是通信网络的质量和区域的形象开始变得更加重要。这就表明，区位主体偏好中，劳动力市场因素的权重在下降，而重要及做出设施以及区域软环境等所占的权重却越来越大。①

第二，信息处理、评价过程。

信息的收集、整理及评价过程对于区位决策非常重要。它包括："决定需要什么样的信息"、"怎么去收集、整理相关信息"以及"如何去评价相关信息"，这些都会因为企业个体的不同以及它们相关的经验、能力和组织结构的不同而不同。

另外，这一信息处理过程还会受到企业的关键决策者的影响，他们可能会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喜好，对具有一定特殊特征的区位具有一定的偏好。

第三，区位决策者的影响。

区位决策过程必然涉及人的问题，具有不同组织结构的企业在进行决策过程时，可能会涉及到不同部门或等级的人员。关键决策者对于特定区位的偏好也会直接影响到一个企业的区位决策，有时候甚至成为关键性因素。

3.4.4 区位选择

区位选择的主体，从表面上或者从以往的一贯的研究视角来看，应该是各种经济行为主体。这些经济行为主体既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企业，还可以是政府。但是，如果从另一个视角出发，我们也可以将区位选择的主体界定为各种经济活动。例如，住宅、公共设施、商业、农业、工业等等。区位作为一定的"经济空间场"可以被这些活动所占据。这些活动选择了相应的区位。

根据前面对于区位选择对象和区位选择主体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相应的区位选择原则。

1. 生产活动的区位选择原则

一般来说应该是区位选择所带来的利润最大化。一定的生产活动进入一定的经济空间场，必然要求获得最大利润。即使短期内为了某种原因，不一定能够获得

① 魏后凯：《现代区域经济学》，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58 页。

最大利润，但从长期来看，它最终还是为了获得最大利润。区位所代表的特定的经济空间场，具有相应的区位优势，能够为生产活动提供相应的收入来源或者相应的成本节约。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相同的生产活动在不同的经济空间场，以及不同的区位上，可能有不同的产出效果，从而获得不同的利润。

图 3.7 可以用来表示区位利益对产出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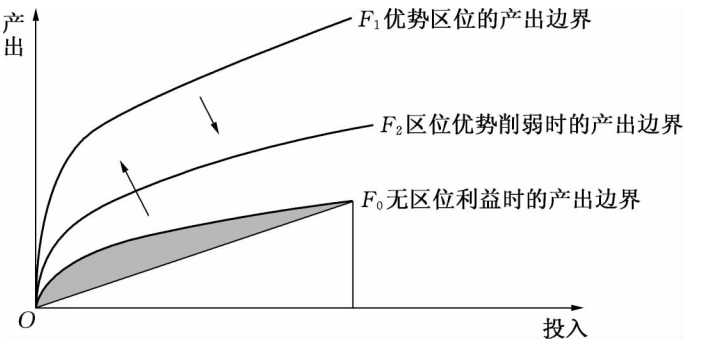


图 3.7　区位利益对产出的影响

2. **公共设施区位选择的原则**

根据相关资料，公共设施的区位选择原则，可分为两种：效率追求型公共设施区位选择和公平重视型公共服务设施区位选择，下面引用两个模型①来说明这两种选择原则。

第一，效率追求型公共设施区位选择。

效率追求型模型由 p-中值问题（p-median problem）发展而来，所谓 p-中值问题就是寻找需求地点和设施区位点间的总移动费用最小化问题。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可把最小费用转化为最短距离，总移动距离最小的地点称为中值。模型的基本结构是由几个制约条件和目标函数组成。

例如，目标函数为：

$$\min Z = \sum_i \sum_j a_i d_{ij} x_{ij}$$

制约条件为：

---

① 模型转引自彼得·尼茨坎普主编：《区域和城市经济学手册》第一卷，安虎森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33—135 页。

$$\sum_i x_{ij} = 1 \leftarrow \forall_i$$

$$y_j - x_{ij} \geqslant 0 \leftarrow \forall_{i,j} \sum_i y_j = p$$

$$x_{ij} = 0, 1 \leftarrow \forall_{i,j}$$

$$y_j = 0, 1 \leftarrow \forall_j$$

其中，a_i 为在地点 I 的需求（人口）；d_{ij} 是地点 I 和 j 间的最短距离；x_{ij} 表示地点 I 的居民如果利用地点 j 的设施，则为 1，否则为 0；y_j 表示在地点 j 布局时为 1，否则为 0；p 为设施数。a_i 和 d_{ij} 是外在变量；而 x_{ij} 和 y_j 是需求的内在变量。

第二，公平重视型公共服务设施区位选择。

公平重视型公共服务设施模型包括两种类型：一是最大最小化原理问题；二是最大覆盖（maximal covering）原理。最大最小化原理问题与前面讨论的效率型公共设施决定一样。这里介绍一下最大覆盖原理。在最大覆盖原理基础上的公平重视型公共服务设施模型是指在距设施一定的范围内，以尽可能向更多的居民提供服务为目的，即距各设施一定的范围 S 内包含的需求地域最大化。最大覆盖原理可进行如下定义：

目标函数为：

$$\max Z = \sum_i a_i z_i$$

制约条件为：

$$\sum_{j \in N_i} y_j - z_i \geqslant 0 \leftarrow \forall_i$$

$$\sum_i y_j = p$$

$$y_j = 0, 1 \leftarrow \forall_j$$

$$z_i = 0, 1 \leftarrow \forall_i$$

其中，z_i 表示地点 I 被覆盖时为 1，否则为 0，其他变量的定义与 p-中值问题相同。目标函数表示被覆盖的需求（人口）最大化，制约条件 $\sum_{j \in N_i} y_j - z_i \geqslant 0 \leftarrow \forall_i$ 表示覆盖地点 I 的设施至少有一个以上，地点 I 才能被覆盖。其他条件与 p-中值问题基本相同。

还有其他经济活动的区位选择的一些基本原则和模型，这里不再一一分析。

在现实经济中，我们观察到经济主体的区位选择往往具有空间聚集的倾向。对于区位选择形成聚集经济的分析构成了下一章的研究内容。

本章小结

在以往的区域经济学中，区位仅被简单地解释为位置，基于这一理解，作为区域经济学基础概念的区位不具有任何拓展性。我们不能从区位延伸出区域经济学的其他概念。延续上一章中关于要素和要素禀赋的相关分析，本书将区位概括和理解为一种经济性要素，这种全新的解释对于构建以区位为基础的区域经济学理论体系有着重要意义。

本书发展的区位理论是基于大量前人理论基础的梳理和把握上，因此全面、深刻掌握区位的相关理论文献对于学习本章理论有着积极作用。

思考题

1. 怎样理解区位的含义？区位有哪些特征？
2. 为什么说区位是经济区域的构成单元和细胞？
3. 如何理解区位理论是区域经济学的基石？
4. 请分析阐述要素禀赋、区位形成和变迁之间的关系。
5. 怎样从要素的视角解释区位差异？

参考文献

高进田：《区位的经济学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阿尔弗雷德·韦伯：《工业区位论》，李刚剑等译，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

埃德温·S. 米尔斯主编：《区域和城市经济学手册》第一卷，郝寿义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埃德温·S. 米尔斯主编：《区域和城市经济学手册》第二卷，郝寿义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安虎森主编:《区域经济学通论》,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奥古斯特·廖什:《经济空间秩序——经济财货与地理间的关系》,王守礼译,商务印书馆 1995 年版。

保罗·切希尔主编:《区域和城市经济学手册》第三卷,安虎森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彼得·尼茨坎普主编:《区域和城市经济学手册》第一卷,安虎森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陈秀山、张可云:《区域经济理论》,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版。

郝寿义、安虎森:《区域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胡晓鹏:《从分工到模块化——经济系统演进的思考》,《中国工业经济》2004 年第 9 期,第 40—45 页。

李小建等编:《经济地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

孙久文、叶裕民:《区域经济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魏后凯:《西方区域经济学及其发展——西方区域经济学述评》,《开发研究》1996 年第 2 期,第 9—14 页。

魏后凯主编:《现代区域经济学》,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6 年版。

杨小凯、黄有光:《专业化与经济组织》,张玉刚译,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张文忠:《经济区位论》,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Hoover, E. M., 1948, *The Location of Economics Activity*, New York: McGraw-Hill.

Labber, M., 1985, "Essays in Network Location Theory",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Libre de Bruxelles, Cahier du CERO.

Ohlin, B., 1968, "Some Aspecte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International Movements of Commodities, Factors of Production, and Technology", in Ohlin, B. (Ed.), *The International Allocation of Economics Activity*, New York: Holmes and Meier.

Yang, Cathy Hong, "Identifying and Testing the Decision Making Factors Related to 'Key Industries' Choice of Location", the thesis submitted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philosophy, April 2004, Brisbane.

第 4 章

区位选择与聚集经济

在前面三章，我们对要素、要素禀赋和区位问题进行了探讨，指出由于要素、要素禀赋在空间上的非均质分布，造成了不同区位之间的客观差异。正是这种差异导致不同区位对于不同经济行为主体的吸引力是不一样的。经济行为主体根据其自身的约束条件和区位的客观差异，进行合理的区位选择，这种区位选择的结果与客观的地理空间相互结合，形成了聚集经济。

聚集经济是区域经济学的核心理论之一。经济主体的区位选择如何引致聚集经济是区域经济学必须解决的关键理论环节。本章在既有理论的基础上梳理了从区位选择到聚集经济的多种研究路径，结合前面所阐述的要素、要素禀赋和区位概念，提出非均质空间的区位选择假说。

4.1 从区位选择到聚集经济的演绎分析是区域经济学的重要微观基础

4.1.1 区域经济学的困境

经济学中的许多分支都以其分析是能否实现微观化或是否具有微观基础作为该学科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以宏观经济学发展为例，研究宏观经济学，就会清楚其中有很多流派，就凯恩斯主义学派、货币学派和新古典学派来说，都是在提出微观基础以后，又有了新的巨大发展。宏观经济学重构其微观基础，会使其更准确，更实用。宏观经济学微观化可以更深刻地体现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之间的关系；把国家干预建立在市场机制的微观基础上，可以更有效地把握国家调节的任务、范围和力度。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在 1972 年《预期与货币中性》的著名文章中，发展了一个微观经济模型，从这以后几乎全部经济学家都是根据卢卡斯思想建立微观基础模型，例如新凯恩斯主义寻求价格和工资刚性的微观基础等等。

当微观经济学实现了博弈论的革命之后，又有经济学家开始尝试使用博弈论工具重构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框架。著名经济学家费希尔(Fisher)认为“如果其他条件相同，我宁愿所有模型都有选择性理论基础”。库珀(Russel W. Cooper)的《协调博弈——互补性与宏观经济学》(*Coordination Game-Complementarities and Macroeconomics*)正是体现了费希尔的这种思想，整本著作贯穿了对微观经济主体的选择分析。

区域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从一定意义上讲起源于区位理论。从1826年杜能的《孤立国》出版至今，区位选择理论一直活跃在理论研究的领域中。区位选择理论是为了正确回答在既定的空间系统中，特定的经济活动在何地(以及为什么)发生的问题。[①]换言之，区位理论就是研究厂商选择何种地点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运输成本(古典区位论)或实现利润最大化(新古典区位论)的问题。关注微观经济主体的空间选择行为是区位理论的核心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讲，区域经济学在其理论开端上是具有微观基础的。

但是，无论是胡佛的《区域经济学导论》，还是国内的诸多区域经济学著作，在区位选择理论之后都转而研究区域的经济活动分布和组织问题，聚集经济开始成为中心内容。对于聚集经济的全面研究可以追溯到马歇尔，但是，马歇尔对这一空间经济现象的分析却是非典型空间范式的，外部性对于大多数区域经济学家来看，就像一只“黑箱”，很难看到空间的影像。经济活动为什么会在空间上实现聚集，关键是追求一种正的外部性，这个外部性就像一个奇特的磁场，保障了聚集的实现。在这个以外部性为基础的聚集经济理论中，我们看不到任何微观主体的空间选择行为。

4.1.2 突破困境——探寻区域经济学的微观基础

区域经济学一直就被缺乏微观基础而困惑着，区位选择理论像是微观经济学的分支，而区域经济活动的空间组织与分布则又像宏观经济学。这种窘境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逐渐被打破。克鲁格曼的《报酬递增和经济地理》(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一文中，对于经济聚集和区域空间的分异进行了微观分析。对于区域经济学来说，无论是区域空间结构的分异还是

① 彼得·尼茨坎普主编：《区域和城市经济学手册》第一卷，安虎森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经济活动的聚集与分散，所有看似宏观或者中观的表象都是微观经济主体空间选择行为的结果。不深入分析和研究这种微观主体的空间选择行为，区域经济学只能是宏观经济学在区域层面的一种应用。更重要的是，区域经济学没有一个完整的内在逻辑体系，而经济学的思想和基础理论却要求严密的逻辑演绎。区域经济学一直难以进入主流经济学的大家庭，自身缺少理论体系的完整性不能不说是其软肋。20 世纪 90 年代以克鲁格曼、藤田昌久(Fujita Masahisa)以及维纳布尔斯(Venables)等著名经济学家为首的新经济地理学派掀起了一场将区域经济学融入主流经济学的浪潮。但是，强调方法上的主流化以及“新瓶装旧酒”的嫌疑让新经济地理学面临诸多的责难。不可否认，新经济地理学为区域经济学构建微观基础做出了积极贡献，但是，面对自身理论体系的“断裂”，无论使用怎样成熟和先进的主流方法，都不能掩饰区域经济学发展所面临的困境。

在我国，区域经济学研究由于长期处于宏观层面，研究的技术手段较匮乏，使得区域经济问题的研究门槛较低，加之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的加剧，区域经济问题一直是研究的热点，这些诸多原因造成了区域经济学逐渐成了一个大口袋(big bag)，大有包罗万象的趋势。在研究范式和路线上，区域经济学研究很多是从问题到对策，完全丢失了经济学分析的内核，这都说明，缺乏微观基础的区域经济学研究是不成熟和不规范的。

经济学的精髓在于研究资源的配置，经济主体的选择行为是其研究重点。国内的区域经济研究往往不太重视对经济主体行为的区位选择分析，从而削弱了其关于资源的空间配置研究的说服力，区域经济学的困境也正是这一问题的深刻体现。突破区域经济学困境的关键就是探寻区域经济学的微观基础，让主体的经济选择行为贯穿区域经济学的理论研究。

4.1.3 沟通从区位选择到聚集经济的逻辑路径

探寻区域经济学的微观基础，首先要为聚集经济这一核心理论找到主体选择基础。对于这一问题，存在两条不同的路径：第一是杜兰特和普伽(Gilles Duranton and Diego Puga，2003)的研究路径，该研究从共享(sharing)、产业匹配(matching)，以及学习机制(learning mechanisms)三个视角进行研究，并建立了多个具有微观基础的聚集经济模型；第二是以区位选择理论为起点，尝试沟通从区位选择到聚集经济的逻辑路径。比较起来，第一条路径是新古典范式，试图将探寻宏观经济学微观基础的方法精髓移植过来。在研究中汇集了亨德森(Hender-

son)、卢卡斯、布莱克和亨德森(Black and Henderson)以及伊森和埃克斯坦(Eaton and Eckstein)的相关研究成果,从研究方法上看,这种思路有助于区域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的融合,但对于构建完整而统一的区域经济学理论框架却相对无力。第二条路径实质上就是要解决微观经济主体的区位选择如何引致聚集经济。如果承认区位理论是区域经济学的基础和逻辑起点,而聚集又是其关键理论环节,那么,第二条路径就是实现区域理论与区域经济理论体系一体化的有效路径。

相对于其他经济学分支,区位理论深刻反映了空间特性,是区域经济学所特有的研究范畴。更重要的是,区位理论的研究体现了微观经济主体的选择行为,这正是区域经济理论微观基础的逻辑起点。

4.2 均质空间下从区位选择到聚集经济实现的路径

从区域经济学的发展历程看,很多学者都尝试探索从区位选择到聚集经济的逻辑路径。需要指出的是,现有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均质空间的视角和假设决定了这些成果都面临一些难以克服的障碍。本节将从古典区位论到现代复杂性科学对从区位选择到聚集经济的实现路径做一梳理,在剖析其合理性的同时指出其存在的问题,为提出非均质空间的区位选择假说奠定基础。

4.2.1 古典区位论的尝试

古典区位论始于杜能,他的《孤立国》向我们展示了因地价不同而引起的农业分带现象。很多人都认为杜能的理论中关于不同农作物的圈层结构就是揭示了从区位选择到聚集经济的一般路径。

区位论从杜能开始主要集中在对经济个体进行理性选择的分析上,完全竞争市场是其重要假设。在完全竞争市场下的空间经济中,必然要求企业以不变特别是递减规模报酬进行生产。正如依顿和利普西(B. C. Eaton and Lipsey)所说,"在任何竞争性模型中最终都要递减的规模报酬变得非常重要,这一递减的成本便限制了工厂和企业规模的大小"。[①]在杜能的模型中,由于预设了中心市场和城市的存在,其主要工作就是解释经济活动如何离开中心而分布的。克鲁

① B. C. Eaton and Lipsey, R. G., 1977, *The Introduction of Space into the Neo-classical Model of Value Theory*, in *Studies in Modern Economics* (M. J. Artis and A. R. Nobay eds.), Basil Blackwell, p. 63.

格曼评价以前的空间经济模型时认为“经济学家们所知道的是经济活动为什么会扩展，而不是为什么变得集中——因此，以前的空间经济模型主要涉及这样的情形：对土地的竞争驱使经济活动远离中心市场”。[①]也就是说，在完全竞争的空间经济中无法容纳聚集经济的分析。但是，聚集是空间经济最重要的景观特征，不能容纳聚集经济的空间分析当然与现实相距甚远。埃德温·S. 米尔斯(Edwin S. Mills)针对以完全竞争为背景的空间经济研究进行分析，刻画出了一幅背离现实经济的景象。

> ……不变的规模报酬允许每一生产活动都能够在不丧失效率的条件下一任意的水平实现。并且所有的土地都具有相同的生产力，均衡状态也要求边际产品的价值及其租金处处相等。因此，在均衡状态下，所有必须直接或间接满足消费者需要的投入或产出都能够定位在邻近消费者居住地的小区域内。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小区域都能够自给自足，从而避免了人和物的运输。[②]

由此可见，完全竞争下的产生的规模报酬不变将导致空间经济呈现为“后院资本主义”，每一户居民只为自己生产。这样，生产或人口密度的不同完全是由于地理因素：气候、土地肥沃程度差异、自然资源不同等来解释。

可以看出，古典区位理论的假设与聚集经济形成的必要条件是不吻合的，由此产生了区域经济理论体系的断裂。针对古典区位理论在解决聚集经济中的缺陷或者不足，从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要构建统一区域经济理论体系，必须要弥补古典区位理论的不足。

那么，古典区位论究竟存在怎样的内在缺憾，导致不能实现从区位选择到聚集经济的有效连通呢？我们知道，聚集经济是经济主体通过区位选择进而在空间相互作用的结果，而古典区位论都对经济主体进行的是牛顿经典力学中隔离分析的方法，未能关注彼此间的相互作用。这种隔离分析的研究方法注定了无法从古典区位选择实现到聚集经济的逻辑联通。

4.2.2 新经济地理学的努力

克鲁格曼认为：“新经济地理学的目标就是设计出一个模型构建方法(即一

---

① Krugman, P., 1995, *Development, Geography, and Economic Theory*, MIT Press, p. 54.

② Mills, E. S., 1972, *Studies in the Structure of the Urban Economy*, RFF Johns Hopkins Press, p. 4.

个描述事实的机器），它让人们可以讨论诸如整体经济背景之中的纽约经济之类的事情——也就是在一般均衡条件下。它应该能使我们同时讨论使经济活动集中的向心力和使它分散的离心力——事实上，它应该能使我们描述出一个经济体的地理结构是如何被这些力量彼此的消长所塑造的。它还应该从更基本和微观的决策方面解释这些力量。”①在新经济地理学文献中，可以使用微观决策来解释聚集的思想，这取决于在个体生产者层面的报酬递增，或者至少是不可分割性。

新经济地理的基础是核心—外围模型。“该模型从更微观的角度展示了向心趋势是如何出现的，从根本上回应了聚集是聚集经济的结果这个嘲笑。特别是，聚集产生工厂层次的报酬递增、运输费用、要素流动的相互作用。报酬递增促使单个生产者集中他们的生产活动；运输因素使其愿意布局于较大的市场周围；要素移动意味着生产者迁往一地后会使相关的市场规模增大，从而使该地更具吸引力。”②

新经济地理的研究突出了居民、厂商的微观主体选择行为，向我们展示了由生活成本效应、市场临近效应和市场拥挤效应构成的一种空间累积因果循环自组织机制。聚集向心力就是在厂商和居民的区位选择的互动中实现的。应该说新经济地理学弥合了古典区位论中隔离分析的先天缺陷，通过引入空间反馈机制巧妙地解释了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

出身于主流经济学的新经济地理学创立者们都对空间作出了简化处理，强调均质空间和使用一般均衡分析，并且遵循微观经济主体拥有完全信息的原则，追求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然而，在均质空间中，在哪聚集依然是新经济地理学解决不了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现实中拥有不完全信息的经济人彼此之间充满了对策博弈，垄断竞争却忽视了这种关键性环节，藤田也承认，新经济地理学忽视了个体的博弈分析确实是一种缺陷。

4.2.3 新兴古典经济学中的空间含义

以杨小凯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用超边际分析法将被新古典经济学遗弃的古

---

① P. 克鲁格曼：《“新经济地理学”在哪里？》，载《牛津经济地理学手册》，G. L. 克拉克，M. P. 费尔德曼，M. S. 格特勒主编，刘卫东等译，商务印书馆 2005 年版，第 51 页。

② 同上书，第 54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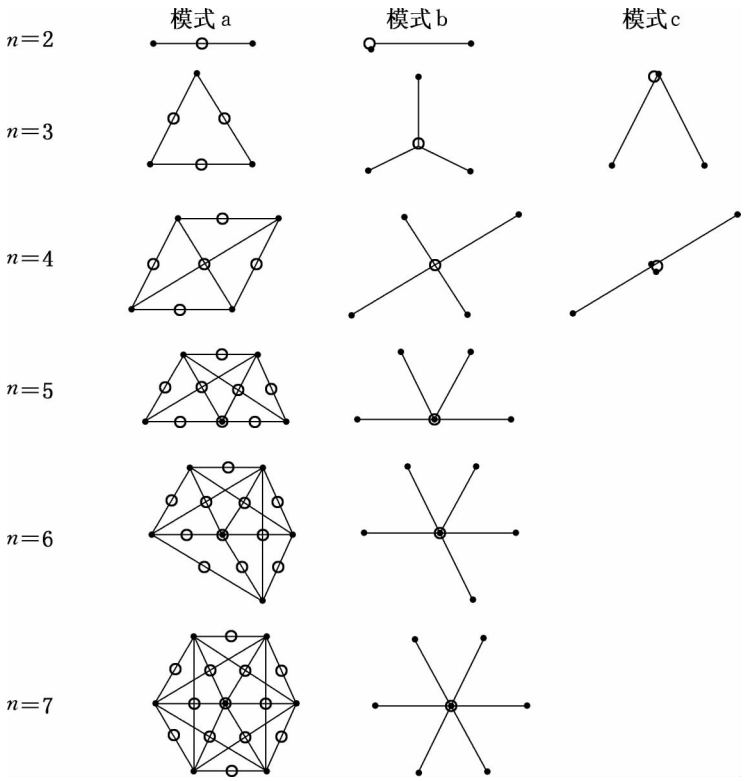
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和专业化的高深经济思想形式化，发展出新兴古典经济学。在新兴古典经济学中并没有明确地探讨和研究空间经济学的问题，但是其关于分工的网络结构和其拓扑性质的研究却暗含了经济活动的空间含义。特别是在其城市化理论中，空间聚集问题就成为新兴古典经济学家们必须回答的问题，这是因为城市的本质就是聚集经济。

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认为：社会生产最初只有农业生产，没有制造业和城市，分工结构是自给自足。随着农业的发展、剩余产品的增加，出现了交换，交换的发展促进了交易效率的提高。交易效率提高到一定程度，分工结构就会从自给自足跳到局部分工，出现半专业化的农业和半专业化的工业。因为农业生产需要占用较多的土地，而生产工业品没有这种要求，所以农民只能分散居住，工业品生产者则选择离农民最近的地方居住，以降低交易费用。如果交易效率进一步提高，在农业和制造业的分工之外，在制造业的内部出现专门以制衣、修建房屋、制造家具等为职业的制造业者。由于制造业者可以分散居住，也可以居住在一起，为了节省不同非农职业者之间的交易费用，非农职业者必然选择居住在一起。于是出现了城市。

集中交易可以改进交易效率。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假设每个人的居住地点不变，每一对贸易伙伴都到他们之间的中点进行交易，那么当分工水平提高而要求交易的网络扩大时，总的交易旅行距离和相关的费用就会超比例地扩大；而如果所有人都将交易集中到一个中心地点，则会大大缩减总的交易旅行距离，从而极大地降低交易费用，提高交易效率。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还揭示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集中交易都能节约交易费用，能不能节约交易费用，同分工水平的高低有关。在分工水平不高时，比如每个人只买卖两种产品，则在完全对称的模型中，每个人的交易费用为 1 元；如果集中交易，每个人的交易费用上升为 2 元；可见分工水平不高时，在市场上集中交易反而增加交易成本。

聚集经济能够通过将一个大的交易网络集中在一个相对较小的区域来降低交易费用，从而实现分工的提升。杨小凯曾在研究城市化理论问题时提到，分工网络和集中交易对提高交易效率有极大的正效应。“如果每个人的居住地点固定不变，每一对贸易伙伴都到他们之间的中点进行交易，那么当分工水平提高而要求交易的网络扩大时，总的交易旅行距离和相关的费用就会超比例地扩大；而如果所有人都将交易集中到一个中心地点，则会大大缩减总的交易旅行距离，从而极大地降低

交易费用。”[①]这种建立在分工水平上的集中效应，在城市经济学中被称为多种经济活动的聚集效应。其实，这种聚集效应是由分工的网络效应带来的，这种网络效应使得交易活动和地理位置上的集中产生了一种特别的经济效果。下面的分析来自杨小凯对城市化问题分析中的相关论述。图 4.1 中，n 代表交易的产品种类数，n 个人中的每一个人向其他 $n-1$ 人卖他生产的产品，然后从 $n-1$ 人中买其需要的产品。我们以 $n=7$ 为例来看看集中交易是如何节约交易费用的。模式 a 中是分散情况，每个黑点代表一个人的空间区位，相邻间的距离是 1，平均运输费用也为 1，通过简单计算可知，这个社会的总交易费用是 56.76 元。但是如果实现空间



资料来源：引自杨小凯：《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91 页。

图 4.1　分散与集中的交易分布模式

① 杨小凯、张永生：《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24 页。

集中交易，则总的社会交易费用只为 12 元。不过需要强调的是，如果分工水平很低，如 $n = 2$ 时，集中交易并不能带来交易费用的节约。这就表明，交易集中是否能够节约交易费用，同分工的水平高低有关系。

4.2.4 博弈论视野中聚集经济的实现路径

从区位选择到聚集经济的博弈论研究始于霍特林的工作。使用博弈论的方法研究聚集经济，已经形成的范式包括古诺(Cournot)竞争和伯川德(Bertrand)竞争两种。古诺模型是解决两家企业生产同质产品，以产量为各企业的决策变量进行博弈的双寡头竞争模型。伯川德模型则是以定价为决策变量的双寡头竞争模型。伯川德均衡的一个基本含义是：如果同业中两家企业经营同质产品且长期打价格战，成本低的企业必定挤走成本高的企业。现在我们从空间特性来看伯川德均衡，这意味着两家具有不同成本函数的企业，必定是空间差异化的，它们将分隔市场而不是集聚，所以伯川德均衡是一个分离均衡。

汉密尔顿等(Hamilton et al.)与安德森和尼温(Anderson and Neven)通过霍特林的线性化城市模型来分析选址和产量选择的竞争两阶段模型。与伯川德的分离均衡明显不同，两篇文章都推断出在消费者均匀地分布线性化城市的各个点上，古诺竞争下企业向市场的中心集聚的结论。

萨洛普(S. C. Salop)提出一个圆环形城市模型，消费者均匀地分布于周长为 1 的圆周上，企业也沿着圆周分布。两阶段博弈为：在第一阶段，潜在的进入者选择是否进入。假设进入的 n 个企业并不选择它们的地址，而是一个个自动等距离地坐落在圆周上。这样，最大的差异化就外生的给定了。第二阶段，在地址给定的情况下，诸企业选择价格进行竞争。与线性化城市相比，此模型更适合于无极端特征的情况，而线性化分布城市模型有助于分析有极端特征的情况。

帕尔(Pal)在圆环形城市分布模型的基础上分析带有选址的两阶段模型，与线性城市中所得到的结果完全相反，他指出两个企业不论是伯川德竞争还是古诺竞争，若某一企业位于周长为 1 的圆环形分布的中心点 1/2，那么另一企业将把初始点 0(或是终点 1)选址为均衡点，即两个企业在圆环上互相等距离的定址。此时，集聚不会发生。麦舒什玛(Matsushima)做了进一步推论，假设有 n 个企业进行这种类似的两阶段竞争，结果是一半企业集聚在一点，而另一半企业集聚在圆环上与之对称的另一点。

我们假设现有 n 个销售厂商，每个参与人同时选择区位 $x_i \in [0, 100]$。消

费者均匀分布在[0，100]的区间内，密度函数等于1(假设每个消费者只买一单位的产品)，价格为1，生产成本为0。销售者根据自己所在的位置排序为 $x_1 \leqslant x_2 \leqslant \cdots \leqslant x_n$，$x_0 = 0$ 且 $x_{n+1} = 100$。销售者 i 从自己两边的距离上各吸引一半的顾客，因此销售者的收益为：

$$\pi_1 = x_1 + \frac{x_2 - x_1}{2}$$

$$\pi_n = \frac{x_n - x_{n-1}}{2} + 1 - x_n$$

或者，对于 $i = 2, \cdots, n-1$，

$$\pi_i = \frac{x_i - x_{i-1}}{2} + \frac{x_{i+1} - x_i}{2}$$

在只有一个销售者的情况下，所有的顾客都只能向这个销售者购买商品，因此这个销售者选择什么区位是不重要的。如果价格是选择变量，且需求是有弹性的，我们可以预期垄断者会选择 $x = 50$ 的位置。

在两个销售者的情况下，无论需求是否有弹性，两个销售者都会选择 $x = 50$ 的位置。两个销售者都会选择 $x = 50$ 的位置是一个稳定的纳什均衡。一个销售者对另外一个销售者所在位置的最优反应是：总是使自己与中点之间的距离比竞争者与中点之间的距离少 ε。因为两个销售者都这样做，所以最后两个销售者都会位于中点，并各自占领一部分市场。

在三个销售者的情况下，这个模型没有纯策略的纳什均衡。因为位于两端的销售者会向中点靠拢以挤占中间销售者的市场份额，所以任何销售者位于不同位置的策略组合都不是均衡。如果有两个销售者位于同一点的话，第三个销售者会使自己离开这两个销售者一段距离，这样第三个销售者至少能得到 $50 - \varepsilon$ 的市场份额。但如果第三个销售者占领的市场份额最大的话，位于同一点的两个销售者中就会有一个销售者移动到第三个销售者另外一端的位置上，以抢占第三个销售者的大部分市场份额。所以，这里唯一的均衡是混合策略均衡。谢克德(Shaked)计算得出对称的混合概率密度为：

$$m(x) = \begin{cases} 2, \text{若 } 1/4 \leqslant x \leqslant 3/4 \\ 0, \text{其他} \end{cases}$$

奇怪的是，3是一个特别的数字。如果有三个以上的销售者，模型就有纯策略

均衡。西蒙(Simon)证明:在任意的 n 个销售者(参与人)和 M 维空间的霍特林区位博弈里都存在着一个均衡,但可能是混合策略均衡。

科林斯和舍斯迪亚克(Collins and Sherstyuk)观察了一个同期空间选址博弈。三个实验对象同时在[0, 100]之间选择一个整数,其中每个整数都与厂商可选的某个"地点"相对应。相类似的顾客居住在这 100 个地点中的每一处,并且在离他们最近的地点购买产品。厂商的利润与产品卖出的多寡相关。这样,实验对象将会选择一个离其他厂商尽可能远的地点,以期能够向临近的顾客售出最多的产品(并且知道其他厂商也会试图做同样的事情)。

布朗-克鲁斯、克朗肖和斯琴科(Brown-Kruse, Cronshaw and Schenk)对经典的两厂商选址博弈进行了研究,其中厂商通过互动会逐渐达到 50(在实验中也是这种结果)。胡克、穆勒和弗雷恩德(Huck, Muller and Vriend)研究了一个四厂商博弈,其中厂商会汇聚在两个值附近选择地点,分别为 25 和 75。他们不仅发现了汇聚在这些值附近的选择,而且还发现了在中央位置不均衡的汇聚。

三厂商博弈是很有趣的,因为厂商会避免选择中央位置,这样它就不会受到其他两个厂商双方面的挤压。谢克德(Shaked)显示,对于每个厂商的唯一对称的混合策略均衡完全规避了低于 25 和高于 75 的地点,并且只在区间[25, 75]进行随机化选择。这里有一个大胆的推断,即认为有一半的地点永远都不会被选择,并且其他的地点将以均等的频率被选择。

选址地点的分布在不同的阶段和不同的时间是类似的,于是累积分布在图 4.2 中给出(其中细线代表的是纳什均衡)。所有的选择看上去像是一个平滑的均衡:较低的(小于 25)和较高的(大于 75)选择都很少见,最多的选择集中在中部。在 55 处有一个低谷,而在 40 和 70 存在两个主要的众数——实验对象规避了中央的选择以防止被挤压。

博弈论视野中的空间或者是一条直线,或者是环形空间。以线性空间为例,两个企业或企业集群沿着这条线发展,要么位于这条线的两端,要么位于两端之间、等分点上。沿着这条线的空间本身就是均质的,这意味着两个感兴趣的区位无论在绝对位置还是相对位置的特征上都是一样的。在这些模型里,距离被认为是经济的外部变量,经济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成本只取决于欧几里德距离本身,而不是经济发展的真实空间结果。地理学家认为这是空间的牛顿处理方式,是发生在空间上的过程的外在距离度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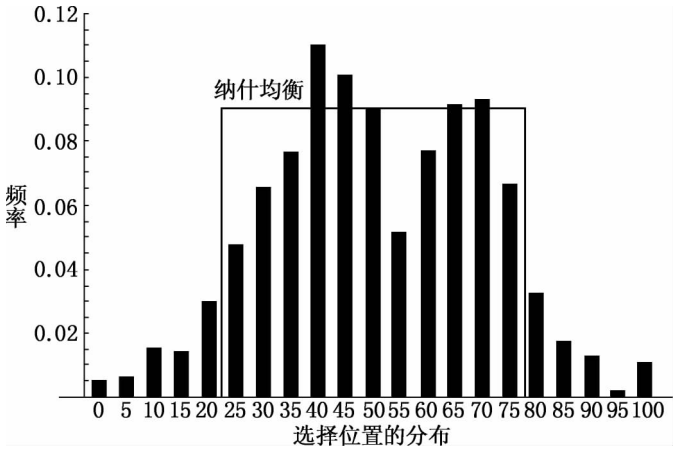


图 4.2　在三人同期选址博弈中的选址频率

4.2.5　基于复杂性理论的聚集经济①

这一路径的基本思路是将空间经济作为一个不断演化的复杂系统进行研究，采用了可运算和计算及模拟的方法。安德森(Anderson)与阿瑟(Arthur)都使用了复杂性方法研究空间经济。可以说，基于复杂性理论的区域经济研究存在不少的文献，但在这一领域具有开创性和代表性的成果当属阿瑟的研究，下面的分析也是基于阿瑟的相关成果所作的整理。

假设有 I 种类型的厂商和 N 个区域。厂商是一个接一个地根据其偏好概率和收益"填"入区域的。厂商 i 选择区域 j 的净收益为 $\pi_j^i + g(y_j)$，其中 π_j^i 代表地理因素所引致的收益，$g(y_j)$代表厂商集聚所引致的收益。某一类型的厂商出现的概率为 p_i，区域 j 被选择的概率则为 $q_j = \sum p_k$，$k \in K$，其中 K 为所有 $\pi_j^i + g(y_j) > \pi_m^i + g(y_m)$ 的厂商类型。这样，对于 N 个区域，就有一个被选择的概率向量 $q = (q_1, q_2, \cdots, q_N)$。在这样的假设下，设初始每个区域的厂商数为零，随着厂商逐个被"填"入区域，就会形成产业在不同区域的分布结构。

如果每个区域被选中的概率是给定的，则在不考虑集聚经济的情况下，厂商的区位分布收敛于这个预先给定的概率。比如，对于三个区域的情形，给定它们被选

① 这里的表述源于：谭遂、杨开忠、谭成文：《基于自组织理论的两种城市空间结构动态模型比较》，《经济地理》2002 年第 3 期，第 322—326 页；谭遂、杨开忠等：《一种基于自组织理论的城市与区域空间格局演变模型研究》，《经济地理》2003 年第 2 期，第 149—153 页。

中的概率为 0.5、0.25 和 0.25。当厂商数达到 197 的时候，它们在三个区位分布的份额为 0.528、0.221 和 0.251，接近预先给定的概率。

在此情况下，历史的偶然事件对结果不会有影响，必然性占主导地位。模型的模拟结果如图 4.3。如果仅考虑偶然因素所起的作用，即每个新厂商选择某个区域不受以前厂商的影响，也不会影响以后厂商的选择，则模型推演的结果如图 4.4。虽然随着厂商进入，每个区域的产业份额会趋于稳定，但每次演化所呈现的结果都是不同的。四次演化的结果有很大差异，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偶然性对于产业集聚的影响力。

在同时考虑偶然与必然的情形下，所得到的结果如图 4.5。图 4.5 的左上角显示了地理的偏好所起的作用，图 4.5 的右上角和左下角显示了厂商集聚所起的作用，图 4.5 的右下角显示了另一次模拟所推出的结果。在此情况下，无限的产业集聚过程一定会发生。也就是说，随着厂商的进入，某个区域的厂商会越来越多，最后居于压倒多数的地位。但我们事先并不知道哪个区域最终会胜出，所以历史的作用也相当重要。如果一个区域对多种类型的厂商都有地理的吸引力，则该区域最终更有可能发展成为厂商集聚的核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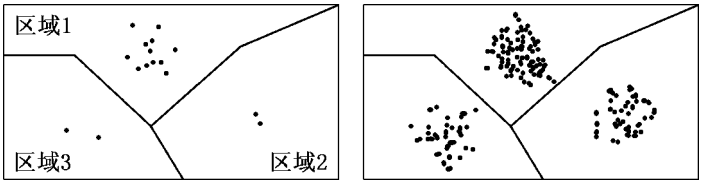


图 4.3　概率给定情况下厂商区位选择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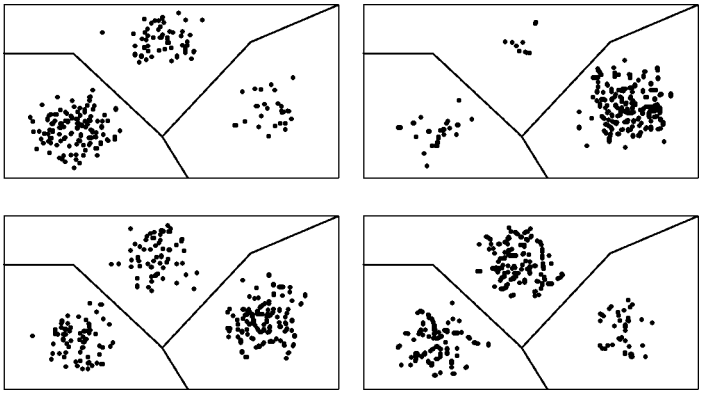


图 4.4　仅考虑偶然因素时厂商区位选择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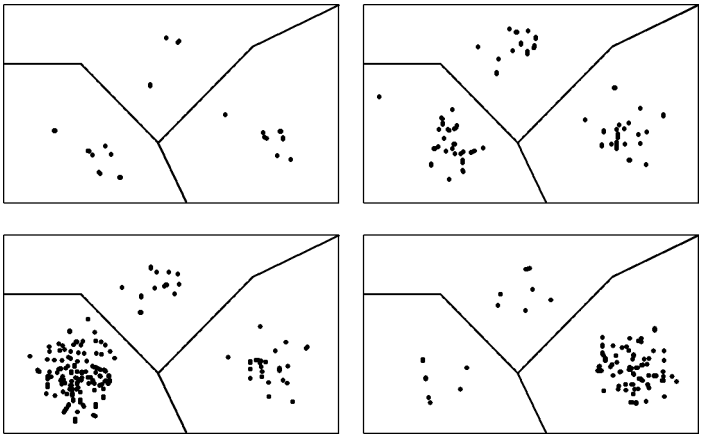


图 4.5　考虑偶然因素和集聚效应厂商区位选择结果

复杂科学的特征之一是“自下而上”，有很好的微观基础。每个厂商的区位选择都是在考虑偏好和集聚所带来的收益后的结果，而且这种偏好以一种概率的形式出现，从而摒弃了经济主体完全理性的前提。阿瑟从认知科学的角度出发，详细地阐述了人类决策过程的有限理性。他认为，在复杂性存在的情况下，完美或演绎理性(deductive rationality) 将不复存在。阿瑟用“归纳推理”(inductive reasoning)来描述人类行为的有限理性，即人类决策是动态的学习过程。从另一方面来讲，复杂科学所建立的模型缺乏经济学基础。在我们惯常的经济学训练中，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或者最小化问题似乎是不变的真理，而对于复杂科学的模型处理方法还有些不习惯。经济学具有庞大的理论体系和内在的自恰性，而复杂科学的内在结构则比较松散。

4.2.6　基于空间互补性的区位选择与聚集经济

上面大多数针对聚集经济形成机理的研究都是基于空间竞争性范式。但是，现实生活中还存在一类聚集是基于空间互补性。所谓空间互补，是指不同经济社会主体之间所存在的一种相互需要、互为补充的关系，亦即多个决策主体的空间邻近将为彼此带来正的外部效应。具有代表性的是，马歇尔认为与集聚相关的外部性有大规模生产、知识的溢出、成熟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与本地大市场相联系的前后向关联等。

为简化起见，模型的研究仍假设经济活动发生在一个一维线性空间中；消费者沿线均匀连续分布，且总人口标准化为 1；消费者存在两种基本需求品 x 和 y，

且 A 区消费者和 B 区消费者对 x 和 y 有不同偏好，并均受总收入水平 m 的预算约束；A、B 区在 0.5 点分界（如图 4.6）。用柯布—道格拉斯效用函数分别表示为：

$$\mu_A(x, y) = x^{\alpha}y^{1-\alpha}$$

$$\mu_B(x, y) = x^{1-\alpha}y^{\alpha}$$

$$\text{s. t. } P_x x + P_y y = m$$

$$1 \geqslant \alpha \geqslant 0.5$$①

假设运输成本由生产者承担，根据效用最大化原则，A 区消费者购买产品的组合 $(x, y) = (\alpha m/P_x, (1-\alpha)m/P_y)$；$B$ 区消费者购买产品的组合 $(x, y) = ((1-\alpha)m/P_x, \alpha m/P_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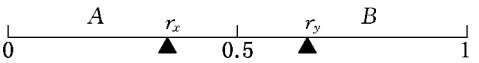


图 4.6　线性市场与企业区位选择

假设建厂的固定成本 F 相对于运输成本足够高，因而每种产品仅建立 1 个工厂；假设不管厂商布局在何处，边际生产成本为零；产品的销售价格分别为 P_x 和 P_y，且不变。假设产品的运输成本②由企业承担，且单位距离、单位产品的运输成本为 τ。

假设生产 x 和 y 的两企业分别在 r_x 和 r_y 处建厂。显然，由于 A 区消费者更偏好 x 产品，x 产品的生产地点靠近 A 区；同理，y 产品的生产地点靠近 B 区。

此时，x 产品生产企业的收益可分成 $(0, 0.5)$ 和 $(0.5, 1)$ 两段求得，

$$R_x = P_x \times \alpha m/2P_x + P_x \times (1-\alpha)m/2P_x = 0.5m \qquad (4.1)$$

运输成本可分成 $(0, r_x)$、(r_x, t) 和 $(t, 1)$ 三段求得，

---

① 假设 A 区消费者对 x 产品更为偏好，而 B 区消费者更偏好 y 产品。

② 这里的运输成本包括所有因距离所引起的障碍，如：运输费用本身、关税及贸易的非关税壁垒、不同的生产标准、交通困难和文化差异等。参见藤田昌久等：《集聚经济学》（中译本），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7 页。

$$C_x = \tau \times [\alpha m / P_x \int_0^{r_x} (r_x - w)\mathrm{d}w + \alpha m / P_x \int_{r_x}^{1/2} (w - r_x)\mathrm{d}w + (1-\alpha) m / P_x \int_{1/2}^{1} (w - r_x)\mathrm{d}w]$$

$$= m\tau / 2P_x \times [2\alpha r_x^2 - r_x + 0.75 - 0.5\alpha] \tag{4.2}$$

由此，x 产品生产企业的利润函数为：

$$\pi_x = R_x - C_x - F \tag{4.3}$$

根据利润最大化条件 $\frac{\mathrm{d}\pi_x}{\mathrm{d}r_x} = -m\tau / 2P_x \times [4\alpha r_x - 1] = 0$，可求得带来利润最大化的建厂位置为：

$$r_x^* = \frac{1}{4\alpha} \tag{4.4}$$

不难看出，x 产品生产企业的选址随着 α 的减小而向中心区靠近。两个极端情形分别为：极端情形Ⅰ：当 $\alpha = 1$，则 $r_x^* = 0.25$；极端情形Ⅱ：当 $\alpha = 0.5$，则 $r_x^* = 0.5$。

同理，可以推导出 y 产品生产企业的区位选择，利润函数为：

$$\pi_y = R_y - C_y - F \tag{4.5}$$

根据利润最大化条件 $\frac{\mathrm{d}\pi_y}{\mathrm{d}r_y} = -m\tau / 2P_y \times [1 + 4\alpha(r_y - 1)] = 0$，可求得带来利润最大化的建厂位置为：

$$r_y^* = 1 - \frac{1}{4\alpha} \tag{4.6}$$

同样，y 产品生产企业的选址随着 α 的减小而向中心区靠近(如图 4.7)。两个极端情形分别为：极端情形Ⅰ：当 $\alpha = 1$，则 $r_y^* = 0.25$；极端情形Ⅱ：当 $\alpha = 0.5$，则 $r_y^* = 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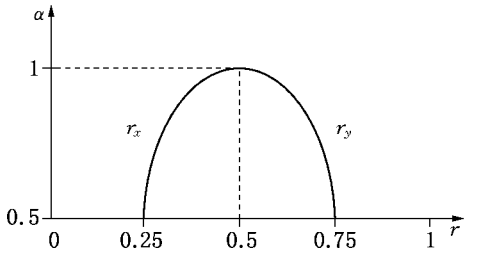


图 4.7　消费者偏好变化引起 x、y 产品生产企业选址区位的变化情况

现在考察两阶段情况，第一阶段 x 产品生产企业进行选址，其选址行为依据公式(4.4)进行。第二阶段 y 产品生产企业进行选址。所不同的是，假设空间毗邻能为其带来额外的经济利益，亦即如果 y 产品生产企业选择靠近 x 产品生产企业，则可以获得某种额外收益，否则额外收益为零。可表述为：

$$R'_y=\begin{cases}\nu, & r_y=r_x\\ 0, & r_y\neq r_x\end{cases} \tag{4.7}$$

其中，R'_y表示空间临近为 y 产品生产企业带来的额外收益[①]，ν 表示集聚带来的额外收益量。

据此，可以修正 y 产品生产企业的利润函数(4.5)，根据利润最大化原则，y 产品生产企业会选择带来利润最大化的区位，亦即：

(1) 当 $\pi'_y\geqslant\pi_y$ 时，y 产品生产企业选择靠近 x 产品生产企业的区位 r_x，形成空间集聚，亦即 $r_y=r_x=\dfrac{1}{4\alpha}$ 时，

$$\pi'_y=R_y-m\tau/2P_y\times[2(1-\alpha)r_x^2-r_x+0.5\alpha+0.25]-F+\nu$$

将 $r_y=r_x=\dfrac{1}{4\alpha}$ 代入，得：

$$\pi'_y=R_y-m\tau/2P_y\times\left[\frac{1-\alpha}{8\alpha^2}-\frac{1}{4\alpha}+0.5\alpha+0.25\right]-F+\nu \tag{4.8}$$

(2) 当 $\pi'_y<\pi_y$ 时，y 产品生产企业基于分散决策选择，不形成空间集聚，亦即 $r_y=1-\dfrac{1}{4\alpha}\neq r_x$ 时，

$$\begin{aligned}\pi_y=R_y-C_y-F=R_y-m\tau/2P_y\times[&2\alpha r_y^2+(1-4\alpha)r_y\\&+1.5\alpha-0.25]-F\end{aligned}$$

将 $r_y=1-\dfrac{1}{4\alpha}$ 代入，

$$\pi_y=R_y-C_y-F=R_y-m\tau/2P_y\times\left[-\frac{(4\alpha-1)^2}{8\alpha}+1.5\alpha-0.25\right]-F \tag{4.9}$$

① 由于是两阶段模型，x 产品生产企业已经选择区位且不可改变，为此这里不考虑集聚对其的影响。

进一步求解空间集聚条件 $\pi_y' \geqslant \pi_y$，将(4.8)式和(4.9)式代入可得空间集聚的临界条件为：

$$\nu \geqslant \frac{m\tau(2\alpha-1)(4\alpha-1)}{16P_y\alpha^2} \qquad (4.10)$$

由此可见，只要存在一定的互补利益，就可能形成生产区位的维持和锁定效应。相互毗邻所形成的空间互补效应加速了企业间空间集聚，基于相互临近的互补利益越大，企业间相互集聚的可能性就越大。随着 $\alpha \in (0.5, 1)$ 不断增加，产生空间集聚就需要更多的互补利益来补偿运输成本的增加(如图 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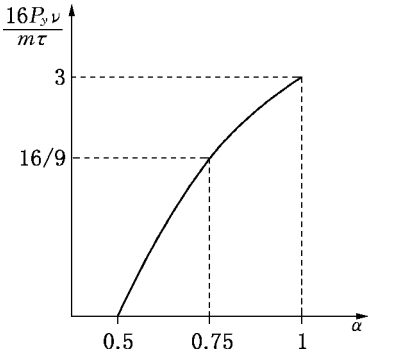


图 4.8　存在企业间互补利益情况下产生空间集聚的临界条件

4.3　聚集经济的微观机理——一个非均质空间下的区位选择假说

4.3.1　非均质条件下的区位选择前提

相对于均质空间分析，非均质空间分析更符合现实的社会经济活动分布。由于要素禀赋在空间上的不均质分布，因此经济空间是一个非均质的空间。随着社会经济活动的变化，要素禀赋在空间上的分布也发生了两个显著的变化。

第一，要素禀赋本身的动态化过程。随着社会经济、时间和技术等条件的变化，要素禀赋的含义发生了变化。从最初的自然资源条件禀赋为主，向资本、技术、人力资源、制度等综合要素禀赋转化。

第二，要素禀赋自身的累积循环效应日益明显。要素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进行有效的聚集和扩散，在某种意义上强化要素禀赋的差异。

在这样的条件下，对应于地理空间点的经济区位发生了质变。空间上的区位点不再同质，在一定意义上属于离散的点。经济区位不能再被简单地理解为“地理位置”，它是具备一定要素禀赋而互不相同的，具体与抽象相结合的点。基于这种对于区位和空间的理解，我们在重新分析区位选择问题的时候，就不能像传统的区位选择理论那样只考虑“距离”的因素。而应该结合区位本身的质的差异，对区位选择问题进行重新界定。

根据我们前面对于区位的界定，我们可以将区位看作是“栅格数据模型”中的“像元”。栅格数据模型是地理学中用来分析空间数据的最重要模型之一。在栅格

数据模型中，它的基本单元是一个格网，每个格网称为一个栅格（像元），被赋予一特定值。这种规则格网通常采用三种基本形式：正方形、三角形、六边形。我们可以借此来分析非均质空间。非均质空间旨在强调不同的“像元”除了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与其他事物相对位置不同之外，更重要的是每个“像元”本身所蕴含的要素禀赋的差异。这种要素禀赋可能是天然的自然资源，也可能是后天人类历史的累积，更可能是各自所附着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差异。栅格模型中的每个像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无限再分。空间是一个连续的过程，由栅格模型中的无数个“像元”所组成。

4.3.2 权衡、机会成本与非均质空间下区位选择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目前的区位乃至整个空间问题的分析中，均质是一个基本的假设。但是空间不可能定理告诉我们：均质的假设与完全竞争不可能共存，进而推导不出聚集均衡的存在。现实的空间经济问题也在昭示着均质性的空间从来都是不存在的。因此，非均质空间分析是空间经济研究有待突破的重要方向。本书在区位概念重新阐述的基础上，指出区位差异性直接导致了空间的非均质性。非均质性分析将更为接近社会经济发展的空间布局现实。

那么，在非均质空间下，区位选择如何进行的呢？这种选择的分析建立在区位要素的分析基础上。经济学在于分析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研究要素的最优利用问题。我们将区位作为要素进行分析，可以借鉴一般要素的分析，同时特别要注重区位要素的“空间垄断性”、“利用的报酬递增性”和“外部性”。

1. 权衡——非均质空间下区位选择的基本思路

非均质空间下区位选择所遵循的基本思路是“权衡”的理念。古典区位理论中，厂商在运输成本与聚集经济效益之间作一个权衡，进而得出最佳的区位，就是这种权衡的明显表现。这里，我们从最初级的经济状态下区位选择来看这种权衡。

我们可以假想一种社会经济的初级状态，空间非均质，但是这种非均质只体现在纯自然资源禀赋方面。我们也许可以借用“鲁滨逊世界”来说明这种状态及其区位选择。在“鲁滨逊世界”中，荒岛上的果树和山洞的位置是相对固定的，是一种“非均质空间”。“鲁滨逊”不需要和人交易，也没有人与之交易。荒岛上有果子供其适用，有山洞供其住宿。很显然，这种状态比较符合只有纯自然要素禀赋有差异的情况。此时，“鲁滨逊”选择其合适的居住区位是必然需要考虑的问题：

第一，山洞的避风雨等居住情况 H，$H>0$ 表示可接受的居住条件；

第二，距离果实最丰富的果树的距离 t_1，对于“鲁滨逊”来说，果树上的水果是唯一的食物；

第三，距离海边的距离 t_2，对于“鲁滨逊”来说，他还需要不间断地去海边观察是否有过往的船只。

很显然在这种条件下，区位选择主要取决于自然资源禀赋的差异和相应的距离成本。因为这里没有市场，没有交易活动。

“鲁滨逊”的区位选择问题是：

$$\min t = \alpha t_1 + \beta t_2$$

$$\text{s. t. } H > 0$$

这里的 α、β 表示“鲁滨逊”每天去摘果子和去海边探视的概率。

随着社会经济活动的发展，我们可以放松前面的假定。过了几年，孤岛上来了一位“星期五”，“星期五”种麦子。很显然，“星期五”自己会根据自然资源禀赋决定其适合种麦子的区位。这时，“星期五”与“鲁滨逊”共同组成了一个“两人经济体”，两个人需要交换果子和麦子。这种情况下，“鲁滨逊”和“星期五”各自的居住区位选择就会受到相互的影响。他们可能会确定一个固定的交易地点，那么各自的居住区位选择则需要考虑：

第一，自然的居住条件；

第二，离各自劳动地点的远近；

第三，离交易地点的远近。

此时的选择依然是以距离成本和自然条件约束成本为主要考虑因素。区位选择依然是一种“替代”关系。

其实，即使在现代经济社会中，社会经济活动日益复杂化的今天，区位选择在一定意义上来说，还是一种权衡，一种取舍。权衡是区位选择分析的基本思想。

2. 机会成本——非均质空间下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

机会成本（或备择成本）的概念表述了稀缺与选择二者之间的基本关系。经济学研究的就是稀缺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问题。同样，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区位这种要素具有空间上的垄断性，一旦一个经济行为主体占据一定的区位，就会造成两个结果：第一，是对别人的影响，最为直接的影响可能是别人不能再占有这一区位，或者说当某一行为主体占据一定的区位之后，会对区位自身以及相关经济行为主体

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第二，当经济行为主体选择了一定的区位投入之后，其重新再区位的过程将会较为复杂，且伴随着相应的成本。

因此，一旦稀缺被引入，需求就不能都得到满足。选择就会存在，选择暗含着拒绝和挑选备择品。机会成本就是特指拒绝备择品或机会的最高价值的估价。它是为了获取已挑选的具体实物中具有更高价值的选择物而放弃或损失的价值。在理解选择与机会成本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第一，如果选择是在不同的价值选择物中进行，一些人不一定会进行选择。这不是说，一个作出决定的人必然成为选择者。由此得出第二种含义。没有选中的选择方案的价值，即机会成本，一定是存在于参与选择的个人头脑中的价值，而不是其他。因此，成本必定完全由选择者来决定，而不能由其他人决定。第三个必然结论是，机会成本必定是主观事物。它存在于选择者头脑中，并且不能由选择者之外的其他人去具体化或进行测量，同时，不能轻易地被转化为一种资源、商品或货币信度。第四，机会成本只是存在于作出选择决定的时刻。

因此，区位选择会是经济行为主体或者活动在多个被择对象中的挑选，是一个考虑机会成本的主观活动，这种选择依托于客观的区位在行为主体心目中的价值以及舍弃其他选择的机会成本。

4.3.3 非均质空间下区位选择模型

前面在分析区位要素的时候，我们勾勒了区位作为一种要素进入生产函数的产出情况分析，指出区位要素独特的特性和产出特征。这里，我们将区位要素与其他要素重新放到一起，来探讨厂商或经济活动的生产行为，亦即可以解释区位选择问题。

如果我们将区位考虑为非同质性要素，也就说明了空间的非均质性。在分析区位及其他要素一起进行生产活动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做两个方面的假设：

第一，经济活动行为目的是为了获得收益的最大化，即厂商为了获得最大利润或者其他，居民为了获得效用最大化。如果抽象到要素层面，资本、技术或者劳动力都是为了达到回报的最大化。

第二，我们这里分析的区位要素，暂时可以假设为没有时间维度的空间单元，并且可以相对离散的形式来存在。如果考虑动态假设条件下，我们可以利用时空转换的概念，将其转换为空间上的差异。也就是说，如果“同一”区位在不同的时间点上，我们可以将其看成是空间上的两个差异区位要素。

在这样的假设条件下，我们可以将区位要素替代土地要素，并将其与资本、劳动力、技术并称为经济活动的四个基本要素。这样，选择什么样的区位要素投入，也就是进行了什么样的区位选择过程。这也就是非均质空间下区位选择的模型。同时，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区位这一要素与其他几个要素不一样，它具有空间上的相对垄断性。因此，区位要素的投入是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这里暂时不考虑区位要素量能的增长问题。

我们将通过下面的具体模型来进一步说明以上的区位选择思想：

假设我们考虑单一产出的厂商或居民（即厂商追求投入的效益最大化，居民追求投入的效用最大化）。因此，在短期情况下，厂商面临三种要素的投入：区位、资本和劳动力（因为短期条件下，技术是不变的）。居民则相对简单，居民作为非生产性经济主体，其只需要进行区位要素的投入，亦即只需要进行区位选择。

1. 厂商的区位选择

假设一定的空间范围内，存在若干可以相对分割的离散区位。我们可以用 $D=(d_1, d_2, d_3, \cdots, d_n)$ 来表示厂商面临的区位选择集，K 作为厂商的资本投入，L 表示厂商的劳动力投入，则厂商的产出也就可以表示为：

$$Y=f(D, K, L)$$

其中，K，L 作为两个可积分的要素投入量，D 是一个离散的选择变量。对于 K 和 L 的投入，厂商遵循一般经济学分析中的要素报酬非递增（或者说报酬递减）的原则进行合理的配比。而对于 D 的选择性投入，当其选择之后，则遵循前面分析的区位要素投入的产出报酬递增规律进行。

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进一步延续考察前面提到的“鲁滨逊世界”的复杂化情形。现在，前面的假设情况进一步发生了变化，出现了 n 个“鲁滨逊”和 n 个“星期五”。同时，经过若干年的发展，“鲁滨逊”开始种植果树，“星期五”也开始不断扩大麦子的栽种（这种行为可以被认为是厂商的生产行为）。“鲁滨逊”们相互聚集群住，“星期五”们相互聚集群住（这是由于同一类型主体对于具有特定的自然资源禀赋的区位的偏好相同所导致）。[①]这样，就出现了各自内部的进一步分工和聚集经济。但是，二者之间还不存在要素流动问题。作为种麦子的“星期五”不能去种植

① 这说明最为初始的区位是由纯自然的要素禀赋差异所决定的。

果树，同样作为种果树的“鲁滨逊”也不可能去种植麦子，亦即劳动力要素不流动。同时，“麦子”不可以充当“果树”的资本投入品，反之“果树”也不可以作为“麦子”的资本投入品，亦即资本不可以流动。

我们假定“鲁滨逊”们所在的区位为 A 区位，而“星期五”们所在的区位为 B 区位。此时，某个体 X（可能是“鲁滨逊”，也可能是“星期五”）进入，生产一种新的产品，就会面临不同的市场环境问题，其在选择生产区位时，则需要考虑更复杂的情况。

设个体 X 的生产函数为：

$$F(x_1, x_2) = f(D, x_1, x_2)$$

式中 x_1、x_2 分别表示劳动力和资本的投入，其价格分别用 r_1、r_2 表示，它们是区位 D 的函数。除了劳动力和资本这两种要素外，还包括土地要素 x_3，其价格 r_3 也是区位的函数。同时，把个体生产的产品运输到市场也需要成本，设产地到市场的距离为 Z，运费费率为 t。现在我们可以假设个体在技术上是最优的，也即 x_1^*、x_2^* 使 $F(x_1, x_2)$ 在既定投入下的产出水平最大，产品价格水平是成本加成方式既定的。因此，现在个体的区位选择问题是：

$$\max \pi = Pf(D, x_1^*, x_2^*) - r_1(D)x_1^* - r_2(D)x_2^* - r_3(D)x_3^* - tZ$$

满足上式的一阶条件是：

$$\partial\pi/\partial D = \mathrm{d}r_1/\mathrm{d}Dx_1^* + \mathrm{d}r_2/\mathrm{d}Dx_2^* + \mathrm{d}r_3/\mathrm{d}Dx_3^* + t\mathrm{d}Z/\mathrm{d}D = 0$$

上述一阶条件表明要使个体获得最大利润，必须使其边际区位利润为零。也就是说，个体无法通过区位的再调整带来利润的增加，此时个体区位最优。

具体来说，就是要考虑区位对于 r_1、r_2、r_3、Z 的分别影响。当由于区位变动带来的对四者的变动影响总和为零时，个体选择的区位将不再变化。

我们进一步假设“鲁滨逊”们比“星期五”们对个体 X 所生产的产品更偏好，那么将在区位 A 首先产生对个体 X 的产品需求。因此，要使上述一阶条件得到满足，必须使 $t\mathrm{d}Z/\mathrm{d}D = 0$。这就要求生产地就在市场地，即个体 X 最优的区位在 A 区位。

2. 居民的区位选择

居民作为消费者进行区位选择，实际上可以看成是一种商品的消费行为。居

民面临相应的预算约束下的消费商品集，我们可以将其看成是一个商品向量，即由一连串不同商品的数量组成的一个集合：$X=(x_1, x_2, \cdots, x_n)$。其中，区位就是其中的一种商品。但是区位商品与其他商品不同，消费区位商品除了决定消费者的直接住房支出，还会影响到其相应的收益和成本。例如，它可能会影响到消费者的就业及其收入，也会影响到消费其他商品的成本。当然，最为关键的是，区位这种商品还是多种潜在商品的集合表示。在现实的情况下，将商品集合扩展到包括某些潜在可得但并非实际可得的商品或劳务，甚至包括某些通过市场交易之外的手段来得到的事物（例如"家庭团聚"的经历）等是方便的，有时还甚至是必要的。而这些往往是区位商品的消费所得，或者说是由区位商品的消费所决定的。因此，居民的区位选择更是一种权衡，亦即不同区位能够带来的收益与支出的比较。

4.3.4 区位选择与聚集经济形成

前面，我们从历史演进的角度，对非均质空间条件下的区位选择问题进行了探讨，指出：非均质条件下的区位选择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成本"替代"的关系。下面，我们具体来分析现实的经济条件下，依要素禀赋差异而进行的区位选择与聚集经济的形成问题。

我们假设一种经济活动的区位选择遵循获益最大化原则。我们将其产出收益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是由"区域性要素"投入所带来的，另一部分是由"非区域性要素"投入带来的，第三部分则是由活动的彼此聚集所带来的。其产出函数可设计为：

$$F(R, NR)=A(D)f(R, NR)+f(R)+f(NR)$$

式中 R、NR 分别表示"区域性要素"和"非区域性要素"的投入，其价格分别用 C_r 和 C_{nr} 表示，其中 C_r 是区位 D 的函数，NR 是非区域性要素，即完全流动性要素，其价格 C_{nr} 与区位无关。A 为聚集影响因子，与区位有关。同时，把个体生产的产品或服务运输到市场也需要成本，设产地到市场的距离为 L，运费费率为 t。现在我们可以假设个体在技术上是最优的，也即 R^*、NR^* 使 $F(R, NR)$ 在既定投入下的产出水平最大，产品价格水平是成本加成方式既定的。因此，现在个体的区位选择问题是：

$$\max \Pi = P[A(D)f(R^*, NR^*)+f(R^*)+f(NR^*)] - C_r(D)R^* - C_{nr}NR^* - tL(D)$$

满足上式的一阶条件是：

$$\partial \Pi / \partial D = Pf(R^*, NR^*) \times \mathrm{d}A(D)/\mathrm{d}D - \mathrm{d}C_r(D)/\mathrm{d}DR^* - t\mathrm{d}L(D)/\mathrm{d}D = 0$$

这样，对于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因子可以分解为：

（1）“区域性要素”对于区位的差异，亦即：$\mathrm{d}C_r(D)/\mathrm{d}DR^*$

“区域性要素”作为随着区位变化的要素，对于个体的区位选择起到重要的作用；“区域性要素”成本的提高，将会影响到个体的区位选择。

（2）聚集效应对于区位的差异，亦即 $Pf(R^*, NR^*) \times \mathrm{d}A(D)/\mathrm{d}D$，这里主要说明聚集作为一个外部影响过程对于区位选择的影响，特别是不同区位的聚集差异会对个体的区位选择产生影响。

（3）距离对于区位的影响，亦即 $t\mathrm{d}L(D)/\mathrm{d}D$。

（4）从上述分析中，由于我们界定了“非区域性要素”是可以完全自由流动的，不因为区位的差异，其成本发生差异。因此，在区位选择模型中，“非区域性要素”的影响随之被剔除。这种处理与现实非常相似。特别是国内或一个相对小的区域内，“非区域性要素”的区位影响几乎为零。

这种区域性要素对经济行为主体的区位选择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不同空间区域所蕴含的“区域性要素”的差异，使得同类的经济活动趋向于选择相同（或相似）的区位。同时这种共同选择带来的聚集效应，又反过来强化了这种趋势。因此，在特定的空间形成了聚集经济。

4.3.5 要素禀赋与聚集经济——历史和动态的视角

非均质空间下的区位选择假说为我们展示了要素对于聚集经济实现的内在机理。这里所使用的要素已经经过了标准化和无量纲化处理，突出了要素对空间经济活动的内生机制。更重要的是，这一假说向我们明确展示了聚集经济不是平坦空间中随机形成，而是与特定要素禀赋的空间分布直接相关。另外，这种内生机制具有很强的历史和动态性质，不同时代驱动这一内生机制的要素往往不同，体现出明显的历史演化特征。

在农业社会时代，土地被认为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与土地直接相关的自然资源成为人们进行区位选择最重要的驱动力量，土地肥沃程度、自然矿藏禀赋、天然的水道和港口等自然条件都是区位主体最重要的选择变量，向自然资源丰富地聚

集是人们的首要选择。

工业社会时代，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不断增强，区位选择中对自然资源的指向性逐渐变弱。工业化的深入使得作为工业要素的资本和劳动力等越来越重要，向劳动力和资本丰富的地区聚集是工业时代的显著空间特征。

到了后工业和信息时代，产业高级化进程不断加速，在劳动力和资本等传统要素继续发挥作用的同时，信息、制度等新要素也构成了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信息革命和知识经济的崛起，令传统工业要素的地位不断下降，而新要素的作用却日益凸现，拥有丰富信息和先进制度的地方成为优势区位，驱动其他经济要素不断向这一区位聚集，形成聚集经济。

本章小结

本章着力于分析从区位选择到聚集经济的一般机理。为此，从均质与非均质两个不同视角分析了从区位选择到聚集经济的实现路径。相对而言，均质空间下的研究比较成熟，但不能有效地回答在哪聚集的问题。为此，我们提出了非均质空间下的区位选择假说，该假说对于回答经济区域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会更加深刻地理解到，均质空间下的研究较好地解决了经济功能区的形成问题，而非均质空间区位选择假说则是解释经济区域形成的关键。

思考题

1. 怎样理解从区位选择到聚集经济的分析构成区域经济学的重要微观基础？
2. 本章归纳了均质空间下从区位选择到聚集经济实现的路径，其中既有失败的，也有成功的，分析其失败和成功的原因各是什么？
3. 比较非均质空间下的区位选择与均质空间下的区位选择的异同。
4. 区位选择行为往往具有非连续性，而聚集经济则具有显著的连续性特征，这个矛盾如何解决？

参考文献

高进田:《区位的经济学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金丽国:《区域主体与空间经济自组织》,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埃德温·S. 米尔斯主编:《区域和城市经济学手册》第二卷,郝寿义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安虎森:《区域经济学通论》,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保罗·切希尔主编:《区域和城市经济学手册》第三卷,安虎森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彼得·尼茨坎普主编:《区域和城市经济学手册》第一卷,安虎森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郝寿义、安虎森:《区域经济学》(第二版),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谭遂、杨开忠、谭成文:《基于自组织理论的两种城市空间结构动态模型比较》,《经济地理》2002 年第 3 期,第 322—326 页。

谭遂、杨开忠等:《一种基于自组织理论的城市与区域空间格局演变模型研究》,《经济地理》2003 年第 2 期,第 149—153 页。

Anderson, Simon P. and Damien J. Neven, 1991, "Cournot Competition Yields Spatial Agglomeration", *International Ecoonomic Review*, 32(4), pp. 793—807.

Audretsch, D. B. and M. P. Feldman, 1996, "R&D Spillovers and the Geography of Innovation and Production", *Amercian Economic Review*, 86, pp. 630—640.

Cohen, Jeffrey P. and Cathine J. Morrison Paul, 2001,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and Industry Location Decisions: The Impacts of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Spillovers", *AER* Working Paper.

Eaton, B. C. and R. G. Lipsey, 1977, "The Non-Uniqueness of Equilibrium in the Loschian Location Model",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44, pp. 361—367.

Fujita, M., Krugman, P., Venables, A. J., 1999, *The Spatial Economy: Cities, Region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The MIT Press.

Gallup, J. L., Sacks, J. D., Mellinger, A. D., 1998, "Geograph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NBER Working Paper, No. 6849.

Gore, C., 1984, *Regions in Question: Space, Development Theory and Regional Policy*, Methuen, New York.

Greenhut, M. L., 1995, *Spatial Microeconomics*, Edward Elgar.

Gupta, Barnali, Debashis Pal and Jyotirmoy Sarkar, 1997, "Spatial Cournot Competition and Agglomeration in a Model of Location Choice",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27, pp. 261—282.

Hoover, E. M., 1975, *An Introduction to Regional Economics*, Alfred A. Knopf, Inc..

Hotelling, H., 1929, "Stability in Competition", *The Economic Journal*, 39, pp. 41—57.

Isard, W., 1956, *Location and Space-Economy: A General Theory Relating to Industrial Location, Market Areas, Land Use, Trade, and Urban Structure*, The MIT Press.

Krugman, P., 1992, "A Dynamics Spatial Model",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s No. 4217.

Krugman, P., 1993, "First Nature, Second Nature and Metropolitan Location",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33(2), pp. 129—144.

Matsushima, Noriaki, 2001, "Cournot Competition and Spatial Agglomeration Revisited", *Economics Letters*, 73, pp. 175—177.

Mayer, Thierry, 2000, "Spatial Cournot Competition and Heterogeneous Production Costs across Locations",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30, pp. 325—352.

McCann, P., 2001, *Urban & Regional Econom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al, Debashis, 1998, "Does Cournot Competition Yield Spatial Agglomeration?", *Economics Letters*, 60, pp. 49—53.

第 5 章

聚集经济、经济功能区与经济区域形成

非均质空间条件下，经济行为主体在空间上的分布呈现非均质状态，亦即相应的聚集状态。而这种聚集显然不可能是无限制、无规律的，经济活动的聚集根据一定的规律性，在特定的经济空间范围内形成有效的聚集，进而构成在一定空间范围内相对均质的经济功能区。不同性质、不同等级的经济功能区，彼此之间交互作用，形成的一种具有网络特征的经济空间，我们称之为经济区域。

5.1 经济功能区

5.1.1 经济功能区概念

经济功能区是由同类的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高度聚集，连片分布形成的空间区域。这种功能区一般是以某种经济功能为主，兼有其他功能。由于各种经济活动需要占有或利用一定的地域空间，而地域空间因其附着的要素的差异而表现为异质性，因此各种经济活动之间必然发生空间竞争，导致各种经济功能区的形成。

经济功能区的主要特征有：

（1）主导要素的优势度。主导要素的优势度，亦即经济功能区内某一经济要素占据主导地位，主导要素在空间上的聚集度要明显强于其他地区，从而形成一个特色空间区域。如果落实到实际中，即地均主导要素拥有量要高于其他地区。正是这种主导要素的聚集度的差异，决定了其与其他经济功能区的边界。

（2）组织上的同质性或群体性。经济功能区的组织方式分为两种情况，相应地表现出组织上的同质性或群体性。一种情况是，区内经济活动属于某一类的经济活动，并且所依赖的主要资源和要素的基础相似，因而经济功能区内的经济活动具有同质性（相对均质空间）。另一种情况下是，区内某一经济活动占据主导地位，但包含了若干项其他关联的经济活动，它们依据经济上、技术上的联系而组成经济

系统，从而使经济功能区内的经济活动具有群体性（结节区域）。但是，无论哪种情况，经济功能区在组织上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是区域经济中相对独立的组织单位。

（3）空间上的相对独立性。经济功能区具有一定的空间边界，就同类同层次的经济功能区而言，一个经济功能区在某一时间上所占据的地理空间具有独立性。但是，对于不同性质或层次的经济功能区则有可能在同一时间内部分或完全共享同一个经济空间。

（4）对外联系的开放性。经济功能区是开放的经济系统，经济功能区内部的经济活动需要从区外获得资源和要素，需要利用区外市场，并经常受到来自外部环境的影响。另一方面，经济功能区也需要通过对外联系来扩散影响，提高自己的地位，寻求发展的机遇。开放性是经济功能区改善发展条件、获得发展机会和动力的一个源泉。

5.1.2 经济功能区特性

经济功能区具有相应的能性、能级、能位的特性。

1. 经济功能区的能性

经济功能区的能性，是指经济功能区的性质，也就是经济功能区的种类，比如住宅功能区、商业功能区、高教区等。它表示经济功能区的功能“是什么”。经济功能区的能性，只反映经济功能区的种类而不涉及经济功能区的大小。所以，在我们看来不能同日而语的两个经济功能区可能具有相同的能性，比如北京的王府井商业区与一个县城或者街区规划的商业区，都可以是商业区。一个经济功能区可以同时具有多个不同能性，但彼此需要相互协调，且具有一个主导功能。

2. 经济功能区的能级

经济功能区的能级，是指经济功能区的自身的量能以及对外作用的强度和广度。经济功能区对外辐射范围越广，辐射强度越大，则经济功能区的能级越高；经济功能区对外辐射范围越窄，辐射强度越小，则经济功能区的能级越低。能级表示经济功能区功能“有多大”。按照经济功能区能级的不同，可以划分为全球性的、跨国性的、国家级的、区域级的和地方级的。同一区域内不同能性的经济功能区的能级常有相当大的差别。一个区域内的不同经济功能区往往有各自不同的影响范围，有不同的能级。如天津市的商业功能区可能只能辐射天津市区和所辖各县，而它的物流功能区却辐射东北、华北和西北地区。

经济功能区的能级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影响最直接的因素有三个：经济功能区内经济主体的专业化程度、经济主体的数量、经济主体的质量。一般来讲，经济功能区内的经济主体的专业化程度越高，它与其他地区进行的原材料、零部件、生产服务、产品的交易就越多，不仅数量大、品种多，而且交易频繁，与外界联系密切，对外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也就越多，经济功能区的能级较大。容易想象，如果人们都能生产自己所需的所有产品，企业自身制造所有零部件和机器设备，那么这个经济功能区就相对隔绝，辐射能力很低。经济主体的数量也是影响经济功能区能级的重要因素，在同等条件下，经济主体的数量越多，经济功能区对外提供产品和服务的总体能力越大，从而经济功能区的能级越高。经济主体的质量主要是指经济主体的生产率和市场竞争力，这些都是决定该经济主体的产品和服务的影响范围和影响力度的重要因素，经济功能区的功能正是通过经济功能区内的经济主体的产品和服务来实现的。

3. 经济功能区的能位

经济功能区的能位，是经济功能区发挥作用的空间区位，是指一个区域内经济功能区在地理上的分布结构。它反映经济功能区空间上的协调程度。

某一能性的经济功能区的能位是由其地理位置及其能级所共同决定的。同性，但不同级的经济功能区的辐射范围是否存在重叠区域、重叠的严重程度、是否存在空白区域，是衡量经济功能区能位好坏的重要标准。最佳的能位应该是经济功能区辐射范围相互补充，交叉少，覆盖面广，组成一个严密的经济功能区的能位图，把地球表面完整而不重复地覆盖。更广义地看，各种能性经济功能区的能位图叠加在一起，可以反映不同能性经济功能区相互协调的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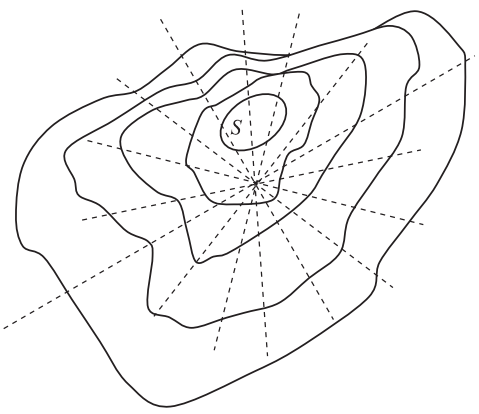


图 5.1　要素 x 的聚集度等高线

5.1.3　经济功能区边界

经济功能区具有一定的边界，我们可以用数学的表达式来进一步说明经济功能区概念及其边界的确定问题。例如，某一以主导功能或主导要素 x 为表征的经济功能区 A。这里，主导要素 x 在空间上的分布可以用左图 5.1 来说明：

通过相关地理信息系统、普查或者其他技术，我们可以根据某一单一的主导要素指标，测出主导要素 x 的聚集度等高线。这一等高线，可以作为判断某一区域是否构成某一主导要素支配的经济功能区的依据，同时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描述经济功能区的边界。

主导要素 x 的密度可以用下面的公式来表示：

$$\rho = [\int_0^S f(x)]/S$$

经济功能区的边界主要取决于主导要素的聚集度的等高性和衰减性。要表征一个经济功能区需要有两个条件：一是必须相应区位的主导要素的聚集度相对等高；二是相应区域内的某一主导要素密度与相邻区域有一个明显的落差。

以上图为例，假定图示中的等高线就是主导要素 x 在空间上的丰富度，从内向外，等高线递减，即内圈的要素 x 的聚集度总比外圈要大。我们要确认 S 为某一经济功能区，则必须满足：一是在 S 范围内，以要素 x 为主导要素，主导要素 x 在 S 范围内聚集度相对等高；二是 S 范围内的要素 x 的聚集度要明显高于相邻的其他区域。很显然，S 的边界可以通过单一要素 x 的聚集度来确定。

5.2 要素禀赋、聚集与经济功能区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行为主体根据特定空间的要素禀赋差异进行区位选择，不同经济主体的区位选择导致经济活动在特定空间上的聚集。这一动态过程促成了经济功能区的形成。图 5.2 说明了经济功能区的形成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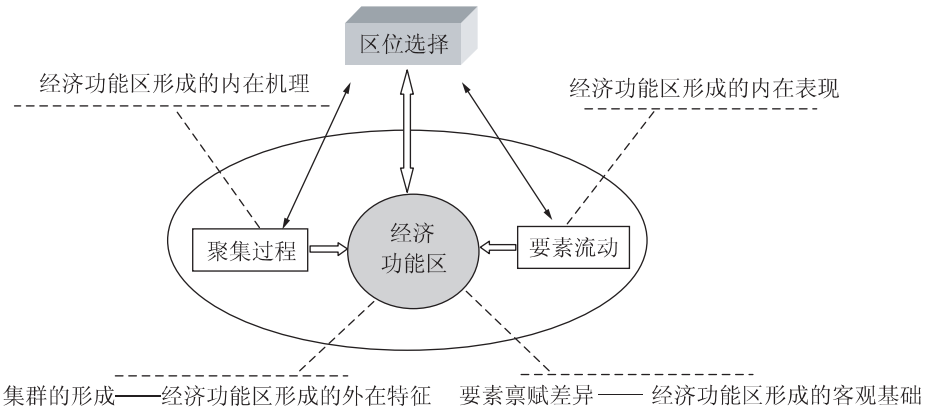


图 5.2 经济功能区的形成

要素禀赋的差异构成了经济功能区形成的客观基础；社会经济行为主体通过区位选择，遵循相应的聚集规律，构成了经济功能区形成的内在机理。经济功能区的内在表现是各种要素在空间上的流动及相应的聚集过程，而经济功能区的外在特征表现为各种各样的集群（如产业集群等）的形成。

5.2.1 要素禀赋与经济功能区

前面，我们对非均质空间的区位选择问题进行了分析，指出非均质空间下的区位选择，必然要充分考虑要素禀赋，特别是区域性要素的作用。一定的经济功能区，首先是以一定的要素禀赋作为特征而存在的，要素禀赋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经济功能区的性质。

这里，建立一个“两地区、两功能和两类要素”的模型，来说明要素禀赋与经济功能区的形成。

1. 模型基本假设

（1）两个空间区域相同部门的生产函数相同；

（2）两个空间区域消费者偏好一致；

（3）规模收益递增；

（4）区域性要素很难流动或者被复制；

（5）“非区域性要素”市场完全竞争，任意流动，价格均等化；

（6）A 地区域性主导要素为 X；B 地区域性主导要素为 Y；

（7）经济活动 x 以 X 为制约性“区域性要素”；经济活动 y 以 Y 为制约性“区域性要素”。

从这些假设可知，两个空间区域的差异性主要体现在“区域性要素”的差异上，且经济活动具有报酬递增效应。在这样的假设条件下，我们可以得出两空间区域将逐渐分化，形成两个不同的经济功能区。

2. 区域性要素与空间区域产出

空间区域上的经济活动的产出与“区域性主导要素”成对称关系。当经济活动与“区域性主导要素”相符或者说经济活动以“区域性主导要素”作为主要的投入品，则产出遵循规模报酬递增的规律，具有明显的规模经济效应；反之则相反！“区域性主导要素”的差异，最终会相同经济活动在不同空间区域上的产出，进而引起经济活动的空间调整。这种产出效应差异可以通过不同的产出函数的偏向性来直观地加以判断。

假设有两种经济活动，一种是以 X 要素作为主要投入要素，产出为 $F(X)$；另一种则以 Y 要素作为主要投入要素，产出为 $F(Y)$。要素的产出差异效应则可以用图 5.3 明显表示出来，即如果活动与要素在空间上相对应，则产出效果呈现报酬规模递增特性；而反之则很难获得规模和报酬递增的效果。下图是两种不同活动在 A 地区布局得到的不同的效益函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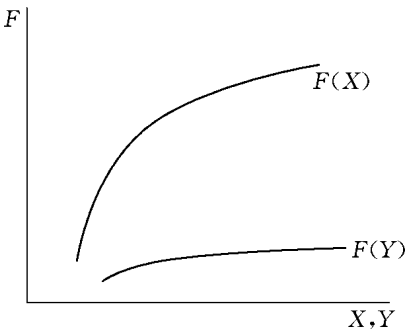


图 5.3　要素的差异产出效应

3. 经济活动的空间有效布局

下面，我们通过两区域来说明经济功能区的形成。在图 5.4 中，E_A 和 E_B 分别表示两地区的区域性要素禀赋点，当经济活动 x 在 A 地区发生时，其产出量等于图 5.4 中通过 E_A 点的等产量线所代表的产出水平 $F_A(x)=\overline{A}_x$；当其在 B 地区发生时，其产出量等于图 5.4 中通过 E_B 点的等产量曲线所代表的产出水平 $F_B(x)=\overline{B}_x$。同样经济活动 y 在 A、B 两地区的生产水平也可以表示出来。根据图 5.4，我们可以在图 5.5 中标出经济活动 x 在 A、B 两地区的产出可能性曲线（或称之为收益可能性曲线）的两个端点，并用一条向外凸的曲线连接起来，便得到了活动 x 的产出可能性边界线的大致轮廓，如图中 xx' 曲线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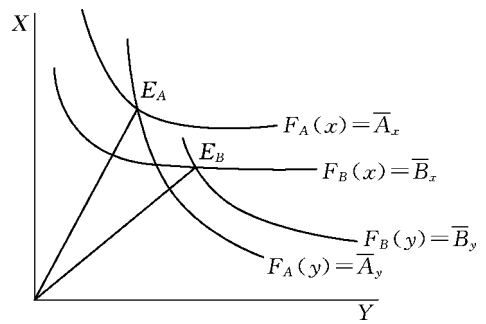


图 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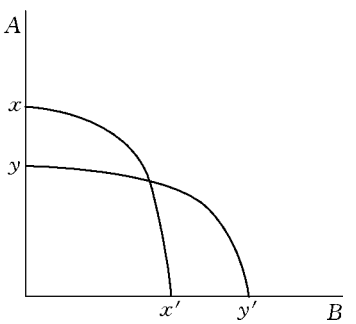


图 5.5

同样，y 活动的产出可能性边界可用同样的办法确定。图 5.5 中，x 活动的产出可能性边界为 xx'。由图 5.4 和图 5.5 可以清楚地看到，x、y 两种活动的产出可能性边界的差异完全是由两地区“区域性要素”的要素禀赋差异所造成的。产出

可能性边界反映了一个地区对于某种经济活动的吸引力。x 活动的产出可能性边界相对偏向于 A 地区，这意味着 A 地区对于 x 活动的吸引力要高于 B 地区，而 B 地区对 y 活动的吸引力则强于 A 地区。于是可以得出结论：空间区域应该根据其“区域性要素”的要素禀赋差异，配置不同的经济活动。或者说是，不同的经济活动会根据其依赖的不同的“区域性要素”而在不同的空间区域实现配置。

这样，不同的空间区域根据其吸引的不同的经济活动，可以形成相应的经济功能区。

5.2.2 聚集经济与经济功能区

很显然，空间的非均质造成了区位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对于不同类型的经济行为主体具有不同的吸引力，而对于同类型的经济主体或活动则具有共同的吸引，这种吸引加上聚集经济的内在报酬递增效应以及累积循环效应，必然在一定的区位上形成聚集。这可以从前面我们提到的“鲁滨逊世界”中得到印证。

1. 聚集经济的内涵

与强调由于“分工和专业化利益、外部经济利益以及规模经济利益”等所造成的聚集效应有所不同，这里强调分析经济聚集的本质，亦即聚集经济本身的内涵。由经济活动集中所形成的聚集经济本身具有三个方面的内涵：

（1）聚集经济的“累积经济性”。聚集意味着要素在一定空间上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集中，这种要素在特定空间上的高度聚集，必然带来一定时间内特定区域的经济增长。这也是城市经济不同于乡村经济最为重要的地方。

（2）聚集经济的“结构性”。聚集经济不是简单的、无序的经济活动地理空间集中，它通常体现为具有一定的合理“结构性”。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聚集的要素是分层次的，一般来说自然资源、一般的劳动力属于低层次的，资本等次之，而知识、技术、高素质的人力资本则处于高层次。这种要素的层次性决定了聚集形态会从低层次的要素聚集逐渐向高层次的要素聚集转化。另一方面，聚集的不同层次要素之间的组合链条也构成了聚集的结构性的一方面的内容，链条是否完整、聚集之间的通道是否顺畅会影响聚集的效果。

（3）聚集经济的空间性。聚集经济的空间性也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聚集随着其聚集度的提高，对周边空间的辐射影响越来越大；反过来，聚集的效果也会受到其周边空间承载力大小和支持通道是否顺畅的影响。其二，聚集的“空间再聚集”特性，聚集到一定程度上会出现空间上的裂变，这种裂变并不是杂乱无章地进

行，而是在新的区位实现重新聚集。正是这种“聚集”与“再聚集”构成了区域空间结构的演进。

2. 聚集经济的层次性

以往人们在研究经济聚集或者聚集经济的时候，通常都是很笼统地分析聚集经济。这种分析有其合理的地方，但是总让相应的分析难以深入。这里，我们在研究经济聚集与经济功能区的时候，考虑将聚集经济分为要素聚集、企业集群、产业集群以及城市群四个层次，其中要素聚集是聚集的本质。

（1）要素聚集。区域性要素的聚集包括区域内要素向不同层次极点的聚集，也包括区外要素向区内聚集的过程。区域性要素的聚集以要素流的形式出现，例如：人口流、物质流、技术流、信息流以及资金流等。这些要素流在空间上的固化往往使得区域土地的利用类型、区域内城市群以及功能发生变化。这种要素流在空间上的聚集一般可能表现为两种方式：一种表现为一定的空间形态上要素的聚集度的提高；另一种是一定空间形态上要素流的级别发生变化（例如，可以认为技术流、信息流是比资金流更为高级的要素流；而资金流相对来说又要比物质流和人口流更为高级一些）。

（2）区域企业集群。企业是要素的组织机构，企业的活力是吸引要素集中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微观源泉。区域企业集群可以作为分析区域聚集的另一种途径，但是这种以中小企业为主的企业集群最为合适的分析区域应当是那种专业化区域。那种专业化区域形成企业集群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地方组合资源优势和相似的基础设施；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类似的企业集群得以在特定空间上的形成和发展有利于发挥规模效益以及促成彼此之间的学习和创新。特定区域内企业集群的形成导致相同企业和相关配套企业在空间上的聚集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同时促成区域在空间上的拓展。

（3）区域产业集群。区域产业集群是建立在企业集群基础上的，产业集群所形成的产业区一般来说是由历史和自然共同限定的区域，其中的中小企业积极地相互作用，企业群与社会趋向融合；区内的生产活动不是自给自足，而是劳动分工的不断细化，生产力迅速提高，促使区域与外部经济空间建立持久与广泛的联系。培育区域特色产业、发展专业化产业区是提高区域产业竞争力的关键。区域产业集群可以看作是区域聚集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这也是区域经济发展强调主导产业、支柱产业重要性的原因所在。产业聚集在一定的程度上，能够有效地促进区域

经济的发展以及区域竞争力的提高。而这种产业聚集也会因为产业自身的升级要求而发生区域产业结构的演进。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要求产业集群发展中不断提升技术水平和不断淘汰低级产业。

(4) 区域城市群的形成和发展。区域城市群可以被看成分析区域聚集的最高级形式。城市本身是区域聚集的核心。城市群,特别是大都市连绵区则更是区域内聚集的最高级表现形式。城市群体可概括为三圈层空间结构。城市群区以首位城市为核心依此向外推移,城镇的规模、城镇密度、城镇及城镇组群的等级依次降低。空间分布的节点在相似的背景条件下吸引和排斥作用使其分布趋于均匀,由于各节点生长机会和能力的不均衡,相互作用场强存在较大差别,导致城市规模和分布的梯度差异。在这一系统中,能量向较高的区域或个体集聚,形成随城市规模增大而城市个体数目的逐级减少,规模较大的个体占据和影响的空间愈来愈大,最终形成有序的等级序列。从圈层结构分析,城市群体结构可划分为核心首位城市带、城市组群发育带、城市个体分布带、城市群腹地带。核心首位城市带:位于城市群中心,发展历史悠久,规模最大,由首位城市及其卫星城组成,第二、三产业发达,非农业用地所占比重较大,交通通达性好,具有极强的集聚和扩散功能。城市组群发育带:围绕核心区形成规模不等的次级城市聚集区,城市发育程度高,具有一定的系统性,在城市群中承担特定的功能,交通便捷。城市个体分布带:分布于城市组群外围,城市个体差异明显,无集聚性功能,与前两圈层有一定的交通联系,城市分布相对均匀,农业用地所占比重较大,以区域性集聚为主。城市群腹地带:由于交通通达性等因素的影响,核心扩散未能在此形成要素集聚,以农业用地为主,第二、三产业不发达,以此为骨架形成理想的城市群结构型式。

从要素聚集—企业集群—产业集群—城市群四个层次的分析可以看出,要素聚集是分析其他几种聚集的基础,正是要素聚集的发生和变化,才引起企业、产业以及区域形态的变化,因此要素聚集是聚集的本质特征。

3. 经济聚集的空间表现——经济功能区

通过聚集经济的本质以及层次性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聚集经济由于聚集类型的不同,其空间表现也将不同。结合前面对于经济功能和经济功能区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不同类型的聚集形态将会产生相应的经济功能区。

(1) 要素聚集与经济功能区。要素聚集是经济功能区的核心标志,是界定经济功能区的性质的关键。这里需要指出的一点,农业地区(农村地区)要素较为均

质，没有形成聚集。但是，我们可以将特定的农业地区看作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功能区。与此相对应，城市作为要素高度聚集的区域可以被看作与农村地区相对应的另一类型经济功能区。如果我们不对要素类别及其组织结构进行分析，而是将各种要素进行一个“抽象意义”上的“加总”，用“要素密度”来衡量农村地区和城市地区，则可以得到相对较大差异的两类型“经济功能区”——城市与农村。可以用三维空间下的不同要素密度图示来说明（见图 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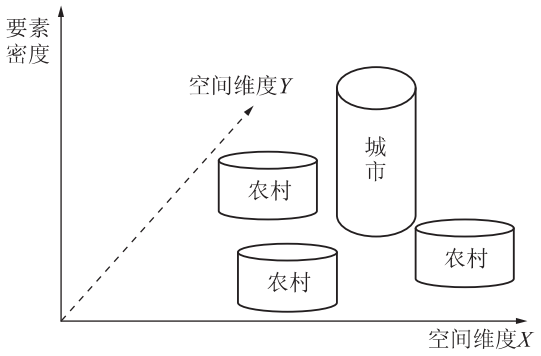


图 5.6　农村与城市两大经济功能区

（2）企业聚集与单一经济功能区。企业聚集在于分享市场、分享相应的基础设施等，因此一般来说企业聚集往往表现为同类型的企业相互集中。特别要说明的是，这里的所谓企业可能是商业企业、工业企业，也有可能指“家庭”。在现实生活中，这种聚集往往表现为“大型的住宅区”、“集中的商业区”和“成规模的工业小区”。

因此，一般来说这种经济功能区的性质相对单一、稳定。在一定的经济功能区范围内，空间要素分布相对均质。这种经济功能区对于其他区域的影响较小，往往只是通过相应的“人流”、“物流”与其他经济功能区进行交换。

（3）产业聚集与综合性经济功能区。产业的聚集往往形成产业集群，进而形成一定的“产业区”。产业集群不是一个简单的企业聚集的概念，它是根据分工、专业化进行有效组织，同时与社会趋向于融合的特殊经济功能区。如果说，企业聚集形成的是“出口加工区”、“工业小区”、“经济开发区”，那么“产业聚集”形成的则是更为综合性的“经济特区”。

因此，一般来说产业聚集形成的经济功能区是以某一主导功能为主，辅之以相关功能；形成一定的主导产业，同时具有相应的配套产业。这样的经济功能区相对

来说具有更强的“动态性”，其空间范围的均质性较之企业聚集形成的经济功能区要差一些。但是，它对于其周边区域以及其他区域的影响更强，它可以更多地通过“制度”、“技术”以及“文化”等方式影响其他经济功能区。

(4) 城市聚集与经济功能区。城市聚集不同于前面所列举的集中聚集形态，城市聚集相对来说，比较难以实现区位上的迁移过程。城市聚集更多的是通过搭建彼此的网络结构来实现聚集，进而形成“城市群”，在城市群内实现“功能分工”、“设施共享”。因此，城市群这种经济功能区主导功能表现不明显，存在较复杂的内部结构，就空间分布来说不很稳定，同时内部的均质性更差。它的“经济功能”特性需要在一个更大的区域范围，甚至全球范围内体现。但是，这一类型的“经济功能区”对于区域，乃至国家经济的影响非常大。

4. 聚集与经济功能区特性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聚集与经济功能区之间存在的一些规律。具体见表 5.1：

表 5.1 聚集与经济功能区

聚集 / 经济功能区	要素聚集	企业聚集	产业聚集	城市聚集
表现形式	城市	单一功能区	综合性功能区	城市群
功能	综合	单一	较为综合	分工基础上的综合
稳定性	中	强	中	弱
内部均质性	中	好	中	差
对外界影响	中	差	中	好

5.3 经济区域形成

经济区域，亦即经济学所要研究的区域，它是区域经济学中最基本的概念，也是区域经济研究的对象和整个区域经济学科的理论基点。

5.3.1 经济区域概念

目前对于“区域”概念的界定，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远未形成一个统一的观点。正如区域经济学家 H. 理查森(H. Richardson)所说，精确地定义区域是如此困难，以至于大多数区域经济学家宁可回避这项工作。另一方面，由于区域经济研究者的学科背景差异，各个学者从自身对于区域经济学的理解出发，从不同的角度对“区域”进行定义，并在此基础上各自展开对区域经济学学科框架和理论体系的构建。这里，就经济学对区域概念的认识做一个回顾和评价，并在此基础上给出本

书关于经济区域的概念。①

1. 经济学中“无限空间”的区域概念

一般经济学研究经济现象时，往往做出很简单也是很不现实的假定，即所有生产和消费都集中在一个地点上，这样就剔除了空间因素这一极其重要而很棘手的变量。最简单的例子是运输成本，这种运输成本是因生产区和市场区的空间分离而产生的。一般经济学视这种成本为一种生产成本，并认为降低这种成本的主要途径为运输技术的改进和发展。然而，如果调整厂商的生产区位，则可以避免这种额外的成本，或大大节省运输成本。正如贝克曼(Beckmann)所指出的那样：“新古典经济学没有分析生产和定价的空间层面，而把它让给了区位论。”②从这种角度去理解区域时，区域是一种无限空间，可以由点、线、面来表示，但不包含范围。我们经常接触的空间是地理空间，可以用点(位置)和线(距离)来表述；如果我们研究的是不同产业或不同人之间的“距离”，那么这种空间是一种模糊空间，我们可以用“模糊位置”、“模糊距离”来表述；如果我们研究的是“核”与“外围”的关系，则这种空间为佩鲁的“受力场”，我们可以用“核”与“受力的通道”来表述。在与这种纯粹空间有关的区域经济学研究内容中，人们比较熟悉的是区位决策问题。

2. 经济学中“有限空间”的区域概念

当然，传统经济学有时候也从有限空间角度去理解区域概念。这时的区域，是指一定范围内的空间，可以用点、线、面来表述，而且还包括了一定范围。我们平时讨论的生产要素的跨界流动、区际经济发展差距、区际劳动分工与贸易等所涉及的区域都属于这种有限空间，这种有限空间将包含某种边界，尽管这种边界是很模糊的。胡佛、理查森等学者对区域概念的理解就是这种有限空间。胡佛认为：“区域是根据叙述、分析、管理、规划或制定政策等目的，作为一种有效实体来加以考虑的一片地区，它可以根据内部同质性或功能同一性而加以划分。”③胡佛还指出：“把区域视为一种聚合体，可以减少所掌握处理的数据和事件，这有助于描述区域。在大多数

① 其他学科对于区域概念的界定，可参见高进田：《区位的经济学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② 彼得·尼茨坎普主编：《区域和城市经济学手册》第一卷，安虎森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9页。

③ Edgar M. Hoover and Frank Giarratani, *An Introduction to Regional Economics*, Alfred A. Knopf, 1984, p. 264.

情况下人口普查、县的统计总量和平均数所提供的信息量与大量的单项普查所包含的信息量是同样丰富的。但在分析、处理上，前者比后者容易得多。同样，聚合体能够简化对信息的分析过程，这在一个地区内存在大量相互依赖的单元或活动而这一整体又不仅仅是各个个体的综合时尤其重要。最后，由于同样的原因，这一聚合体对于管理、计划以及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是必需的。从这些可以看到，最适宜的区域划分应遵循行政区域疆界。”①从胡佛的阐述中可以看到，从这种角度所理解的区域，必然包括在某一主权国家的疆域内，中央政府对它拥有政治、经济方面的控制权，或中央政府的代表代理中央政府形式控制权。如果把区域理解为有限空间，而且它必须在某一主权国家疆域内以及能够有效地组织区内外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联系，那么这些区域在经济上应是比较完整的区域。所谓完整，是指区域能够独立地生存和发展，具有比较完整的经济结构，能够独立地组织与其他区域的经济联系。这就要求区域必须具备能够组织和协调区内经济活动与区际经济联系的能力，如果不具备这种能力，它就不是一个完整的区域，不能单独组成一个区域。要具备这样的组织和协调能力，不仅要能够制定符合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且能够刺激区域经济持续高涨的各种政策法令，还要具有“高级循环”，也就是要具有由金融银行业、贸易和批发业、信息产业、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服务业等所组成的循环系统。如果缺乏这种循环系统，则无法组织区内的经济活动，也无法组织区际经济联系，不能独立地生存和发展。一般来讲，制定政策的权力机构和高级循环系统主要集中在较高等级的中心城市里。因而这种中心城市充当区域经济的组织者和协调者，正如胡佛指出的那样，“每一个地区必须包含至少一个‘中心城市’组成的核心”②。

这也就是我们国内学者常常引以为据的区域概念：区域是由城市和农村二元结构或者城市、农村、城乡边缘区三元结构组成。

3. 近年来对区域的一些新认识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在艾萨德的基础上演化出两种探寻区域本质的研究流派，一个分支是强调聚集的规模报酬递增原理，新经济地理学派的代表藤田、克鲁格曼等，在《空间经济学》一书中虽然没有直接给区域下定义，但指出：“区域

---

① Edgar M. Hoover and Frank Giarratani, *An Introduction to Regional Economics*, Alfred A. Knopf, 1984, p. 243.

② 同上书，p. 246。

就是一定的经济空间，是各种形式的收益递增和不同类型的流动成本相互平衡作用的结果。”[①]另一支是新兴古典经济学派则更加侧重区域产生的专业化分工基础，杨小凯等人则从专业化经济和交易费用的思想出发，深化了艾萨德等人的区域专业化分工认识，认为专业化与市场交换是产生区域差异的基础，提出区域是一种经济组织，它是随城市的形成而出现的，这种组织是市场选择的结果。

4. 经济区域概念

通过前面的回顾，我们知道传统意义上的区域概念强调的是一种空间，而近年来一些经济学者（特别是一些新兴古典经济学研究者）的概念则强调是一种经济组织。这种将区域抽象为一种经济组织，有其科学性和逻辑上的可接受性。但是，却丢失了区域（或经济区域）的概念本身所蕴含的特有的空间内涵。不能因为空间内涵不便于清晰的表述，就舍弃这一核心。因为不管怎么说，区域的概念脱离不了“空间”。区域概念不可能，也不应该像“企业”概念那样被无限度的抽象为制度或组织。在此基础上，我们结合前面具体论述的经济功能区，给经济区域下一个定义，亦即：

经济区域是由不同种类、不同等级的、具有较强自组织能力、相对独立却高度开放的经济功能区，彼此之间交互作用，形成的一种具有网络特征的经济空间。

在这一定义中，居住区可能是一种经济功能区；商业区可能是一种经济功能区；农村地区也可能归类于一种经济功能区。而且这些功能区可能有其自身的等级性。一方面，每一类经济功能区不同等级构成一种网络结构；另一方面不同种类的经济功能区之间彼此联系，形成另一种网络结构。正是这种不同的网络结构彼此之间的叠加，才形成了相应的经济空间。

5.3.2 经济功能区与经济区域

在界定经济区域概念时，指出经济区域是一种自组织能力强的经济网络空间，而这一空间的基础（或称之为组成单元）是经济功能区。那么经济功能区是怎么有效地组成经济区域的呢？这构成了本节的主要内容。

1. 经济功能区的分层和模块化特征

“无论在无机界还是在有机界，质量围绕某一核心——中心区的凝聚，是应归属在一起的事物之等级序列的一种基本形式——集中型等级序列。”[②]因此，一定

---

① Fujita, Krugman, Venables, *The Spatial Economy: Cities Region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MIT press, 1999, pp. 18-30.

② 沃尔特·克里斯塔勒：《德国南部中心地原理》，常正文、王兴中等译，商务印书馆 1998 年版，第 19 页。

的时间维度下，不同的经济功能区在社会经济网络中，各自占据一定的联系互动的经济功能位置，这些纵横交错彼此联系的经济功能区有一些占据的经济区位的价值量相当或接近，有一些却相差很多。这些占据不等区位价值的经济功能区网络上下叠合形成层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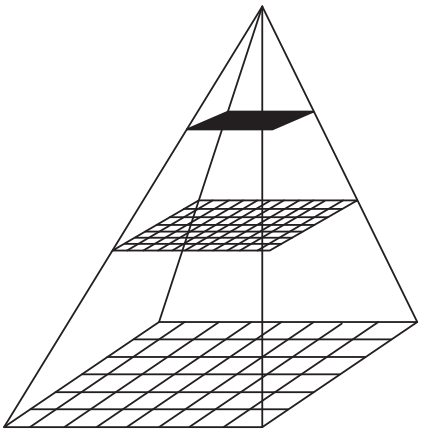


图 5.7　经济功能区网络分层图解

如果不考虑区位价值的扭曲异化，亦即与相应的区位价值所对应的经济空间被合适的经济功能区所占据，也不考虑区位价值的发展变迁，那么在某一时刻，我们可以静态地刻画经济区域中经济功能区的锥体状的分层状况，如图 5.7 所示。

这样，

（1）同一能性、不同等级的经济功能区在经济区域网络体系中占据与其相对应的影响范围的经济区域网络节点。

（2）不同等级的经济功能区具有相应的、不同的影响范围和供给区。

（3）各层次的经济功能区，在一定程度上统帅属于比它低一级的同能性的经济功能区。

这也可以通过下面的图形来直观地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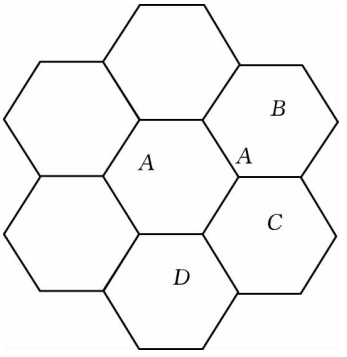


图 5.8　较高层级的经济功能范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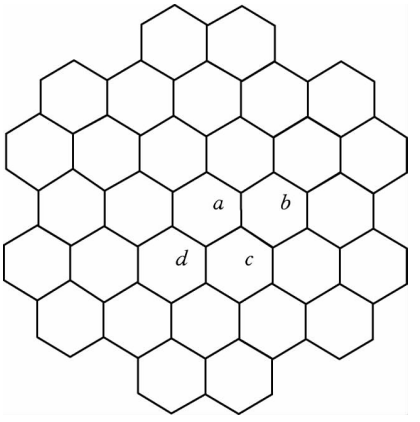


图 5.9　较低层级的经济功能区

图 5.8 和图 5.9 分别描绘了两个层级的经济功能区分布，很显然二者的影响范围和在经济区域中占据的位置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将二者叠加，我们可以得

到图 5.10。这也说明较高层级的经济功能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与较低层级的经济功能区影响范围重叠，而且具有一定的统帅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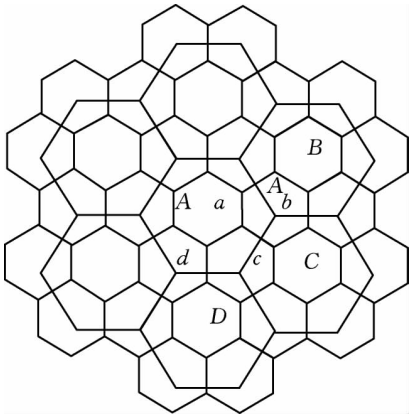


图 5.10　不同层级经济功能区的叠加

模块化是一个将系统进行分解和整合的动态过程，模块化是与分工经济相联系的经济现象，是经济系统演进的结构性表现；经济系统的演进是遵循着“规模经济—分工经济—模块化”的基本路径。很显然，经济功能区的形成也是由自发的“市场规则”和人为的“政府规则”共同决定的。经济功能区也是以分工、专业化为基础的。同样，仅仅有分工专业化，也不一定形成合理的经济功能区。我们可以将经济功能区看作是一定经济区域网络中的节点或者模块。这种经济功能区具有等级性、网络性和模块化的特征，是复杂经济区域中的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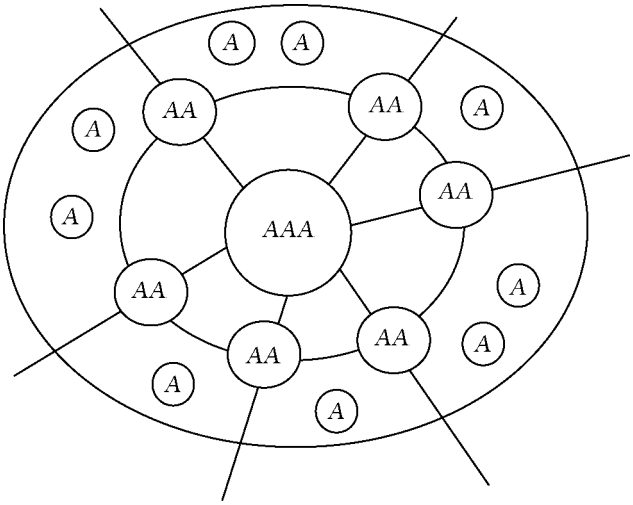
2. 市场范围、空间成本与经济功能区的纵向分解

经济功能区根据其能性的不同，可以分为不同类型；同一能性的经济功能区按照其不同的能级和能位又可以分为不同的层级。同一能性的不同能级的经济功能区由于其自身相同的能性，具有纵向分解的内在机理。

（1）市场范围是经济功能区等级差异的基础。同一能性的经济功能区由于其依托的市场范围不同，可能呈现等级式分布特征。这种市场范围的不同可能体现为市场供给能力的不同，也可以体现为市场需求能力的差异。市场供给能力的不同，是指不同等级的经济功能区所提供的产品（或者服务）的种类、层级、影响范围不同。而市场需求能力的差异，则取决于所在经济区域的人口的总量和需求的水平。这种市场范围的差异，既可以根据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原理”得出证实，也可以用商业功能区网络很现实地表现出来。

如图 5.11 所示，商业中心由于其覆盖的市场范围的差异，形成一定的等级体系，越高级别的商业中心其影响覆盖范围越大且数目越少。

（2）空间成本节省是经济功能区等级式纵向分解的内在机理。这里所说的空间成本并不是运输成本。虽然运输成本是因空间距离而产生，但生产成本一般已经包含了运输成本。科斯提出了交易费用概念时没有考虑空间的影响，没有涉及



注：*AAA* 是指最高等级的商业中心，*AA* 次之，*A* 更低。

图 5.11　商业中心的等级体系

空间阻隔而产生的空间成本的付出。实际上，只要存在空间距离，人们完成一笔交易时，总比位于市场区的交易者付出更多的费用，这种费用是由于空间距离，更确切地说是由于时间距离而产生的。假设参与交易的当事人都具有理性且偏好相同，交易方式和完成一笔交易的程序相同，交通方式相同。我们知道，信息质量因传输方式不同而不同，质量等级最低的是用文字印发的信息，电话可以提高信息的质量等级，但属于信息质量首位的是面对面会见。要完成一次交易，最后交易双方往往必须坐下来进行签约，任何信息传递手段都无法替代这种面对面的会见。这样，距离市场区不同距离的人，因为到达市场区进行交易所耗费的时间成本是不同的。距离市场区较远处总比离市场区较近处多花费时间和精力，也就是说对相同的交易频数而言，远距离者总是多付出时间和精力，付出更多的资源。

为了节省这种空间成本，人们会不断向市场区靠近。但是因为人的行为活动的需求是分层次的。这种分层的需求发生的频次会有很大的差异。高层次需求的频次一般来说较小，而相对低层次的需求发生的频次相对较大。这种由频次差异带来的需求差异，又可以反过来影响到功能区的层次空间分布。仍以商业为例，如果我们可以将人们对于商品的需求分为：日常生活必需品、提高型生活用品、享受型生活用品。一般来说，日常生活必需品购买的频次最高，享受型生活用品的购买

频次最低，提高型居中。根据空间成本存在的原理，发生频次越高，空间成本越大，因此越需要靠近市场区。反过来说，这样的活动能够在较小的范围内提高较大的需求。这种市场区的等级可以是很低的、但是数目需要很多。这类商业设施往往就是我们所需要的社区商业网点。另一端，享受型的商业由于个体的需求发生的频次较低，因此可以远距离实现购物的可能；另外也造成了其需要巨大的市场区才能生存。因此，享受型的商业设施一般来说在同类经济功能区等级排序中级别很高，但是数目较少。这也与事实非常吻合。

（3）再聚集是经济功能区等级式纵向分解的表现形态。前面，我们提到了聚集与“再聚集”的关系。为了克服过度聚集带来的聚集成本的提高，在一定聚集阶段，需要“裂变”，重新聚集。很显然，这种在原有聚集基础上的“再聚集”往往是一种同能性的经济功能区的纵向分解。经济功能区的等级式纵向分解过程也是彼此之间相互关联的过程，这种关联网络形成了经济区域网络结构的基础层面之一。

3. 分工、联系与经济功能区的横向联合

我们在前面指出经济功能区具有开放性特征，它需要与其他能性的经济功能区进行彼此的联系和交流，从而形成同能级、不同能性的经济功能区网络结构。这就是经济功能区的横向联合。

（1）分工与专业化。分工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一种固有的现象，也是一种十分重要的社会经济规律，对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斯密在其《国富论》中认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①马克思考察了社会生产从简单协作向工厂手工业和机器大生产发展的历史后指出，正是分工的深化，使生产规模得以扩大，而生产规模的扩大，可以从协作中得到好处，而且因为产量提高而固定成本不变使单位产品的成本降低。任何一种生产活动都可以分解为许多基本的单位，这些基本单位是指在既定的生产条件下无法再分的最基本的操作单位，也就是这些生产操作不可能在个人之间可分或无法在空间上分割开来由不同的人来完成。专业化，“就是一个人或组织减少其生产活动中的不同职能的操作的种类；或者说，将生产活动集中于较少的不同职能的操作上。分工就是两个或两个

①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第 5 页。

以上的个人或组织将原来一个人或组织生产活动中所包含的不同职能的操作分开进行”。[①]专业化和分工使一个人或组织从事尽可能少的不同职能的操作。这种分工与专业化之间彼此存在着相互关联性，因此以分工、专业化为基础形成的“经济功能区”之间也存在着相互之间的联系。

（2）部门分工与经济功能区的横向联合。经济功能区一般是由一定的生产、生活部门所组成，部门分工联系是经济功能区彼此之间联系的内在原因之一。部门分工是社会分工的基础，资源的开发和地理环境的变化与部门分工的发展直接相关。人类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部门分工的历史，从自然分工到三次社会大分工，进而到产业革命之后的部门大分化，直至形成当今世界错综复杂的部门分工体系。这种部门的分工体系，也就决定了不同能性的经济功能区之间必然产生相应的联系，它们彼此交换着原料、能源和其他中间产品，进而能够形成相应的分工、专业化提高整个生产的效率。

（3）地域分工与经济功能区横向联合。地域分工是社会分工在地域上的体现，是部门分工在地域上的落实。地域分工与部门分工密切相联，互为影响。但二者的发展过程则各有特点。在生产力的共同作用下，部门分工主要体现在产业部门的不断增多和部门联系的不断增强和日益密切上；而地域分工主要表现在地域专门化的不断加强，生产力的不断扩展和经济地域联系的不断密切与日益深化上。正是这些地域分工联系构成了经济功能区之间彼此的横向联合，进而形成经济区域的横向网络结构。

4. 经济功能区网络叠加与经济区域

前面，我们分别从纵向和横向两个视角分析了经济功能区之间的联系，指出：同能性的经济功能区存在着等级网络结构，形成经济功能区之间的纵向分解网络结构；而不同能性、相对同等级的经济功能区则通过部门分工、地域分工，形成横向联合网络结构。在现实的社会经济生活中，这种纵向的分解网络结构与横向的联合网络结构是彼此并存，相互重叠的。这种重叠的网络结构也就构成了我们所说的经济区域，亦即相应的经济空间。

5.4 经济功能区裂变与经济区域空间结构演进

前面，我们在分析经济区域形成的过程时，侧重于强调“经济区域”是由一系列

① 盛洪：《分工与交易》，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3 页。

不同能性、能级的经济功能区所组成的有机网络结构。这种网络结构必然会随着相应的经济功能区及相关网络通道的变化而发生演进过程。这里，我们就从“经济功能区的裂变”这样的视角来分析经济区域空间结构的演进。

5.4.1 经济功能区能性转换与区域空间结构演进

经济功能区的能性，是指经济功能区的性质，亦即经济功能区的种类。在地理空间上，最为直接的体现为土地的用地性质。经济功能区的能性转换，就是指某一经济功能区的主导功能的变化。例如，农村变成了城市，工业区变成了商业区等。

经济功能区的能性，通常是由初始的要素禀赋所决定。某一区位独特的禀赋资源会吸引某一类型的经济活动选址其上，形成有效的聚集，进而形成相应的经济功能区。经济功能区的能性的确立，一般来说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因此，这种稳定性一旦被打破，就会直接导致由经济功能区构成的经济区域的空间结构的变化。经济功能区的能性转换主要存在于两类区域，由两种主要原因所造成。

第一种情况，城市化导致的城乡边缘区形成。城市和农村作为两类典型的经济功能区，其能性相对不同，这主要体现为土地用途、产业结构、聚集要素的种类等差异。这两类经济功能区接壤的地方，形成了城乡边缘区。城乡边缘区这样的经济功能区担负着“过渡桥梁”的作用，其功能区的能性往往也比较模糊。随着城市的扩张，城乡边缘区的“经济功能区”的能性往往会发生变化，亦即一些“农业类”的经济功能区改变其能性转变为其他能性的经济功能区。这种区域空间结构的动态过程可以用图 5.12 和图 5.13 来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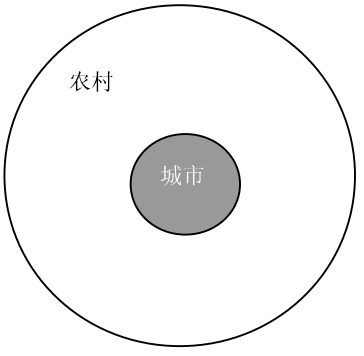


图 5.12 经济功能区视角下的城市与农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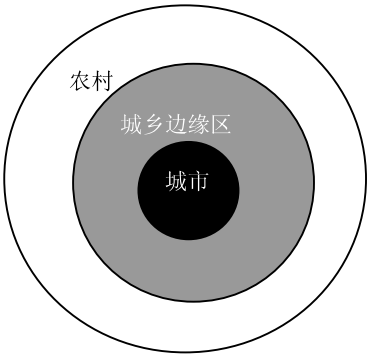


图 5.13 经济功能区视角下的城市、农村和城乡边缘区

第二种情况，产业转移伴随的城市更新。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服务范围会变得越来越大，原有的产业空间布局会不断制约区域经济的发展。例如，城市规模的扩大，必然带来服务业的需求增加，而服务业偏向集中于城市中心地区。而原有的制造业已经占据了这样的区位，必然造成一种对于区位的争夺。这就会直接反映在对于土地要素资源的竞标价格上。很显然，服务业将会在一定程度上驱逐制造业等向外转移。伴随着这种产业转移，也会直接形成城市更新过程。这两个变化过程，对于区域空间结构将会带来直接的变化影响。这种影响可以分解为三个变化点。

（1）城市更新带来的城市经济功能区内部的某些小的经济功能区能性的转化。如图 5.14 所示，城市范围内的两个白色圆区域，可能代表的就是由于城市更新带来的城市内部特定经济功能区能性的变化。这将直接导致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调整。

（2）由于产业转移带来的城乡边缘区的空间结构的变化，由于产业转移带来的分散聚集，导致的城乡边缘区和城市近郊农村地区的空间结构变化。例如，随着产业转移，需要占用更多土地的物流仓储企业将会向城乡边缘区，具有特定区位优势（特别是交通优势）的区位，聚集在一起，改变了城乡边缘区特定区位的经济功能区的能性，进而导致城乡边缘区的空间结构演变。

（3）另一方面，特定的工业企业可能寻求好的环境和低的土地成本，或由政府在特定的城郊农村地区建立新的工业小区，将会吸引相应的工业企业高度聚集在工业小区内。再有，政府可能为了疏散城市内部的高度聚集的贫民住宅区，在城郊建立相应的住宅组团，也必然会改变相应地方的空间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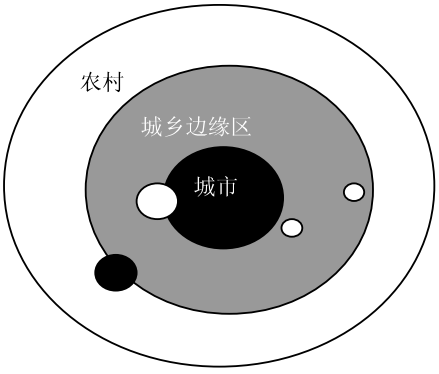


图 5.14　区域空间结构演进Ⅰ

第二种情况下的动态变化过程可以通过图 5.14 来表示：

城市功能区内的两个白点代表着城市更新带来的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变化，而城乡边缘区的大一点的白点区域和近郊农村区域内的大一点的黑色点状区域则代表着由于产业转移带来的相应区域内的空间结构演变。

5.4.2 网络通道的改变与区域空间结构演进

经济区域是由相应的经济功能区和相关的网络通道功能造成。经济功能区的能性转换导致了区域空间结构的演变，同样网络通道的改变也将直接引起区域空间结构的变化。一定的高能级的经济功能区，作为一个核心增长极，其对周边其他经济功能区的影响，受到受辐射经济功能区的区位特点以及相应的联系通道的影响。这就必然导致核心增长极对周边的影响的空间差异，也就直接导致了空间上的非均衡发展。具有某一方面区位优势的区位会随着网络通道的建设进一步提升自身的增长能力，同时网络通道也会进一步发展，形成相应的发展带。这都会改变区域的空间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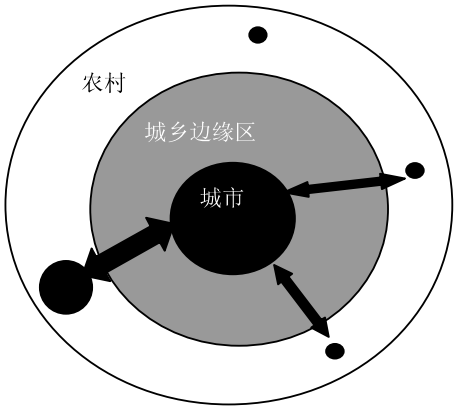


图 5.15 区域空间结构演进Ⅱ

这一变化可以通过图 5.15 来表示，城市的产业转移和扩散在四个方向上是不会完全平衡的，分散的农村地区的黑色圆形区域的大小代表着承接城市产业转移的规模，很显然城市的右下方形成了一个较大规模的聚集，这除了与其特殊的区位优势有关，也与城市和它之间的通道顺畅有关。反过来，这种分散聚集的过程也促进了通道地区的进一步发展，形成相应的发展带。

5.4.3 经济功能区能级的增长与区域空间结构演进

前面，我们在探讨经济功能区的特点的时候，指出经济功能区具有不同的等级，这是由经济功能区相应的能级所表征的。同样，经济功能区的能级也会发生动态变化。不同能级的经济功能区相互之间彼此分工、服务不同的市场，共同形成一定的网络结构。在现实的区域空间结构中，这种分工、专业化市场在城市群发展中表现为城市群内不同城市应该做到：

（1）不同等级的城市服务不同的市场；

（2）不同等级的城市应该做到相互之间的有效分工；

（3）城市群内城市之间应该注重通道的建设，形成相应的有效网络结构。

下面，我们针对几种具体的情况进行分析。

第一种情况下，在一定的区域内存在一个绝对领导地位的核心城市，随着其能级的不断增大，其影响覆盖的范围将不断扩大，进而在其影响范围内各种经济功能区的能性不断进行调整，进而改变整个区域的空间结构。如图 5.16，左边的核心城市能量不断增强，进而不断调整其自身的经济功能区的能性，具体来说可能是产业的不断高级化，形成整个区域的服务业的高度聚集，进而分散其制造业等。而右边的原有两个城市则可能会将其顶端的服务业转移到左边的核心城市，而承接一部分相应的制造业，同时发展适合自身特点的服务业。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不同能级的城市功能区之间的联系通道将会进一步改变，进而也会影响到整个区域的空间结构。这种区域空间结构的变化与目前中国的长三角地区的都市圈的空间结构及其变化有很大的相近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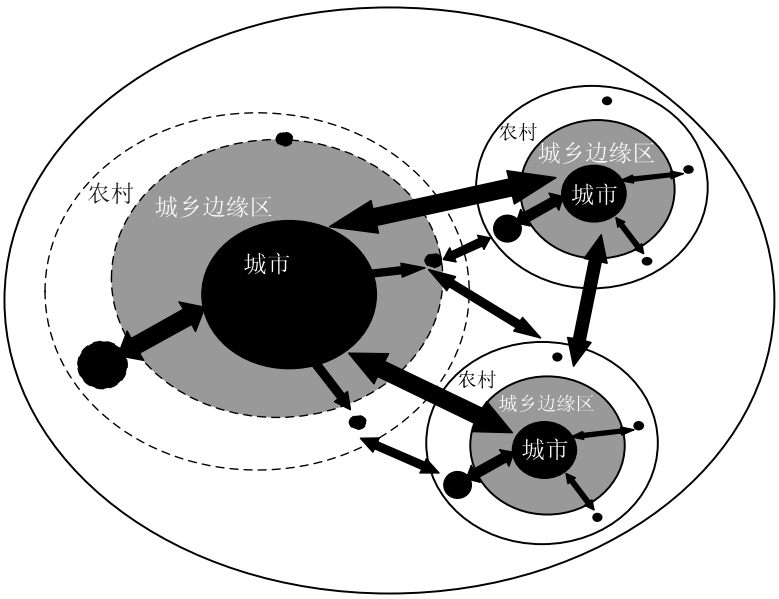


图 5.16　多核心区域空间结构的演进

第二种情况下，在一定的区域内存在两个能位相当的城市区域。这种情况下，每个原有城市区域会不断发展，延续上述的分散聚集过程。但是这时可能会出现另外两种状态。一种是如图 5.17 所示，一个小的分散聚集功能区与一个较大的分散出来的聚集经济功能区相互对接，进而形成了一个新的更大的聚集功能区，承担着相对独立的分工，形成具有特点的经济功能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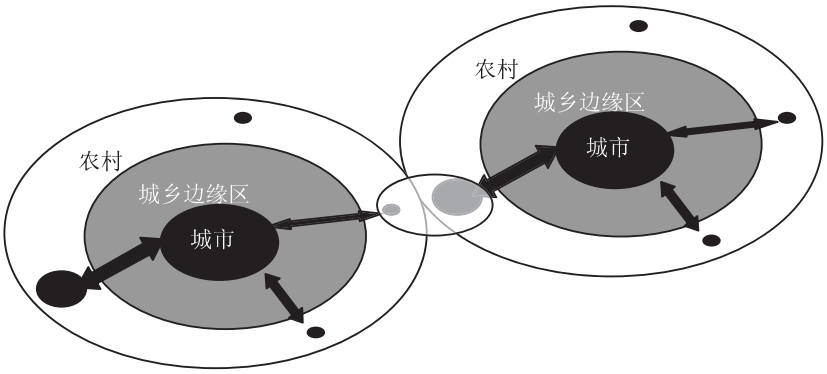


图 5.17　双核心区域空间结构的演进Ⅰ

另一种是如图 5.18 所示，一个较大的裂变出来的聚集功能区与另一个较大的裂变出来的聚集经济功能区相互对接，进而形成了一个经济发展带，这个经济发展带也构成了一个新的聚集功能区，承担着相对独立的分工，形成具有特点的经济功能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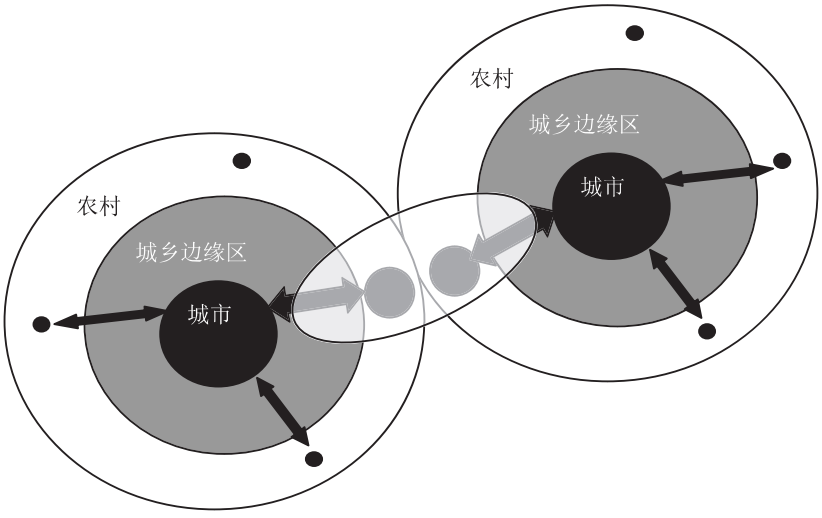


图 5.18　双核心区域空间结构的演进Ⅱ

5.4.4　地方政府行为与经济区域空间结构演进

前面，我们分析了完全市场经济条件下，区域空间结构演变的一般过程和规律。但是，现实中产业的转移，经济功能区的发展及其变化会受到许多非市场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经济区域空间结构的演进，往往

受到相应的行政辖区的利益和考核机制的影响。在当前转型经济条件下的中国，地方政府为了本地区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官员政绩的考核，必然表现为“经济人”政府。在前面提到的整个都市圈范围内，往往存在横向城市政府间竞争内耗和纵向权利关系中的城市间竞争，这直接导致了都市圈范围内的“多层次分割”①。

“多层次分割”造成了城市间无序竞争和协调缺乏，城市间的猜疑、内耗、“负和博弈”给都市圈的发展带来了巨大交易成本。这在空间上直接表现为区域空间结构演进的变形。地方保护割断了要素流动，也造成了分散聚集实现的困难，形成了空间结构演进的障碍。地方政府对于公共物品，特别是基础交通设施的建设和指导，也将直接影响这种分散聚集的实现，导致空间结构演变的变形。例如，在双核心情况下，如果其中一个地方政府为了自身利益的需要，不顺应市场经济发展和产业转移对于区位的客观选择，转而花费更多的成本去培育不可行的分散聚集点，这必然导致整个区域空间结构的演变的变形。

下面，我们利用图 5.19 来说明这个问题。如图，完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该经济区域未来的演化方向应该是形成连接双核的中间发展带。如果，我们引入地方政府的错误干预，就有可能形成图 5.20 那样的不利空间发展结构，进而直接影响区域的经济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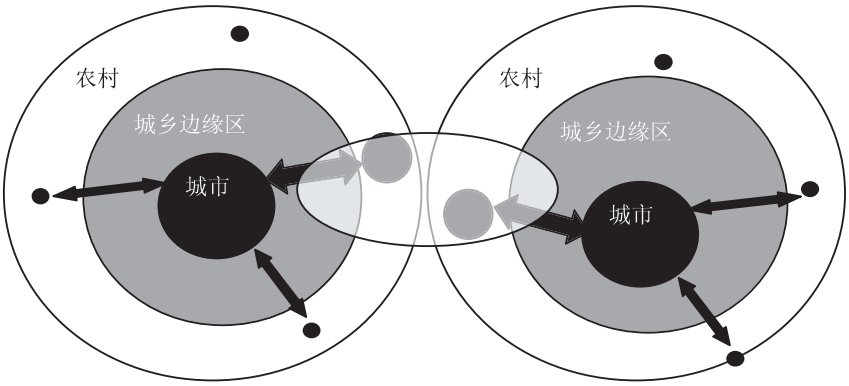


图 5.19　市场经济条件下双核心区域空间结构的演进

① 关于“多层次分割”问题，可参见王志锋：《创新区域治理机制：推进都市圈一体化进程》，载于《区域经济一体化下的城市合作与发展》，郭鸿懋等编，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76—280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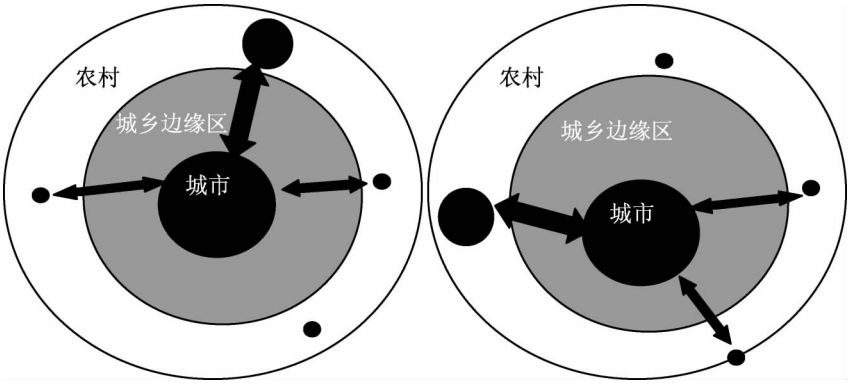


图 5.20　政府干预下双核心区域空间结构的演进

5.5　经济区域特征及其边界

经济区域与人文区域和自然区域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但是，三者究其各自所遵循的规律，包括的主要内容、物质运动的形式及其实践领域等方面，都是有所区别的。经济区域主要是研究人类经济活动领域的地域组织问题，它主要遵循劳动地域分工规律和经济地域运动规律并直接为国民经济发展服务。人文区域主要是遵循人地关系规律而形成的区域，其主要功能是协调与解决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而自然区域则是遵循自然规律所形成的区域，它主要是为自然条件与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与保护服务的。

5.5.1　经济区域的特征

1. 经济区域的时空统一性

经济区域是一个相对完整的空间单元，其随着时间流逝而发生变迁。其时空统一性，首先表现在经济区域形成条件在一个空间内通过有机结合共同作用于经济空间；其次表现在其主要物质内容，即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第三产业、城镇与农村的有机结合，协调发展，互为制约；再次表现为经济区域的部门结构和空间结构的有机结合与相辅相成；四是所有的区域物质内容都处于时空的运动状况，始终处于发展变化和分化与组织的过程中。四个方面有机组合在经济区域内，使其具有明显的个性和区域性，并与其他经济区域紧密联系在一起。

2. 经济区域的系统性

任何经济区域都是劳动地域分工大系统中的一个有机环节，是经济地域系统中的一个细胞。任何经济区域都不能脱离经济地域系统而孤立存在。同时，

在当今世界，已不存在完全封闭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地域。因此，对经济区域的研究必须运用系统科学的思想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在系统联系运动中去分析区域。

3. 经济区域的层次性

一方面，经济区域在劳动地域分工规律的作用下，始终处于形成、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因此，各个经济区域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市场经济发展程度明显不同，表现出高、中、低的不同层次。另一方面，各个经济区域在经济地域系统中，由于实力强弱、规模的大小的差别，也必然分属于不同层次和占据不同的位置。

4. 经济区域的开放性

经济区域的系统性与开发性是一致的。经济区域与前资本主义封闭的自然经济地域截然不同，它是开放的市场经济的区域。任何经济区域与其他区域经济都发生着十分密切的经济联系，复杂的网络系统成为经济区域开放的重要手段和渠道，而物质流、能量流、人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等，则成为开放联系的主要内容。

5. 经济区域经济发展的周期性

经济区域也是一个生命有机体，有其自然形成、发展、成长、衰退的发展过程。经济学家对发展阶段进行了各种划分与表述，而承认其发展的阶段性是学者们的共识。

6. 经济区域类型的多样性

经济区域有其共同的发展规律。但是，由于世界各国各地区的地理条件是很不相同的，因此，这必然形成各具特色且具有不同的主要专门化和产业结构的经济区域。正是由于经济区域类型的多样性，才使经济区域间进行广泛的经济联系成为可能。经济区域都是以鲜明的个性表现出来的，共性寓于个性之中。

5.5.2 经济区域的边界

至于经济区域的边界，则需要通过对不同要素进行品级分类，然后进行加总，形成一个总的聚集密度。例如：

$$\rho = \sum_i \varphi_i [\int_0^S f(x_i)] / S$$

也就是说，不同的要素对于总的聚集度的贡献率是不一样的，可以通过系数

φ_i 来表示。通过无量纲处理，从而形成一个单纯的数值。

这时，区域的边界可以通过某一边界点的要素流动情况来决定。设边界点的要素聚集量 $h = \phi_i - \phi_o$，其中：

h 为边界点的聚集度，即反映要素的保有情况；

ϕ_i 为流入因子，即由于引致效应带来的在考察期(t)边界点上流入的要素量；

ϕ_o 为流出因子，即由于溢出效应导致的在考察期(t)边界点上流出的要素量。

本章小结

本章首先围绕聚集经济和经济功能区形成展开分析，从聚集经济演绎出经济功能区这一相对均质的空间单元。之后，以经济功能区为基础，分析了不同经济功能区如何演化生成一定的经济区域。我们认为经济区域是经济功能区的有机组合，既是一种空间结构，又是一种自组织体系。

本章将分工和专业化理论引入经济功能区的分析，认为经济功能区就是不同要素禀赋下分工的一种空间映像，而经济区域则是不同经济功能区依据分工和专业化形成的一种网络结构和组织体系。这样，城市和乡村就成为两种不同类别的经济功能区，区域空间结构的演进从一定意义上也是经济功能区的一种动态变化的结果。

思考题

1. 从本章的分析可以看出，区域的概念众多且差异很大，你认为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是什么？
2. 什么是经济功能区？经济功能区有哪些特征？
3. 经济功能区和经济区域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
4. 如何从经济功能区的视角看待经济区域的空间结构？
5. 从均质和非均质的关系谈谈你对经济功能区和经济区域的理解。经济功能区和经济区域两种空间单元如何体现了均质和非均质的对立统一关系？

参考文献

高进田:《区位的经济学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安虎森:《区域经济学通论》,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保罗·克鲁格曼:《地理和贸易》,张兆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彼得·尼茨坎普主编:《区域和城市经济学手册》第一卷,安虎森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陈才:《区域经济地理学》,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崔功豪、魏清泉、陈宗兴:《区域分析与区域规划》,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

杜肯堂、戴士根:《区域经济管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版。

高洪深:《区域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郝寿义、安虎森:《区域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金元欢、王建宇:《区域经济学》,浙江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孙久文、叶裕民:《区域经济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藤田昌久、雅克·弗朗克斯·蒂斯:《集聚经济学》,刘峰等译,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王铮:《区域管理与发展》,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王铮、邓悦等:《理论经济地理学》,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魏宏森、曾国屏:《系统论》,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沃尔特·克里斯塔勒:《德国南部中心地原理》,常正文、王兴中等译,商务印书馆 1998 年版。

杨小凯、黄有光:《专业化与经济组织》,张玉刚译,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朱传耿、沈山、仇方道:《区域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A. H. 契斯巴耶夫:《经济区的发展、理论和研究方法》,海潮出版社 1990 年版。

T. M. 克尔日查诺夫斯基:《苏联经济区划问题》,商务印书馆 1961 年版。

Allard, L. and Hodgson, M. J., 1986, "An Hierarchical Location-allocation Model with Allocations Based on Facility Size", *Annals of Operations Research*, 6, pp. 273—289.

Amin, A. and Thrift, N., 1992, "Neo-Marshallian Nodes in Global Network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6(4), pp. 571—587.

Dickinson, Robert E. , 1969, *The Makers of Modern Geography*, Friederich A. Praeger Publishers.

Drezner, Z. and Wesolowsky, G. O. , 1996, "Review of Location-allocation Models with Demand-dependent Costs", *Studies in Locational Analysis*, 10, pp. 13—24.

Eaton, B. C. and Lipsey, R. G. , 1977, "The Introduction of Space into the Neo-classical Model of Value Theory", in *Studies in Modern Economics*, M. J. Artis and A. R. Nobay eds. , Oxford: Basil Blackwell.

Hartshorne, Richard, 1959, *Perspective on the Nature of Geography*, Rand & McNally.

Hoover, Edgar M. and Frank Giarratani, 1984, *An Introduction to Regional Economics*, Alfred A. Knopf.

Keeble, D. and Wilkinson, F. 1999, "Collective Learning and Knowledge Development in the Evolution of Regional Clusters of High-technology SMEs in Europe", *Regional Studies*, 33(4), pp. 295—303.

Krugman, P. , 1995, *Development, Geography, and Economic Theory*, MIT Press.

Mills, E. S. , 1972, *Studies in the Structure of the Urban Economy*, RFF Johns Hopkins Press.

Perloff, H. S. , E. S. Dunn, E. E. Lampard and R. F. Muth, 1960, *Regions, Resources and Economic Growth*, Baltimore.

第 6 章

区域经济发展

在前面 3 章，我们分析了经济区域形成的内在机理，指出经济区域会随着时间和社会经济活动的发展而发生演化。经济区域形成之后将会不断发展和演进。本章将集中探讨经济区域形成之后的发展问题，揭示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动力机制。为了得到一般意义上的规律，本章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单区域进行分析，突出动态研究，从时间、空间及区域间的交互作用等多个层面，探索始于要素禀赋，动力源于要素聚集的区域经济发展规律。

6.1 区域经济发展的内涵与本质

6.1.1 区域经济发展的内涵

经济学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如何使社会有限的资源合理利用，以增进社会总财富和总福利。社会总财富和福利的增加过程即是经济的发展过程。根据艾萨德的观点，区域经济学是研究“确定可在某一区域有效地从事生产并获取利润的单个或集团产业；改善区域居民的福利，如提高区域内人均收入水平，改善收入分配，更有效地衡量收入等；区域内产业的分散，获得区域内资源的最有效利用……等等”。① 因而研究区域经济发展问题是区域经济学的重要内容。

所谓区域经济发展是指区域内总产出不断增加、区域产业结构及空间结构不断优化、区际引力与辐射能力不断提高的过程。区域经济发展与一般经济发展的概念既相联系又有区别，共性特征是均表现为财富和福利的增加，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但区域经济发展强调的是在特定的地域空间上的经济发展，具有时间与空间相结合的特殊属性。

---

① 艾萨德：《区域科学导论》，陈宗兴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6 页。

历史上，西方经济理论界曾长期认为经济发展就是经济增长，即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经济理论界开始严格区分这两个概念。事实上，区域经济增长、区域经济发展和区域发展是三个不同层面的发展问题，正确区分三者的不同，是准确把握区域经济发展内涵的关键。

1. 区域经济增长与区域经济发展

经济增长的内涵较狭，是一个偏重于数量的概念，强调沿时间维度经济运行状态的变化；而经济发展的内涵较广，是一个既包含数量又包含质量的概念，强调经济运行状态沿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的变化。经济增长是手段，经济发展是目的。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基础，经济发展是经济增长的结果。因此，追求区域经济增长就成了大多数区域实现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

回顾经济学发展史，从斯密、李嘉图到现代西方一些主要经济学家都非常注重经济增长的研究，使经济增长理论不断完善，并逐渐向系统化、计量化和模型化发展，从而使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成为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区域经济发展理论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出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增长极理论、发展极理论、累积的循环因果关系理论、中心边缘理论、依附理论、收入趋同假说等，但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论尚不成熟，主要表现在区域经济发展理论主要仍集中于区域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其模型也主要源于主流经济学的经济增长模型，缺乏与区域形成规律相联系，并能揭示区域经济发展内在机理的理论与模型。因而，限制了区域经济学对现实社会区域经济发展问题的解释力，同时也限制了区域经济学学科的发展。

2. 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发展

区域发展是一个超出纯粹经济学范畴的更为广义的概念，其指在特定的地域空间，经济、社会、环境的全面发展。区域经济发展、区域社会发展和区域环境的保持与改善相互依存，是区域发展的三个方面。区域经济发展是基础，经济得不到发展，其他方面的发展就无从谈起，而且会带来环境的进一步破坏和对社会进步的负面影响；区域社会发展主要表现为社会进步。社会进步最具体的表现是人的进步，是人与人交往的进步，表现为人的认识水平的提高、国际和平的维护、社会的公平与平等、人民的自由、人的权利得到承认和尊重等内容。如果社会不能进步，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结果将是无益的，对资源和环境也将是不利的；区域环境是区域各种因子的总合，是区域经济发展和区域社会进步的载体。环境既包括具有生物的环

境，如各种植物和动物，也有非生物的环境，如气候、土壤、资源等等。人们向往一种良好的、有益于身体健康和心情愉悦的环境，包括清新的空气、清澈的水体、绿色的植被、丰富的动植物种群等。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是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保障。

6.1.2 区域经济发展的本质特征

区域经济发展作为区域经济学研究的主要领域之一，有别于一般的经济发展，表现出如下本质特征：

1. 时间维度上表现为区域经济增长

所谓区域经济增长是指特定区域商品和劳务的增长。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要特征是数量化和模型化，即利用数学计量手段将与经济增长有关的变量联系起来，构造模型，并以此来推导结论、预测未来。具有代表性的理论主要有：哈罗德—多马模型、新古典增长模型、新剑桥增长模型和新增长模型等。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是主流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理论分支，其秉承了主流经济学的一贯传统，以时间序列数据为构建模型的基础，沿时间维度推导结论、描述未来。区域经济学尚未形成独有的区域经济增长理论，在解决区域经济增长问题时，基本是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在区域范畴进行应用。

2. 空间维度上表现为空间结构的演化

空间作为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场所，各种社会经济活动都会在空间上反映出来。经济活动在多种因素影响下的集中与扩散，会构成并推动着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增长，而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增长，又会使一定空间范围内原有的各种社会经济客体和现象的位置、相互结合关系、聚集规模及其形态发生相应的变化。

区域经济空间的运动，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区位选择的结果，是各种社会经济活动在地域空间分化、组合、聚集的动态过程，是社会经济系统与其环境之间、系统内部各子系统之间经常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在地域空间的表现，也是它们之间的人流、物流、资金流、能源流、信息流等传输的动态的过程。区域经济空间的运动过程，即是区域空间结构的演化过程，同时考察区域经济增长与区域空间结构演化，并寻找两者的内在联系是区域经济学有别于其他经济学研究的显著特征。

3. 区际关系上表现为吸引与辐射的交互作用

由于要素禀赋在空间上的非均质分布，出现了区际劳动分工，又由于人类社会

的制度性空间分割的出现，即带有一定程度或范围的排他性产权的建立，其表现形式为具有行政管辖疆界的区域或国家的出现，扩大了生产的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劳动分工的演进，实质是不同空间区域资源配置变换和制度变迁的过程，这种过程同时又促进了不同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区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区域之间存在合作与竞争的双重关系。区域之间既相互吸引，又相互辐射，所谓吸引是指在聚集力的作用下，特定区域从其他区域聚集经济发展所需的要素和资源，辐射则指特定区域的经济活动在其他区域的扩展和影响。由于区域间要素禀赋、分工与专业化程度、产业结构等的差异，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处于不平衡状态。具有比较优势的强势区域在区际关系中表现出具有较强的吸引与辐射的能力，弱势区域则表现出较弱的吸引和辐射能力。

6.2 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与动力机制

6.2.1 经济发展的动力与动力机制

1. 经济发展动力

动力是指推动事物运动与发展的力量。经济发展的动力则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作用于经济活动主体之上的动力。由于经济活动主体具有不同的层次和不同的经济活动内容，决定了经济发展动力具有不同的层次。如：企业经济发展动力、产业经济发展动力、城市经济发展动力和区域经济发展动力等等。根据动力的一般划分方法，不同层次的经济发展动力，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内生经济发展动力与外生经济发展动力，直接经济发展动力与间接经济发展动力，主导经济发展动力与辅助经济发展动力等。进行科学的经济发展动力划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我们深入分析不同层次的经济活动规律，科学地制定与经济发展相关的制度与政策和经济发展战略的依据与前提。经济发展动力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方向性。

动力是具有方向的空间矢量，与经济发展方向一致，促进经济发展的力量我们称之为正向动力；与经济发展的方向不一致的动力，我们称之为负向动力。经济发展的状态是正向动力与负向动力综合作用的结果。当正向动力超过负向动力时，经济得到发展，当负向动力超过正向动力时，经济发展呈衰退状态。

第二，动态性。

经济发展动力不是一成不变的，其大小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内生动力与外生动力表现出不同的动态性品质。内生动力是关于时间的增函数，而外

生动力则是关于时间的减函数。也就是说，作用于某一事物上的内生动力会随着时间的增加而增加，这种增加包含两种过程，其一是原有内生动力的累积过程；其二是外生动力的内化过程。而外生动力，随着其内化的过程，以及由于新的外生动力的替代效应，导致外生动力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递减。这种变化规律见图 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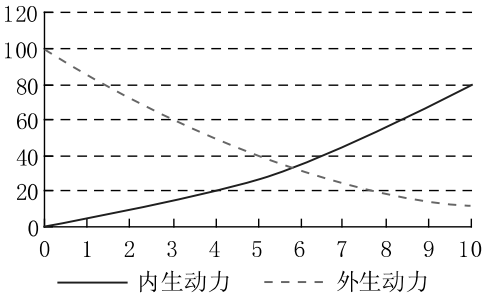


图 6.1　内生动力及外生动力随时间的变化规律

图 6.1 表达的含义是，横轴代表时间，纵轴代表表征经济发展动力大小的百分数。可以看出，内生动力随着时间的增加而增加，外生动力随着时间的增加而减少。内生动力是决定经济发展的根本，外生动力需要内化为内生动力才能成为真正影响经济发展的力量。

第三，加和性。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站在某一时点观察，影响经济发展的有多种动力，包括内生动力、外生动力、直接动力、间接动力、根本动力、辅助动力等。经济发展状态是这些动力综合作用的结果。因而动力具有加和性。正向动力的累加，使促进经济发展的动力加大，负向动力的累加将使导致经济发展的总动力变小。

2. 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

所谓机制，“原指机器的构造和动作原理，生物学和医学在研究一种生物的功能（例如光合作用或肌肉收缩）时，常借指其内在工作方式，包括有关生物结构组成部分的相互关系、及其间发生的各种变化过程的物理、化学性质和相互关系，阐明一种生物功能的机制，意味着对它的认识已从现象的描述进到本质的说明”。①所

① 《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510 页。

以，所谓动力机制是指在事物运动与发展过程中各种动力的作用原理与传导过程，其本质是描述动力与事物运动与发展的内在联系。

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则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各种经济动力的作用机理及其传导过程，反映经济发展动力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研究经济发展的动力与动力机制是揭示经济发展规律的重要途径。

6.2.2 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

区域是一个空间的概念，要素与经济活动主体在区域空间上的聚集是区域产生的根本原因，聚集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根本力量，聚集经济是区域经济的本质特征，因而聚集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1. 聚集动力的特征

第一，聚集动力的方向性。聚集作为动力具有方向性，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主要表现为正向性，但有时也表现为负向性。例如：当区域经济处于聚集经济状态时，聚集动力与区域经济的发展方向一致，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正向动力；有时也会表现出负向性，与区域经济的发展方向相反，即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负向动力，阻碍或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如：当区域经济处于聚集不经济状态时，延续原有的聚集方式将会导致区域经济的发展速度减慢，甚至出现倒退。

第二，聚集动力的动态性。聚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区域空间上，聚集度随时都在发生变化。区域作为开放的空间，流动性要素随时都有流入与流出；新的企业或新的产业的不断兴起，区域外的企业向特定区域空间的迁移，以及区域内的企业向其他区域的迁移随时都在发生；区域性要素境况的改变也随时在发生着，如：区域内自然环境的改善等。上述变化均会带来聚集度的变化，从而导致聚集动力的变化。

第三，聚集动力具有加和性。聚集的过程伴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过程，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又是聚集度不断提升的过程。聚集程度随区域经济的发展而增加。另外，我们说聚集动力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这并不意味着聚集动力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唯一动力，区域经济的发展是聚集动力与其他类型的动力综合作用的结果。

第四，聚集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聚集过程发生在区域的特定空间范围之内，聚集是导致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在原因，因而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聚集动力作为内生动力是关于时间的增函数，而外生动力则是关于时间的减函数。

其变化规律见图 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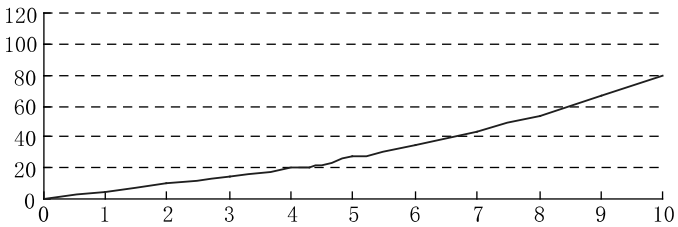


图 6.2　聚集动力随时间的变化规律

2. 聚集效应分析

区域的聚集效应是指社会经济活动因区域空间聚集产生的各种影响或经济效果。区域聚集效应可从分工与专业化、规模经济、外部经济和市场效率等方面进行考察和分析。

(1) 分工效应。

所谓分工效应，是指由于聚集而给区域经济活动主体带来的分工与专业化方面的影响。分工与专业化具有聚集需求。分工与专业化的发展需要相应的外在环境与条件，企业分工专业化的深化，客观上要求企业具备一定的生产规模，手工作坊式的生产，分工专业化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因而，聚集是分工与专业化实现的条件和基础。

分工与专业化生产作为近现代经济的一种生产方式，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之一。分工与专业化生产之所以能够产生巨大的经济利益，是因为：分工与专业化能够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分工和专业化生产有助于生产要素投入的节约；分工与专业化生产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效率。分工与专业化使得复杂的生产程序变得较为简单，而且由于分工比较明确，生产技术的可控程度增强，从而导致企业管理工作的复杂程度降低，效率得到提高；分工与专业化有助于技术创新和进步，有助于大规模生产设备的采用，从而扩大了技术应用的潜力；分工与专业化促进了生产方式的发展，使得大规模专业化生产成为可能，社会产品日益丰富。

(2) 规模效应。

所谓规模效应，是指由于聚集导致经济规模增加而给区域经济活动主体带来的利益影响。规模经济是区域聚集经济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既包括生产方面的利

益即生产规模经济，也包括消费方面的利益即消费规模经济。前者主要表现为单位产品成本随产量的扩大而递减，后者则表现为单位消费品或消耗品的平均支出随聚集规模的扩大而下降。

产生规模经济的原因有很多方面，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投入的不可分性。我们知道在组织社会经济活动过程中，总是有一些投入是不可分的，它与一定区间上的规模大小无关。以生产性投入的不可分性为例。假定某生产活动唯一的投入是某种特定的资本品（如一台机器、一艘轮船、一条管道或一个工厂等）。这些资本品如果在物质上将其分割，则可能会变得毫无用处或至少失去其原有的生产功能。因而，它们是不可分的。这种不可分的投入，广泛地存在于社会活动的各个范围和领域。不仅单个企业内部、产业内部，而且整个城市内部、区域内部都存在着投入的不可分性问题。前者如企业内部的固定成本、产业内部的技术培训与信息收集成本等，后者则如城市基础设施、交通、管理、污染控制等公共物品的投入，都具有明显的不可分性。与之相联系，不仅在生产领域，而且在诸如文化娱乐、教育、住房等消费领域也存在类似的状况。所以，在城市经济和区域经济中，不可分的投入是导致各种规模经济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不可分投入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为设置成本。经济活动的组织，毫无疑问都要花费设置成本。就企业而言，其设置成本主要表现为准备工作所花费的各种成本。一旦设置成本已经付出，则产出与其要素投入成正比，从而，产品平均成本则随产量的扩大而降低。在这种情况下，规模收益递增的现象十分明显。在区域经济活动中，类似的设置成本在各个领域中广泛存在。除了企业以外，整个行业的创立、公共物品的生产、社会文化团体的组建等都存在着类似现象。

规模经济的产生，除与不可分的投入有关外，还来源于因规模扩大而形成的生产、销售、管理等方面效率的提高。首先，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劳动分工的专业化、生产线的一贯作业将随之加强，个人技术积累也随之提高，为适应产品需求及原料供应的随机变动所需的产品与原料的存货也因之降低，从而企业的生产力得以提高。其次，企业规模的扩大，广告宣传、产品运输和贮藏等销售活动也形成了规模经济，单位产品所分摊的销售费用也随之降低。最后，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管理的专业化和管理功能的规范化也随之增强，从而管理技能和管理水平随之提高。所有这一切均会导致规模经济的产生。

规模经济的实现是有条件的，它不仅要求有相应的技术条件，而且要有相应的

市场需求，才能保证上述企业合理规模的实现。社会经济活动的空间集中，为企业合理规模的实现提供了充分的社会经济技术和市场条件：同类与不同类企业的合作与竞争，为企业大规模专业化生产提供了可能；大量熟练劳动力的聚集，为企业规模的扩大提供了必需的劳动力市场；众多而偏好各异的消费者，则为其提供了必需的市场需求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是经济聚集的重要结果，其产生原因则与社会经济活动的另一类特性即外部性有关。

规模经济的产生与生产函数的技术状况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并非所有的生产活动都具有规模经济特征，只有生产函数必须是严格的凸函数，才存在规模收益递增。规模经济的实现也是有限制的，它仅存在于一定的技术条件之下。具有规模经济的同一企业，若生产规模过分扩大，改变了生产函数的投入与产出关系，就有可能出现规模收益递减，即规模不经济的现象。

（3）外部效应。

所谓外部效应是指由于聚集而给区域内的经济活动主体带来的外部经济方面的利益。外部性的产生与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相互作用有关，各种外部经济效应的存在正是聚集经济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社会经济活动的空间集中，各种行为的相互依赖与摩擦格外强烈，从而其外部性特征更为突出。概括而言，因社会经济活动及行为主体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外部性经济利益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使经济活动主体获得更好的信息和技能。在现代经济中，不同产业的经营活动是紧密相联的。一个企业的产出可能是另一个企业的投入，从而两者之中任何激发技术发明和革新，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更有效的技术手段。上述信息经济利益是产生聚集经济的又一重要原因。

第二，多样性经济利益。城市区别于乡村的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其社会经济活动的多样性，或称为“异质性”。在城市中，多种多样的居民、厂商及社会组织聚集在一起，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产生了多种形式的外部经济利益。各种思想、观念、知识、风俗等方面的交流，不仅为居民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社会文化生活环境，而且还为新知识、新思想、新发明的涌现提供了源泉。众多的居民和厂商的汇集，则又产生了各种各样的产品（或服务）需求与供给。消费需求与产品供给的多样性毫无疑问为分工和专业化的深化与发展提供了社会基础。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常见的由多样性所产生的外部经济效果。

第三，大数法则利益。具有异质性的多个行为个体（居民、厂商）及其活动的空间聚集，使得任何一项活动都有足够多的个体与之相适应，从而可以减少社会经济活动波动的损失。例如，众多的具有不同消费偏好的消费者的存在，毫无疑问减缓了需求和生产波动给厂商造成的损失；众多的社会经济活动给具有不同能力的居民提供了就业机会，减少了失业的可能。大量的经济活动主体集中在一起，可实现特定区位优势资源的利益共享等。

第四，市场效应。所谓市场效应是指由于区域聚集而给区域内的各个经济活动主体带来的市场效率提高的利益。空间聚集所带来的市场效率的提高，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聚集导致市场空间范围内的经济活动主体之间的经济联系增多。市场既是进行商品交换的场所或领域，又体现一种交换关系。同一产业内的企业之间表现为竞争与合作的关系、不同产业的企业之间体现一种竞争与互补的关系、厂商与消费者之间以及下游产业与上游产业之间存在着供给与需求的关系等等。经济活动主体，包括城市居民在区域空间上的聚集，将导致这种经济联系的增多。

其次，聚集导致市场需求增大。区域空间内大量人口的聚集，带来了巨大的市场需求，这种需求一方面表现为消费者个体的需求，也包括企业为保证其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劳动力、能源和相关设备的需求。消费者和厂商数量的增加，将导致市场需求的增加。

再次，聚集导致市场供给能力的增强。同类厂商的聚集，将直接导致某种产品市场供给量的增加。而不同类型厂商的聚集，将导致市场上供给产品种类的增多。数量增加和品种增多的直接结果是市场供给能力的增强。

最后，各类经济活动主体在空间上的聚集，使生产者与消费者，原料生产商与厂商，以及具有内在经济联系的经济活动主体之间的空间距离拉近，在发生经济联系或进行交易时可节约时间和交易费用。另外，空间聚集又导致市场竞争加剧，为取得竞争中的有利地位，各经济活动主体必须努力提高工作效率，并规范市场行为，从而导致市场运行效率的提高。

3. 聚集动力的测度

为了表征特定空间上的聚集动力的状态，我们需要进行聚集的测度。表示聚集动力状态的指标是聚集度，即单位面积上聚集的要素或经济活动主体的数量。

根据聚集对象的不同我们将聚集度分成要素聚集度和经济活动主体聚集度；为反映不同类型的要素或主体在特定空间上的聚集状态，又将聚集度分成总量聚集度和分量聚集度。利用聚集度进行聚集的测度时，由于均采用单位面积上的聚集为标准，消除了因内涵式聚集和外延式聚集的不同所带来的差异。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要素可分为流动性要素与非流动性要素，在聚集度的计算中，非流动性要素主要决定聚集度的初值，流动性要素则决定聚集度的变化，在研究聚集经济变化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论研究中应特别关注关于流动性要素的变化，以及由此引起的聚集度的变化。

(1) 基于要素的聚集度计算。

第一，总量聚集度。

$$H = \frac{Fg}{S} = \frac{\sum_{i=1}^{n} f_i g_i}{S} \tag{6.1}$$

其中：

H——基于要素的聚集度(总量)，其含义为：特定空间一定时间点单位面积上聚集的一定品级要素的数量；

F——一定时间点，特定空间的要素总量；

g——要素品级因子，反映要素的质量；

S——特定空间的总面积；

f_i——第 i 种要素的数量；

g_i——第 i 种要素的品级因子；

n——所考虑的特定空间上要素的总种类数。

考虑到不同要素的性质，为使公式的运算成为可能，关于要素的数量均需进行量化处理、无量纲处理和标准化处理，不同区域的要素数量应是分布于 0—100 区间内的数值；关于品级因子，在进行实际测算时，需借助特尔菲法等进行处理，品级因子的等级分为：差、较差、中等、较好、好。采用等差级数赋值，实际为各种要素的影响权重。

第二，分量聚集度。

分量聚集度的公式如下：

$$H_i = \frac{F_i g_i}{S} \tag{6.2}$$

其中：

H_i——特定空间一定时间点单位面积上聚集的一定品级的第 i 种要素的数量；

F_i——一定时间点，特定空间的第 i 种要素数量；

g_i——第 i 种要素品级因子，反映要素的质量；

S——特定空间的总面积。

基于要素的总量聚集与分量聚集的关系为：

$$H = \sum_{i=1}^{n} H_i$$

（2）基于经济活动主体的聚集度。

第一，总量聚集度。

$$H = \frac{F}{S} = \frac{\sum_{i=1}^{n} w_i f_i}{S} \tag{6.3}$$

其中：

H——基于经济活动主体的聚集度（总量），其含义为：特定空间一定时间点单位面积上的经济活动主体数；

F——一定时间点，特定空间的各类经济活动主体总数量；

S——特定空间的总面积；

w_i——第 i 种经济活动主体的权重；

f_i——第 i 种经济活动主体的数量；

n——特定空间经济活动主体的种类数（一般情况下 $n = 3$，即代表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

不同类型的企业因聚集程度不同，应赋予不同的权重。

第二，分量聚集度。

$$H_i = \frac{F_i}{S} \tag{6.4}$$

其中：

H_i——特定空间一定时间点单位面积上聚集的第 i 种经济活动主体的数量；

F_i——一定时间点，特定空间的第 i 种经济活动主体的总数量；

S——特定空间的总面积。

基于经济活动的总量聚集与分量聚集的关系为：

$$H = \sum_{i=1}^{n} H_i$$

当特定空间为企业空间时，式(6.1)—式(6.4)计算的结果为企业聚集度；当特定空间为行业空间时，式(6.1)—式(6.4)计算的结果为行业聚集度；当特定空间为城市空间时，式(6.1)—式(6.4)计算的结果为城市聚集度；当特定空间为区域空间时，式(6.1)—式(6.4)计算的结果为区域聚集度。

6.2.3 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

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指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各种聚集动力的作用机理及其传导过程，反映聚集动力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聚集之所以能够成为动力，是因为聚集效应的存在，而聚集过程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存在着流入、流出和乘数三种效应。

1. 聚集过程的内在三种效应

聚集过程之所以能够发生、发展，以及聚集动力的作用过程和传导机制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聚集过程中存在着三种效应，即流入效应、流出效应和乘数效应。关于三种效应的讨论，是揭示聚集动力机制的关键。

(1) 流入效应。

所谓聚集的流入效应，是指客观上存在导致经济活动主体或要素向特定空间聚集的动机或力量。

为说明问题，我们以厂商为例。企业的经济活动涉及“何时、何地、为何、如何”的问题。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我们得知厂商的生产目的是明确的，即追求利润最大化，当根据市场需求厂商决定生产什么和何时生产以后，厂商目标实现取决于价格、产量和成本。同等投入的情况下，劳动效率决定产量，并影响成本。要素价格决定成本。于是具有满足厂商生产可能性要求，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并具有较低要素价格的优势区位成为厂商的必然选择。即优势区位存在厂商向其聚集的驱动力，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流入效应。

(2) 聚集的乘数效应。

任何经济活动主体的经济活动都必须与其他的经济活动主体发生联系，这种联系是经济活动主体劳动价值实现的过程。任何生产要素都不会单独地发挥作用，生产的效率取决于要素组合及其内在的有机联系。因而，经济联系是实现经济活动主体目标的前提和基础。所谓乘数效应是指特定空间上聚集的经济主体之间

的经济联系与经济主体的数量增加成倍数关系。乘数效应可用图 6.3 来表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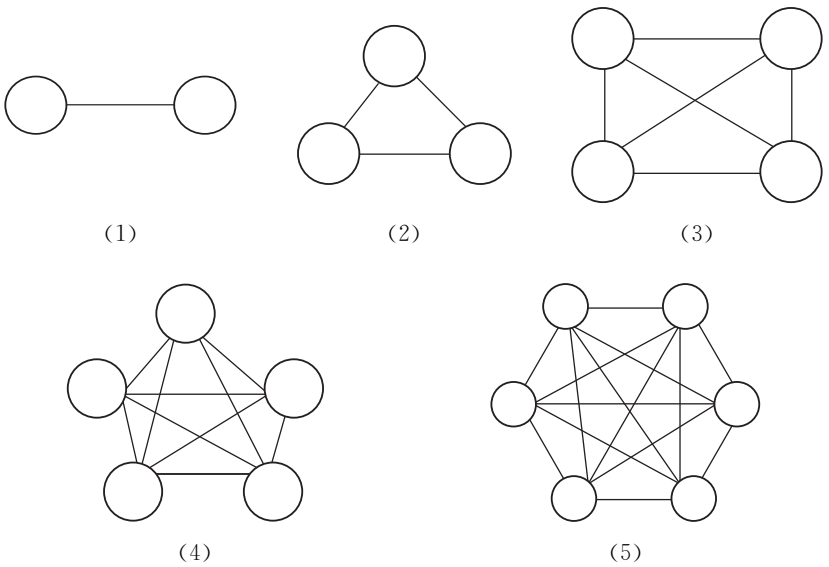


图 6.3　经济活动主体及其经济关系示意图

图中圆点代表经济活动主体，连线代表两两之间的经济联系。例如，图 6.3(1)为两个经济活动主体，经济联系数为 1。经济活动主体数与它们之间的经济联系数的关系，实际为关于经济活动主体取 2 的组合数，其数学表达式为：

$$N = C_n^m = \frac{n!}{m!(n-m)!} \tag{6.5}$$

式中 n 为经济主体数，m 为构成一个经济关系的经济活动主体数，即 $m = 2$，所以式(6.5)又可写成：

$$N = \frac{n(n-1)}{2} \tag{6.6}$$

根据式(6.6)进行计算：2 个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数为 1；3 个经济主体的关系数为 3；4 个经济主体的关系数为 6；5 个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数为 10；6 个经济活动主体的关系数为 15 个等等。

(3) 流出效应。

与流入效应相对的是流出效应，即经济活动主体或流动性要素由于某种原因从特定区位流出的现象。流出效应发生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其一，当经济活动主体

的经济活动内容发生改变，而区位条件无法满足要求时发生的流出，如厂商生产新的产品，而原有区位的资源条件无法满足其生产要求是发生的流出；其二，更大空间领域存在着竞争，当其他区域的流入效应超过本区域的流入效应时发生的流出，如其他区域的特惠政策导致的本区域的企业迁出等。

2. 聚集过程是流入效应、流出效应和乘数效应交互作用的结果

流入效应、流出效应和乘数效应反应了聚集过程的内在机理，同时也揭示了聚集能够成为经济发展动力的原因。聚集过程是在流入效应、流出效应和乘数效应的交互作用下完成的。流入效应导致了在特定空间聚集的开始，在乘数效应的作用下形成了新的流入效应，从而导致聚集度不断提高。

流入效应与乘数效应的交互作用，能够使我们清晰地解释在特定的区位为何城市、区域能够形成和发展，而不是在其他的区位。流出效应与乘数效应的交互作用，能够使我们清晰地解释在城市与城市和区域与区域之间的竞争中，为何有的城市或区域经济发展较快，而有的城市或区域经济发展则较慢，甚至出现倒退。

乘数效应是可逆的，既具有正的乘数效应，也有负的乘数效应。当流入效应大于流出效应时，表现为正的乘数效应；当流出效应大于流入效应时，表现为负的乘数效应。

3. 聚集动力的传导过程

在流入效应、流出效应和乘数效应的综合作用下，聚集动力的传导过程见图 6.4。其基本含义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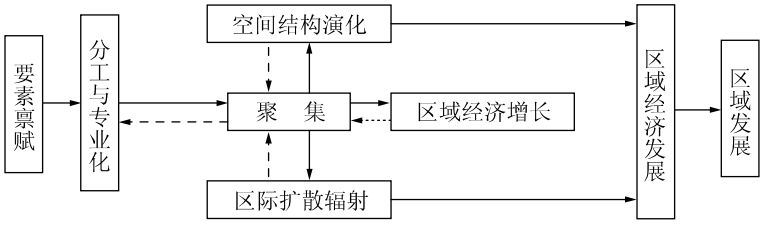


图 6.4　聚集动力的传导过程

第一，要素禀赋是聚集动力传导过程的发端，是产生流入效应的基础。在流入效应的作用下，特定区域的聚集开始。要素禀赋是区域分工与专业化的基础，要素禀赋中的主导因素决定分工与专业化的内容和发展方向。

第二，聚集使特定区域空间上的分工与专业化发展，乘数效应发挥作用，分工与专业化具有聚集需求，带来新的流入效应；聚集和生产过程引起要素禀赋条件的变化，个别厂商无法适应这种变化，进行新的区位选择，流出效应产生。

第三，分工与专业化导致聚集，聚集程度的提高又会促进分工与专业化，两者表现为一种互动的关系。当流入效应大于流出效应时，正的乘数效应发挥作用，区域聚集度迅速增加；当流出效应大于流入效应时，负的乘数效应发挥作用，区域聚集度下降。

第四，聚集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从时间维度来看表现为区域经济增长，从空间维度来看表现为空间结构的演化，从区域的交互作用来看表现为区际引力与辐射。区域经济增长、区域空间结构的演化和区域对外扩散与辐射能力的增强，均是区域经济发展的表现形式。

第五，聚集与区域经济增长、空间结构演化和区际扩散与辐射是相互作用的。首先，聚集促进了区域经济增长，区域经济增长又会产生流入效应，出现更大规模的聚集；其次，聚集带来区域空间结构的演化，优化的空间结构也会产生流入效应，从而带来更大规模的聚集；再次，聚集形成了区域对外辐射与扩散的能量，是区际扩散与辐射形成的条件，区际扩散与辐射的过程使特定区域的影响力加大，产生新的流入效应，给区域带来更大规模的聚集。

第六，聚集的动态过程将时间与空间有机结合，聚集的产生、发展与变化揭示了区域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

第七，在聚集动力的作用下区域经济不断发展，并进一步推动了区域经济发展。

6.3 区域经济发展模型

6.3.1 聚集—区域经济增长模型

我们这里在分析区域经济增长模型时，建立了基于梅奥模型的改进模型。

1. 选择梅奥模型作为基础模型的原因

第一，梅奥证明在聚集经济或不经济的前提下城市增长模型存在稳定的长期均衡。并且，如果城市总产出的总需求继续增加（以一比率），长期稳定均衡就存在。在模型中土地（land）因素被考虑进去了，在聚集经济或不经济的前提下，第三生产要素的可用性使得模型更容易达到稳定的增长均衡。

第二，梅奥讨论了聚集经济和聚集不经济的情况，认为聚集经济或聚集不经济

的存在可能会造成增长均衡的不稳定。聚集不经济的存在将会造成向稳定均衡的收敛。聚集经济的存在造成均衡的无限扩散。

第三，梅奥模型虽然也是以生产函数为基础的经济增长模型，但不同于其他经济增长模型，其将土地要素引入模型，土地作为非流动要素，最能反映经济空间特征，因而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更具现实意义。

设生产函数为：

$$Y = A(N)K^{a}N^{1-a}$$

引入聚集系数 h，令 $h = (\phi_i - \phi_o) \cdot \Delta_t$。其中：

h 为聚集系数，即反映聚集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程度的变量；

ϕ_i 为流入因子，即由于流入效应带来的在考察期(t)区域空间单位面积上流入的要素量；

ϕ_o 为流出因子，即由于流出效应导致的在考察期(t)区域空间单位面积上流出的要素量；

Δ_t 为乘数因子，反映因乘数效应导致的放大效果。

引入聚集系数的实际意义如下：

(1) 当$(\phi_i - \phi_o) > 0$ 时，流入大于流出，表明区域经济处于聚集经济状态；

(2) 当$(\phi_i - \phi_o) < 0$ 时，流出大于流入，表明区域经济处于经济不经济状态；

(3) 当$(\phi_i - \phi_o) = 0$ 时，流入等于流出，表明区域经济处于均衡状态。

令：

$$A(N) = N^{h},\ h \neq 0$$

$$\frac{\dot{K}}{K} = \frac{sY}{K} + v(r - \bar{r})$$

$$\frac{\dot{N}}{N} = n + g(w - \bar{w})$$

$$r = A(N)\frac{\partial(K^{a}N^{1-a})}{\partial K} = aK^{a-1}N^{1-a+h}$$

$$w = A(N)\frac{\partial(K^{a}N^{1-a})}{\partial N} = (1-a)K^{a}N^{h-a}$$

模型存在稳定均衡，其条件为 $\dot{K} = \dot{N} = 0$。

假设，随着时间的变化，实际工资率 ω，向劳动边际生产力，将会有调整，那么：

$$\dot{\omega} = \theta(w - \omega),\ \theta > 0$$

$$\frac{\dot{K}}{K} = \frac{sY}{K} + v\left(\frac{Y - \omega N}{K} - \bar{r}\right)$$

$$\frac{\dot{N}}{N} = n + g(\omega - \overline{w})$$

从而，模型可以得出：

$$\dot{K} = T(K,\ N,\ \omega) \equiv (s+v)K^{a}N^{1-a+h} - vw\omega N - v\bar{r}K$$

$$\dot{N} = U(N,\ \omega) \equiv nN + g(\omega - \overline{w})N$$

$$\dot{\omega} = V(K,\ N,\ \omega) \equiv \theta[(1-a)K^{a}N^{h-a} - \omega]$$

利用 Jacobian **矩阵：**

$$J = \begin{bmatrix} T_K & T_N & T_\omega \\ 0 & U_N & U_\omega \\ V_K & V_N & V_\omega \end{bmatrix}$$

其中，下标处的字母意味着偏微分，并且在均衡处，$U_N = n + g(\omega - \overline{w}) = 0$**，从而：**

$$\Delta_1 \equiv -(T_K + V_\omega) = (1-a)sK^{a-1}N^{1-a+h} + \theta$$

$$\Delta_2 \equiv \begin{vmatrix} T_K & T_\omega \\ V_K & V_\omega \end{vmatrix} + \begin{vmatrix} 0 & U_\omega \\ V_N & V_\omega \end{vmatrix} = \theta\left[\frac{(1-a)sv\bar{r}}{s+va} + \frac{a\omega vN}{K} + (a-h)\omega g\right]$$

$$\Delta_3 \equiv -\det[J] = -h(av+s)\theta\omega gK^{a-1}N^{1-a+h}$$

如果聚集经济存在，$h > 0$**，模型的结果应该是** $\Delta_3 < 0$**，就是其均衡局部不稳定。如果聚集不经济存在，**$h < 0$**，模型的结果应该是** $\Delta_1 > 0$、$\Delta_2 > 0$、$\Delta_3 > 0$**，其均衡就是局部稳定的。**

实际上，我们可以证明更一般的生产函数：

$$Y = A(N)F(K,\ N)$$

$$\psi(k) = s\frac{f(k)}{k} + vf'(k) - g[f(k) - kf'(k)]$$

$\psi'(k) < 0$ **意味着** $\lim_{k\to 0}\psi(k) = \infty$，$\lim_{k\to\infty}\psi(k) = -\infty$，$f'(0) = \infty$，$f'(\infty) = 0$。**从而，资本劳动比率** k **在** $t \to \infty$ **时向增长均衡点** k^* **收敛。**

假设将土地要素考虑进去的模型的生产函数为：

$$Y = A(N)K^{a}N^{h}L^{1-a-b}$$

其中，L 为土地，$a>0$，$b>0$，$1-a-b>0$。再考虑需求导向模型：

$$\hat{K} = s\frac{Y}{K} + v\left(a\frac{Y}{K} - \bar{r}\right),\ v'(\cdot)>0$$

$$\hat{N} = n + g\left(h\frac{Y}{N} - \overline{w}\right),\ g'(\cdot)>0$$

与前一模型相比，这一需求导向模型包括原始劳动力迁移方程式。其差异就是土地可用性的结果，它是达到稳定增长均衡的调整要素。这里，我们有：

$$(K\hat{/}Y) = \hat{K} - \hat{Y} = s\frac{Y}{K} + v\left(a\frac{Y}{K} - \bar{r}\right) - \varphi$$

$$(N\hat{/}Y) = \hat{N} - \hat{Y} = n + g\left(h\frac{Y}{N} - \overline{w}\right) - \varphi$$

假设 $v(-\bar{r})<\varphi$ 和 $g(-\overline{w})<\varphi-n<g(\infty)$，我们可以证明稳定增长均衡值的 $\left(\frac{K}{Y}\right)^{*}$ 和 $\left(\frac{N}{Y}\right)^{*}$ 的存在性、唯一性、稳定性。L 的动态路径是在生产函数中可以发现的，如 $A(N)=N^{h}$，我们可以得出：

$$L = Y^{\frac{1}{1-a-b}}K^{\frac{-a}{1-a-b}}N^{\frac{-(b+h)}{(1-a-b)}}$$

并且，

$$\hat{L} = \frac{1-a-b-h}{1-a-b} = \hat{Y} = \hat{K} = \hat{N}$$

上述方程式表明，与产出量、资本和劳动力相比，为了弥补聚集经济（不经济）效应，依照稳定增长路径，土地更缓慢地（更快地）增加。无论生产技术具有聚集经济的特征还是具有聚集不经济的特征，只要土地要素成为模型的调整因素，模型就能够达到稳定增长均衡。

6.3.2 聚集—区域空间结构演化模型

由于是非均质空间，引入最早由科林·克拉克（Clin Clark）提出的密度梯度变化曲线。对于单核心、具有三元结构的典型区域，需引入三个斜率系数，即：

$$H(x)=\begin{cases}H_0\mathrm{e}^{-b_1x}\\H_0\mathrm{e}^{-b_2x}\\H_0\mathrm{e}^{-b_3x}\end{cases}$$

其中，H_0 代表区域中心最高聚集度；b_1、b_2、b_3 分别代表城市中心区、城乡边缘区和农村的斜率系数，可得区域聚集度梯度曲线如图 6.5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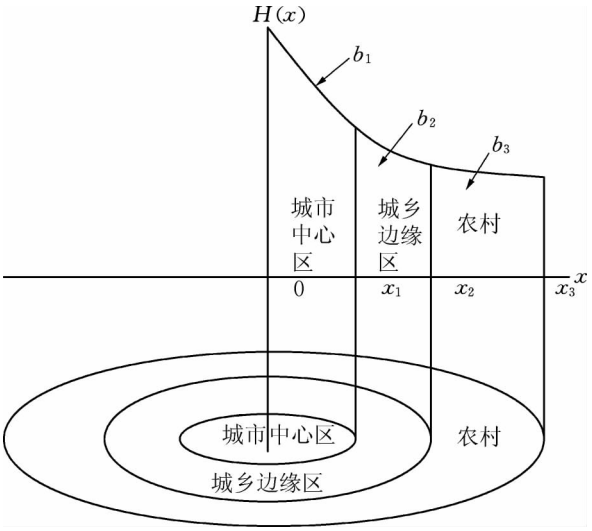


图 6.5　区域聚集度梯度曲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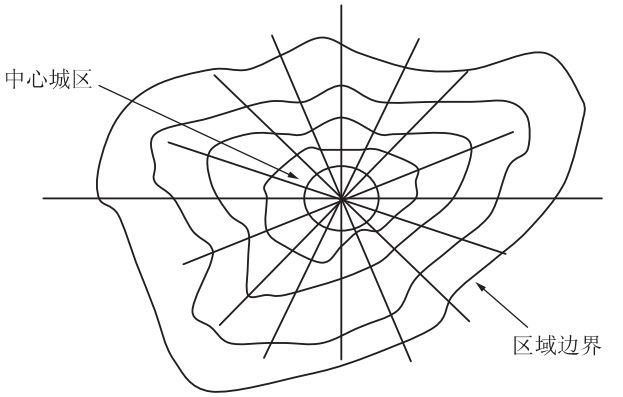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极为重要的推论：

推论Ⅰ：特定区域当沿空间某一方向聚集度与相邻区域聚集度相等时，形成两个相邻区域聚集度梯度曲线的交点，实际为两区域在该方向的空间均衡点，该点在区域空间地表的映像即为区域空间沿此方向的边界点。

推论Ⅱ：由于区域空间的异质性，沿不同方向聚集度表现不同的变化规律，因而将在距区域中心点具有不同半径的空间点上实现均衡。

推论Ⅲ：由沿不同方向的边界点所形成的包络线所形成的闭合空间即为区域空间，包络线即为区域边界，于是区域边界可测。又因为沿不同方向的边界点距区域中心点的距离（半径）不同，表明区域边界不是等半径的同心圆结构（见图 6.6）。

推论Ⅳ：由于区域面积与聚集度存在着内在的联系，所以区域面积可测。



注：圈层线为聚集度相等的等高线

图 6.6　区域空间(平面)的演化过程

根据图 6.5 求积分，可得城市中心区的面积 S_1、城乡边缘区的面积 S_2 和农村的面积 S_3。

$$S_1 = \int_0^{x_1} \frac{H \cdot b_1}{H_0 \cdot e^{-b_1 x}} dx$$

$$S_2 = \int_{x_1}^{x_2} \frac{H \cdot b_2}{H_0 \cdot e^{-b_2 x}} dx$$

$$S_3 = \int_{x_2}^{x_3} \frac{H \cdot b_3}{H_0 \cdot e^{-b_3 x}} dx$$

此时，区域的总面积为 S：

$$S = S_1 + S_2 + S_3$$

即：

区域总面积 = 城市中心区面积 + 城乡边缘区面积 + 农村面积

6.3.3　聚集—区域辐射模型

1. 有关问题的讨论

(1) 聚集的“场”效应。

我们讨论了关于聚集效应问题，指出聚集经济存在四种效应，即分工效应、规模效应、外部效应和市场效应，这是站在区域内部来看聚集给区域内的各个经济活动主体所带来的好处，进而说明聚集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的原因。

事实上，区域又是物质实体，要素及经济活动主体在区域空间上的聚集，本质

上又是能量的聚集。在区域空间上聚集度越高，表明聚集的能量越大，反之亦然。因而表明，在以区域中心为中心的一定空间上存在着能量场。

（2）区际关系是区域的辐射与扩散能力的表现。

聚集所形成的能量场，一方面使区域内部的各个经济活动主体受益；另一方面又是区际关系形成的基础。在社会经济体系中，各个区域作为国民经济系统或更大系统的子系统，区域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即表现为区际联系。在区域的相互作用与相互影响中，有的区域处于优势地位，有的处于劣势地位。区域的辐射与扩散能力是决定特定区域在与其他区域的相互影响中，是否处于优势地位的决定因素。

（3）区域能量场边界与区域边界的关系。

所谓区域能量场的边界即指区域的辐射与扩散的边界，指当聚集度沿各个方向衰减至零时地表各点的包络线。由于区域能量的大小取决于区域的聚集程度的高低，所以聚集度是关于区域能量大小的衡量指标。区域中心聚集度最高，因而能量最大；聚集度从区域中心沿某个方向随着与中心点距离的变大而衰减；在区域内部流入大于流出，具有正的聚集度增量；在区域边界流入等于流出，聚集度增量为零，聚集度小于沿特定方向区域内任何一点的聚集度，但不为零（见图 6.6），表明区域在区域边界仍有可释放的能量，因而区域的辐射与扩散边界大于区域边界，两者的关系如图 6.7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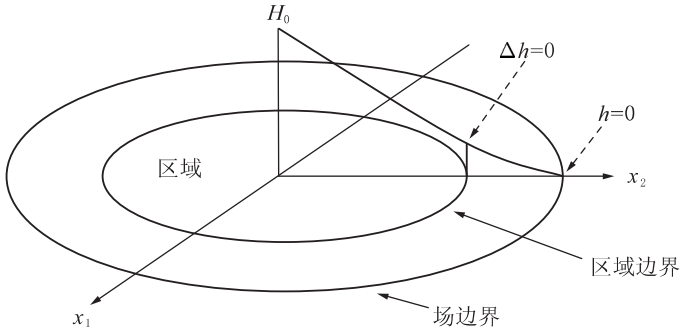


图 6.7　区域边界与场边界的关系

2. 聚集—区域辐射与扩散模型

引入 Fick 定律，根据图 6.7，假设聚集度是辐射与扩散的驱动力。令 $h(x, t)$ 代表聚集度，即单位面积上的要素数量。令 $\varphi(x, t)$ 代表要素流动向量，其方向为

要素流动的方向，其大小为单位时间穿过单位单元的比率。则：

$$\varphi = -k\,\mathrm{grad}\,h \tag{6.7}$$

或

$$\varphi = -k\,\nabla h$$

负号表示辐射朝着使聚集度减小的方向。

一定时期特定空间赋存的要素数量是一定的，按照守恒定律，流出某区域的要素数量等于流入其他区域的要素数量。

$$\frac{\partial h}{\partial t} = -\,\mathrm{div}\,\varphi = -\frac{\partial \varphi_1}{\partial x_1} - \frac{\partial \varphi_2}{\partial x_2} \tag{6.8}$$

组合式(6.7)和式(6.8)，

$$\frac{\partial h}{\partial t} = \mathrm{divgrad}\,h$$

$$\frac{\partial h}{\partial t} = \nabla^2 h = \frac{\partial^2 h}{\partial x_1^2} + \frac{\partial^2 h}{\partial x_2^2} \tag{6.9}$$

规定穿过区域边界的净聚集量 $\Delta h = 0$，即：

$$\varphi_n = 0$$

根据式(6.7)

$$(\mathrm{grad}\,h)_n = 0 \tag{6.10}$$

考虑一维的情况，令 f 代表从左向右的流动，则：

$$f = -\frac{\partial h}{\partial x}$$

$$\frac{\partial h}{\partial t} = -\frac{\partial f}{\partial x}$$

因此：

$$\frac{\partial h}{\partial t} = \frac{\partial^2 h}{\partial x^2}$$

并且在边界点 x_0、x_1，有：

$$\frac{\partial h}{\partial x} = 0$$

对于给定的无边界区域，式(6.9)的解是：

一维情况：

$$H(x,\ t)=\frac{H_0}{2\sqrt{\pi t}}\mathrm{e}^{-\frac{x^2+x^2}{4t}} \tag{6.11}$$

H_0 为区域中心的最高聚集度。

二维情况：

$$H(x,\ t)=\frac{H_0}{2\sqrt{\pi t}}\mathrm{e}^{-\frac{x^2}{4t}} \tag{6.12}$$

一维情况下，根据式(6.11)，最大解为：

$$0=\frac{\partial}{\partial t}\left(\frac{\mathrm{e}^{-\frac{x^2}{4t}}}{\sqrt{t}}\right)=\frac{1}{2}\frac{\mathrm{e}^{-\frac{x^2}{4t}}}{t^{\frac{3}{2}}}+\frac{x^2}{4t^2}\frac{\mathrm{e}^{-\frac{x^2}{4t}}}{t^{\frac{3}{2}}}\text{，解之，}t=\frac{x^2}{2}$$

距离区域中心的距离为：$x=\sqrt{2t}$。

二维情况下，假设为对称辐射(即圆形辐射区)，则辐射半径为：

$$r^2=x_1^2+x_2^2$$

即：$r=\sqrt{x_1^2+x_2^2}$，为圆形辐射区的半径。

事实上，由于我们已经证明区域的真实边界不是同心圆的结构，因而真实的辐射边界也不可能是同心圆结构，所以，由 $r=\sqrt{x_1^2+x_2^2}$ 得出的区域边界实际为关于区域辐射边界的近似结果。

6.4 区域经济发展的循环规律

6.4.1 要素聚集规律

1. 基本概念

所谓要素聚集是指在特定的空间各种要素的变化过程，这里的要素既包括区域性要素，也包括非区域性要素，由区域性要素和非区域性要素的性质所决定，对区域性要素而言，要素聚集主要指特定区域空间要素性态的变化，如：在土地面积未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土地的肥沃程度随着人们的生产活动而发生变化等；对非区域性要素而言，要素聚集则主要指在流入效应和流出效应的作用下，特定的区域空间一定品级要素数量的增减，如：资本的流入流出、人口的流入流出等，在流入效应作用下将使特定区域空间要素的数量增加，我们称其为正向聚集；在流出效应的作用下，将使特定空间要素的数量减少，我们称之为负向聚集；一定时间

内在正向聚集与负向聚集的综合作用下，特定空间要素数量的变化量我们称为净聚集。

要素聚集可分为总量聚集和分量聚集。所谓总量聚集是指特定的地域空间各种要素总的聚集变化过程。与之对应的是综合要素禀赋的概念，其反映的是特定的地域空间各种要素综合的赋存状态；分量聚集则指特定的地域空间某种要素的聚集变化过程。与之相对应的是单一要素禀赋的概念，其反映特定的地域空间某种要素的赋存状态。如：劳动力数量和质量的变化等。

要素聚集的结果是使特定区域空间的要素禀赋发生变化。所谓要素禀赋是指某一时点特定空间要素的赋存状态，其既是数量的概念，又是质量的概念，即要素禀赋是关于要素数量和要素质量的综合表征。

2. 要素聚集与经济活动主体聚集

如前所述，聚集可分为要素聚集与经济活动主体聚集，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首先，经济活动主体的聚集是第一性的，聚集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是因为聚集的分工效应、规模效应和外部效应等的存在，能够获得或具有获得分工效应、规模效应和外部效应好处的需求的是经济活动主体，而非要素本身，劳动是最重要的要素之一，但由于劳动的承担者是人，其具有要素和经济活动主体的双重属性；其次，经济活动主体的选择行为对要素聚集具有决定作用，聚集过程中的流入、流出是区域经济活动主体进行区位或区域选择的结果；再次，要素聚集是聚集的最终表现形式，要素是经济活动主体经济活动的对象，任何经济活动的结果都将伴随特定空间要素数量和结构的变化。

3. 沿时间维度的要素聚集

从时间维度来看，要素禀赋又可分为原始要素禀赋、初始要素禀赋、现时要素禀赋和预期要素禀赋。所谓原始要素禀赋是指特定的地域空间在未有人类活动干预的情况下，各种要素的赋存状态，即特定地域空间纯自然状态下的要素禀赋。原始要素禀赋决定人们最早的区位选择和区域选择行为；初始要素禀赋是指特定的地域空间在给定时点的要素赋存状态。由于不同地域空间的要素禀赋条件的差异，人类经济活动开始的时点不同，始于不同时点的要素禀赋之间往往不具有比较意义。因而，初始要素禀赋是进行不同空间要素禀赋比较研究的基础。现时要素禀赋是指特定的地域空间在当前时点下要素的赋存状态，我们通常讲的要素禀赋即指现时要素禀赋，现时要素禀赋是进行区域经济研究的最直接的依据；

预期要素禀赋是指经济活动主体对特定地域空间未来时点要素赋存状态的预测或估计，预期要素禀赋对经济活动主体的区位选择和区域选择行为具有重要影响。现时要素禀赋和预期要素禀赋是经济活动主体进行区位与区域选择决策的主要依据。

4. 沿空间维度的要素聚集

空间是人类经济活动的载体，任何经济活动都不能离开空间而存在。由于要素在空间上的非均质分布，不同空间点满足人类经济活动的要素禀赋条件不同，基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选择具有比较优势的空间是经济活动主体的必然选择。

单个经济活动主体选择的对象是区位，其经济活动的过程使与其经济活动相关的要素在特定区位上聚集，形成区位要素聚集；在聚集动力的作用下，与占据优势区位经济活动主体具有密切关联或具有共同的要素需求的经济活动主体将选择与之毗邻的区位，其结果是在特定的空间上由具有共同的要素需求或密切关联的经济活动主体所形成的经济功能区，即经济功能区要素聚集；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人们的需求是多样的，单一经济功能区无法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因而在特定的经济功能区周边将形成与其功能互补、具有有机联系的其他类型的经济功能区，由多个经济功能区组成功能完善的经济区域，形成区域性要素聚集。

先期形成的经济功能区我们又称之为主导功能区，其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特殊的意义。首先，主导功能区的形成标志在该地域空间与其功能直接相关的某种要素或要素组合具有比较优势，这种要素或要素组合我们称为主导要素。其次，主导要素的性质决定了主导功能区的性质，亦即决定了区域的主导产业。由于其他功能区的形成与主导功能区相关，主导功能区对其他功能区的形成具有决定作用，满足其他功能区需要的要素或要素组合成为辅助要素。再次，主导要素的品级和数量决定了一定区域与其他同类区域之间的竞争优势。

6.4.2 要素聚集规律决定的区域经济循环发展

区域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始终伴随着要素聚集的过程。从时间维度来看，原始要素禀赋与区域的形成起源密切相关，初始要素禀赋与现时要素禀赋是关于区域经济发展历史的表征，预期要素禀赋则可描述区域经济发展的未来；从空间的维度来看，区位要素聚集是形成区域的基础，经济功能区要素聚集反映了区域经济发展的过渡形态，而区域性要素聚集则综合反映了区域经济发展的状态。

由图 6.4 所示的区域经济的发展过程，仅表达了区域经济发展过程的一个阶段。事实上，区域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循环过程，如图 6.8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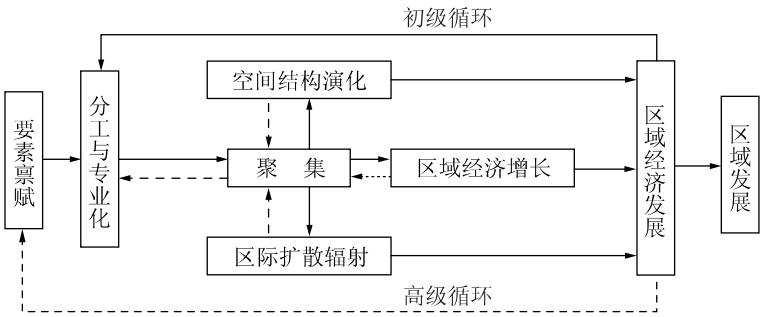


图 6.8　区域经济发展循环

由图 6.8 所表达的区域经济发展过程，包括了两个循环过程，即初级循环过程和高级循环过程。

所谓初级循环是指在区域的产业结构不变的条件下，在流入效应、流出效应和乘数效应的交互作用下，聚集动力推动区域经济累积循环的过程（见图 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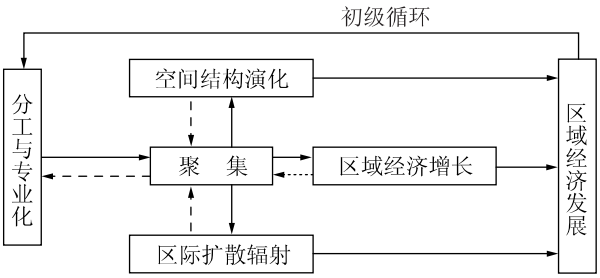


图 6.9　区域经济发展的初级循环

1. 初级循环

（1）初级循环的前提条件。

初级循环的前提条件是区域的经济结构（主要指产业结构）不发生变化，因而可以理解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量变过程，也是区域经济发展在相对短期内的变化规律。主导要素决定主导功能区的功能定位，即产业类型，在主导功能区的引带下，相关功能区不断形成，构成了与主导功能区具有有机联系的系统，由此决定了特定区域的产业结构类型与特点。初级循环是以主导功能区为核心的区域产业结构不

断优化的过程，通过初级循环的过程，适宜这一产业结构的要素不断向区域聚集，区域规模不断扩大，主导产业的竞争力不断增强。

（2）初级循环的环境条件。

初级循环要求的环境条件是区域经济处于聚集经济状态。所谓聚集经济状态是指随着区域空间要素聚集度的增加，由区域经济增长、区域空间结构演化和区际辐射与扩散能力所表征的区域经济发展处于良性状态。即聚集程度的增加与区域经济的发展保持同向，说明现有的产业结构能够适应区域经济发展现阶段的需求。

（3）初级循环的传导过程。

一定时期区域的要素禀赋条件决定了区域的分工与专业化，形成了区域的产业结构，其中主导因素决定主导产业，形成了初级循环的基础；流入效应与乘数效应综合作用，导致区域的聚集度提高；聚集动力推动区域经济增长，带来区域空间结构的演化和区际辐射与扩散能力的增强，区域经济得到发展；区域经济的发展引起分工与专业化的进一步深化，新的循环开始。但在初级循环阶段，主导产业未发生变化，其要素聚集的过程是使区域内以主导产业引领的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的过程。

2. 高级循环

所谓高级循环是指原有的产业结构已不适应区域经济发展的要求，区域的产业结构发生改变，即要素禀赋和主导因素的变化导致新的产业结构和与之相适应的分工与专业化，在这个基础上，由于流入效应、流出效应和乘数效应的综合作用，聚集动力推动区域经济在新的产业结构下发展（见图 6.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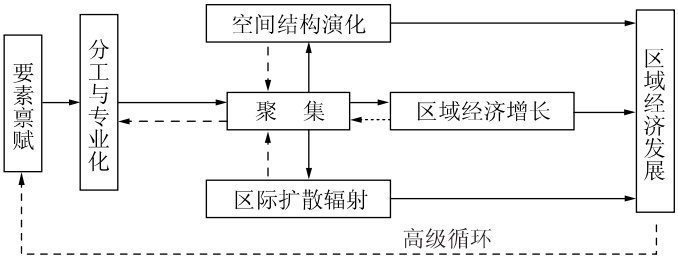


图 6.10　区域经济发展的高级循环

（1）高级循环的前提条件。

高级循环的前提条件是原有的产业结构无法满足区域经济的发展要求，客观

上要求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由于要素禀赋对产业结构和分工与专业化的决定作用，要求寻找新的主导因素，因而，也是区域经济发展的质变过程。

（2）高级循环发生的环境条件。

高级循环发生的环境条件是区域经济处于聚集不经济状态，即当产业结构不发生改变时，聚集度的进一步提升，不仅不会带来区域经济的发展，反而会导致区域经济的停滞，甚至倒退。

经济活动是以人们的需求为导向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需求不断发生变化，适应人们需求的产业得到发展，不适应人们需求的产业则被淘汰。因而，区域产业结构的变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从生产的角度看，任何产业的生产都需要特定的要素与要素组合，随着要素聚集和生产过程的资源消耗，原有的主导要素可能失去其相对优势，经济活动主体将寻找新的主导要素，并据此形成新的主导产业和与之相关的产业结构。科技创新能够改变经济活动主体的生产能力和要素的利用方式。人类社会已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逐渐发展到知识经济社会，不同的社会形态下具有不同的需求和主导产业，因而对要素具有不同的选择，农业社会是以农业作为主导产业的，与农业密切相关的土地是主导要素，土地的肥沃程度、适耕性、水源、气候等条件成为生产者区位与区域选择的主要对象。工业社会经济活动主体的区位与区域选择，主要以工业生产所需的要素为依据，如原材料产地、运输成本、劳动力等。工业社会经济活动主体的区位与区域选择行为要比农业社会复杂得多，并且随着科学技术进步的加快，主导要素和主导产业的更替速度加快。进入知识经济社会，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源成为最重要的要素，区域的主导产业及其产业结构将依区域所拥有的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源条件的变化而变化。

（3）高级循环的传导过程。

当区域经济处于聚集不经济状态时，客观上要求区域的产业结构发生改变，由于要素禀赋对产业结构和分工与专业化的决定作用，新的主导因素产生，循环开始；新的主导因素及要素条件，决定了分工与专业化，在流入效应、流出效应和乘数效应的综合作用下，区域的聚集度提升；在聚集动力的推动下，以区域经济增长、区域空间结构演化和区际辐射与扩散能力为表征的区域经济不断向前发展，并进入新的初级循环。

3. 区域经济发展的周期性规律

在初级循环和高级循环的交互作用下，区域经济发展表现出明显的周期性规

律，如图 6.1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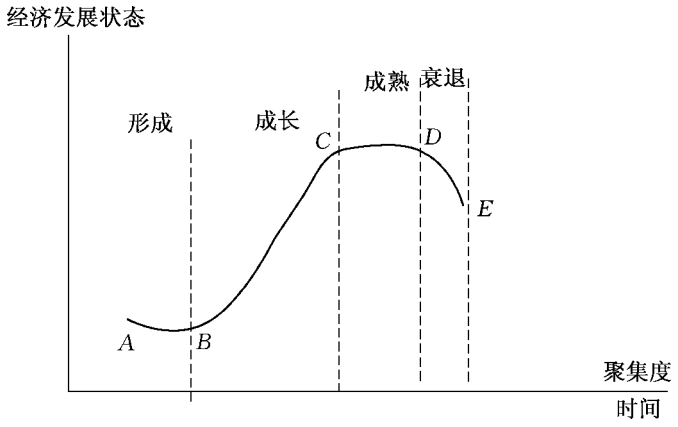


图 6.11　区域经济发展初级循环阶段

初级循环阶段，区域经济发展的状态变化规律可用倒 S 曲线表示，在聚集经济的条件下，一定的产业结构在聚集动力的作用下，经济不断发展，呈上升趋势。初级循环历经四个阶段，如图 6.11，AB 为循环的起步阶段，特定区域由于某类要素禀赋具有比较优势，具有该类要素禀赋需求的经济活动主体向该区域聚集，逐渐形成以该类要素为主导要素的主导功能区及主导产业；BC 为循环的成长期，在主导功能区的引带下，辅助功能区逐渐形成，聚集水平不断提高，区域经济规模不断扩大；CD 为循环的成熟期，与主导功能区相配套的区域功能已经完善，区域经济发展处于稳定持续的状态；DE 为循环的衰退期，随着需求和要素禀赋的变化，新的替代品出现或主导要素或要素组合枯竭，不能维持原有规模生产，区域经济处于聚集不经济状态，呈下降趋势。上述阶段包含了多次初级循环过程，每一次初级循环都使围绕主导产业的分工和专业化水平得到一次提升。

初级循环进入衰退期，表明原有的产业结构已不能适应新的需求，经济活动主体要进行新的区位与区域选择，寻找新的主导要素，建设新的主导功能区，使区域经济发展进入新一轮的初级循环。上述主导要素及主导功能区的转化过程，我们称之为高级循环。高级循环的过程，是使区域的产业升级的过程，使区域经济进入新的聚集经济状态。建立在高级循环基础上的新一轮的初级循环使区域经济站在更高的起点上，进入新的循环周期，如图 6.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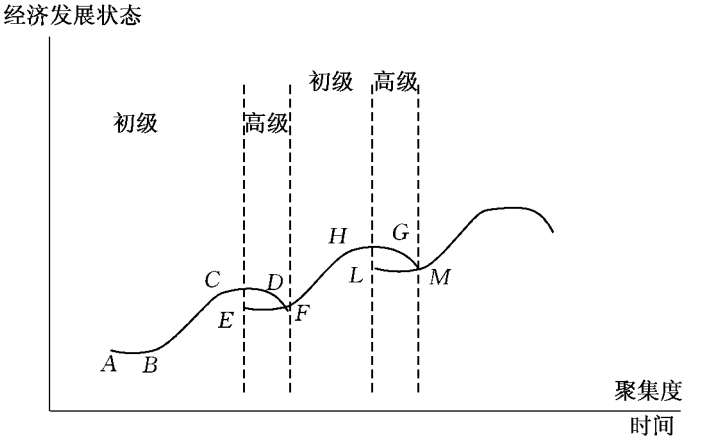


图 6.12　初级循环与高级循环的交互作用

4. 区域经济发展的类型

(1) **短周期的类型**。

区域经济发展的周期规律适用于各个经济区域，短期内(即一次完整的初级循环)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可以用倒 S 曲线的形状进行定性的分析。一般而言，在坐标尺度一定的条件下，具有陡峭倒 S 曲线的区域经济发展较快，具有扁平倒 S 曲线的区域则发展较为缓慢。其表达的含义是：在获得同样的经济增长的条件下，该区域较其他可比区域用较短的时间完成了初级循环的各个阶段。如图 6.13，A、B **两个区域完成初级循环所用的时间相同，但区域** A **获得了较大的经济增长，因而区域** A **的发展速度快于区域** B；**在相同时间内该区域与可比区域完成了初级循环的各个阶段，但获得了较大的经济增长。如图** 6.14，A、B **两个区域完成初级循环获得了同样水平的经济增长，但区域** A **所用的时间小于区域** B **所用的时间，表明区域** A **的发展速度快于区域** 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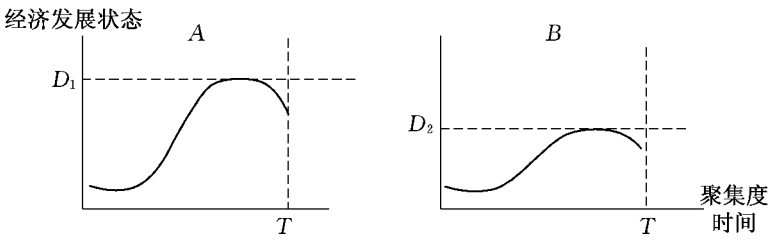


图 6.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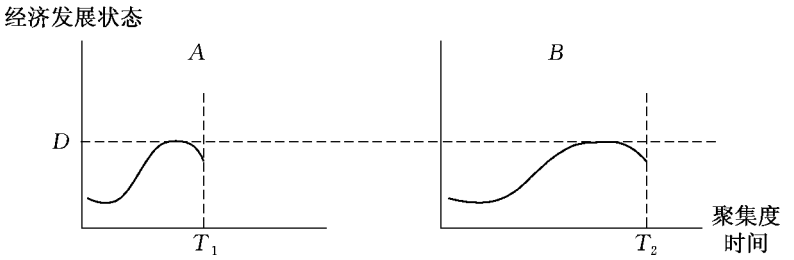


图 6.14

(2) 长周期的类型。

从长期发展的角度来看,区域经济的发展如图 6.12 所示,在初级循环与高级循环交互作用的短期内可以通过倒 S 曲线的形状判断区域经济的发展速度,但长期内必须综合考察由初级循环和高级循环所组成的整体循环过程。一般我们可以将区域经济的发展分为三种类型:超前型、同步型和滞后型。

第一,超前型区域经济发展。图 6.15 给出的是超前型区域经济发展类型,其特点是:高级循环在上期初级循环进入成熟阶段时就开始,新一轮的初级循环的起步阶段与上一轮初级循环的成熟阶段同时进行,当上一轮初级循环进入衰退阶段时,新一轮的初级循环刚好进入成长阶段。这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理想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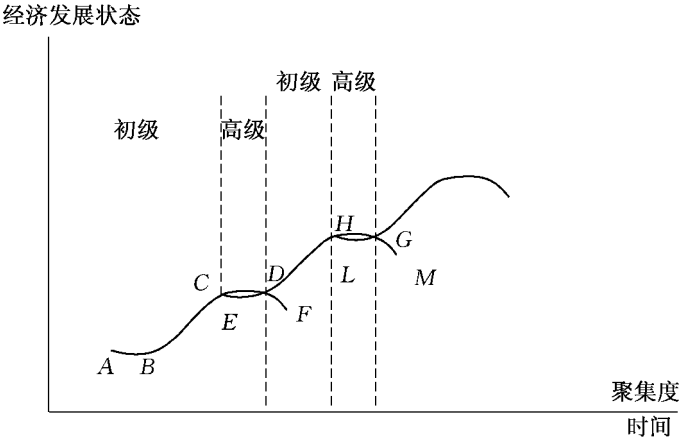


图 6.15 超前型

第二,同步型区域经济发展。图 6.16 给出的是同步型区域经济发展类型,其特点是:当上一轮初级循环结束成熟阶段时,高级循环同时发生,下一轮初级循环的起步阶段与上一轮初级循环的衰退阶段并行进行。这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一般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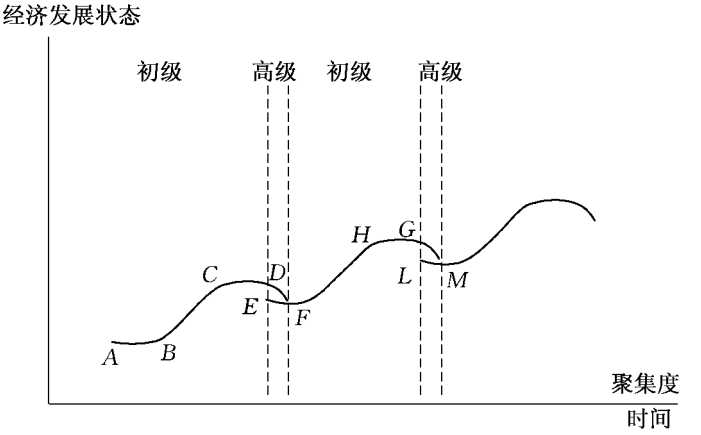


图 6.16　同步型

第三，滞后型区域经济发展。图 6.17 给出了滞后型区域经济发展类型，其特点是：上一轮的初级循环已进入衰退阶段，高级循环在经济发展衰退的压力下实现，区域经济处于最低谷时，新一轮的初级循环才刚刚开始。这是区域经济发展最不理想的类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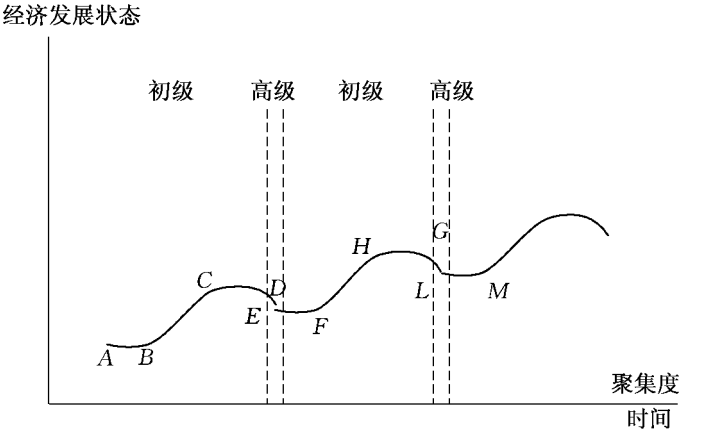


图 6.17　滞后型

6.4.3　把握区域经济发展的循环规律的现实意义

1. 循环规律揭示了区域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由量变到质变及其两者的相互转化是物质世界发展变化的普遍规律。区域经济发展循环中的初级循环是一个

量变的过程，而高级循环是一个质变的过程。当区域经济处于聚集经济状态时，产业结构不变，循环是一个量的积累过程；当量的累积达到一定程度时，原有的产业结构无法满足进一步发展的要求，发生质变。产业结构的升级是区域经济发展的质的飞跃。

从短期来看，初级循环包括起步阶段、成长阶段、成熟阶段和衰退阶段，而每一阶段的完成都可能需要多次的初级循环过程，但主导要素、主导功能区及由此决定的区域产业结构不发生变化。从长期来看，需求变化和要素禀赋条件变化是导致高级循环发生的主要原因，高级循环的发生才能使区域经济发展进入更高层次的循环发展。初级循环和高级循环的交互作用，揭示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完整过程。

2. 循环规律是进行区域经济诊断的有力工具

区域经济学是为解决区域经济问题而产生的。能够发现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并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十分重要。循环规律为我们提供了进行区域经济问题诊断的有力工具。

首先，区域经济的发展始于要素禀赋和经济活动主体的选择行为，特定区域一定时期的要素禀赋条件，决定了其主导要素、主导产业及其产业结构，由此也决定了该区域在社会经济系统中的分工定位，不考虑区域的要素禀赋条件人为地确定主导产业，将会使区域失去竞争的比较优势。

其次，产业结构升级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一定时期区域经济发展的优势不代表永久性的优势，不注意产业结构升级的区域进入初级循环的衰退期后将逐渐失去优势。

再次，初级循环的量变积累是高级循环的必要条件，但是不考虑区域经济的发展阶段和综合水平，一味强调产业结构升级是不成立的，其结果将带来区域经济的盲目发展，延长新一轮初级循环的起步阶段，使倒 S 曲线变得扁平，发展速度减缓。

3. 循环规律是制定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前提

一个好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不是靠华丽的辞藻，而是通过对区域经济发展状态和趋势的准确判断，针对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现实问题，进行区域经济发展的安排。也就是说制定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必须遵守区域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才能准确把握局部与整体、眼前与长远的相互关系，科学确定一定时期区域经济的发展目标，并制定切实可行的战略与对策。

初级循环和高级循环的交互作用构成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周期规律，同一区域可

能表现为不同的发展类型。超前型的区域经济发展类型最为理想，其克服了由于上一轮初级循环进入衰退期带来的负面影响，区域经济实现了持续的增长过程，但对区域主体具有较高的要求，只有科学判断区域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并科学分析需求变化和区域的要素禀赋条件，才能进行科学的预测与决策；滞后型的区域经济发展类型，将使区域丧失发展机遇，拉大与其他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

4. 循环规律是制定区域经济发展政策的依据

区域经济发展政策是指政府部门为确保区域经济的良性发展，根据其管辖范围内各个区域的发展状态制定的有关宏观经济的调控措施。政策的制定同样必须遵守客观的经济规律，否则就将事倍功半。例如我国的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处于不同的循环发展阶段，国家的有关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必须尊重这一客观事实，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宏观经济的调控措施，否则就不会起到应有的作用。改革开放后首先发展东部，现在进一步又适时提出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均是按照区域经济的发展规律制定区域经济发展政策的很好例证。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要素在空间上的非均质分布，同一时点下不同的区域具有不同的要素禀赋条件和要素聚集能力，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因而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绝对的，而平衡则是相对的。正视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正确处理平衡与不平衡的关系，进而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应是区域经济政策的落脚点。

本章小结

在前面对经济区域形成问题的讨论的基础上，本章构建了以聚集为核心、时空统一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型，认为聚集经济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揭示了区域经济发展和循环规律。这样，本章的研究跳出了孤立构建区域经济增长模型的范式，更好地反映了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动态属性，有利于解释区域经济发展的诸多问题。

思考题

1. 区域经济发展和区域经济增长是什么关系？

2. **为什么聚集经济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3. **认真推导本章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型，理解该模型与一般宏观经济增长模型的差异。**

4. **如何理解区域经济发展循环规律及其在现实中的应用？**

参考文献

王建廷：《区域经济发展动力与动力机制》，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查尔斯·I. 琼斯：《经济增长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陈秀山、张可云：《区域经济理论》，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版。**

费洪平：《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冯云廷：《城市聚集经济》，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郝寿义、安虎森：《区域经济学》（第 2 **版），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胡兆量：《中国区域发展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黄义珏：《中国的区域经济》，三英社（韩国）1998 **年版。**

陆大道等著：《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杨开忠：《中国区域发展研究》，海洋出版社 1989 **年版。**

Black, Duncan and Vernon Henderson, "Spatial Evolution Population and Industry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Economic Rewiew*, 89(2), pp. 389—413.

Hoyer, Karl Georg and Petter Naess, 2001, "The Ecological Traces of Growth: Economic Growth, Liberalization, Increases Consumption and Sustainable Urban Development ?',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Planning*, 3, pp. 177—192.

Kraus, Marvin, 1976, "Land Use in a Circular City: Some Numerical Results",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6, pp. 399—418.

Kuenne, Robert E., 1977, "Spatial Oligopoly: Price-Location Interdependedce and Social Cost in a Discrete Market Space",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7, pp. 339—358.

Nijkamp, Peter, 1986, "Dynamics of Generalised Spatial Interaction Models",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16, pp. 367—390.

Smith, Tony E., 1976, "Spatial Discounting and the Gravity Hypotesis",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6, pp. 331—356.

Smith, Tony E., 1978, "A Cost-Efficiency Principle of Spatial Interaction Behavior",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8, pp. 313—337.

Todaro, Michaer P., "A Model of Labor Migration and Urbean Unemployment in Less Development Countries", *American Economic Rewiew*, 59(1), pp. 39—54.

Williams, Martin, 1984, "Technical Efficiency and Region(The U. S. Manufacturing Sector 1972—1977)",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14, pp. 459—463.

第7章

区域经济的不平衡发展

上一章我们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单区域，分析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与动力机制。而现实中任何一个区域都不是孤立的，在其发展演进过程中，需要与其他区域发生联系。当审视不同的区域经济发展时，多区域间的不平衡问题就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本章将在上一章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区域经济不平衡与协调发展问题进行研究。

7.1 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的概念、特征与衡量

7.1.1 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的概念

在研究和比较不同区域的发展水平时，不同学者使用的术语也不同。有的人使用“差异”一词，有的人使用“差距”一词，而另外一些人则使用“不平衡”一词。这表明，我们必须首先界定和澄清关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一般概念。克拉森(L. H. Klassen)曾经把不同区域间发展水平的不同分为动态和静态两个层面，前者称为区域非均衡(regional disequilibrium)，或者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regional imbalance)；后者称之为区域差异(regional disparity)或者区域不平等(regional inequality)。从概念上讲，一般来说，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并不是均衡与非均衡的问题。因为所有的经济主体在达到均衡的时候，多个区域之间会出现发展水平的差异和不平衡，而在所有经济主体处于非均衡时，也会存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和不平衡。所以，区域非均衡不能用来表示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区域差距和差异比较适合两个区域间的比较，而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研究涉及两个以上的多区域所构成的区域经济体系；区域经济发展不平等涉及的是价值判断问题，而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客观的；另外，分析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应更集中在动态视角，而非描述性的静态视角。基于此，研究多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

时应该选择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regional imbalance)这一术语。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指多个区域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

7.1.2 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的特征

1. 发展不平衡是一个长期过程

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是指区域之间发展水平差异。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是常态的,也是长期过程。虽然以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的区域经济增长理论指出区域经济最终达到长期稳定的均衡状态,但是我们的现实总是不平衡的。

区域经济增长理论表明,区域经济增长路径取决于初期条件,并且,各种要素的相互作用的结果导致要素增长率的稳定状态,这也就是长期均衡状态。区际或国际贸易理论也指出,通过各区域间的贸易,区域最终实现各种要素以及商品的相对价格均等化,其结论意味着,虽然不同区域面临不同的经济增长或发展条件,但是最终我们的世界能够实现一种理想状态,也可以说是长期平衡状态。但是,我们的世界是非常复杂的,区域经济发展也是很复杂的过程。区域经济学是从区域的角度来发现区域问题。区域是空间维度,不同的区域面临不同的空间条件。并且,在一般情况下,这些空间条件是无法改变的。

经济发展是长期过程,需要各种发展条件。经济发展必然取决于这些发展条件的约束,区域经济发展也如此。区域经济发展结果的不平衡取决于条件的不平衡。与发展成果的不平衡相比,更核心的东西是发展条件的不平衡。从这个角度来看,区域经济的不平衡发展之所以是常态的,是因为发展条件本身是不平衡的,也是常态的。

2. 发展不平衡是相对的

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是相对的,既没有绝对的平衡发展,也没有绝对的不平衡发展。正如上所说,区域经济发展是常态过程,也是不断演进的过程。人类的经济活动离不开空间,其结果表现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各种区域问题,区域经济的发展差距所造成的不平衡结构问题就是其中之一。从空间维度来看,经济活动尤其是生产活动,是集中和扩散的不断演化的过程。为了追求更高的利益,生产活动必然集中起来,但是为了追求更高的利益,生产活动还会扩散。从某种程度上看,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的缪尔达尔(K. G. Myrdal)的回波效应与扩散效应以及赫希曼(A. O. Hirschman)的极化效应与涓滴效应,和 90 年代克鲁格曼的向心力与离心力都表明了这种特征。

经济活动的集中是聚集经济的根源。在聚集经济作用下，各种要素流向有发展条件的地区，其结果是区域之间发展成果的差距扩大。集中和聚集经济达到临界点的时候，经济活动自然地面临往外扩散的必要，从而使得各种要素流向其他地区。经济活动扩散造成的各种要素的空间移动，最终带动区域之间发展成果差距的缩小。经济发展是不断的累积过程，一方面呈现聚集和分散，另一方面呈现新的聚集和分散。其结果就是新的集中以及新的聚集经济的存在。并且，前阶段的集中和分散对新阶段的集中和分散提供重要的条件和空间。

区域经济之间发展成果的差异扩大是短期的，其差异缩小也是短期的。不同的区域经济不断地寻找自己的发展条件和路径。不同区域经济之间的要素流动在短期内对发展差距的缩小起着作用，但长期来看其要素移动反而成为造成发展差距的主要原因。

不平衡本身是相对的。一个区域的增长水平及其速度快，另一个区域的速度慢，造成不平衡的发展结构。收敛假说指出，发达区域的增长速度相对地慢，欠发达区域的增长速度相对地快，其结果两个区域能够达到一种稳定的增长速度。但是，不平衡还是存在的，欠发达区域的快速发展的同时，发达区域也在发展。有时，虽然发达区域的发展速度慢于欠发达区域，但是其发展成果远超过欠发达区域。

3. 不平衡具有差异性和类别性

区域之间的不平衡状况是存在差异的。有些区域之间的差异是不能通过自身的努力就能解决的，例如，一些自然资源匮乏、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的区域不是通过改造自身的产业结构就能赶上具有良好自然资源和条件的区域的，许多偏远地区长期处于落后状况就属于这种类型；而有些区域之间的差异是可以通过自身就能解决的，如有些地区的发展领先是因为其相对其他地区具有较好的历史基础或政策倾向，而相对落后的区域在完善自身的制度建设和技术创新方面是可以以更快的发展速度赶超上去的，甚至可以超越原先的发达地区，当前许多新兴地区、城市和国家（如 20 世纪腾飞的亚洲“四小龙”）的发展路径都能反映出这种情况。

因此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就存在两种类型：自身不能缩小差距型和自身可以缩小差距型。

4. 不平衡常常具有固化和强化的特征

即使是自身可以缩小差距型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也常常表现出固化和强化的特征。无论是偶然的机会还是必然的机会，区域经济一旦发展起来了，它就具

有一定的发展条件和空间。下一步的发展一定受到前阶段发展条件的影响和制约，这主要与要素的固化和强化特征有关系。各国的实证分析发现区域经济之间存在条件收敛和俱乐部收敛[①]或子集收敛。这说明，区域经济的发展需要一些发展的条件，并且，具有一定的发展条件的区域之间呈现长期收敛的趋势，要是其条件差异很大，很难呈现收敛趋势。

多利克(S. Dowrick)和阮(D. T. Nguyen)的研究表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之间的收敛。戴维德(D. Ben-David)研究发现欧盟国家之间的收敛。萨克斯和沃纳(J. D. Sacks and A. Warner)研究发现采取开放贸易政策的国家之间的收敛。他们所研究的不是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收敛。虽然发达国家之间呈现收敛趋势，但是，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来越扩大。上述实证研究表明世界范围内的俱乐部收敛的存在。美国、日本、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欧盟都属于各区域之间要素自由移动以及市场开放程度比较高的地区。克鲁格曼的产业内贸易理论解释发达地区之间的收敛。据赫克谢尔—俄林定理，通过两个区域的贸易，发达区域与不发达区域之间的差异缩小。但是，实际上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量很少，车铁豪(1997)表明，20 世纪 80 年代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量仅占总贸易量的 10%，而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量占总贸易量的 60%以上。这说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对收敛可以发挥积极作用，但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量很少，从而，贸易的作用还是有限的。罗默(Romer)的实证研究也表明发达国家的持续增长，并不是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收敛增长。罗默指出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不出现收敛的主要原因是技术的收益递增。芮诺德(N. G. Reynolds)的研究结果是，20 世纪 50 年代至 80 年代，不发达国家的平均经济增长率比发达国家低 2.3%。为了收敛，需要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比发达国家快得多，但是雷伊尼欧德的实证研究结果却与此完全相反，所以无法收敛。鲍默尔(W. J. Baumol)从生产力角度来研究发达国家集团的收敛，发现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不存在收敛趋势。上述克鲁格曼、罗默、雷伊尼欧德和鲍默尔的研究都表明发达国家之间收敛趋势的存在和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收敛。瞿阿赫(Quah，1996)的研究表明邻接区域之间存在很大的人

① 俱乐部收敛(club convergence)是指在初期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经济集团内部，其增长速度和发展水平处于收敛，而集团间的增长差异却无法缩小。

均收入相关关系，这说明在国家范围内俱乐部收敛存在的可能性。

7.1.3 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的衡量

目前测度区域经济不平衡的方法主要有 β 收敛检验方法、σ 收敛测量方法、概率收敛检验。

1. β 收敛检验方法

β 收敛检验方法是在区域经济增长模型的基础上发展的。其主要形式是检验区域经济增长的 β 收敛系数，是指落后地区某些经济指标逐步接近富裕地区水平的速度。β 收敛包括无条件收敛（unconditional convergence）和条件收敛（conditional convergence）。按照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国际或区际人均收入的差异是由于其资本和劳动比率（K/L）不同的结果。假定储蓄率不变，一国或地区最初的 K/L 越低，其 K/L 增长就越快；其结果，穷地区将比富地区增长得更快。如果地区间要素能够自由流动，那么，劳动力将由资本短缺的地区流向资本充裕的地区，而资本的流向则恰好相反。因此，区际要素流动将会加快地区收入增长收敛的速度。从而，利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我们可以考察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收敛性。鲍默尔把 β 收敛检验的方程式设为：$g_i = \alpha_i + \beta(y_{i0}) + u_i$，式中 g_i 为 i 区域的人均 GDP 平均增长率，y_{i0} 为 i 区域的初期人均 GDP。经过回归分析，β 系数小于零意味着 β 收敛的存在。巴罗和马丁（Barro and Sala-i-martin，1991）发展了鲍默尔的方程式，其基本回归方程式为：

$$\frac{1}{T-t}\log\left(\frac{y_{iT}}{y_{it}}\right) = x_i^* + \frac{1-e^{-\beta(T-t)}}{T-t}\log\left(\frac{\hat{y}_i^*}{\hat{y}_{it}}\right) + u_{it} \tag{7.1}$$

其中，i 代表区域，t 和 T 代表初期与期末时间，$T-t$ 为观察时间长度，y_{it} 和 y_{iT} 分别为期初和期末的人均产出或收入，x_i^* 为稳定状态的人均增长率，$\hat{y}_{it}$ 为每个有效工人的产出，$\hat{y}_i^*$ 为稳定状态下每个有效工人的产出水平，β 为收敛速度，u_{it} 为误差。如果假定 x_i^* 和 $\hat{y}_i^*$ 保持不变，那么，从式（7.1）可以得到：

$$\frac{1}{T-t}\log\left(\frac{y_{iT}}{y_{it}}\right) = B - \frac{1-e^{-\beta(T-t)}}{T-t}\log y_{it} + u_{it} \tag{7.2}$$

其中，B 为常数。由式（7.2）可知，β 值的大小取决于初期的人均产出或收入水平，而与其他参数的变化无关。因此，由式（7.2）测算出来的 β 系数，实际上反映的是一种无条件收敛或绝对收敛（absolute convergence）。阿特金斯和鲍尔德（Atkins

and Boyd，1998)利用更简单的方法检验了 β 收敛的存在：

$$\log y_{iT} = \alpha + \beta \log y_{i0} + u_{it}$$

其中，y_{i0} 为 i 区域的期初人均 GDP；y_{iT} 为 i 区域的期末人均 GDP。若 β 系数小于 1，就证明了 β 收敛的存在。关于式(7.1)和(7.2)的实证分析可参见珀森(Persson，1997)，法伦和兰帕特(Fallon and Lampart，1998)，刘强(2001)，沈承镇(Seung-jin，Sim，2004)等的研究。

但是，区域人均收入的增长不仅取决于初期的人均收入水平，而且受到资源禀赋、产业结构，以及区域间要素流动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巴罗和马丁之类模型中的资本变量还应该包括人力资本等其他变量。为此，将新的变量加入到式(7.2)中。当加入这些新的变量之后，β 系数衡量的实际上是一种条件收敛，即收敛的速度将同时决定于其他参数的差异。马丁(1991)用一个增长理论中的公式来表示。

$$y_{it} = \alpha_i - \beta \log(y_{i0}) + \psi(x_{it}) + u_{it} \tag{7.3}$$

其中，x_{it} 是一组控制变量，使经济 i 处于稳定状态。假定 α_i 是在各地区都不同的截距项，但是，它可以分解为各地区人力资本存量差异和一个在各地区都相同的截距项。从而，地区的经济增长可能与这经济的初始存量和 x_{it} 都有关系。

蔡昉和都阳(2000)利用人力资本存量、投资率、就业、投资效率、市场化程度、开放程度来做控制变量。沈坤荣和马俊(2002)利用人力资本、贸易依存度和工业总产值变量做控制变量。巴罗(1992)，魏后凯(1997)，刘强(2001)利用式(7.4)这一结构变量来衡量条件收敛。

$$s_{it} = \sum_{j=1}^{n} W_{ijt} \log\left(\frac{y_{iT}}{y_{it}}\right) \tag{7.4}$$

其中，W_{ijt} 是期初的第 j 部门在第 i 地区的人均产出的份额，y_{it} 和 y_{iT} 分别是期初和期末来源于第 i 部门的全国人均产出，n 为部门个数。并且，巴罗(1992)和魏后凯(1997)的研究已经证明，加入结构变量 s_{it} 的收敛分析从整体上会改善回归方程的稳定性，导致收敛系数有所下降。

从理论角度来看，虽然无条件收敛和条件收敛是典型的经济增长收敛状态，但是，很多实证研究表明区域经济间并不存在无条件收敛趋势，也不存在条件收敛趋势。不过，一些实证研究发现某些区域集团内部存在收敛趋势，但是，区域集团间

并不存在收敛趋势。加洛尔(Galor，1996)将这种现象归结于微观层面上劳动要素禀赋的异质性。迪尔多夫(Deardorff，2001)以专业化和国际贸易为背景，阐述俱乐部收敛存在的原因。俱乐部收敛的计量检验是以马丁(1996)的模型为基础的，其检验方程为：

$$\gamma_{it} = \alpha_1 - \alpha_2 \log(y_{i0}) + u_{it} \tag{7.5}$$

其中，γ_{it} 为末期第 t 年各区域的人均 GDP 增长率，y_{i0} 为初期各区域的人均 GDP 水平，α_1 为常数项，α_2 为参数。如果 α_2 为正值，就称这 n 区域间呈现俱乐部收敛。沈坤荣和马俊(2002)利用式(7.5)检验中国东西部地区内部的俱乐部收敛。王启仿(2004)也利用式(7.5)检验江苏省的俱乐部收敛，变量包括人力资本、市场化、投资率、工业化、就业、区位等。实际上，俱乐部收敛是最具有现实意义的，β 收敛就停留在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幻想”之内。新古典增长模型所需要的区际或国际要素移动实际上呈现在特定区域或国家之间。一些实证研究表明这种俱乐部收敛可能在欧盟(Ben-David，1993)、OECD(Dowrick and Nguyen，1989)或开放经济(Sachs and Warner，1995)等区域内出现。

巴罗之类的 β 收敛检验主要利用横截面数据。其模型假设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Seung-jin，Sim，2004)。$Y_t = K_t^{\alpha}(A_t L_t)^{1-\alpha}$，$0<\alpha<1$，式中，$Y_t$ 为产出，K_t 为资本投入，L_t 为劳动投入，A_t 为技术系数，劳动和技术假设为按固定比率 n 和 g 增长，资本增长率取决于投资(I_t)，投资是储蓄的函数，$S_t = sY_t$，折旧率为 δ。资本的增长率为 $\mathrm{d}K/\mathrm{d}t = \dot{K} = I_t - \delta K_t = sY_t - \delta K_t$，从而，$Y_t/A_tL_t = \tilde{y}_t = f(\tilde{k}_t) = \tilde{k}_t^{\alpha}$，其时间变化为 $\partial\tilde{k}/\partial t = s\tilde{k}_t^{\alpha} - (n+\delta+g)\tilde{k}_t$，在稳定均衡状态下，资本增长率($k^*$)是稳定的，即 $\partial\tilde{k}/\partial t = 0$，因此，$k^* = (s/n+\delta+g)^{1/1-\alpha}$。$t$ 时期稳定均衡状态下的人均产出量为 $Y_t/L_t = A_t\tilde{y}_t = A_t f(\tilde{k}_t)$，加以代数转换，则 $\ln y_t^* = \ln A_t + \alpha\ln\tilde{k}_t$，再简单地描述为 $\ln y_t^* = \ln y_0 + g$。从而，我们能够得出收敛速度(β)，$\ln y_t = (1-\beta)\ln y_{t-1} + \beta g t + \beta \ln y_t^*$，其中，$\beta = (1-\alpha)/(n+\delta+g)$，就是人均产出量向稳定均衡状态的接近速度。一般的巴罗之类的 β 收敛检验模型假定 n、g、δ 是固定的，即各国家间或各区域间是一样的。从而得出，$\ln y_{i,t} = (1-\beta)\ln y_{i,t-1} + \beta\ln(y_{i,0}^* + gt) + \varepsilon_{i,t}$，其中，$i$ 为国家或区域，$\varepsilon_{i,t}$ 为冲击。再整理上式并得出式(7.6)，其中，$\alpha' = \beta\ln y_t^*$，$\lambda = (1-\beta)$。

$$\ln y_{i,t} = \alpha' + \lambda \ln y_{i,t-1} + \varepsilon_{i,t} \tag{7.6}$$

一般的β收敛检验模型类似式(7.6),但是,式(7.6)具有严重的非现实性假设。以式(7.6)为基础的横截面分析在因变量具有内生性(endogeneity)的时候具有严重的偏倚问题,并且,式(7.6)不能够表明各区域的异质性(heterogeneity),假设初期收入水平独立于区域特性并具有强的外生性,并假设各区域的收敛速度是一样的。式(7.6)还假设各区域的劳动和技术是同比增长的,这个假设也不太现实。除此之外,条件β收敛模型较多利用人力资本,很多实证研究表明人口资本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意义,并且,加上人力资本的 Barro 检验模型也能够得出条件收敛的结果,但是,人力资本的估计还是个问题,尤其是各区域的人力资本储量很难估计。

虽然β收敛是一种典型的收敛检验方法,但是β收敛是区域收敛的必要条件,并不是充分条件(Fallon and Lampart, 1998)。并且,β收敛不能表明收敛或不平衡的动态过程(Tsionas, 2002)。较简单的巴罗检验模型都利用横截面数据,从而,β收敛只能分析一定期间的收敛情况,不能分析该期间内的不平衡的变化。

2. σ收敛测量方法

σ收敛是指不同经济系统间人均收入的离差随时间的推移而趋于下降(王启仿,2004)。从结构角度来看,区域经济增长的收敛与扩散是不平衡的问题,从而,区域经济增长的不平衡测量指标要满足一些条件。

戴尔顿(Dalton, 1920)曾经总结了测度指标四条原理,包括转移原理、测算变量的比例加上原理、同额加算原理和测算单位的比例加上原理。转移原理是指从发达区域向欠发达区域的收入转移使得不平衡测度指标的下降。转移原理是由戴尔顿所提出来的,并由庇古(A. C. Pigou)加以解释,从而被称为庇古—戴尔顿(Pigou-Dalton)转移原理。测算变量的比例加上原理是指若各区域所得加上同比的所得,不平衡测度指标没有影响。除了上述四条原理以外,考埃尔(Cowell, 1995)提出σ收敛指标的可分解性条件。

下面是常见的几个σ收敛指标。

(1) 相对平均偏差与变异系数。

相对平均偏差(relative mean deviation)是较常用的σ收敛指标。但是,相对平均偏差无法反映收入转移效应,尤其是收入转移发生在平均的左右一方面,其转移效应是等同的。相对平均偏差无法表明发达区域和欠发达区域之间的任何转移效应。变动系数(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CV)解决平均收入规模的影响。虽然变

动系数解决了相对标准偏差的缺陷，但是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就是收入转移效应的中立性。变动系数认为，收入水平为 100 元的区域把 10 元转移给收入水平为 90 元的区域等同于收入水平为 100 100 元的区域把 100 元转移给收入水平为 100 000 元的区域，这就是收入转移效应的中立性。不过通过收入的代数转换能够解决其问题，即式(7.6)。代数转换变异系数表明，收入水平较低的转移效应比高收入水平的更大。代数转换变异系数为：

$$\sigma_t^2 = \frac{1}{n}\sum_{i=1}^{n}\left(\log y_{it} - \frac{1}{n}\sum_{i=1}^{n}\log y_{it}\right)^2 \tag{7.7}$$

其中，n 为区域，y_{it} 为 i 区域 t 时期的人均收入。因为其计算过程较简单，所以相对平均偏差和变异系数被广泛使用。但是，变异系数无法表明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不平衡测度的变化是取决于发达区域间的收入转移，还是取决于欠发达区域间的收入转移。

(2) 赫平达尔—赫尔曼(Herfindhal-Hirshman)系数与平均代数偏差系数。

除了转移原理和可分解性以外，不平衡系数还有两个特征，就是系数的函数特征与同次性。赫平达尔—赫尔曼系数(HHI)是总量份额的凸函数，泰勒(Theil)系数(TEC)是凹函数。凸函数是指该系数受到大份额间变化的影响较大，凹函数是指受到小份额间变化的影响较大。式(7.7)和式(7.8)中，f_i 为 i 区域的规模，F 为总规模，s_i 为 i 区域的份额。

$$\mathrm{HHI} = \sum_{i=1}^{n} s_i^2,\ s_i = \frac{f_i}{F},\ F = \sum_{i=1}^{n} f_i \tag{7.8}$$

$$\mathrm{TEC} = \sum_{i=1}^{n} s_i \log(s_i) \tag{7.9}$$

HHI 和 TEC 的比较具有重要的含义。若 TEC 相对稳定变化的同时，HHI 呈上升趋势，则表明其变化主要取决于大份额间的变化。若 HHI 相对稳定变化的同时，TEC 呈上升趋势，则表明其变化主要取决于小份额间的变化(Low et al.，1998)。对于区域经济不平衡的研究，虽然 HHI 和 TEC 的比较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也有严重的局限，就是衡量对象的数量问题，HHI 和 TEC 对衡量对象的数量变化非常敏感。利用平均代数偏差(mean logarithm deviation，MLD)系数可以缓解其问题，它不受衡量对象数量变化的影响。不管分析对象数量多少，要是完全平衡

分配，那么平均代数偏差系数等于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HHI、TEC 和 MLD 都具有零次同次的性质。这些系数不受分配规模变化的影响，即如果所有的区域都增加 10%的人均 GDP，那么，其系数没有变化。

$$\mathrm{MLD} = \log\Big(\frac{1}{n}\sum_i f_i\Big) - \frac{1}{n}\sum_i \log(f_i) \tag{7.10}$$

（3）一般熵系数。

对于区域经济增长不平衡的测量指标，考埃尔（Cowell，1995）提出四种严格的条件，包括庇古—戴尔顿转移原理、收入规模独立原理、人口原理和可分解性原理（Sala-i-Martin，2002）。考埃尔（Cowell，1995）等人表明，只有一般熵系数（generalized entropy indexes，GEI）才能都满足上述四种条件。

$$\begin{aligned}\mathrm{GEI}(\theta)_t &= \frac{1}{\theta^2-\theta}\Big[\frac{1}{N_t}\sum_{i=1}^{m}\sum_{j=1}^{N_a}\Big(\frac{y_{ijt}}{\bar{y}_t}\Big)^{\theta}-1\Big] \\ &= \frac{1}{\theta^2-\theta}\Big[\frac{1}{N_t}\sum_{i=1}^{m}\sum_{k=1}^{n}\Big(\frac{ns_{ikt}y_{it}}{\bar{y}_t}\Big)^{\theta}-1\Big]\end{aligned} \tag{7.11}$$

上述的测量指标都把一个区域作为一个测量单位，而不考虑区域内部的不平衡。一般熵系数正好考虑该问题。式（7.11）中的 s_{ikt} 为 t 时期 i 区域 k 阶层的份额，θ 为参数，N_{it} 为 t 时期 i 区域的人口规模，y_{it} 为 t 时期 i 区域的人均 GDP，y_{ijt} 为 t 时期 i 区域 j 人的人均 GDP，N_t 为全国人口规模，$\bar{y}_t$ 为：

$$\bar{y}_t = \frac{1}{N_t}\sum_{i=1}^{m}\sum_{j=1}^{N_a} y_{ijt} = \sum_{i=1}^{m}\frac{N_{it}}{N_t}y_{it} \tag{7.12}$$

GEI 的一个特殊形式就是 θ 接近于零，利用洛必达（L'Hôpital）法则，可以得到 MLD 形式。第二个特殊形式就是 θ 接近于 1，利用洛必达法则，可以得到 TEC 形式。第三个特殊形式就是 $\theta = 2$，利用洛必达法则，可以得到变异系数的形式。一般熵系数实际上包括 MLD、TEC 和 CV，它是一个综合性的测量指标。一般熵系数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分解性，即区域间不平衡和区域内不平衡的分解。

σ 收敛指标的优点就是它能够表明区域增长不平衡的动态过程。但是，σ 收敛指标也具有一些分析上的局限。第一个局限是区域范围问题。该问题不仅仅是 σ 收敛指标的单独问题，β 收敛检验也具有类似问题，即如何划分发达区域和欠发达区域。不同的区域划分或区域数量会导致不同的结果。第二个局限是测量变量问

题。哪种变量才能够表明区域经济增长。β 收敛检验模型利用资本和劳动等基本变量。σ 收敛指标一般多利用各区域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或人均收入口径。虽然这些变量能够表明各区域的生产和消费的发展水平，但是测量变量还是个难题。第三个局限是选择指标问题。这里没有介绍基尼系数，它也是较常用的 σ 收敛指标之一。大部分的实证分析选择一种 σ 收敛指标，并进行研究。即使每项研究在分析之前说明指标和数据的情况，但是其指标和数据的可靠性或科学性还是个问题。第四个局限就是 σ 收敛指标假设分析期间内的经济环境的变化与指标演变是独立的。σ 收敛指标只能测量各区域经济增长或发展替代变量之间的不平衡程度，并不能表明其不平衡的背景或环境的影响。

3. 概率收敛检验

β 收敛检验与 σ 收敛检验是横截面分析的主要方法。但是，伯纳德和德劳夫(Bernard and Durlauf，1995)的研究表明，横截面收敛检验具有不理想的规模性质，并且，内生增长模型和多重均衡模型经常拒绝非收敛假说。德朗(De Long，1988)与瞿阿赫(Quah，1993)等人的研究表明横截面收敛检验的结果有偏倚，尤其在国家间的收敛检验。

(1) 概率收敛检验。

概率收敛(stochastic convergence)是第三种收敛检验方法。概率收敛认为，区域间人均收入的差异是短期性的，并且，其差异具有决定性和概率性的趋势。要是区域间人均收入的差异具有长期稳定的性质，能够检验概率收敛的存在(Lim and McAleer，2003)。弗斯佩奇(Verspagen，1994)指出概率收敛的简单方法，$w_{it}=\ln y_{it}-\ln y_t^*$，其中，$y_{it}$ 为 i 区域 t 时期的实际人均 GDP，y_t^* 为 n 区域的平均人均 GDP，即 $y_t^*=(\sum y_{it})/n$。弗斯佩奇假定：$w_{it+1}=\psi w_{it}$；若 $\psi>1$，则不存在收敛；若 $\psi<1$，则存在收敛。一般而言，单位根检验可以分析时间序列的稳定性，奥克斯利和格里斯利(Oxley and Greasley，1995)利用 Dickey-Fuller (DF)检验方法。

$$y_{p,t}-y_{q,t}=\mu+\alpha t+\beta(y_{p,t-1}-y_{q,t-1})+\sum_{j=1}^{n}\delta_j\Delta(y_{p,t-j}-y_{q,t-j})+\varepsilon_t \tag{7.13}$$

Dickey-Fuller 检验的解释如下：若 $y_{p,t}-y_{q,t}$ 具有单位根($\beta=1$)，p 区域和 q

区域的人均 GDP 差异随时间而扩大；若 $y_{p,t}-y_{q,t}$ 是稳定的（$\beta<1$），$\alpha=0$ 表明 p 区域和 q 区域间的长期收敛，$\alpha\neq 0$ 表明 p 区域和 q 区域间的追赶（catching-up），就是产出量差异的缩小。Dickey-Fuller 检验方法分析 $y_{p,t}-y_{q,t}$ 的趋势是不是稳定的。伯纳德和德劳夫（Bernard and Durlauf，1995）指出更严格的概率检验方法。如果 p 区域和 q 区域的人均 GDP 差异要收敛，其产出量应该有协整（cointegration）关系，这意味着 p 区域和 q 区域的产出量差异的稳定趋势。要是不存在收敛，一定存在长期冲击。他们利用 Augmented Dickey-Fuller（ADF）检验方法。DF 和 ADF 检验方法的前提条件是时间序列的长期稳定性，如果出现什么意外冲击，它一定是短期性的，这就是收敛的长期过程。但是，这个过程中会出现结构分裂（structural break），DF 和 ADF 检验方法不能分析该问题，从而，奥宾（St. Aubyn，1999）提出 Kalman Filter 方法。

$$\begin{aligned} y_{p,t}-y_{q,t}&=\gamma_t+\varepsilon_t,\ \varepsilon_t\sim N(0,\ \sigma^2)\\ \gamma_t&=\gamma_{t-1}+\mu_t,\ \mu_t\sim N(0,\ \Omega_t)\\ \Omega_t&=\phi^2\Omega_{t-1}\\ \Omega_0&=\psi^2 \end{aligned} \tag{7.14}$$

奥宾（St. Aubyn，1999）认为，若 $|\phi|<1$，分散 μ_t 长期则接近于零，换句话说，两个区域产出量的时间序列存在收敛趋势，两个区域产出量的差异成为 $I(0)$。从而，Kalman Filter 收敛检验假说为 $H_0:\phi=1$，$H_a:\phi<1$，检验统计量为 $T(\phi_{ML})=(\phi_{ML}-1)/\sqrt{(h^{-1})_{22}}$。

（2）Panel 单位根检验。

瞿阿赫（Quah，1994）与莱文和林（Levin and Lin，1992）等人在各区域具有一样的自我相关（auto-regressive，AR）系数的假定下进行研究 panel 单位根检验方法。但是，他们的分析模型具有严重的缺陷，就是不能考虑异质性（heterogeneity），即各区域的特殊性或误差项的不同的自我相关等。尤其是替换假设包括一样的 AR 系数就是一个严重的分析局限。假设同样的 AR 系数的替换假设，就意味着各区域向稳定均衡状态的收敛速度一样，但是，这种假设很难接受。伊姆、佩塞朗和希恩（Im，Pesaran and Shin，1997）研究考虑各区域的异质性的单位根检验方法，就是不同 AR 系数的替换假设。他们所利用的 panel 单位根检验方程式为：

$$\Delta(y_{i,t}-\bar{y}_t)=\alpha_i+\beta_i(y_{i,t-1}-\bar{y}_{t-1})+\sum_{j=1}^{p}\varphi_{i,j}\Delta(y_{i,t-j}-\bar{y}_{t-j})+u_{i,t} \tag{7.15}$$

其中，y 为人均收入或产出，$\bar{y}_t=1/N(\sum y_{i,t})$。埃文思(Evans，1998)也认为式(7.15)能够解决巴罗模型的横截面分析的一些问题。虚无假设为 $H_0:\beta_i=0$，对于所有的 i。替换假设为 $H_1:\beta_i<0$，对于至少一个 i。拒绝虚无假设就意味着区域收敛的存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得出外生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但是，其结论与现实经济间还是存在较大的隔阂。罗默(Romer，1986)将规模经济引入到增长模型。但是，卢卡斯(Lucas，1988)在保持规模经济不变的假定下将人力资本引入到生产函数中，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人力资本的规模报酬不收敛于零，可以继续储蓄下去，并保证持续经济增长。因此，新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human-capital-augmented neoclassical growth)包括人力资本变量。俞和帕克(Yu and Park，2004)利用其模型检验韩国的区域收入收敛。模型形式包括动态固定效应模型(dynamic fixed-effect model)、平均集团模型(mean group model)和结合平均集团模型(pooled mean group model)。

7.2 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的内在动因

造成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的原因很多，例如国家区域经济发展政策的倾斜等。但是，我们更加关注于区域自身或者内在的一些原因，这对于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具有更加深刻的意义。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从时间维度来看恰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结果和表现形式。揭示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内在动因就要从不同区域自身的发展中寻找。在第 6 章，我们是通过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动力机制与区域经济发展循环规律来认识区域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循着上述思路来分析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发展的内在动因。

从一定意义上讲，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发展的内在动因可以从两个角度理解，一个是区域经济发展循环阶段的差异，一个是要素聚集的差异。

7.2.1 区域经济发展循环的阶段差异

为了分析简便但却不失一般性，这里假设所研究的区域都处于初级循环阶段。需要说明的是，任何经济区域都是在一定的地理空间基础上，经由区位选择—聚集经济—经济功能区—经济区域这一路径形成的。由于经济空间发展具有时序性和

演化性特征，不可能所有的区域都从同一时刻在经济主体的区位选择下开始自己的演化路径，有的区域可能在同一时期开始其循环演化历程，而更多的是不同区域的演化起点沿着时间序列依次展开。

在图 7.1 中，存在三个不同的区域，其中，区域 1 刚开始自己的演化路径，处于从地理空间向经济空间的转型期，区域 2 则处于成长期，经济无论从质上还是量上都快速变化着，区域 3 本应该经过产业结构调整，从初级循环跃迁至高级循环，但是由于诸多原因，该区域未能顺利实现结构升级，仍然处于初级循环，区域经济于是处于衰退阶段。通过图 7.1，可以看出，不同区域由于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三个区域就呈现出明显的不平衡性，这种差异源于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的时序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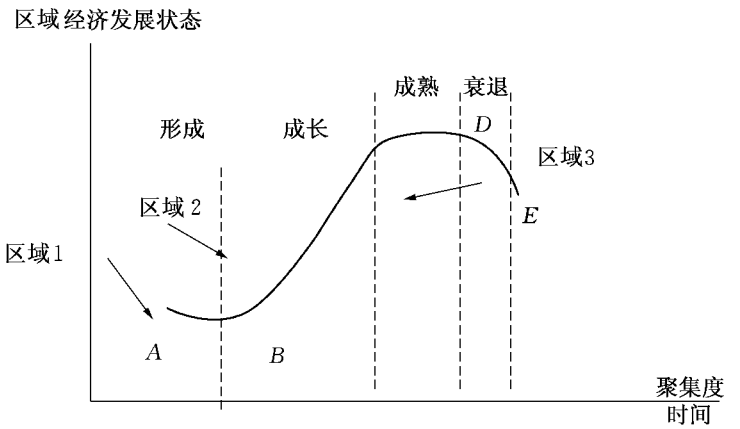


图 7.1　区域经济发展阶段不同而产生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

7.2.2　要素聚集的差异

区域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聚集经济，而聚集经济的承载物质则是各种要素。所以，研究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内在动因还需要回到要素这一关键环节上来。

1. 初始要素禀赋与累积要素禀赋影响

由于区域经济发展存在初级循环和高级循环两个过程，如果这两个循环过程的起点和变化过程不同，则必然带来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初级循环主要取决于区域初始要素禀赋，在要素不断聚集的过程中，当要素累积到一定程度，主导要素也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原有的区域产业结构不符合要素禀赋状况时，就会出现产业结构升级，主导产业发生变化，进入区域经济高级循环，从而进入更快速度的发展。

因此由于空间是非均质的，初始要素禀赋与累积要素禀赋的影响也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内在动因。

表 7.1 反映了我国自然资源禀赋的区域差异状况，可以看出这种自然资源禀赋的差异与区域的产业选择有十分重要的关系，如西部大部分省市由于自然资源条件较好，其采掘业、原材料加工业所占比重就比较大，而东部则不适合发展这些产业。又如我国北方主要生产小麦，南方生产水稻，东部是耕作业，西部是畜牧业。这种格局的形成具有浓厚的自然“色彩”。

表 7.1　我国自然资源禀赋条件的区域差异

资源种类	主要评价指标	评价结果		
		条件最好	比较好	一般或较差
矿产资源	45 种主要矿产潜在价值；关键矿产资源在全国的重要性及其资源组合类型	晋、内蒙古	川、辽、新、青、宁	其他省区
其中：能源资源		藏（水能为主）、宁、内蒙古、晋、新	陕、滇、青、贵	其他省区
农业自然资源	气候资源；人均耕地资源	黑、内蒙古、新、桂、粤	吉、闽、赣、浙	其他省区
水资源	人均水资源量	琼、粤、闽、桂、滇、黔	湘、鄂、川、赣、浙	京、津、冀、晋、豫、辽、苏、鲁、宁
海洋资源	人均浅海、滩涂、海湾可养殖面积；海洋油气田前景	辽、粤	鲁、闽	冀、苏、浙、桂
综合评价	对以上四种资源分别赋予权重 0.6，0.2，0.1，0.1	晋、内蒙古	川、滇、新、宁、青、辽、黑、粤、闽	豫、鄂、苏、吉、湘

资料来源：陆大道等：《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35 页。

另外，从累积的劳动力要素看，东部人力资源较为丰富，而中西部相对较少，这也是影响东中西发展差距的重要动因。表 7.2 反映出了 1996—1999 年期间分地区从业人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1999 年，东部地区劳动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8.1 年，中部是 7.7 年，西部是 6.9 年，东西相差 1.2 年；而且在 1996—1999 年间两

地区差距扩大了。

表 7.2　东中西部地区从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1996	1997	1998	1999
东　　部	7.64	7.89	7.92	8.10
中　　部	7.49	7.73	7.70	7.72
西　　部	6.64	6.77	6.81	6.90
西部与东部之差	1.00	1.12	1.11	1.20

注:受教育年限是根据各不同学历的从业人员的人数加权平均推算的。三个地区的平均数分别是根据各省区平均数加权计算的。

资料来源:王小鲁、樊纲:《中国地区差距的变动趋势和影响因素》,《经济研究》2004 年第 1 期,第 40 页。

通过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计算各省份专业技术人员的区位商,在东部 12 个省份中,区位商大于 1 的有 9 个,占 95%;中部 9 个省份中有 3 个省份的区位商大于 1,占 33%;西部 9 个省份区位商大于 1 的有 5 个,占 56%。但由于东部地区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 41.2%,超过总人口的 1/3。可见,东部地区的专业技术人员在相对数量和绝对数量上都占有较大优势。①

一些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分析了人力资本差距与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问题。蔡昉、都阳用人口识字率表示初始人力资本存量,得出结论:人力资本的初始禀赋非常显著地与区域经济增长率正相关,是促进增长速度的重要因素。陈钊、陆铭、金煜根据现有数据估测出一套 1987—2001 年完整的人力资本和教育发展的省级数据。其中构建了两个指标:一是各省级单位的人均受教育水平,二是受高等教育、高中、初中和小学教育的人口比重。分析结果认为,教育指标仍然是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一个因素。

制度已成为许多地区发展的主导要素,制度作为要素的累积表现为制度的完善。我国正处于经济改革时期,最主要的推动力就是中国经济从计划体制转向市场体制的改革。但是市场化的进程在各地差别仍然很大。根据国民经济研究所市场化指数课题使用 25 项客观指标进行度量的结果,东部沿海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远远超过中部和西部地区(樊纲、王小鲁、朱恒鹏,2003)。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2000

① 引自李一鸣、罗永明:《宏观经济调控研究》,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67—168 页。

年的市场化指数(记分区间 0—10 分),按东中西部 3 个地区分组平均,分别为 7.16、5.47、4.71。这反映出绝大部分东部省份不仅经济发展程度比较高,而且在市场化进程中也走在中西部前面。中西部省份市场化程度与东部差距较大的方面主要是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和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但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产品市场发育、市场中介组织和法律制度环境等方面也都存在明显差距(见表 7.3)。

表 7.3 各地区市场化指数的平均得分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非国有经济的发展	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	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	市场中介组织和法律制度环境
平均	6.05	5.34	7.44	3.60	5.26
东部	7.52	7.73	8.80	5.64	6.44
中部	5.77	4.41	7.25	2.75	4.94
西部	4.78	3.63	6.21	2.19	4.31
东西差距	2.74	4.10	2.59	3.45	2.13

资料来源:樊纲等:《中国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报告》,《经济研究》2003 年第 3 期。

2. 要素聚集能力和约束差异

主导要素和要素禀赋是区域分工的主要决定因素,而分工又会促进要素的聚集和扩散,引起要素的累积和主导要素的更替,从而推动着区域经济的不断发展,可以说聚集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因此区域性要素聚集能力差异也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内在动因。

区域性要素聚集能力的不同会使得不同区域处于产业分工的不同环节,发挥的规模效应、外部效应等存在差异,区域性要素聚集能力越强,则要素流入越多,且越容易吸引更高层次的要素,而且内部分工更细,合作更密切,空间成本更小,市场效率更高,经济活动主体更易获得正外部效应,社会规模效应更明显,新的企业和新的产业越容易聚集,从而越容易加速区域经济的初级循环,促进主导要素的发展和更替,带动区域经济高级循环。而趋于要素聚集能力越弱,则要素流入量小,或者流向要素聚集能力强的区域,也越不易吸引高层次的要素,内部不能形成良好的分工合作,规模效应小,难以出现新的企业和新的产业,区域经济的初级循环速度慢,很难带动主导要素的更替,难以进入高级循环,整体经济发展速度放缓。因此,区域性要素聚集能力的差异直接导致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带来区域之间发展差异。例如,我国东部许多沿海地区区域性要素聚集能力很强,引发的大规模劳动

力流向珠三角、长三角，外商投资也十分青睐选择这些区域，使得这些区域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排头兵，与中西部区域的经济发展差距很难缩小，甚至有扩大的趋势，1980 年东部地区人均 GDP 分别相当于中、西部地区的 1.53 倍和 1.8 倍，1990 年则扩大到 1.62 倍和 1.90 倍，2002 年则进一步扩大到 2.08 倍和 2.63 倍。

长期以来，众多学者一直十分关注区域差距收敛的问题，在现实中我们既发现有些落后区域能赶上发展良好的区域，但有些落后区域却很难追赶上，甚至有差距越来越大的倾向。由于要素聚集推动着区域的发展，因此要素聚集约束也就成为了影响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发展的重要因素。如果有些地方初始要素禀赋不好，但如果要素聚集渠道畅通，则能够通过要素的不断聚集改变要素条件，达到甚至超过其他区域，那么这些地方与其他区域的差距会缩小。但如果有些地方要素聚集受到很大的约束，或者说要素聚集的成本非常大，那么这些地方就很难追赶上其他区域。

这种要素聚集约束现象是比较普遍的，不过不同要素聚集约束状况也并不完全一样。一般而言，自然要素聚集约束是最有刚性的，因为一个地区的自然资源和自然条件在短时间内是难以改变，特别是自然资源是很难增加的，如矿藏、森林、水资源等，自然条件也是很难改善的，如空气净化、气温的调节、恶劣地质地貌的改善。

制度的改变也是很有刚性的。一方面受到当地风俗习惯、文化背景的影响，例如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战略以来，西部地区由于受计划经济的影响根深蒂固，相对于东部缺乏开发、创新、竞争、效率以及自主、人才、利益的市场经济观念。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思想束缚着人们的头脑，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阻碍着经济进步。从主观上看，观念陈旧，思想保守，尤其是在一些贫困落后地区，“等、靠、要”的思想较为严重，束缚了改革开放的进程，丧失了不少好的机遇。在这种落后观念的支配下，投资环境得不到改善，不能发挥西部劳动力、土地和资源的比较优势，从而造成对区外流入要素的侵蚀、漏损和排斥，极大地影响了资本、技术和人才等要素的投入使用效率。而东部地区则抓住改革开放的机会，在 20 多年来的“自主改革”、“用足政策”、及“照猫画虎”的做法，体现出一种改革创新的精神，正是这种现代化的思维和意识大大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制度的改变也常常受到一些利益相关者的抵制。因为制度的改变必然会带来生活的变化，会影响一些经济个体的收益，特别是经济制度的改革常常会受到既得利益获得者的反对。例如我国的政府体制

越深刻，充分认识到了要素投入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巨大作用，认为通过要素的不断投入促进区域性要素的累积，可以改变区域内要素赋存，不断弥补区域间的要素累积差距，以此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不断缩小区域经济的差距，在长期内实现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不可否认，该理论在一定时期和一定区域确实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理论在解决现实的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问题上也面临着窘境。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理论从理论和实证上都充分认识到、并证明了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必然性，也提出了一些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政策对策。但如何解决现实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实现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缩小，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理论则难以提出根本性的有效对策。世界性的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不断加大是不争的事实。而中国，在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理论的指导下，实行了 20 多年的区域差异发展模式，综合经济实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但是区域经济之间发展的差距并没有缩小，反而产生了马太效应，发达区域与落后区域的差距越来越大。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反思从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到区域经济平衡发展路径的可行性。

7.3.2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理论的反思

世界不可能完全是平衡的。各区域的要素禀赋条件本身是不平衡的，从而，它们的发展成果也必然不平衡。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结构是动态过程，也是周期变化过程。随着发展的要素条件的变化，发展的最终成果也会变化，不平衡发展是必然的，也是客观的。

目前，国内外学者研究所关注的要素投入无论是劳动、资本还是制度都只是一种累积的可变要素，而古典经济学家们高度关注的自然要素等不可变要素却往往被忽视。事实表明，所有区域经济发展都是基于一定的自然要素等各种不可变要素而展开的，这种自然要素恰恰是所有累积性要素所面临的一种约束。由此可见，不能仅仅沿袭现有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研究路径。我们需要回到古典经济学那里，重视被很多新古典经济学家们所忽视的自然要素，在自然要素和后天累积性要素的统一中研究区域经济发展差异问题。区域之间因为要素及要素禀赋的差异，必然导致区域经济发展的起点不平衡；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在核心动力——聚集机制在空间上的差异性，直接导致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不平衡；制约聚集机制发挥效果的外部环境、政策的差异导致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不平衡。当从这个视角来研究区域问题时，不同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就不仅仅是平衡与否的问题，

而是区域经济发展协调的问题。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就是不同区域基于自身要素禀赋的特点，确定不同要素约束条件下的开发模式，形成合理的分工，同时在政府的调控下保持区域之间的发展条件、人民生活水平的差距在合理的范围内，人与自然之间保持和谐状态情况下的发展状态。

7.4 要素适宜度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7.4.1 要素适宜度的概念与测度

1. 要素适宜度的概念

经济发展的过程要利用各种要素，包括区域性要素和非区域性要素。区域性要素差异是造成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以往区域经济学较重视研究非区域性要素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及其不平衡发展的影响。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以及市场经济的发展，非区域性要素在空间上的流动性加速，对于一定区域的经济发展的根本制约性在下降，而导致空间非均质性的最基础要素——区域性要素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制约性作用在相对提升。区域经济的发展既需要区域性要素，也需要非区域性要素，但是区域性要素是发展的基础和发展的条件。非区域性要素的聚集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区域性要素状况的制约。因此，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考虑非区域性要素与区域性要素之间的匹配。例如，在自然生态环境脆弱的地区，其区域性条件（有时表现为自然承载力）相对较差，就不能人为地提升这个地区的非区域性要素的投入。特定条件下，非区域性要素投入的人为增加往往不能带来经济效益的提高，甚至会造成区域性要素的恶化。非区域性要素投入与区域性要素之间的匹配程度，我们称之为要素适宜度（factor appropriateness degree）。

2. 要素适宜度的测度

要素适宜度探讨的是要素之间的协调问题，主要指非区域性要素投入和以自然环境等为核心的区域性要素之间的适宜和协调。要素适宜度的最基本含义就是非区域性要素的利用要服从于当地的自然环境条件。我们利用式(7.16)来表示这种要素适宜度。

$$\mathrm{FAD}_i = \frac{1}{\left[\dfrac{\sum_{j=1}^{n} w_j \mathrm{FUD}_{ij}}{\sum_{j=1}^{n} w_j \mathrm{FC}_{ij}}\right]} \qquad (7.16)$$

$$j = 1, \cdots, n$$

其中，FAD 为要素适宜度，FUD 为非区域性要素利用度，FC 为区域性要素所表示的要素条件，I 代表区域，j 代表各种要素，w 为权重。要素适宜度的关键是如何衡量非区域性要素的利用和区域性要素条件之间的关系。考虑利用工业化程度来表示非区域性要素利用度[①]。工业化程度利用工业部门在整个区域经济中的比重，来衡量工业生产总值在区域生产总值中的比重。

$$\mathrm{FUD}_i = \left(\frac{\mathrm{SIGDP}_i}{\mathrm{GDP}_j}\right) \times 100\% \tag{7.17}$$

其中，i 为区域，SIGDP 为区域的工业生产总值，GDP 为区域的生产总值。要是区域没有工业部门，其比重应该为 0，要是区域只有工业部门没有其他部门，其比重为 100。为了指标的构建要标准化，其区间为从 0 到 1，那么 $0 \leqslant \mathrm{FUD} \leqslant 1$。

区域性要素条件(FC)是该区域的承载力。一般而言，区域承载力是指不同尺度区域在一定时期内，在确保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和生态环境良性循环的条件下，资源环境能够承载的人口数量及相应的经济社会总量的能力。区域承载力包括资源承载力和环境承载力，资源承载力还包括土地承载力等。目前区域承载力的衡量方法有几种，这里可以直接利用这些方法，但是为了要素适宜度的测量要标准化，其范围为 $0 \leqslant \mathrm{FC} \leqslant 1$。

资源与需求的差量方法是较典型的衡量方法。王中根、夏军(1999)认为区域生态承载力体现了一定时期和一定区域的生态环境系统，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和人类各种需求(生存需求、发展需求和享乐需求)在量(各种资源量)与质(生态环境质量)方面的满足程度。[②]因此，衡量区域生态环境承载力应从该地区现有的各种资源量(P_i)与当前发展模式下社会经济对各种资源的需求量(Q_i)之间的差量关系(如 $(P_i - Q_i)/Q_i$)，以及该地区现有的生态环境质量与当前人们所需求的生态环境质量之间的差量关系入手。可持续环境承载力模型是操作性较强的衡量方法。以 PP 表示现实的人口数量，RE 表示自然经济人口容量，那么，人口资源承载力 r

① 要素利用度的要素包括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全部要素。工业化所利用的要素并不等于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全部要素。但是，从区域承载力的角度来看，工业化和环境承载力具有较密切的关系。不过，如何衡量要素利用度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② 王中根、夏军：《区域生态环境承载力的量化方法研究》，《长江职工大学学报》1999 年第 4 期，第 9—10 页。

$= PP/RE$[①]。

式(7.16)表明，$0 \leqslant \mathrm{FAD} \leqslant 1$，FAD值越大，该区域的要素适宜度越高，反之亦然。区域性要素条件为0.1，非区域性要素利用度为0.1，区域的要素适宜度为1。区域性要素条件为0.1，非区域性要素利用度为1，区域的要素适宜度为0.1。

7.4.2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从各种要素在空间上非均质分布的角度来看，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是必然的结果，也是常态的过程。片面地追求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的平衡，可能会导致整个社会总的福利损失和生态环境的破坏。因此，区域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不应只强调缩小区域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而应追求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三个不同层次的含义。第一层次是要素的协调，主要评价区域性要素和非区域性要素之间的适宜程度和协调程度，即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要素适宜度问题。第二层次是发展的协调，主要评价一个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另一个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协调，即我们平时所说的区域之间的平衡与不平衡发展问题。第三层次是社会收入水平的区域协调，主要评价一个区域与另一个区域之间的收入差距，解决社会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带来的社会福利的均等化问题。

区域协调发展要充分发挥不同区域各自的要素优势，充分挖掘要素禀赋的利用潜力，只有各区域的比较优势充分发挥了，才能实现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因此，需要避免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盲目攀比和产业雷同，以及重复建设现象，根据自身的要素禀赋特点，同时朝着促进要素聚集、主导要素更替的方向选择区域的发展路径。例如，区域经济发展必须考虑自然要素禀赋特点，考虑自然环境承载能力，这样才能促进人与自然处于协调、和谐的状态。

7.4.3 要素适宜度与区域协调发展

要素适宜度是衡量区域要素条件和区域经济发展间的联系程度的一种概念和指标，它对于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现阶段的区域经济理论尤其是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对现实经济发展的指导作用很模糊。特别是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理论尚未解释清楚协调的基准是什么。要素适宜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强化人们对于区域要素禀赋和区域经济发展路径之间的关系的认识。同时，要素适宜度还能

① 洪阳、叶文虎：《可持续环境承载力的度量及其应用》，《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1998年第3期，第54—57页。

提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协调的评价基准。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本书中所讲的要素适宜度是用来说明一个区域的问题，它测度的是一个区域的非区域性要素与区域性要素之间的匹配问题，而不是要解决两个区域间的协调问题。区域间的协调问题是一种社会政治层面的区域之间的公平性问题，更多地应该通过相应的财政转移来解决，实现区域间社会福利的均等化。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国家或中央政府可以扶持一个区域的发展，但为此不能抑制其他区域的发展。发达区域要不断地向前发展，与此同时，欠发达区域也要向前发展。关键是区域经济的发展是不是充分利用了自己的要素条件。

7.4.4 要素适宜度与主体功能区

要素适宜度要解决的是某一个区域应该发展什么，不应该发展什么的问题。不同的区域具备不同的区域性要素与非区域性要素条件。不同发展阶段的区域也具备不同的要素条件。从而，各区域经济发展必须要考虑自己的要素条件，也要考虑区域的承载力。要素本身的发展也一定要与基础条件吻合。要素适宜度就说明各区域的主要功能应该来自它的要素条件。有一些要素，如自然资源和自然条件是不能累积的，因此相应的产业就不是在所有地区都能完全复制。比如一些自然要素十分恶劣的西部地区就不能完全模仿东部地区的发展模式。因此，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必须正视这种要素约束条件，其发展思路就是通过划分主体功能区来实现各区域的不同发展路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统筹考虑未来中国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和城镇化格局，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先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主体功能区的划分是按照资源环境的承载力要求，即前面提出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观所强调的在现有自然要素的约束条件下，基于现实开发力度和未来的发展潜力进行划分的，要求区域内自然资源要素与要素类型及积累程度相匹配，实现自然要素资源与区域内要素类型及积累程度相和谐，以此确定区域的分工及其功能定位。

由于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主要受到区域聚集要素能力、要素禀赋以及要素聚集约束的限制，而不同区域的不同要素聚集的刚性不一样，对于存在刚性很强的要素硬约束的区域，如自然资源匮乏，生态环境脆弱的地区，如果一定要进行大量资金和劳动力投入，可能短期内获得一定经济收益，但必然不能持久，而且会很容

易引起生态破坏，以及部分资源的永久性丧失。而对于刚性很弱的要素约束区域，如地理位置佳，经济发展、文化教育以及开放意识基础良好的地区，如果限制发展，或者不能及时创造条件发展，则会影响区域的要素禀赋升级以及区域向高级循环发展的速度。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对于自然要素约束刚性特别强的地区，生态环境脆弱，自然资源再生能力不强的区域，由于要素聚集困难，而且难以累积，难以推动主导要素更替，应该将其纳入禁制开发或限制开发的主体功能区。

对于无太强自然要素的约束，而仅存在劳动、技术、资本、制度等要素软约束的区域，由于要素聚集成本较小，要素可以累积，从而带动要素禀赋的发展，推动主导要素更替，则应该将其按入重点开发或优先开发的主体功能区。

一般而言，禁止开发和限制开发的主体功能区与周边功能区的界限更为明显，更加独立。这种功能区与外界的产业联系不是十分密切，往往是森林、草原、荒漠化和水土流失地区和重要的水源补给区、蓄滞洪地区、自然灾害频发地区和水资源严重匮乏地区，或者以独立的风景区、农田保护区、自然资源保护区等形式存在。而重点开发或优先开发的主体功能区则往往开放度较高，与周边区域联系密切，资本、劳动等要素流动量大，文化、技术交流频繁，通常参与更大区域内的分工与合作。

在实际工作中划分主体功能区时，由于经济区域与行政区域并不完全一致，所以主体功能区可能是跨行政区，也可能某一行政区内存在多个主体功能区。

本章对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研究是在自然要素和后天累积性可变要素的统一视角下展开的，认为区域经济不平衡是各种要素综合影响的结果。而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表明，在经济要素的均质分布条件下，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同样能够导致空间结构的分异，引发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这样看来，在分析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时，除了考虑经济要素的非均质分布，更要考虑区域主体的微观经济行为，否则无法全面揭示区域经济差距的原因。基于此，后面的两章将对区域主体行为及由此引致的空间经济组织规律进行研究。

本章小结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既是重要的实际问题，也是理论的研究热点和难点。当

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度量和收敛性问题上，但是，究竟如何认识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这一本质问题却被忽视。

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关键不在于如何在一般意义上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收敛，而在于实现区域的协调发展，这种协调是充分考虑不同区域的要素适宜度，实现不同区域人民社会福利的均等化，而不是经济增长总量均等化。只有充分尊重要素适宜度的约束，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才能够体现“人定顺天”，实现可持续发展与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

思考题

1. 如何理解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发展规律及其特征？
2. 请你认真比较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三种测度方法，理解每种测度方法适用条件。
3. 从要素和要素禀赋角度谈谈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原因。
4. 什么是要素适宜度，该理论的提出对于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有什么意义？

参考文献

金相郁：《中国区域经济不平衡与协调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白雪梅：《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比较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8 年版。

蔡昉、都阳：《中国地区经济增长的趋同与差异：对西部开发展略的启示》，《经济研究》2000 年第 10 期。

蔡继明：《中国城乡比较生产力与相对收入差别》，《经济研究》1998 年第 1 期。

车铁豪：《产业内贸易的理论与实际：以克鲁格曼模型为主》，中央大学校经济研究所经济论文集 1997 年版。

陈安平、李国平：《中国地区经济增长的收敛性——时间序列的经验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4 年第 11 期。

陈宗胜:《中国城市居民收入分配差别现象、趋势及影响因素:以天津市为案例》,《经济研究》1997 年第 3 期。

董藩:《关于地区间收入差距变动分析的几点商榷意见》,《经济研究》1992 年第 7 期。

费洪平:《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中国跨世纪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海闻、卢锋:《中国经济转型与经济政策》,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胡鞍钢:《中国地区差距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胡兆量:《中国区域发展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胡兆量:《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黄义珏:《中国的区域经济》,三英社(韩国)1998 年版。

黄作平:《中国经济区域新论》,中国农业出版社 1998 年版。

金相郁:《空间收敛第二规律与中国区域经济结构不平衡的研究》,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2 年。

金相郁:《空间收敛第一规律与空间收敛第二规律》,《南开经济研究》2001 年第 3 期,第 46—50 页。

金相郁:《区域经济增长收敛的分析方法》,《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2006 年第 3 期,第 102—110 页。

金相郁:《中国区域划分的层次聚类分析》,《城市规划汇刊》2004 年第 2 期。

金相郁:《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格式实证研究》,《地域研究与开发》2005 年第 2 期,第 1—5 页。

金相郁:《中韩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的比较研究》,载《中韩经济与管理比较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金相郁、郝寿义:《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趋势与动因分析》,《财经科学》2006 年第 7 期,第 110—117 页。

李克:《适度差距与系统优化: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区域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李实、魏众、B. 古斯塔夫森:《中国城镇居民的财产分配》,《经济研究》2000 年第 3 期。

李正雨:《韩国的区域间经济力隔差:长期趋势与韩日比较》,《经济发展研究》1997 年第 3 卷。

李宗哲、姜承昊:《改革开放与中国区域差距:现状、原因、展望》,《国际经济研究》1998 年

第 4 卷第 2 号。

林丹明、徐宗玲：《中国因特网发展的地区差异》，《中国经济问题》2001 年第 4 期。

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经济转轨时期的地区差距分析》，《经济研究》1998 年第 6 期。

刘强：《中国经济增长的收敛性分析》，《经济研究》2001 年第 6 期。

刘水平、舒元：《中国地区经济的收敛与增长决定力量：1978—1997》，《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 年第 5 期。

陆大道：《1997 中国区域发展报告》，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

马洪、王梦奎：《中国发展研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报告选》，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0 年版。

孟连、王小鲁：《对中国经济增长统计数据可信度的估计》，《经济研究》2000 年第 10 期。

饶会林：《区域发展差距走势的理论与方法分析——对倒 U 字型观点的评价与发展》，《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 年第 1 期。

申海：《中国区域经济差距的收敛性分析》，《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9 年第 8 期。

沈坤荣、马俊：《中国经济增长的"俱乐部收敛"特征及其成因研究》，《经济研究》2002 年第 1 期。

宋学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及其收敛性》，《经济研究》1996 年第 9 期。

孙久文：《中国区域经济实证研究——结构转变与发展战略》，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1999 年版。

覃成林：《中国区域经济差异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7 年版。

万广华：《中国农村区域间居民收入差异及其变化的实证分析》，《经济研究》1998 年第 5 期。

王检贵：《倒 U 现象是不是一条经济法则》，《经济研究》2000 年第 7 期。

王建廷：《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与动力机制》，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王梦奎、李善同：《中国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的研究》，商务印书馆 2000 年版。

王启仿：《区域经济增长的俱乐部收敛特征分析——以江苏省为例》，《科技进步与对策》2004 年第 6 期。

王小鲁、樊钢：《中国地区差距的变动趋势和影响因素》，《经济研究》2004 年第 1 期。

魏后凯：《论中国区际收入差异的变动格局》，《经济研究》1992 年第 4 期。

魏后凯：《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经济研究》2002 年第 4 期。

魏后凯：《中国地区间居民收入差异及其分解》，《经济研究》1996 年第 11 期。

魏后凯：《中国地区经济增长及其收敛性》，《中国工业经济》1997 年第 3 期。

徐建华:《中国区域经济差异的时空尺度分析》,《地理研究》2005 年第 1 期。

杨开忠:《中国区域发展研究》,海洋出版社 1989 年版。

杨伟民:《地区间收入差距变动的实证分析》,《经济研究》1992 年第 1 期。

姚波:《中国区域经济差异的实证分析》,《统计研究》2005 年第 8 期。

张敦富、覃成林:《中国区域经济差异与协调发展》,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1 年版。

张海如:《中国经济地理》,东北财政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张耀辉:《区域经济理论与地区经济发展》,中国计划出版社 1999 年版。

中央党校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西部大开发的经济学思考》,《经济研究》2000 年第 6 期,第 33—40 页。

Akita, T., Rizal A. Lukman, and Yukino Yamada, 1999, "Inequality in the Distribution of Household Expenditures in Indonesia: A Theil Decomposition Analysis", *The Development Economies*, 37(2), pp. 197—221.

Alonso, W., 1980, "Five Bell Shapes in Development", Papers of the Regional Science Association, 45, pp. 5—16.

Amos, O. M. Jr., 1988, "Unbalanced Regional Growth and Regional Income Inequality in the Latter Stages of Development",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18, pp. 5—16.

Barro, R., and Sala-i-Martin, X., 1992, "Regional Growth and Migration: A Japan-United States Comparison", *Journal of the Japanese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es*, 6, pp. 312—346.

Barro, R., and Sala-i-Martin, X., 1991, "Convergence across States and Regions",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1, pp. 107—182.

Barro, R., and Sala-i-Martin, X., 1995, *Economic Growth*, New York: McGraw-Hill, Inc..

Baumol, W., 1986, "Productive Growth, Convergence and Welfar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6(4), pp. 1072—1085.

Baumont, C., Ertur, C., Gallo, L. J., 2002, "The European Regional Convergence Process, 1980—1995: Do Spatial Regimes and Spatial Dependence Matter?", presented at the Spatial Inequality and Development Conference, Cornell/LSE/WIDER, London, June 28—30, 2002.

Ben-David, D., 1993, "Equalizing Exchange: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Income Conver-

genc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8(3), pp. 653—679.

Ben-David, D., 1999, "Trade, Growth and Disparity among Nations", *WTO Special Studies*, 5.

Bernard, A. B., Durlauf, S. N., 1995, "Convergence in International Output", *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etrics*, 10, pp. 97—108.

Bernard, A. B., Durlauf, S. N., 1996, "Interpreting Tests of the Convergence Hypothesis",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71, pp. 161—173.

Byun, B. S., 1999, "A Comparative Study of Regional Inequality Patterns in Korea and the Unites States", *The Journal of Korea Planners Association*, 34, pp. 157—165.

Carlino, G. A., Mills, L., 1996, "Testing Neoclassical Convergence in Regional Incomes and Earnings", *Regional Science & Urban Economics*, 26, pp. 565—590.

Danziger, S. H., Gottschalk, P., 1993, *Uneven Tides: Rising Inequality in America*,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Dowrick, S., Nguyen, D. T., 1989, "OECD Comparative Economic Growth 1950—1985: Catch-up and Convergenc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9(5), pp. 1010—1030.

Evans, P., Karras, G., 1996, "Convergence Revisited",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37, pp. 249—265.

Fallon, P., Lampart, C., 1998, "Can Backward Subnational Regions Catch up with Advanced Ones", World Bank PREM notes.

Fan, C. Cindy, Emilio Casetti, 1994,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Dynamics of U. S. Regional Income Inequality," *The Annals of Regional Science*, 28(2), pp. 177—196.

Fritzell, J., 1993, "Income Inequality Trends in the 1980s: A Five-country Comparison", *Acta Sociologica*, 36(1), pp. 47—62.

Isard, Walter, 1956, *Location and Space-Economy*, MIT Press.

Jian, T., Sachs, J. D., Warner, A. M., 1996, "Trends in Regional Inequality in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7(1), pp. 1—21.

Krugman, P., 1991,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9, pp. 483—499.

Krugman, P., 1993, "First Nature, Second Nature and Metropolitan Location",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33(2), pp. 129—144.

Kuznets, S., 1955, "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45, pp. 1—28.

Lee, J. C., 2000, "Changes in the Source of China's Regional Inequality", *China Economic Review*, 11, pp. 232—245.

Lee, J. S., 2002, "A Study on the Classification of Regional Patterns by Cluster Analysis Utilizing Factor Scores", *Journal of the Korea Planners Association*, 37(4), pp. 191—200.

Lee, W. S., 2003, "A Study on the Regional Classification for the Differentiation of National Assistance", *The Korea Spatial Planning Review*, 36, pp. 19—35.

Lim, L. K., McAleer, M., 2003, "Convergence and Catching up in ASEA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CIRJE-F-218.

Low, P., Olarreaga, M., Suarez, J., 1998, "Does Globalization Cause a Higher Concentra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vestment Flows", WTO Economic Research and Analysis division Staff Working Paper 98—08.

Myrdal, K. G., 1957, *Economic Theory and Under-Developed Regions*, Gerald Duckworth & Co. Ltd.

Neven, D., Gouyete, C., 1995, "Regional Convergence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33, pp. 47—65.

Partridge, M. D., Rickman, D. S., Levernier, W., 1996, "Trends in U. S. Income Inequality: Evidence from a Panel of States", *Quarterly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36(1), pp. 17—37.

Persson, J., 1997, "Convergence across the Swedish Countries, 1911—1991",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41, pp. 1835—1852.

Quah, D., 1996, "Regional Convergence Clusters across Europe",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40, pp. 951—958.

Renard, M. F., 2002, "A Pessimistic View on the Impact of Regional Inequalities", *China Economic Review*, 13, pp. 341—344.

Rosenthal, J. S., 1996, "Markov Chain Convergence: from Finite to Infinite", *Stochastic Processe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62, pp. 55—72.

Sachs, J. D., Warner, A., 1995, "Economic Reform and the Process of Global Integration",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1, pp. 1—18.

Sacks, J. D., Woo, W. T., 1997, "Understanding China's Economic Performance", NBER Working Papers No. 5935.

Sala-i-Martin, X., 2002, "The Disturbing "Rise" of Global Income Inequality",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8904.

Sim, S. J., 2004, "Income Convergence in East Asia and Normative Analysis on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The Korean-Japanese Journal of Economic & Management Studies*, 29, pp. 51—72.

St. Aubyn, M., 1999, "Convergence across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1890—1989): New Results Using Time Series Methods", *Empirical Economics*, 24, pp. 23—44.

Tsionas, E. G., 2002, "Another Look at Regional Convergence in Greece", *Regional Studies*, 36(6), pp. 603—609.

Verspagen, B., 1991, "A New Empirical Approach to Catching up or Falling behind",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2, pp. 359—380.

Williamson, J. G., 1995, "Globalization, Convergence and History",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5259.

Williamson, J. G., 1965, "Regional Inequality and the Process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A Description of Pattern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13, pp. 3—45.

Yu, B. C., Park, S. I., 2004, "Analysis on Convergence Income and Determinants of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Application of Dynamic Heterogeneous Panel Model", *Kukje Kyungje Yongu*, 10(2), pp. 105—126.

第 8 章

区域主体与空间经济自组织——基于厂商和居民的分析

本书的第 3 章到第 5 章构建了从区位到区域的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研究了区域经济发展与不平衡问题。任何区域形成与发展都是一定经济主体行为的结果。前面，我们从区位与区位选择的视角，分析了区位主体的空间选择行为，初步探讨了经济区域形成的微观机理。下面两章则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区域主体及其行为较为系统的分析，进一步探寻区域经济学的微观基础，认识区域经济演化的微观机理。

8.1 区域主体及其特征

研究区域主体及其经济行为，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什么是区域主体，区域主体包括哪些对象，各种经济主体在何种情况下可以纳入区域主体的研究范畴。其次，区域主体经济行为的研究目的和内容是什么，只有回答了这些问题，才能对区域主体行为进行深入的经济学分析。

所谓区域经济主体，其含义就是能够实现一定经济空间（经济区域）组织和运行的最少类别的微观承载对象。在经济研究中，我们经常谈经济结构问题，大多数都是从客体角度去谈，如生产结构、分配结构、流通结构、消费结构、区域空间结构与经济类型结构等，很少有人谈经济主体结构。其实，经济结构应该既包括客体结构，也包括主体结构。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看，经济主体结构都是经济结构问题的题中应有之义。

现代空间经济是一个社会化大生产型经济，各类参与者在其中活动并发生相互关系。参与者包括自然人（或自然人的集合）和各种法律实体，我们一般将它们

统称为经济主体。所有这些参与者按一定的方式搭配与排列，彼此交往，进而衍生出各种各样的相互关系，便形成了经济活动的主体结构。从区域角度来看，一定区域经济的组织、运行和发展都是一定主体行为的结果，不对这种区域主体的行为进行研究，就无法真正揭示区域空间经济组织和发展的机理。

8.1.1 区域主体确定的原则

区域主体是客观存在的，研究确定区域主体应该遵循一定的原则。按照区域经济主体的定义，我们可以确定如下原则：

1. 一致性原则

作为区域经济学独特研究对象的经济区域是由众多的经济区位有机构成，所以，区位是区域构成的微观单元。从区域经济学的研究体系来看，区位理论是其重要的理论基础，区域经济理论的产生、发展以及体系的构建都是以区位论为基础和起点展开的。要体现这种理论体系的一贯性，从构成的内容上来说，区域主体应该和区位主体保持一致。

在这里，区位主体也就是区位选择的主体。在区位选择理论中，主要分析生产活动的区位选择、家庭居住的区位选择和公共基础设施的区位选择。首先，在生产活动的区位选择中，主体是各种生产厂商，它们或者在产出、投入既定的条件下寻求运输成本最小化的区位，或者同时选择价格、区位和投入要素，使其利润最大化。其次，在家庭居住的区位选择中，主体是居民，他们根据效用最大化原则，选择适当的居住区位。最后，对于公共设施的区位选择，依据的原则一般是费用最小化或者福利最大化，这里的经济主体相对复杂一些，根据不同情况会包括政府、相关区域组织、居民和厂商四个主体。[①]如果认为区位是区域的构成单元，区位理论是区域经济理论的基础，那么区域空间的形成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不同区位主体进行区位选择的交互作用结果。因此，区域主体与区位主体从构成内容上说，应该具有一致性。

2. 包含原则

区域经济发展和演进、区域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都是一定区域主体行为空间演化的结果。所以，对区域主体及其行为的经济分析，关键也就是分析区域经济演进的微观机理。为了揭示这种微观机理，对主体行为进行

---

① 对不同区位选择行为的研究可以参见彼得·尼茨坎普主编的《区域和城市经济学手册》第一卷中第一篇的相关内容。

标准的微观经济学和博弈分析就是必要的。这样，从分析工具的贯通性角度讲，区域主体应该包含微观经济分析中的经济主体。

但是，微观经济学中对主体行为的分析主要集中在消费者和生产者上面，在市场出现失灵以后才引入了政府这一角色进行分析。相比而言，区域主体包含的范畴要更广些，对于封闭区域，其主体从构成上看与微观经济学的主体基本相同，但是，对于政府的作用却不仅仅囿于解决市场失灵，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区域空间结构演变和区域空间规划等方面都体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随着区域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成熟，各种区域协调组织也会以区域主体的身份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3. 有机运行、组织原则

区域主体的经济行为必然是在一定的经济空间中实现的，这个经济空间对于经济主体类型的确定和行为都会产生重要影响。经济空间作为经济发展的一种承载体，脱离不了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也就是说，经济空间及其秩序、结构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之间是双向影响的，一方面，经济空间的有序化和结构优化也就是经济增长的过程，另一方面，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一定经济空间的结构与形态。所以，不同的区域空间所能够容纳的区域主体是不同的，区域主体的存在是以保证区域经济的有机运行和组织为目的。区域主体的行为在空间上的相互作用应能够反映经济空间的发展、演化。

有机运行和组织原则同时包含了区域主体确定的范围最小化原则。这是因为，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参与的个体众多，包括消费者、企业，各类非营利组织（NPOs）、区域协调组织和不同的行政、事业机构等等。分析区域主体行为，如果涵盖所有的参与者，错综复杂的联系网络将使得经济分析无法进行，而且模糊了最本质的经济机理，为此，一定的抽象与简化是必需的。在分析区域主体行为时，我们将区域主体限定为能够组织、实现区域空间运行、演进的最小范围的经济主体。据此，将区域主体设定在企业、居民、政府、NPOs 和区域协调组织的范畴内。

区域主体的确定往往是上面三个原则综合作用的结果，而不是依据单一原则确定。这是因为，不同性质的区域，区域主体所包含的内容也会不同。对于封闭区域的主体主要包括企业、居民和地方政府；而对于全球化、一体化下的开放区域，除了这三者外，还包括区域协调组织（例如，欧盟委员会）的作用，这种组织是不同区域在一体化进程中，协调与演化博弈的结果。由于这里的研究目的旨在揭示空间

经济自组织的基本规律，研究的重点集中在封闭区域，而对区域协调组织的研究则在第 10 章中进行。

8.1.2 区域主体的特征

对于封闭区域，通过上述原则确定的区域主体，从包含内容上看，和一般微观经济学的研究主体似乎相同。那么，是不是对区域主体的行为分析就是将微观经济学的内容简单地应用到区域中呢？回答是否定的，这是因为，区域主体虽然在构成上来说与微观经济主体是基本一致的，但是，由于区域主体的行为是在一定的空间中展开的，这种空间性赋予了区域主体一定的特殊性质。

1. 系统性特征

任何结构中各个部分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作为和其他部分的关系存在的。整体论的哲学分析方法并不拒绝对构成整体的部分的研究，认为整体与部分之间除了存在着对立外还存在着内在的统一性。整体的性质不是从整体外去寻找，而是由互相依存的各个部分的关系来说明。

在微观经济学中，对厂商、消费者的行为分析，首先采用类似物理学中隔离分析的方法，进行逐个研究，之后统一于一般均衡的框架之下，而当市场失灵时，进一步引入了政府行为，以弥补市场失灵。但是，以简单的封闭区域经济为例，在区域主体的分析中，考虑空间的因素后，企业和居民之间的行为表现出一种自组织的特性，这种自组织使得企业和居民形成了一个相对闭合的经济循环系统，我们对区域主体的分析很重要的就是研究这个循环系统的经济机理。作为政府，其作用，一方面是为这种自组织经济的运行创造适宜环境，这主要通过相应的制度安排，保证市场机制的顺畅运行来实现；另一方面，政府可以在遵循自组织规律的基础上，使用区域经济政策或通过区域治理，强化主体经济行为，产生乘数效应，放大已有的自组织效应，促进经济增长。

2. 结构性特征

在研究区位主体时，我们发现区域空间中的企业和居民等，遵循的是隔离式的区位选择原则，造成除了偏好、区位指向和面对的目标函数不同外，企业、家庭和政府的区位选择行为没有差异，区位主体之间形成了明显的雷同和平行现象，这也是传统区位选择理论和区域经济理论存在分割的原因。

但是，在区域空间中展开自己经济活动的区域主体却有着明显的结构性特征，这种结构性特征与系统性特征相联系。在一定的区域中，区域主体中的企业和居

民处于同一层次，二者的区位选择行为产生的自组织形成一个基本系统，政府的行为建立在这个基本系统之上，针对这个基本系统营造相关的制度环境，如果是一体化的区域，则还有区域协调组织的影响与作用，进而形成一个更大的区域主体运行系统，由于两个系统处于不同的层次，决定了区域主体具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

3. 动态、演化特征

将区域主体概括为企业、居民、政府和区域协调组织，并不表示区域主体是一成不变的，区域主体的内容和构成从时间与空间维度的展开看，存在动态、演化的特征。以企业为例，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企业的构成也就不同，在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的地区，国有企业居于主导地位，随着经济水平的发展，国有、民营企业共同支撑区域经济发展，当高度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竞争与分工后，一体化的区域中往往是跨国公司居于主导地位，可见，企业的构成具有这种动态、演化特征。

另外，前面也已叙及，区域协调组织并不是在任何区域中都存在或都能够成为区域的主体，这种协调组织是经济发展到一体化的程度后，各个子区域的政府为解决空间分工、协调经济发展，在各自区域经济的基础上，经过长期博弈而逐渐衍生形成的。区域协调组织形成后，会随着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和涉及范围的扩大，内部组成也会发生不断变化，欧盟委员会成员的增加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4. 同一主体的不同角色特征

对区域主体的表述，在不同的环境中可能会不同，这是由于同一主体具有不同角色的特征使然。区域主体行为的研究关键是把握不同主体之间的内在联系机理，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同一区域主体会在不同的条件下拥有不同的角色。对居民而言，在谈到消费问题时，在表述上会以消费者的角色出现；在为企业提供劳动力时，又以劳动者的角色体现；当强调区位选择行为时，更多的则以家庭的角色出现，在分析区域主体行为时，认为这些不同的角色都是居民这一主体的不同表述形式。又如对企业而言，从表述上对企业和生产厂商不加区分，为了建模的需要，有时需要将企业这一主体抽象成企业家，以企业家的行为等价替代企业的空间行为。

8.1.3 区域主体行为研究的内容

区域主体行为理论的研究涉及了区域经济学的主要领域，该理论更强调区域经济学的微观基础，突出主体间经济行为的联系分析。我们将区域主体行为研究的主要内容、各行为的参与主体以及和原有区域经济理论体系的关系表示成图 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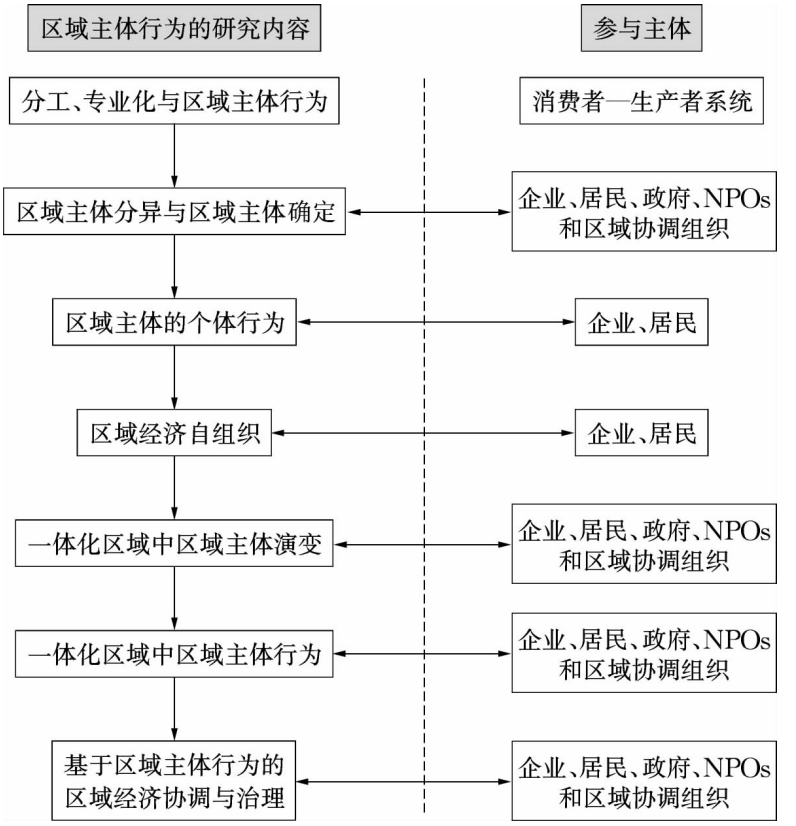


图 8.1　区域主体行为的研究内容

由图 8.1 中可以看出，对区域主体行为展开研究，需要明确分析对象。所以，区域主体的确定是进一步研究的前提。按照亚当·斯密的观点，分工与专业化是经济发展研究的主线，而在区域经济学中，分工与专业化又表现为在一定空间中的区位选择继而聚集经济的形成，我们对区域主体行为的展开正是置于特定空间中通过区位选择实现的。作为区域主体行为研究的内容，首先应该对空间分工实现中的区位主体行为进行分析。其次，由于不同性质的区域（这里主要指相对独立的区域和一体化进程中的区域），区域主体所包含的内容亦有不同，但是对于一体化区域的主体行为分析要以前者为基础，针对相对独立的区域进行主体行为研究是后续研究的基础，这个理论基础是通过对区域经济自组织研究奠定的。再次，对一体化区域的主体演变和行为的分析是区域主体研究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最后，基于上述对区域主体行为的分析，研究区域治理问题就显得更为必要。

由图 8.1 可知，区域主体行为研究的内容涉及面很广，可以说基本覆盖了区域经济理论的主要领域。这里，我们分析区域主体行为目的是揭示区域空间的微观组织机制，为前面章节研究的区域经济理论奠定微观基础。为此，我们通过选择三个主体的空间行为进行研究，本章以厂商和居民两主体的行为展开，下一章则引入地方政府行为进行分析。

8.2 区位主体与区域主体

所谓区位主体也就是区位选择的主体。其主体包括居民、企业、政府机构和区域协调组织。从构成内容上来说，区位主体与区域主体具有一致性，但是，区位主体的决策往往是离散性的，一般来讲，居民和企业的区位选择都是一次性行为或较少的有限次行为。但是，区域主体的行为却是在空间中动态的连续演进，进而在经济空间场中产生循环累积的相互作用。这里，简单分析区域主体之间的不同关系，以和区位主体实现进一步的区分，对区域主体之间关系和行为机理的详细分析将在 8.3 节中进行。

8.2.1 区位主体及其离散式关系

区位主体在进行区位选择时，在标准的区位选择模型①中，主体之间是没有相互联系的，呈现了一种明显的离散式或弱相关关系。这里仅通过厂商的区位选择和家庭的居住区位选择来进行说明。

1. 厂商区位选择中与居民（消费者）之间的离散关系或弱相关关系

在厂商的区位选择中，曾经一度由劳恩哈特—韦伯模型主宰，这个模型的基本特征是厂商的目标函数对市场和资源禀赋好的区位较为敏感，在假定需求给定，而且对企业区位选择不产生影响，即不考虑需求因子作用的条件下，认为单一企业的区位选择的动机是追求费用最小。但是我们在分析企业行为时，发现企业选址关心的不仅仅是成本，还要关心其产品的市场需求，最终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对于建立以厂商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函数的区位选择问题后来被称为空间垄断的价格—区位问题。但是，上面的无论哪一种模型，都没有明确，作为厂商产品的消费者其行为究竟如何影响厂商的区位选择，在劳恩哈特—韦伯模型中，由于假设市场需求

① 这里所说的标准的区位选择模型指《区域和城市经济学手册》第一卷的第一篇中所阐述、归纳的模型。详见彼得·尼茨坎普主编：《区域和城市经济学手册》第一卷，安虎森主译，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给定，消费者的作用就被排除在模型以外，从而两个主体之间的选择行为没有必然联系，空间垄断的价格—区位问题虽然放松了这一假定，引入了消费者的需求函数，但是由于割裂地研究厂商的区位选择，居民和厂商之间的空间联系依然不能得到体现。

相比而言，相互依存的区位论从一定意义上体现了主体之间的弱相关关系。空间相互作用为出发点的区位理论又被称之为“相互依存”区位理论。区位相互依存学派的代表人物是费特、霍特林和张伯伦等经济学家。区位的相互依存学派假定生产费用一定，市场不是韦伯假定的点状市场，而是在地域中分布的市场（但在理论研究中，假定为线状市场）。企业产品的送达价格因区位不同而不同，各个企业都尽力以低于竞争企业的价格向消费者销售，而送达价格与克服企业与消费者间的距离所支付的运费大小有关。各个企业在选择区位时，都想尽量占有更大的市场地域，这样市场地域的大小受到消费者的行为和其他企业的区位决定行为的影响。某企业如果以低于竞争者的价格能够在某市场地域销售产品，那么该市场就会被该企业所垄断。总之，该学派认为区位和市场地域间的空间模型产生于需求场所的差异和企业区位间的相互依存关系。相互依存区位理论将不完全竞争市场理论引入到空间分析，而且明确提出厂商的区位选择在一定意义上取决于消费者的行为，但是，由于研究视角未能扩展至对居民（消费者）的行为研究，而仅仅局限在厂商行为上，相互依存理论也只能揭示出两个主体之间的弱相关关系。

2. 家庭的住宅区位选择中与厂商的离散式关系

家庭根据效用最大化原则，选择适当的居住区位。假定家庭的效用 U 可由函数 v 和干扰项 ξ 来表示，v 是描述家庭的社会经济各方面和代表居住区位的诸要素 x 的函数；干扰项 ξ，用以表示因个人偏好不同而导致的偏离家庭平均效用的未知量以及测量误差等。家庭居住选址模型为：

$$U_{in} = v(x'_{in})\beta + \xi_{in}$$

约束条件为：

$$X + R = Y$$

其中：

i =第 i 个可选择区位；n =第 n 个家庭；β =描述第 n 个家庭的第 i 个选择的

特征向量的参数；X 表示第 n 个家庭除住房之外的其他消费支出；R 表示选择第 i 区位的居住支出；Y 为家庭的预算约束。

第 n 个家庭随机选择居住区位 i 的概率就等于对第 n 个家庭来说 i 的效用（或吸引力）大于或者等于其他任何可选择的 i' 的效用的概率：

$$P_{in} = Pr(U_{in} \geqslant U_{i'n};\ \forall i),\ i,\ i' = 1,\ \cdots,\ I;\ i \neq i',\ n = 1,\ \cdots,\ N$$

于是，假定最初选择的人都将努力使他或她的效用最大。上式中选择的概率的实际计算取决于效用函数的形式。在这个模型中，厂商的影响作用没有直接的体现，不过，由于消费者消费其他商品的结果必然会影响到对住房的消费，通过消费者的预算约束作用，消费者和厂商之间存在间接的关系。

从对区位主体的区位选择分析表明，区位主体的行为由于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研究，厂商和居民都会将对方的行为变量视为既定，这样必然形成二者的离散式关系。空间垄断的价格—区位问题和相互依存理论虽然将市场结构置换为垄断竞争，但是由于单一的研究视角，只能体现出两者的弱相关关系。这样仅仅从区位选择理论很难过渡到区域的相关理论，单一的区位理论也很难有力支撑区域理论，因此，必须从区域主体的互动和关联视角深入分析区域主体行为。为了多维度揭示区域主体的彼此关系，我们分别就市场经济下的三主体独立区域、纯市场条件下的两主体区域、转型经济条件下的三主体区域和全球化、区域一体化条件下的四主体区域进行研究。

8.2.2 区域主体及其系统结构关系

与区位主体不同，区域主体行为的研究是置于特定的垄断竞争的经济空间中进行的，主体间行为明确表现出了系统结构关系。这里以相对独立区域、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三个主体的情况为例来说明这种系统结构关系。

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中，区域主体由企业、居民和政府组成。其中，企业和居民的区位选择行为在一定的经济空间中表现为自组织机制，形成一个简单的经济自组织系统。政府虽然可以通过相关机构决定或影响诸如公共产品的区位、各级政府办公机构的区位等，进而间接影响厂商和消费者的空间行为（在图 8.2 中，这种间接关系用双向的虚线表示），但是，更重要的，政府通过制定一系列区域经济政策来影响区域经济自组织系统的发展和演变。这种影响所产生的经济场和自组织系统又会形成区域经济系统，这个区域经济系统既有自组织机制的作用，也有政

府行为和区域经济政策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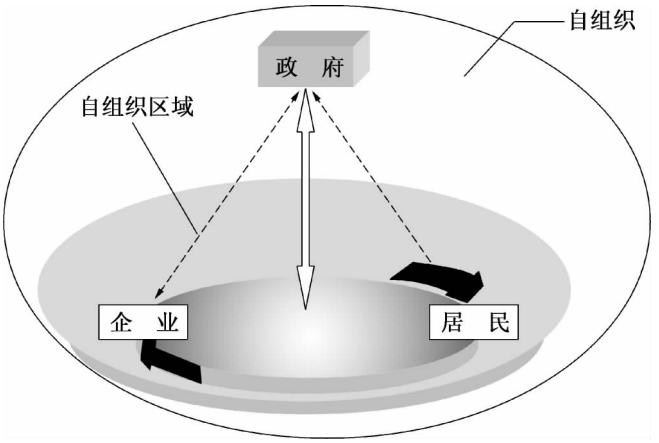


图 8.2　简单独立经济中区域主体的系统结构

在区域经济系统中，区域主体的空间选择行为表现了强相关的互动关系。在这里，企业是明确的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区位选择只是其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手段之一。利润最大化的实现关键力量决定于市场的大小，那么，什么因素决定市场的大小呢？这就是消费者的消费能力，而决定消费者消费能力的主要因素是消费者的工资收入，工资收入则源于企业对劳动力的支付，于是，消费者空间行为和厂商的空间行为建立了互为因果的累积关系。其运行的根本动力完全来源于内生，形成了一个自组织系统。

相比企业和居民，政府的空间行为并不直接进入自组织系统，而是在高于其他两个主体的层面上施加影响。当政府加入分析后，在企业和居民的空间经济行为决策时，政府的因素或者直接进入目标函数或者作为外生影响因素加以考虑，反之，区域政府的行为和政策的制定则是以是否有利于企业的利润最大化和居民的效用最大化为主要目标，三个主体之间行为形成了经济空间演化的主要内容。

8.2.3　纯市场条件下区域主体的耦合组织结构

为了强调区域经济这种自组织机制，假设一个没有政府存在的纯市场经济区域，主体构成仅有企业和居民。这种情况下，区域经济系统的运行完全由自组织来实现，“看不见的手”处于核心的支配地位。市场的作用分别从三个方面得

以体现。首先，消费者聚集在市场上表现为市场容量扩大，由此厂商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区位选择倾向于这一空间，反之，厂商的聚集，引致了产品丰富，消费物价指数下降，这些因素对消费者实现效用最大化有明显的正向作用，进而市场的作用促进了两个区域主体在空间上的聚集。其次，市场作用的经济空间总是呈现一种有序的结构，这种内生的有序结构源自分工与专业化的空间映像。以企业和居民为主体的区域在市场的力量下，实现经济的分工演化，这在时间上表现为经济的增长。最后，随着分工的不断演进，经济活动的容量越来越大，活动的范围越来越广，所有问题都依靠市场解决的结果使得市场的滞后性弊端逐渐突出，于是各种行业性协调组织应运而生，在欧洲各种行会型的协调组织发挥着重要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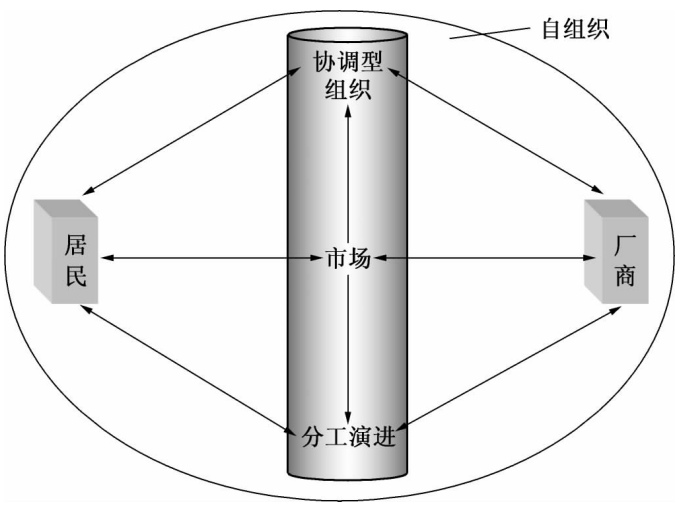


图 8.3　纯市场条件下区域主体的耦合组织结构

8.2.4　转型经济中区域主体的耦合与层级结构

我国从建立市场经济制度至今也只有十几年的历史，由于经济制度的强大的惯性，我国仍将会在较长时间内处于转型经济的过渡时期，分析和把握转型经济中区域主体的关系就有着重要意义。

转型经济中区域主体的构成包括政府、企业和居民，彼此间的关系通过图 8.4 表示，这个图形与图 8.2 很相似，但是内涵有很大的差异。在转型经济的制度背景下，企业和居民组成的自组织系统遵循与其他制度条件下（市场经济）相同的规律

与特征，而最突出的差异存在于政府这个主体的行为和其与另外两个主体之间的关系之中。首先，区域政府与自组织系统之间一般是单向联系，也就是说转型经济中自上而下的区域经济政策居于主导地位，政府可以通过制定各种区域经济政策来影响区域自组织系统。其次，由于计划经济的影响，政府往往还通过直接的方式决定某些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和居民的空间行为，于是，政府和微观区域主体还产生直接的联系。不过，随着市场经济制度的逐渐完善，政府与微观主体的直接联系会越来越弱，更多地体现为间接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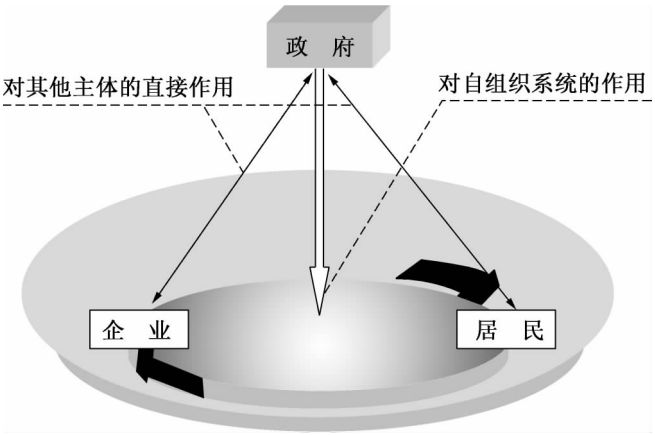


图 8.4　我国转型经济中区域主体的耦合与层级机构

8.2.5　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下区域主体的结构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共同加速，是当前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较之以前，区域经济发展的环境、背景也就有了很大的不同，区域主体的内容构成和行为特征都有了相应的变化。

经济全球化使得更多的经济要素在全球实现最优组合，跨国公司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推动者，与此相对应，区域主体中的企业行为将更多地体现为跨国公司区域经济一体化在促进不同区域融合的同时，也使得区域间的联系与摩擦同时增加，区域政府间不断重复的协调博弈将演化出区域协作组织，以低成本实现区域间的协调发展。跨国公司的增多和居民流动性加强将区域经济自组织变成了一个高度开放的经济系统，产业链条突破了原有区域界限，在世界范围内的延伸，仅仅依靠区域政府的力量显然不够，区域协作组织对区域自组织的影响和协调也

扮演了重要角色。区域政府的行为一方面存在于原来的区域空间中，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区域协作组织的工作，使得其空间行为透过区域协调组织间接扩展至更多的其他区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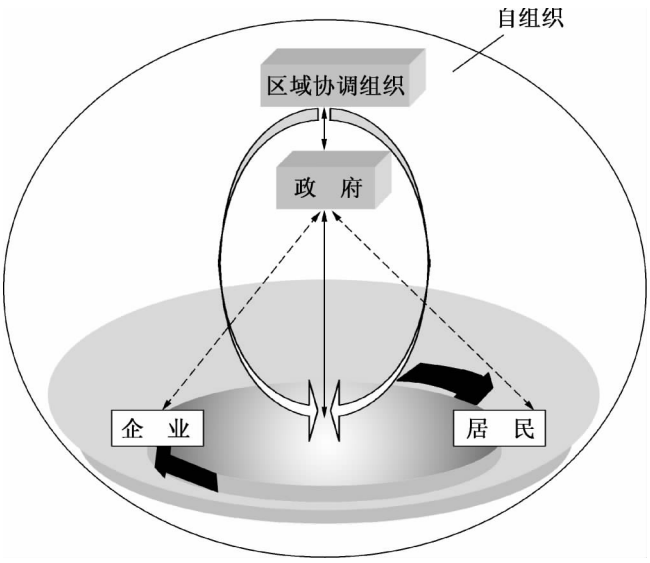


图 8.5　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下区域主体结构

本节对不同经济背景下的区域主体关系进行了简单分析，其间涉及了区域经济的自组织和政府行为与自组织的关系等问题，但都未进行详细阐述，因此，有必要对这些相关问题予以解释。8.3 节将分析区域主体活动的自组织问题，揭示区域经济自组织的深层机理，而对于政府的行为和作用则在下一章研究。

8.3　区域主体经济活动的自组织——基于厂商和居民的分析

20 世纪 90 年代初，新经济地理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克鲁格曼将对自组织系统的跨学科研究所取得的成果运用于经济学研究之中，建立起空间自组织模型。克鲁格曼的空间自组织模型以对厂商之间的向心力和离心力及其相互作用的分析为基础，向我们清楚地阐明了经由“一只看不见的手”形成大范围内的有规则的经济空间格局的内在机理。它回答了早期的杜能模型以及克里斯塔勒和廖什的中心地方理论所不能回答的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对中心地理理论的补充和完善，成为区域经济学、空间经济学、特别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新经济地理学领

域的重要分析工具。

8.3.1 核心—外围模型

为了考察特定功能区自组织形成的过程，可以通过经典的核心—外围模型(core-periphery model)来表述。

1. 模型的假设条件

假设经济中有两个对称的功能区，分别称为南、北两区，该经济提供工业制造品 M 和农产品 A。农产品是同质的，其生产是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的，并且运输是无成本的，即农产品可以无成本地流动。工业制造品之间存在差异，生产是规模报酬递增，符合 D-S 的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制造品的运输有成本，成本采用萨缪尔森的“冰山”成本形式，用 $\tau > 1$ 来度量，就是说，运输 τ 单位的工业制造品，最终到达目的地仅有 1 单位，其中 $\tau - 1$ 单位在途中“融化”了。经济生活中，农业劳动力(农民)用 L 表示，工业劳动力(工人)用 H 来表示。

经济中典型消费者存在两个层面的效用，首先，消费者将收入分别在农产品和工业制造品之间配置，该方程符合柯布—道格拉斯形式，其次，该消费者要在有差异的工业品之间进行消费配置，这个过程符合 CES(constant 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形式。可将这两个过程表述为：

$$U = C_M^{\mu} C_A^{1-\mu} C_M = \left(\int_{i=0}^{n+n^*} c(i)^{1-(1/\sigma)} \mathrm{d}i\right)^{1/(1-1/\sigma)},\ 0 < \mu < 1 < \sigma \tag{8.1}$$

其中，C_M、C_A 分别为工业品和农业品的消费量，n、n^* 表示北区和南区的厂商数量，μ 代表消费中用于工业品消费的支出份额。$\sigma > 1$，表明了工业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σ 越大，厂商生产的产品的可替代性就越大。

2. 不同主体的行为

(1) 消费者行为。

消费者要在一定的收入水平下，实现效用最大化，消费者面对的问题可以表述如下：

$$\max U = C_M^{\mu} C_A^{1-\mu} C_M = \left(\int_{i=0}^{n+n^*} c(i)^{1-(1/\sigma)} \mathrm{d}i\right)^{1/(1-1/\sigma)}$$

$$\text{s. t. } p_A C_A + \int_0^{n^w} p(i)c(i)\mathrm{d}i = E \tag{8.2}$$

这里，p_A 是农产品价格，$n^w = n + n^*$ 表示南北两区的厂商总数，E 指消费者

的收入水平。为了解这个最大化问题，可将其分解为两个步骤①，首先求一个支出最小化问题，即选择 $c(i)$，使得以最小成本得到制造品 C_M；其次，求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②

求解支出最小化问题，可得制造品消费的最小支出为：

$$\int_0^{n^w} p(i)c(i)\mathrm{d}i = \left(\int_0^{n^w} p(i)^{1-\sigma}\mathrm{d}i\right)^{\frac{1}{1-\sigma}} \cdot C_M = G \cdot C_M \tag{8.3}$$

定义 $\left(\int_0^{n^w} p(i)^{1-\sigma}\mathrm{d}i\right)^{\frac{1}{1-\sigma}} = G$，表示工业品价格指数，利用这个价格指数，可以将消费需求 $c(j)$ 写为：

$$c(j) = \left(\frac{p(j)}{G}\right)^{-\sigma} \cdot C_M$$

求解效用最大化问题，可将效用表示为：

$$U = \mu^{\mu}(1-\mu)^{1-\mu}EG^{-\mu}p_A^{\mu-1}$$

定义 $P = (\Delta \cdot n^w)^{-a} \cdot p_A^{1-\mu}$ 为完全价格指数，其中，$\Delta \cdot n^w = G^{1-\sigma} = \int_0^{n^w} p(i)^{1-\sigma}\mathrm{d}i$，$a \equiv \dfrac{\mu}{\sigma-1}$。假设，工人的名义工资为 w，那么实际工资为 $\omega = \dfrac{w}{P}$。

如果农业部门的劳动力是均匀分布的，农民的总量是 L^w，工人的总数为 H^w，但其分布是模型内生决定的，令 $s_H = H/H^w$ 表示北区所占的工人份额。设迁移方程为：

$$\dot{s}_H = (\omega - \omega^*)s_H(1-s_H)③,\ \omega = \frac{w}{P},\ \omega^* = \frac{w}{P^*} \tag{8.4}$$

短期均衡要求农产品市场出清，其均衡条件为：

$$[(1-\mu)E + (1-\mu)E^*]/p_A = L^w/a_A \Rightarrow (1-\mu)(E+E^*) = p_A\left(\frac{L^w}{a_A}\right)$$

---

① 这里将求解分成两个步骤，是因为偏好对农业和制造业是可分的。不代表这类最大化问题都可进行这种分解。参见 Denton，A. and J. Muellbauer，1980，*Economics and Consumer Behavior*，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② 关于模型的求解可参见金丽国：《区域主体与空间经济自组织》，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③ 这个特殊的迁移行为方程表明，迁移速度是实际工资差距的一个比例，另外，$s_H(1-s_H)$ 也表明迁移不是同时完成的，说明存在调整成本。详见 Richard Baldwin et al.，2003，*Economic Geography and Public Polic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 **厂商行为。**

综合整理前面的需求函数信息，重新表述如下：

$$c_j = \frac{p_j^{-\sigma}\mu E}{n^w \Delta},\ n^w \Delta = \int_{i=0}^{n^w} p_i^{1-\sigma} \mathrm{d}i,\ E = wH + w_L L \tag{8.5}$$

根据假设，厂商只使用劳动这个单一要素做投入，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特性，那么单一厂商的工人劳动力使用为： $H = F + a_m x$，x **是某个厂商生产的产品数量，** a_m **为每生产一单位工业品所需的工人劳动力投入。厂商面临的问题是：**

$$\pi = px - w(F + a_m x)$$

求解厂商利润最大化，将一阶条件代入利润方程，得到：

$$\pi = w\left(\frac{a_m x}{\sigma - 1} - F\right)$$

考虑厂商均衡时的产品生产量，可以得到均衡时的企业总数，即：

$$n = \frac{H}{\sigma F} \tag{8.6}$$

该式表明，北区的厂商数量与工人劳动力数量正向相关，厂商的区位选择与工人的区位选择是互相依赖的。也就是说，一定经济空间中，厂商的经济活动和居民、消费者的经济活动存在密切联系，而单纯的区位选择分析无法针对这种互动机制做出完整分析。

下面来分析工业产品的市场出清条件。区域经济主体中的企业和居民之间存在明显的互动机制，企业的区位选择与居民的区位选择有关，而工人的区位又与企业区位有关，这是因为工人的区位选择和迁移行为由实际工资的状况决定。产品市场出清条件要求产品供求相等以及厂商获得零利润。另外，均衡时的产品价格与工资直接相关，所以，市场出清时，南北两区的工资水平也必须均衡。这里，可以对北区的代表性企业进行分析，将其市场出清条件表述为：

$$p\bar{x} = R$$

其中， $p\bar{x}$ **是指获得零纯利润厂商的生产产品的价值，** R **表示销售额(以消费者购买价格实现的价值)。具体的可将** R **表示成** $R = pc + p^* c^*$，c **和** c^* **表示北区企业生产的产品在北区和南区的消费量。根据需求方程(8.5)，推导可得：**

$$R=\frac{w^{1-\sigma}\mu E}{nw^{1-\sigma}+\phi n^{*}(w^{*})^{1-\sigma}}+\frac{\phi w^{1-\sigma}\mu E^{*}}{\phi nw^{1-\sigma}+n^{*}(w^{*})^{1-\sigma}} \tag{8.7}$$

在以前的研究中，τ 一般理解为运输成本，但是，更一般地，这里将 $\phi=\tau^{1-\sigma}$ 视为经济开放程度或贸易自由度，ϕ 越大，说明经济越开放，贸易成本越小。一般而言，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经济开放程度也较低，贸易或交易成本越高，这种改进要比单纯研究运输成本更有意义。

虽然，我们已经建立了两个区域经济主体之间的内在联系，但是，这种联系必然是通过市场机制实现的，为了能够清晰显示出这种市场的中间组织作用，这里引入市场大小的概念，用收入支出的情况 E 来表示，也就是说，收入支出越多，市场越大，收入支出越少，市场越小。为此，可以进行如下的表述。设 $s_n=n/n^{w}$ 为北区厂商的比例，对 n^{w} 实行标准化，令其等于 1，于是，有：

$$R=\mu\frac{E^{w}}{n^{w}}B \qquad R^{*}=\mu\frac{E^{w}}{n^{w}}B^{*}$$

$$B=\left(\frac{s_E}{\Delta}+\phi\frac{1-s_E}{\Delta^{*}}\right)w^{1-\sigma},\quad B=\left(\phi\frac{s_E}{\Delta}+\frac{1-s_E}{\Delta^{*}}\right)(w^{*})^{1-\sigma} \tag{8.8}$$

$$\Delta=s_n w^{1-\sigma}+\phi(1-s_n)(w^{*})^{1-\sigma} \qquad \Delta^{*}=\phi s_n w^{1-\sigma}+(1-s_n)(w^{*})^{1-\sigma}$$

$E^{w}=E+E^{*}$ 表示南北两区的消费支出，$s_E=E/E^{w}$ 表示北区的消费支出所占份额。至此，模型的核心表述基本完成，对于模型的经济机理和长期均衡分析，将放在 8.3.2 小节集中阐述。

3. 量纲的选择和标准化

为了使下面的关于经济自组织和长期均衡的分析更明了和简单，这里集中处理模型中量纲和标准化的问题。首先，选取 A 产品即农产品为计价物，通过选择适当的单位使得 $a_A=1$，这就意味着 $p_A=w_L=w_L^{*}=1$。其次，通过量纲处理，使得 $a_m=(1-1/\sigma)$，进而可以得到 $p=w$，$p^{*}=\tau w$，所以，在均衡时 $\bar{x}=F\sigma$。再次，将 F 标准化为 $1/\sigma$，由此可以求出 $\bar{x}=1$，$n=H$，$n^{*}=H^{*}$，这些结果一方面简化了市场的出清条件，另一方面，突出了居民的区位迁移与企业区位之间的联系。最后，令 $H^{w}=1$，会有 $n+n^{*}=n^{w}=1$，另外，在对称结果中，即 $s_n=n=H=1/2$ 时，令 $w=w^{*}$ 会比较方便。

将标准化处理的情况集中表述如下：

$$p = w,\ p^* = w\tau,\ p_A = p_A^* = w_L = w_L^*,\ \bar{x} = 1,\ L^w = \frac{1-\mu}{\mu},\ E^w = \frac{1}{\mu}$$

$$n + n^* = H + H^* = H^w = 1,\ n = H = s_H = s_n,\ n^* = H^* \qquad (8.9)$$

$$w = w^* = 1(\text{在对称结果中})$$

上述分析所处理的均衡问题集中在短期均衡，即产品市场的均衡，而忽略了消费者或者说居民的迁移行为，在方程的表达中没有体现出迁移方程的作用，如果考虑居民的迁移方程的均衡，可以将上述分析拓展至长期均衡分析。通过短期与长期的均衡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区域经济主体行为之间的内生联系机制——自组织。所以，在全面针对模型进行长期和经济自组织机理分析之前，有必要先对空间经济自组织本身进行研究。

8.3.2 核心外围模型与累积因果的自组织机制

1. 经济自组织及其特点

按组织演化动力来源及其形成方式不同来划分，组织过程可以分为自组织和被组织。被组织(organized)是指系统的形成不能自行组织、自行创生、自行演化，不能够自主地从无序走向有序，而只能依靠外界的特定指令来推动组织的形成和向有序演化，从而被动地从无序走向有序。而自组织(self-organizing)是指不需外界指令而能自行组织、自行创生、自行演化和自主地从无序走向有序，形成有结构的系统的过程和结果。

一个远离平衡的开放系统在外界条件变化达到某一特定值时，量变可能引起质变，系统通过不断与外界交换能量和分子运动产生一种自组织现象，组成系统的各子系统会形成一种互相协调的作用，从而可能从原来的无序状态转变为一种在时间、空间或功能上有序的自组织结构，也即耗散结构。自组织系统演化动力来自系统内部。协同学创始人哈肯(H. Haken)认为，自组织系统演化的动力是系统内部各个子系统之间的竞争和协同，而不是来自系统外部的指令。系统内部子系统通过竞争而协同，从而使竞争中的一种或几种趋势优势化，最终形成一种总的趋势，从而支配系统从无序走向有序。

经济自组织的根本动力是市场。市场自组织指市场的演进过程是一个自发的过程，通过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无须政府的过多干预。市场作为一个系统其自组织的特性主要表现为：

第一，非平衡性。普利高津认为："非平衡是有序之源"。[①]一个系统从无序走向有序，必须处于非平衡态。当系统处于平衡态时，该系统是孤立的、混乱无序的。市场作为一个复杂的自组织系统，同样也具有非平衡性。这既表现在其资源分布的非平衡，又表现在其子系统发育程度的非平衡，还表现为市场中供需关系的非平衡。正是由于这种非平衡性的存在，加强了市场内各个要素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在非平衡态下，由于各自仅有有限的资源和功能，为求得生存和发展，必须寻求与其他因素和子系统的合作，通过这种相互竞争和合作，来促进市场的自动调节并实现市场的优化。

第二，非线性。在市场自组织体内，各个要素之间存在非线性的关系，存在非单一的多样性的市场体系，存在市场主体在进行市场决策时的非线性行为。因此，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自组织地配置各个要素之间的这种非线性的关系，充分发挥各具特色的功能，可以实现市场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

第三，涨落性。普利高津指出："涨落决定全局的结果"，"通过涨落达到有序"。[②]所谓涨落就是指对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的随机扰动，这种扰动对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的稳定性产生重要的影响。在远离平衡态时，涨落的作用往往很大，通过破坏系统的原有的结构和功能，从而推动系统向有序结构进化。同其他自组织体一样，市场也是有着涨落的随机性的。市场体系中的每一个部门和企业生产什么、怎样生产都由它们按自己的判断、想法和计划行事，所以，就整个市场体系而言，各个部门、各个企业的行为是难以预测的，市场体系状态时时刻刻受着这种随机扰动而呈现涨落。以价格体系为例，由于供求关系的不平衡，价格始终围绕着均衡价格进行随机波动，正是这种随机波动，引导着各个企业的经济行为，从而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

第四，协同性。系统内外大量的涨落的存在使系统走向有序有了可能，但系统内各个要素必须都达到协同，真正的有序结构才能形成。在市场体系中，各个要素或组成部分不是简单的加和关系，而是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互相依存、互相作用，共同处在市场这一体系中。这便决定了各个经济主体一方面通过竞争独立地发挥自己的功能，另一方面通过协作来完成单个主体所不能及的活动。这种协同和竞争的结合，实现了资源的最优配置。

---

①② 普利高津：《从混沌到有序》，曾庆岩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25 页。

对于空间经济而言，空间的自组织主要体现在区域主体的空间行为彼此产生累积因果的内生动力，这种动力推动着区域经济的形成和演化，从这个意义上讲，区域经济的发展有其内在组织机制和动力，这同一国的经济增长理论有着质的区别。由此可见，区域经济的增长在空间层面上，就是空间经济组织从无序走向有序的过程，区域主体的行为分析恰恰可以使关于区域经济增长的研究更加透彻，打开空间经济增长的“黑箱”，为区域经济发展寻找到主体支撑。

2. 核心—外围模型中的累积因果自组织机制

克鲁格曼认为核心—外围模型依赖于收益递增，运输成本和需求的相互作用，并把它描述为如果规模经济程度足够大，每个制造商都想在一个地方生产，为整个区域的市场提供产品。为了最小化运输成本，他会选择当地需求大的地方，这正是大多数制造商选择的地方；因此，有一种循环关系，使得一个制造带一旦建立起来以后，就一直存在下去。

在核心—外围模型中，集中体现这种自我累积动力的有三种效应，分别是市场接近效应、生活成本效应和市场拥挤效应，其中前两种效应是空间聚集的向心力，后一种效应是离心力。图 8.6 刻画了由这三种效应生成的区域经济的自组织机制。这种机制的核心在于市场的作用，市场扩大取决于居民在相应空间的集中，居民在企业当中承载了劳动力供给的角色，这样，相应经济空间的生活成本的高低决定了市场范围大小，生活成本低的空间吸引力越大。生活成本的高低可由综合物价指数衡量，那么这个指数又由什么决定呢？这个决定因素就是企业聚集的数量，这样，两个向心力的作用推动了区域空间的经济聚集，从另一角度说，也就是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增长。当然，如果仅有这两种向心力的作用，经济会完全收缩于空间中的一点，这种现象之所以没有出现，是由于存在制衡的力量，即市场拥挤效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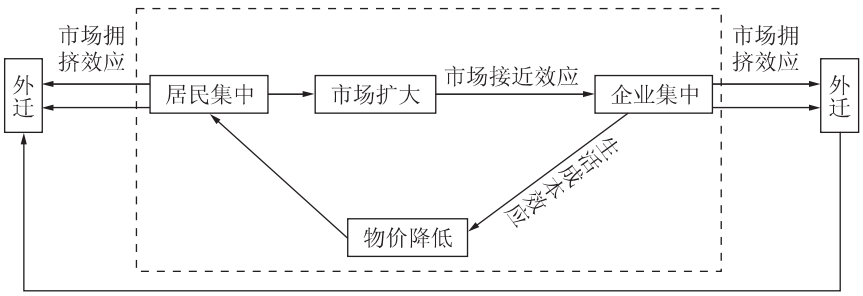


图 8.6　区域经济自组织

如，企业的不断聚集，将引致更加激烈的竞争，为了避免过于激烈的经济竞争，会有企业向外迁移，对应于向心力而言，这就是一种离心力。区域经济就是在三种效应、两种力的作用下实现自组织的。

市场接近效应是指厂商更加倾向于在市场较大的空间选址设厂，这是由于距离市场区近，可以节省运输成本，进而降低了产品进入商场的价格。在现代经济中，技术进步的速度不断加快，产品的时间价值越来越重要，产品能否以最快的时间进入市场是决定企业利润的重要因素，而靠近市场区有利于企业以更快的速度向市场投放产品，促进企业利润的实现。在模型中讨论可以表述如下。假设经济初始状态为对称，现在经济中的扰动使北区市场增加，也就是 s_E 增加，根据式(8.8)，只要 $\phi<1$（这个条件一般是满足的），则 B 增加，进而引起 R 增加，但是由零利润条件，此时厂商会增加工人工资，即 w 增加，于是更多的工人向北区迁移。这表明，市场接近效应具有自我增强机制(self-reinforcing)。

生活成本效应是指居民倾向于完全价格指数较低的空间聚集。这是因为工人的迁移方程受实际工资的支配，而实际工资与完全价格指数反向相关。假设初始经济受到某种扰动偏离均衡，一些居民向北区迁移，这样 H 增加，由于劳动力市场出清的条件要求，此时企业数量 n 也会增加，这又进而导致价格指数下降，这是由于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当地企业在本地销售产品没有运输成本。完全价格指数的下降使得实际工资水平上升，引致更多的居民向北区迁移。这种生活成本效应同样具有自我增强机制。

市场拥挤效应是指市场在空间中的一种离心力，当区域主体的集中导致企业间竞争过于激烈、居民的居住过于拥挤时，市场的空间配置会引导经济主体向其他经济空间迁移。我们由 R 的表达式(8.8)，假设某种市场力量使一些企业向北区移动，只要满足 $\phi<1$，就是说要素的流动不会是完全无障碍的时，Δ 会上升，若其他条件都不变时，B 就会下降，利润水平 R 也就降低，这必然会使得更多的企业向北区迁移。

由上述分析可见，空间经济的演化就是在这三种效应的自我增强之中，互相制衡，形成了自我实现的自组织。这种一定空间中的经济要素的自组织配置是区域经济的核心特征。为了将这种空间经济的自组织在不同开放程度的区域中进行比较，我们将问题的分析转向长期均衡。

与短期均衡不同，在长期均衡中要考虑迁移方程(8.3)，这要求长期均衡满足

$\dot{s}_H = 0$。根据方程(8.3)，此时对应两种长期解：一是内点解 $0 < s_H < 1$，此时，$\omega = \omega^*$，$\omega = \frac{w}{P}$，$\omega^* = \frac{w^*}{P^*}$，$P = \Delta^{-a}$，$P^* = (\Delta^*)^{-a}$，$a = \frac{\mu}{\sigma - 1}$；二是角点解 $s_H = 0$，$s_H = 1$。上述长期均衡的非线性特征导致无法获得解析解，但是，我们可以知道，当两个功能区完全对称时，满足内点解的条件，是长期均衡。对于其他情况，我们借助于图 8.7 来分析。图中，用横轴表示北区工人劳动力的比例 S_H，纵轴表示实际工资差额。当经济较封闭、贸易自由度较低时，对称均衡 S 点满足长期均衡条件，假设北区工人数量有一个微小增加，结果实际工资差额变负，北区实际工资下降，于是工人又向南区迁移，最终又回到 S 点。据图所示，S 点的斜率为负。同样的分析可知 C、D 点都不是长期均衡点。这就表明，在经济没有全球化和一体化时候，彼此相对封闭的区域经济倾向于空间的对称分布。但是，当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程度非常高时，区域间贸易自由度和开放度足够高时，S 点对应的对称分布将不再稳定，转而形成核心和外围结构，A 点和 B 点成为长期稳定点。但是，在这里，我们不能确定经济中心究竟在哪一个点上。当经济处于高度开放和相对封闭之间的水平时，核心—外围对称保持长期稳定，即 G 点、S 点和 H 点满足长期稳定均衡，而 U_1 和 U_2 点则是不稳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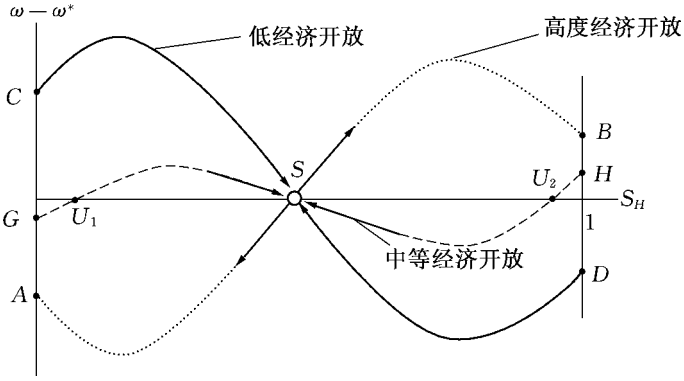


图 8.7　不同开放程度区域的自组织长期均衡

从另一个角度看，经济开放度和经济空间结构的不同也表明不同经济开放度下，自组织的三种效应的表现也不同。用图 8.8 可以表述这个问题。图中，横轴表示经济开放程度，横轴表示市场力量，A 区间表示经济开放度低，此时可以看出离心力明显大于向心力，也就是经济在空间中倾向于分散布局。但是，随着经济开放

程度的加深，离心力迅速衰减，使得核心、外围的空间结构出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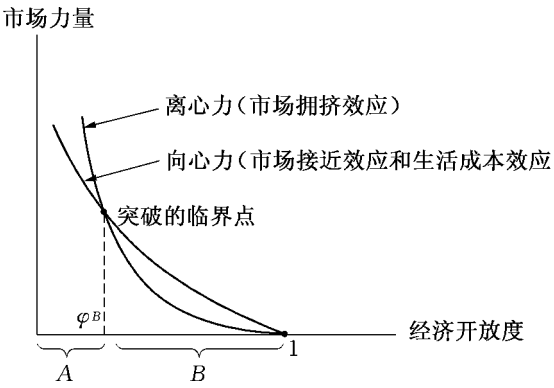


图 8.8　经济开放程度与市场自组织力量

8.3.3　产业垂直联系与空间经济自组织

在核心—外围模型中，空间经济自组织的主要动力表象是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在模型中，制造业内部生产不同产品的企业之间没有任何关联。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制造业的不同产品生产者之间往往存在很强的关系，例如，汽车生产和制造需要钢铁企业的钢板、轮胎企业生产的汽车轮胎等等。此时，汽车生产企业和钢铁企业、轮胎企业就产生了垂直关联。这里，我们将钢铁企业和轮胎企业称为上游企业，将汽车生产企业称为下游企业，下游企业除了需要资本、劳动力以外，还需要上游企业提供的产品，这样就建立了一种成本联系。同样道理，对上游企业来说，企业利润的实现依赖于下游企业，下游企业的需求就构成了上游企业的市场。当考虑这种普遍存在的产业垂直联系时，空间经济自组织的动力表象就与核心—外围模型有着很大的不同。本节将集中阐释这种上下游产业的空间经济自组织理论。

1. 模型的概述

最早将产业垂直联系引入分析的是费恩（Faini，1984），后来维纳布尔斯（Venables，1994，1996a，1996b），克鲁格曼和维纳布尔斯（Krugman and Venables，1995）将这一研究引入了新经济地理的分析框架。在新经济地理的文献中，关于产业垂直联系的空间经济模型主要有 FKV（1999）的核心—外围结构的垂直联系模型，尼克德（Robert-Nicoud，2002）提出的具有自由资本结构的垂直联系模型以及

奥塔维诺(Ottaviano，2002)提出的具有自由企业家结构的垂直联系模型。不同类型垂直联系模型的关键在于对要素性质所作的不同假设。例如，具有自由资本结构的垂直联系模型中存在两种要素即劳动和资本，其中资本具有自由流动的特性，但是在核心—外围的垂直联系模型中只有劳动单一的要素。由于要素的种类和性质不同，突出表现在规模报酬递增的成本函数也就不同，进而产生了模型的具体差异。

奥塔维诺和尼克德(Ottaviano and Robert-Nicoud，2006)提出了一个更广阔的分析框架，旨在揭示具有垂直联系特征的不同空间经济模型的共同属性。在这个新的框架中，核心—外围结构的垂直联系模型和自由企业家的垂直联系模型都成为不同参数下的特例。这里，我们采用这一新的分析框架，不去对垂直联系模型本身进行类别定位，而是关注于具有产业垂直联系的空间经济自组织的机制。在本节中，我们不对空间结构的稳定性进行特别的关注，这是因为，首先，基于产业垂直联系的模型本身已经非常复杂，稳定性分析又会加剧这种复杂性；其次，我们主要目的是想揭示具有垂直联系的空间经济自组织机制，而不强调空间经济结构本身的变化和稳定性。当然，这并不表明稳定性的分析不重要，这里我们牺牲了分析的严谨性和完整性只是想突出这种空间自组织机制。

2. 基本假设

假设一定的经济空间中有南北两个对称的功能区，该经济提供工业制造品 M 和农产品 A。农产品是同质的，农业劳动呈均匀分布，其性质与上一节中的假设完全相同。对于工业制造品来说，除了产品之间具有水平差异之外，制造业内部还具有上下游的垂直联系，下游的最终产品生产需要以上游制造业部门的产品作为中间投入品。制造业部门的生产是规模报酬递增，符合 D-S 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运输成本仍然采用萨缪尔森的"冰山"成本形式，用 $\tau > 1$ 来度量。经济生活中，基本经济要素考虑劳动，假设这种劳动具有一定的抽象性，这样农业部门和制造业部门的劳动力就相同，这避免了将农业劳动和制造业劳动的区分，简化了分析的复杂性，虽然这种假设并不合理，但是并不影响对空间经济自组织机制的描述。

在农业部门，由于完全竞争、规模报酬不变以及产品的同质性，可以假设一单位的产出需要一单位的劳动投入，根据利润最大化的原则就有 $p_A = p_{A^*} = w = 1$，最后一个等式表明将农产品价格视为了计价物。对制造业而言，假设北区生产 j 产品的成本函数为：

$$C(x_j) = Fw^{1-\mu}P^{\mu} + a_M w^{1-\alpha}P^{\alpha}x_j = FP^{\mu} + a_M P^{\alpha}x_j \tag{8.10}$$

其中，F 表示固定成本的规模参数，a_M 表示可变要素的边际投入。μ 表示固定成本支出中源于上游制造业的比例，α 则表示可变成本支出中上游制造品的比例。从上面的成本函数可以看出，与核心—外围模型不同，这一成本函数考虑了制造业内部中间产品的投入，也就是说，下游企业的成本中包括了购进上游产品的支出，P 就表示制造业的价格指数，可以表示为：

$$P = \left(\int_0^{n^w} p(j)^{1-\sigma}\mathrm{d}j\right)^{\frac{1}{1-\sigma}} \tag{8.11}$$

$p(j)$代表第 j 种制造品的消费价格，n^w 和 σ 的含义与上一节中相同。另外，通过 8.1 节的研究，我们可以直接写出消费者的间接效用函数为：

$$V = Y/P^{\mu}P_A^{1-\mu} = Y/P^{\mu} \tag{8.12}$$

效用函数表明该代表性消费者的收入 Y 中有 μ 用于制造品，另外的 $1-\mu$ 用于农产品消费。该比例的设定和成本函数中固定成本中的比例相同是为了简化分析。

对比核心—外围模型，这里给出模型推导的几个核心结果①。当市场出清条件后，可以将企业的经营利润写成：

$$\pi = (bE^w/n^w)B,\ \pi^* = (bE^w/n^w)B^*,\ b = \mu/\sigma,\ E^* = E + E^* \tag{8.13}$$

$$B = \Delta^{\alpha}\left(\frac{s_E}{\Delta} + \phi\frac{1-s_E}{\Delta^*}\right),\ B^* = (\Delta^*)^{\alpha}\left(\phi\frac{s_E}{\Delta} + \frac{1-s_E}{\Delta^*}\right),\ s_E = E/E^* \tag{8.14}$$

通过上面的公式可以看出，企业的经营利润和所在区域的需求开支正相关，和本区域的企业数负相关。从本质上讲，这就是后面要分析的市场邻近效应和市场拥挤效应。可以证明，$s_nB + (1-s_n)B^* = 1$，据此，将总支出的表达式写为：

$$E^w = \frac{L^w}{1-\beta},\ \beta = \alpha + \frac{\mu-\alpha}{\sigma} \tag{8.15}$$

① 关于该模型的详细情况请参见金丽国：《区域主体与空间经济自组织》，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并可将支出份额的比例 s_E 写成：

$$s_E = \frac{1-\beta}{2} + \beta s_n B,\ 1 - s_E = \frac{1-\beta}{2} + \beta(1-s_n)B^* \tag{8.16}$$

3. 产业垂直联系时的空间经济自组织机制

存在产业的垂直联系时，空间经济自组织仍然是由三种空间作用力的相互作用而实现的。

第一，市场邻近效应。这种效应可以通过分析式(8.14)来获得揭示。假设经济的初始状态是对称的，现在某些企业由于某些原因(例如税收优惠政策或者土地优惠等)进入了北区的市场，这样在其他条件不变时，根据式(8.16)可知 s_E 就会增加，也就是说北区的总支出水平增加，而这代表了一种市场规模的增加。这是因为企业向北区迁移或者进入将引致劳动力或者居民向北区迁移，而居民既是厂商的劳动力供给者又是产品的需求和消费者。这种情况下，由于空间成本的存在，企业总是偏好于优先选择市场规模较大的区域投资设厂，这就是市场邻近效应。当 s_E 增加时，根据式(8.14)可知 B 会增加而 B^* 会减小，进一步观察可以看出 Π 会增加而 Π^* 会减小，换言之北区企业的纯利润会增加而南区企业的纯利润会减小。因此，会有更多的南区的企业向北区迁移。市场邻近效应的存在会将空间经济中某些微小变动放大形成正反馈，进而产生自组织的循环累积促进制造业的空间集中。

第二，生产成本的关联效应。在核心—外围模型中由于迁移方程是以居民为基准的，因此作为消费者会选择生活成本较低的区域居住。但是存在产业垂直联系时，迁移方程是以厂商为基准的，这是由于此时厂商的成本关联形成的累积效应。仍然假设经济初始状态是对称的，由于某些外部原因使得个别企业进入了北区。这表明北区的企业数量 n 增加，根据价格指数方程(8.11)和成本方程(8.10)可知这会导致价格指数降低和生产成本下降，进一步会提高北区的利润率，由此不断吸引更多的企业进入北区。从纯利润方程可以看出，当 π 为常数的情况下，s_n 增加时，P 相对于 P^* 变小了，所以北区的纯利润就会高于南区。最明显的情况就是当某些上游企业进入北区时，由于下游企业需要上游企业的产品作为投入，这样，大量上游企业的集中在价格指数效应的作用下保证了下游企业的成本下降，进而会引致下游企业的聚集。

在现实生活中很多地区都偏好针对巨型跨国公司的招商引资，但是这些跨国公司，例如丰田汽车、摩托罗拉电子等，都需要一系列的上游产业作为支撑。由于

成本关联效应的存在，这些跨国公司很难考虑会在周边没有上游产品供给的地区投资设厂。为了吸引这些跨国公司，很多地区不得不以零地价或者过度的税收优惠政策来吸引外资，而这也是诱致恶性竞争的原因之一，后面章节我们会进行更加详细的分析。成本关联效应告诉我们，与其零地价政策，不如营造更好的产业链条，帮助下游产业降低成本，进而实现利润最大化。

第三，市场拥挤效应。本节中的模型引入了产业的垂直联系，下游企业使用上游企业的产品作为中间投入品，这构成了空间经济自组织的一个重要组织动力。但是对于市场拥挤效应来说，这种产业垂直联系并不起作用。也就是说，市场拥挤效应和参数 μ 没有关系，为了简化，我们假设 $\mu = 0$。此时假设北区的企业数目增多，那么 Δ 会变大，很显然 B 又会随着 Δ 的增加而减小，较小的 B 又和较低的利润相对应。这就是一种市场拥挤效应。

这种空间经济自组织的过程可以用图 8.9 来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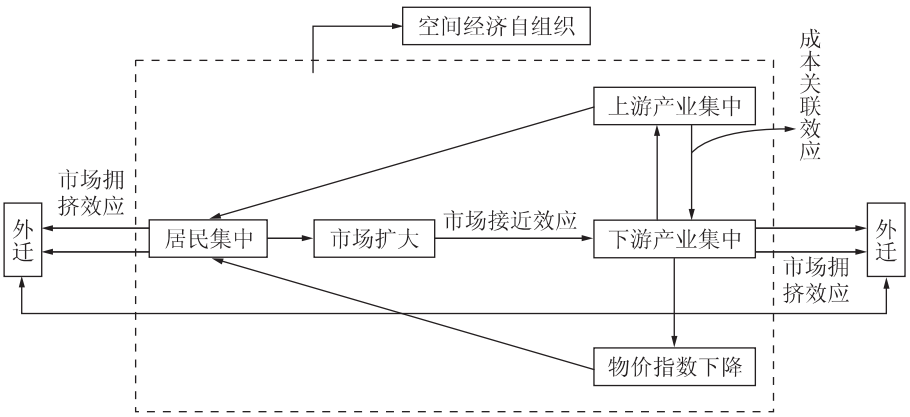


图 8.9　产业垂直联系时的空间经济自组织

在图 8.9 中，对于上游企业来说，其产品价值的实现依赖于下游企业，可以将下游企业的需求看成是上游企业的市场。所以，下游产业集中的区域就会形成上游产业的市场区，也就是说，当存在产业垂直联系时，市场的邻近效应会在两个不同的层面同时发挥作用。一个层面是居民的消费需求对下游厂商形成的市场，另一层面则是下游企业对上游企业形成的市场。同样的道理，成本效应也是在两个层面发挥作用，一个层面是上游产业的集中对下游产业的成本节约效应，另一个层面是下游产业集中直接对居民生活成本的节约效应。可以看出此时的空间经济形

成了两个相互关联的因果累积循环，彼此之间依赖于上下游的产业匹配实现一体化的关联。

8.4 空间经济自组织诱致的区域经济一体化

在大多数经济学文献中，有关产生区域经济合作或者说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第一，来自于多边或双边的协议，例如关贸总协定以及其他多边机构或组织。这些协议是以促进更紧密的国际经济合作以及由此而形成更好的收益为基础的，因此，一些国家愿意加入该区域的经济合作。第二，来自于一个共同的文化和社会制度体系。例如，过去的英联邦国家之间的合作便是以此为基础的。第三，由于地理邻近减少了运输等空间成本，使得一些国家或者区域形成了经济一体化。第四，意识形态或其他的非经济因素的相互影响。例如，在以往的经济互助委员会中，古巴与东欧国家地理位置相距虽然甚远，但由于意识形态相同，也加入了该组织。第五，许多学者从博弈论的视角出发，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不同区域之间竞争与合作的均衡结果。其中，区域地方政府是区域经济利益的主体，也就是说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政府行为推进的结果。那么，区域经济一体化在没有地方政府的作用下是否存在自组织的内在动力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以放在空间的框架下来研究。

经济自组织的结果会呈现出不同的空间结构，前面的模型都是基于两区域和制造业、农业两部类的研究。现在，我们可以放松这一假设，考虑制造业内部各种不同产业的情况，此时，我们省略了对农业的分析。这是因为，从历史上看区域经济一体化都是出现在城市化水平很高的地区或者国家，居民用于食品支出的基尼系数都很低，这样，仅考虑各种非农产业并不会影响到对一体化问题的分析。

现代经济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不同产业链条纵横交错的网络。一方面，产业链条内部投入产出的垂直联系普遍存在，另一方面，不同产业链条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水平联系，这种交错的经济联系构成了经济市场区的范围，经济区域或者空间就是这种经济市场区的一种空间映像。随着空间经济自组织的不断演进，空间经济的网络联系越来越复杂和广阔，甚至突破既定空间边界的约束，形成跨区域的空间市场网络。这种更大经济市场区的形成淡化了原来区域的界限，客观上要求一个新的与该市场区相吻合的区域出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就是在这种市场力量作用下进行的。

8.4.1 单产业链条的空间经济自组织、市场区与经济空间

首先分析单一产业下产业链条的空间经济自组织分布特征以及经济市场区的演变。存在产业上下游联系时，存在两个性质不同的市场，一个是最终消费市场，居民直接购买下游厂商生产的产品进行消费；另一个是中间产品市场，下游厂商购买上游厂商的产品作为中间投入品。通过维纳布尔斯（Venables，1996a）的数值模拟分析可以看到两类产业的空间布局情况。由于我们考虑的是经济发展水平较为发达和接近的区域，假设工资率相同、要素市场无差异，区域间的最终需求相同，下游产业的中间投入品份额为 0.5。在图 8.10 中，横轴为空间成本，纵轴是下游产业（用 n 表示）中的企业数量。其中，$n_1^b = n_2^b$ 表示下游产业均匀的分布在两个不同的区域，也就是空间的分散均衡。点 C 是空间经济自组织的临界点。当空间成本很高时，为了克服空间成本满足最终的消费需求，分散均衡是稳定的，在图中用实线表示，随着空间成本的下降至 C 点，分散均衡不再稳定，空间经济自组织强化了向心力的作用。也就是说，当空间成本很低时，厂商淡化了空间成本影响而对生产成本的差异很敏感（工资率相同），存在大量上游企业的区域为下游企业提供了较低成本的中间投入品，因此会吸引下游厂商过来聚集。反之，下游企业会为上游企业创造市场，增强对上游企业的吸引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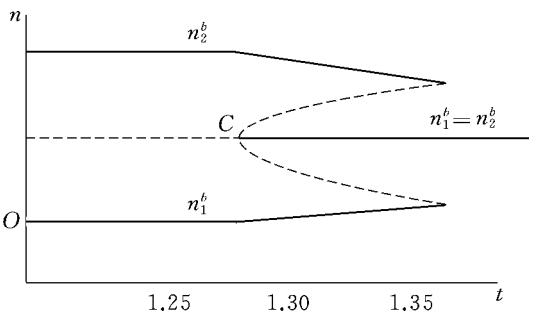


图 8.10 下游产业的区位

上述的分析是基于局部均衡，没有考虑要素市场。然而不同产品生产需要投入的要素是不同的，很多产品生产需要更多考虑区域性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而不仅仅是成本关联效应。随着现代经济交通运输成本的不断下降，上下游产业的确有向同一空间不断接近的趋势，但是，空间成本的大幅度下降也会产生一种离心力的作用——意味着厂商从相互靠近的区位中获利的减少，此时的空间经济自组织

会存在下面几种可能。

第一，具有很强时间价值取向的产业会出现上下游的单区域聚集。例如珠宝和手机这类产品，大型公司间的内在品质相差很小，设计理念与潮流往往是主要卖点，新产品的率先进入市场就会有更大的几率赢得市场。这样，手机的制造商越来越要求上游的配件商在空间上与自己接近，于是这种具有很强时间价值取向的产品生产往往是上下游产业高度聚集在同一区域。

第二，价格敏感、竞争性很强的产品为降低成本会实现上下游的聚集。以汽车为例，全球几大汽车制造企业在家用轿车的技术上没有明显差异，由于家庭对汽车产品的价格较为敏感使得竞争非常激烈，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加剧了这种效应。以丰田汽车为例，该公司可以说是“配件零库存，整车零库存”。丰田汽车的组装配件从供应商的供货、车上卸货，不需要进库房，而是直接上组装流水线。整车下线后也无需进库，而是直接装船，运往预订客户手里。丰田从采购、生产、销售的各个物流环节都做到了零库存，从而大大降低了运营成本。要能为丰田汽车供应零配件，就必须在空间上实现尽可能的接近，零配件厂商围绕丰田汽车的整装实现聚集是最优选择。

第三，对异质性要素禀赋有偏好的也会产生分散均衡。有些产品上下游有很强的差异性禀赋偏好，如稀土产品，其上游是资源禀赋型，需要靠近富含稀土矿藏的地区，但是下游的各种稀土开发品往往是科技型，依赖于高科技的人力资本和技术，这样，上下游企业往往会分别聚集在各自要素禀赋丰富的地区，而不是在空间上实现完全聚集。

第四，相对空间弱关联的产业链条会分布在不同区域。例如很多上游产品不仅仅针对单一的下游产品，同时，下游产品的中间投入品可以由较多的上游厂商来供给，这就是一种空间弱关联的产业链条。这种情况下，上下游产业在空间上倾向于分散分布，换言之，成本关联效应产生的向心力不足以创造最终的聚集。

通过单一产业的空间链条分布可以看出，即便随着交通运输成本的不断下降，关联产业间空间经济自组织的结果并不会出现唯一的空间结构。但是不论出现何种自组织结构，市场一体化的程度必然会持续增强，这是因为只有中间产品市场和最终产品市场高度统一时，才能保证经济的稳定运行。上游企业的产品价值通过中间产品市场由下游厂商购买来实现，下游企业的价值必须在最终产品市场上由居民消费而实现。任何一个市场出现问题都会导致经济运行的紊乱。特别地，当

产业链条出现跨区域的延伸时，原有的市场边界和区域空间边界逐渐模糊。空间经济自组织会根据产业链条的空间延伸调整这一边界，新的经济空间也会根据市场区的范围进行调整，这就形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内部动力。

8.4.2 多产业链条的空间经济自组织、市场区与经济空间

随着经济的发展，分工与专业化水平不断提升，一定经济空间中承载的产业数量越来越多，产业的划分也会越来越细。从每一个产业来看，其产业链条的空间分布依然遵循上述的自组织机制，但是，在多产业的情况下，产业链条之间在空间上会形成复杂的联系网络。图 8.11 是以三个产业链条为例表示的联系网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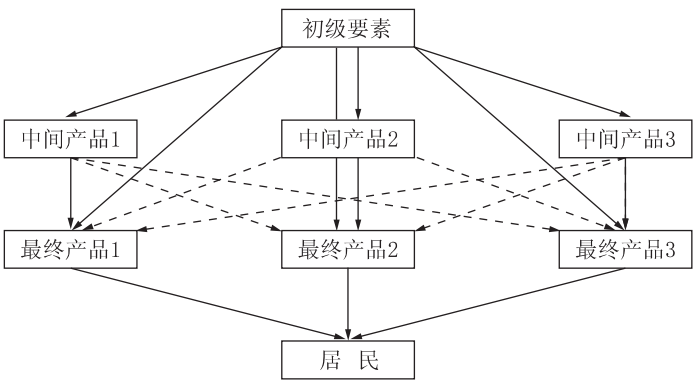


图 8.11 多产业链条的空间经济联系网络

在图中，实线表示确定性的市场流向，虚线表示带有不确定性的市场流向。例如，中间产品 1 和最终产品 2、3 之间的市场关联是不确定的，既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初级要素既包括各种矿产资源等也包括简单劳动力，通过支付空间成本，初级要素可以实现空间流动。每一种最终产品代表一个产业，如汽车、手机等。根据空间经济自组织的理论，每一类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生产的空间位置既可能位于同一区域，也可能位于不同区域，每种要素和产品进入下一个环节都要经过市场的交易行为，于是一个网络状的市场空间就会形成。

随着产业数目的增多，跨越一定区域的市场网络将越来越大，形成的市场网络结构也会越来越稳定。更多的产业链条延伸至原有的区域之外，这使得市场空间扩张力量不断增加，新的经济市场区会随着这种张力的增加逐渐形成。如果说单产业的空间链条延伸只是一种市场区扩张的隐含力量，那么，高度分工和专业化条件下的产业链条的组织网络形成无疑将这种隐含力量变成显性力量。这也回答了

为什么区域经济一体化总是出现在经济高度发达的地区，这是因为经济高度发达必然是因为专业化水平高，而高水平的专业化又与丰富的产业内容相联系，只有经济所容纳的产业数量达到一定程度，才能够形成稳定的跨区域市场空间网络组织。有了这种市场的空间网络组织，经济空间就会逐渐突破原有的边界束缚，产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内在需求。

8.4.3 行政区划、经济空间与区域经济一体化

市场区的动态空间演变和新经济空间的内在需求仅仅构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一种内在张力，这种张力最终体现出来并且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还需要一种显性的推力，这就是地方政府间的合作推动。产业链条和市场区的动态空间延伸首先突破的边界就是行政边界，在现实中，这种由于不同行政区划而产生的空间成本往往是最大的。可以说，市场区的动态延伸和行政区划的束缚是面临的第一层矛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居民和厂商在效用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决策下，会在空间中寻找最优区位，主体的空间动态调整可以化解市场区的调整和行政区划的束缚。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第一层次的矛盾依靠市场力量就可以解决。

当新的市场区范围逐渐形成后，经济空间与原有市场区不一致的矛盾就会尖锐，这是第二层次的矛盾，说到底，这一矛盾的根本在于行政区划和经济区的不一致。目前我国区域经济就等同于行政区经济，行政区与经济区之间的各种矛盾，使区域内统一的共同市场难以形成，最终导致这个区域的经济增长成本加大，增长速度放缓，严重地阻碍了经济区的进一步发展。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新阶段，行政区划制约地区间协调发展的格局不应继续下去，要适时合理调整行政区划，逐步实现从行政区经济向经济区经济的转变。只有这样才能整合经济区内的各种资源，使经济区在全球区域经济竞争中发展成为辐射力更强、更具活力的经济区域，进而提高整个区域的竞争力，提高整个国家的竞争力。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不是行政手段，而是市场导向。生产要素的流向，不是行政区划所能约束和改变的。我们不是不要行政区划，而是不要画地为牢，互相封锁。在经济活动中，应该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弱化“行政区概念”，强化“经济区概念”，打破地域界限，扫清体制障碍，完善各项服务体系，以开阔的视野，探索优势互补、利益共享、多边联动的协作机制，实现人流、物流、资金流的畅通，提升整体经济发展水平。

其实行政区划和经济区之间的矛盾是长期的，仅仅试图对行政区划作出调整

并不能立刻解决这一矛盾。经济区的形成是在分工和专业化的推进下，根据市场区的范围而定的，这种经济区具有明显的功能属性，不同经济区往往就是市场空间网络中的节点。当分工和专业化水平非常高，产品差异化越来越细时，经济区之间的联系就会高度紧密，这种联系体现为竞争与合作的矛盾，这是区域经济一体化中面临的第三层次矛盾。

面对这两个层次的矛盾究竟如何解决呢？这必然涉及其他区域主体的行为。区域协调组织（包括各种非政府组织）和地方政府的行为都会对厂商和居民的空间行为产生影响。但本书旨在揭示空间经济自组织的基本规律，这里主要分析地方政府的行为。本书强调不同类型的地方政府其行为及影响效应完全不同。在本章中，我们集中研究了居民和厂商两主体的空间经济行为，其空间经济自组织的结果最终会产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内在需求和张力，但是，一体化的实现还有赖于地方政府的行为。而这正是后面一章中重点研究的问题。

本章小结

任何经济活动都是由一定主体来完成的，区域经济活动也不例外。遗憾的是，已有的区域经济研究却长期忽视对区域主体的研究。本章以区域主体及空间经济的组织机制为研究内容，探寻区域经济的微观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区域经济研究的主体缺失状态。

本章首先明确了区域主体的内容、特征，并分析了区位主体和区域主体之间的关系。其次，通过新经济地理经典的核心—外围模型，研究了厂商、居民两主体的空间行为，揭示了空间经济的微观组织机制。最后，我们将要素禀赋引入分析，阐述了空间经济自组织和要素禀赋之间的关系。

思考题

1. 分析造成区域经济学长期缺乏微观基础的原因有哪些？
2. 区位主体与区域主体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3. 怎样理解以区域主体的空间行为为基础，从要素禀赋变化的角度分析聚集经济

这一研究路径？

4.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深入，企业的空间行为也会有所变化，这种变化会对空间经济自组织机制产生哪些影响？

参考文献

高进田：《区位的经济学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金丽国：《区域主体与空间经济自组织》，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孙兵：《区域协调组织与区域治理》，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保罗·克鲁格曼：《地理和贸易》，张兆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彼得·尼茨坎普：《区域和城市经济学手册》第一卷，安虎森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郝寿义：《建立区域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想》，《南开经济研究》2004 年第 1 期，第 14—19 页。

郝寿义、安虎森：《区域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梁琦：《产业聚集论》，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版。

普里高津：《从混沌到有序》，曾庆岩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年版。

藤田昌久，保罗·克鲁格曼、安东尼·J. 维纳布尔斯：《空间经济学——城市、区域与国际贸易》，梁琦主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Baldwin, R., R. Forslid, Ph. Martin, G. I. P. Ottaviano and F. Robert-Nicoud, 2003, *Economic Geography and Public Polic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d'Aspremont C., Dos Santos Ferreira, R. and Gérard-Varet, L.-A., 1996, "On the Dixit-Stiglitz Model of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6, pp. 623—629.

Faini, R., 1984, "Increasing Returns, Non-traded Inputs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Economic Journal*, 94, pp. 308—323.

Krugman, P. and Anthony J. Venables., 1995, "The Seamless World: A Spatial Model of International Specialization", NBER Working Papers 5220.

Krugman, P., 1980, "Scale Economies,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and the Pattern of

Trad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0, pp. 950—959.

Krugman, P., 1981, "Intra-industry Specialization and the Gains from Trad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9, pp. 959—973.

Krugman, P., 1991, "History versus Expectation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6 (2), pp. 651—667.

Krugman, P., 1991,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9, pp. 483—499.

Krugman, P., 1995, "The Growing World Trad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bity*, 1, pp. 75—96.

Krugman, P., 1996, *Self-Organizing Economy*, Blackwell Publisher Inc..

Ottaviano, Gianmarco I. P. and Robert-Nicoud, F., 2006, "The 'Genome' of NEG Models with Vertical Linkages: A Positive and Normative Synthesis",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6, pp. 113—139.

Robert-Nicoud, F., 2002, "A Simple Model of Agglomeration with Vertical Linkages and Perfect Capital Mobility", Chapter 1 in *New Economic Geography: Welfare, Multiple Equilibria and Political Economy*, PhD Thesis,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Venables, A., 1994,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Economic and Social Review*, 26(1), pp. 1—17.

Venables, Anthony J., 1996a, "Equilibrium Location of Vertically Linked Industries",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37, pp. 341—359.

Venables, Anthony J., 1996b, "Trade Policy, Cumulative Causation,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49, (1), pp. 179—197.

第 9 章

区域主体与空间经济自组织——基于地方政府的分析

第 8 章对于区域经济自组织的分析较少考虑政府的作用。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恰恰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只有研究了区域地方政府，才能够将区域主体的行为机理真正解释清楚。研究地方政府的空间经济行为，首先就要对地方政府的属性进行界定。本章中，我们给出两种不同的地方政府行为假说，分别是福利型地方政府假说和经济人地方政府假说，地方政府的空间行为分析正是基于这两种假说展开的。

9.1 福利型地方政府与空间经济自组织

假设经济中存在两级政府，即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我们所研究的地方政府是指在一定空间中和中央政府相对应的一级政府。由于不涉及实证分析，这种假设可以避免概念上的含糊不清。①

按照福利经济学的方法，福利型地方政府应该是以地方社会福利函数（social welfare function）最大化为目标函数。遗憾的是，阿罗不可能定理（Arrow's impossibility theorem）却证明在一定条件下根本不存在社会福利函数。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虽然挑战了阿罗不可能定理，成功化解了该定理给福利经济学带来的一些困境，并且构建了“森福利指数”，但是，在空间经济中，我们很难得到能

① 在现实经济中，地方政府既可以是省级政府，也可以为市级政府，甚至可以指乡镇一级政府，所以，直接使用地方政府这一概念并不准确。本章的抽象假设可以避免地方政府所指不清这一问题。

够包含空间区位等因素的福利函数。本章所使用的福利型地方政府本质上是强调地方政府的“利他性”而非“利己性”，既然是“利他”，地方政府就会通过自身的空间经济行为，使居民效用最大化和厂商的利润最大化①，这样虽然不够严谨，但是可以化解社会福利函数无法获得的困境。

9.1.1 福利型政府的空间功能

1. 外部性、公共物品与地方政府

在马歇尔那里，空间的外部性是聚集经济实现的重要原因，当然这里指的是一种正的外部性经济。但是，负的外部性或者说外部不经济在空间中也是经常存在的。这种负的外部性存在会打破经济自组织的内在机制，削弱社会福利所得，地方政府应该纠正这种负的外部效应，维护自组织机制的正常运行。

关于生产的空间外部性论述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逐渐形成，亨德森(Henderson，1977a，1977b)、赫斯曼(Hochman，1978)、斯道尔(Stull，1974)都有规范表述。梅奥(1980，1981)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形成了完整体系。

以竞标地租函数来分析的话，当存在空间负的外部性时，居民的竞标地租函数就会受到这种外部不经济的影响而偏离。这种负的外部性越大，其他条件相同时，一定区位上的居民对地租的竞价水平越低。可以想象，若在经济中心区出现这种空间的外部不经济，居民的竞标地租函数曲线的斜率就会变得平缓，打破了杜能竞标地租曲线斜率随着远离中心区而递减的规律。存在负的空间外部性时，若无政府的适当干预，空间均衡时同样的城市用地上，居民聚集数量将相对减少，厂商数量和用地规模将会增加，生产效率、就业密度相对下降，城市空间结构紊乱。

除了纠正这种空间外部性产生的空间失灵，为所辖区域提供适宜的公共物品也是地方政府的重要职能。奥茨(Wallace E. Oates)在《财政联邦主义》一书中，认为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在提供公共品上存在着效率差异，中央政府由于要等分每一人口子集的物品所遇到的有约束力的限制条件，使其在配置资源的功能上不如地方政府。“对于某一种公共品来说——关于这种公共品的消费被定义为是遍及全部地域所有人们的子集，并且，关于该物品的每一个产出量的提供成本无论对中

① 虽然居民效用最大化和厂商的利润最大化有时会矛盾，例如存在空间负的外部性时，但是，我们假设地方政府能够通过一定的方法克服这种外部性的效应，以保证居民效用最大化和厂商的利润最大化能够一致。

央政府还是对地方政府来说都是相同的，那么，让地方政府将一个帕累托有效的产出量提供给它们各自的选民总是要比由中央政府向全体选民提供任何特定的并且一致的产出量有效得多。”①

2. 维护聚集经济

空间经济最重要的景观就是聚集，它是空间经济自组织的必然结果。通过区位竞争，在聚集利益的作用下，能够享受到最大聚集收益的经济主体必然愿意支付最高的竞租价格，从而获得该区位土地的使用经营权。市场机制的运行保证了每一区位上的土地都由出价最高者获得，从而边际土地生产率达到最大。这从根本上保证了区域空间结构最优化的实现。地方政府必须维护由市场机制产生的有序空间秩序，防止诸如垄断等不正当行为对这一机制的破坏。

另外，在一定的经济空间中，企业和家庭两主体会形成具有内生自组织机制的空间组织系统。该系统的运行是经济空间演化的主要微观内容，也是空间经济增长的基础。为了保证区域空间经济的有效运行，地方政府就需要在依据自组织规律的前提下，维护自组织运行机制。追求区域福利水平最大化的地方政府，更多的是以社会功能人的身份参与经济运行，依据市场运行需求，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纠正各种负的外部性，从而强化了经济自组织系统，起到放大效应。

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分工与专业化的加深所产生的区际分工和联系、空间自组织边界的延伸都会导致区域经济的不断融合，地方政府作为区域主体的代表应该积极推动区域合作与一体化进程，实现共赢与和谐发展。

地方政府的空间功能并不是彼此割裂的，而是有机统一的。对区域经济发展来说，主要的动力源于自组织的聚集经济，维护自组织机制的健康运行和促进聚集经济的空间累积构成了地方政府空间功能的中心。纠正空间负的外部性、提供公共产品以及干预不完全竞争的空间市场都是为实现这一中心职能而服务。

作为福利型地方政府，实现上述职能的主要途径之一是制定并实施区域空间规划，创造相应的区域经济发展环境等。

3. 干预不完全竞争市场

在空间经济中，如果一个企业的市场在空间上与其他企业相隔开，或者虽然在空间上分布了多家企业，但是各自的市场区不接触或者互不重叠时就出现空间垄

① Oates, W. E., 1972, *Fiscal Federalism*,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New York, p. 35.

断。因此，在处于垄断地位的企业所控制的空间中，价格会明显高于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的市场价格，消费者剩余减小甚至为零，消费者的福利受到损失。另外，与完全竞争相比存在明显的生产资源浪费，这是因为生产是在生产成本高于最低平均成本处保持均衡，因此资源未能得到最优配置。

空间垄断的出现是市场失灵的重要表现，无论是社会福利损失还是资源的浪费，福利型地方政府都应该给予纠正。对于某些自然垄断的行业，如天然气等因具有很强的规模经济效应而形成垄断，由于“自然垄断”阻止了其他企业进入，而打破垄断又是社会不合意的（分割规模经济的市场会提高产出的平均成本），这样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价格管制就是必需的。政府通常会进行限制定价或者指导定价，防止企业自主定价过高侵害居民福利。在经济生活中，真正的空间垄断是很少的，更多见的则是空间的寡头垄断和垄断竞争。

空间的寡头垄断问题相当复杂，相互依存的厂商间既可以进行价格竞争也可以进行产量竞争。我们这里关注的是地方政府的行为，而非针对空间寡头问题进行一般分析。理论研究表明，企业间竞争对社会福利的促进作用与市场上产品差异化程度密切相关。例如在空间寡头垄断企业的伯川德模型中引进产品差异化，均衡价格随着两产品相互的替代系数的增大而减小，也就是两厂商生产的产品越相似，市场价格越低，竞争也就越激烈，消费者得到的福利越多。在一定的经济空间中，我们并不能确定寡头之间究竟是产量竞争还是价格竞争，也有学者认为，相互依存的企业间既有价格博弈也有产量博弈。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尽可能增进福利和提高市场效率是其重要目标，一方面应该防止寡头之间串谋形成卡特尔等组织；另一方面可以通过空间规划和产业政策促进寡头间的竞争，例如将软件产品生产者规划在同一空间内，这既可以强化溢出效应，加速知识传播、流转，利于技术创新，又能够通过竞争的激励增进社会福利。

在垄断竞争市场上，由于存在差别产品，生产者面临向右下方倾斜的需求曲线，因而仅能获得正常利润的长期均衡厂商不能实现最低成本生产和最优规模生产。所以，垄断竞争厂商常在有剩余生产能力的情况下经营，效率自然比完全竞争低。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差别产品易于替代，需求弹性大，实际存在的闲置生产能力又比较小。有的经济学家认为，垄断竞争中存在的产品差别可以满足消费者多方面的需要，有助于增进消费者的福利。在非价格竞争中，厂商必须不断开展技术创新、提高产品质量、改进服务方式，也有利于增进消费者的福利。在这一点上，完

全竞争市场就相形见绌了。在完全竞争市场上，产品价格虽然低廉，但完全同质的产品无法适应消费者需求的多层次性。而且，厂商在创新上也缺少动力。

9.1.2 福利型地方政府的区域经济政策与空间经济自组织

研究和认识区域经济自组织规律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而是为制定科学、合理的区域经济政策服务。区域经济政策的种类众多，囿于篇幅安排，无法一一展开，这里分析的重点在于分析引入区域经济政策对于区域经济自组织的影响。

图 9.1 分析了当区域经济政策引致区域经济开放度提高时区域经济的自组织状况。依然使用核心—外围模型的研究成果，这里，横轴表示经济开放度，用 ϕ 来表示，纵轴表示北区所占的工人劳动力份额。根据核心—外围模型，区域空间的自组织和经济开放程度有着直接关系。图中，加粗的黑色实线表示稳定均衡，当经济开放度较低时，南北两区是均匀分布的；当经济开放程度大于 ϕ^B 时，区域经济或者完全集中到北区或者完全聚集到南区；当经济开放度 $\phi^S < \phi < \phi^B$ 时，处于交迭区域，即有三个可能稳定均衡。现在假设经济的初始点在 E_1，对应的开放度为 ϕ^0，区域政府实行更加开放的区域政策致使开放度变为 ϕ'，此时经济稳定均衡在 E_2，从产业布局来看，两个功能区的工人比例没有变化。但是，如果政策引导开放度继续增加相同的量直到 ϕ''，此时区域经济将发生质的巨变，相同力度的区域经济政策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经济结果，区域经济将实现完全聚集，这里假设北区的要素禀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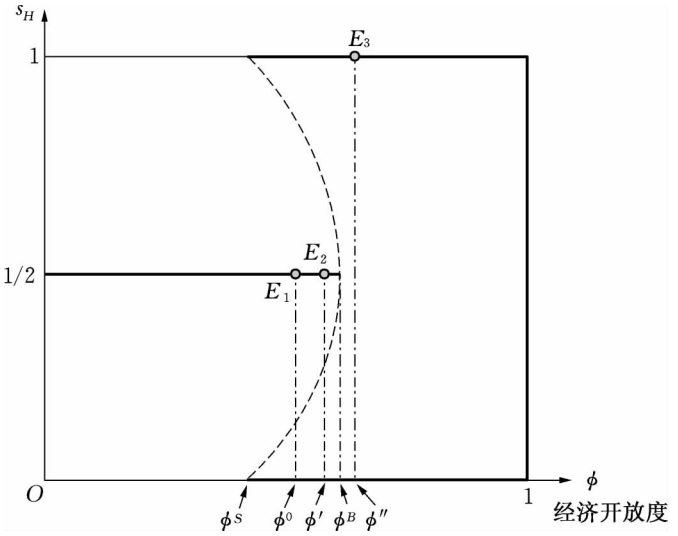


图 9.1 政策引致的经济开放度变化与空间自组织

在这种区域政策中得到极化，这样经济将完全聚集到北区，均衡点为 E_3。该例子说明，区域经济政策具有强烈的非线性特征，相同的区域经济政策在不同的条件下可能将产生质的差异，而非仅仅是量的不同。区域经济政策的制定、运用，首要的是先理解当前区域经济的自组织状况，在本例中，区域政府必须先掌握当前区域经济运行的质变点即 ϕ^B 和 ϕ^S。

9.1.3 区域空间规划与空间经济自组织

区域经济的自组织既有可能产生良性的累积机制，也有可能造成消极、负面的恶性循环。纳克斯(Nurkse)的“一个国家之所以穷是因为它穷”就是这种恶性循环的生动写照。

对于内生良性累积运行机制的自组织，许多学者主张区域政府的无为而治。但实际上，自组织的运行需要高度完善的市场制度体系，作为政府，维护这种制度的稳定运行也是应有之意。而且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经济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自由、大量地流动和不断地重组。巨大的经济资源在哪里落户并聚集，哪里的经济就会有更快的发展。而除自然禀赋外，国际经济资源驻足的前提从本质上讲并不是靠多么特殊的优惠政策，而是看是否有良好的市场环境和规范的市场机制，这正是我们所提出的要素禀赋。因此，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不同国家的各个区域空间规划纷纷通过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创造优美的环境、建立高新技术开发区等措施，积极培育和发展本区域的创新网络，不断“黏附”国际上流动的资金、知识、技术等生产要素及其携带载体——跨国公司的入驻，并与之合作和竞争，为本区域的快速、持续发展打下基础。这表明，区域空间规划可以增强要素禀赋，进而改变区域经济自组织的空间赋存，起到加速经济发展的作用。

经济全球化使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流动加速，逐步实现全球资源的优化配置，边界的限制被打破，改变了区域产业和空间结构主要根据区域的地理位置和区域资源禀赋进行布局的规律。国家和区域的产业和空间结构布局战略制定应由因地制宜转向因时就势，必须认识到本国或本地区的经济已成为世界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产业是全球产业链上的一环。对产业结构的调整，除了要分析本地区的自然条件、产业基础和相关制度，更要注重全球的产业演变规律，主动参与全球的分工和合作，以全球经济协调发展和充分发挥地区经济优势相结合、经济现状与远景发展相结合、区内劳动分工与区际分工相结合、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及社会全面进步相协调等为原则，不断地改变和调整各自的区域布局，根据区域间和区

域内部协调发展的需要，明确产业布局和空间布局，集中人才、资金、创造局部优势，发挥更大更强的集聚作用，实现资源要素更广、更强的扩散作用。

对于恶性累积的自组织区域，打破这种恶性机制是解决发展瓶颈的关键。这时，政府力量作为自组织系统的外部效应将发挥重要作用。经济贫困、落后地区的恶性累积机制主要表现为劳动力长边不断替代资金技术的短边，导致空间要素禀赋越来越集中到适宜低级产业的简单劳动力上来。很多地方解决贫困的方法，主要局限在对基础设施（特别是道路、交通）的集中投资上，但是，解决区域贫困问题需要多种手段的综合治理，经验表明，简单的直接投资的效果并不显著。区域空间规划也是解决区域贫困的重要方法之一。区域空间规划可以从不同层面来瓦解这种恶性累积机制。一方面，通过规划手段直接或间接提供更多的金融设施、机构和服务，强化资本、技术对简单劳动力使用的约束，逐渐引导人们对劳动力的替代。这种约束的实现需要新型产业的支撑，这可以通过区域空间规划引导发达地区将产业链条延伸至落后地区来实现，这种延伸既有利于发达地区的产业获得新市场和低价劳动力，又有助于落后地区实现资本、技术对劳动的替代。另一方面，区域空间规划要更多地考虑人力资本的积累，在适宜的空间设置各种教育机构，实现人力资本的可持续增长是阻断恶性机制运行的关键。

9.1.4 自组织、区域空间规划与经济功能区

由于我国长时间的相对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不同区域形成相对独立的经济体系，大而全、小而全是各区域普遍的发展模式。为了便于计划管理，行政区域成为各种场合的标准尺度。随着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和经济全球化影响的加深，行政直接干预逐渐淡化，市场自组织的作用越来越强，而经济全球化则强调发挥比较优势深化分工网络。区域经济发展要求依据空间要素禀赋实现自组织，原来大而全、小而全的空间组织不再适应经济形势。另外，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各种要素资源相对短缺，原有的区域组织为了实现本区域的经济增长，使用各种手段争夺资源成了普遍现象，造成空间经济资源配置的失灵，与科学发展观和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难以协同。

在这种背景下，就需要科学运用区域空间规划，促进区域间和区域内部依据要素禀赋实现空间分工，以不同经济功能区为单位，形成和谐的区域经济发展景象。结合图 9.2 来说明区域空间规划和经济功能区的关系。假设某区域包括四个板块，每个板块生产四种（图中用 1、2、3、4 表示）产品。图 9.2(a)中说明不同板块

间完全自给自足，形成大而全、小而全的封闭模式，彼此间没有市场联系，经济主要靠计划指令来实现运行。随着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每个板块生产的产品种类降到了三种，舍弃了最先被认识到不适宜发展的产业，相对图 9.2(a)而言，图 9.2(b)出现了市场联系，经济的一体化程度加深，由于每个区域开始注重要素禀赋的作用，空间分工发挥了比较优势，经济的聚集程度也加强了，其产生的经济总量相较图 9.2(a)扩大了许多。在图 9.2(c)中，各板块在市场的作用下，实现了完全分工，分工的空间网络将市场的一体化程度推向更高程度，经济的聚集度和总量也都比图 9.2(b)中更高，形成了四个不同的经济功能区。这种经济功能区由于高度的专业化，可以实现在全球的资源重组和配置，由于实现了完全分工，不同功能区之间的关系不再是竞争，而更重要的是协作，抢夺相同经济资源的现象也就消失，区域内不同功能区之间在市场网络的组织下，协同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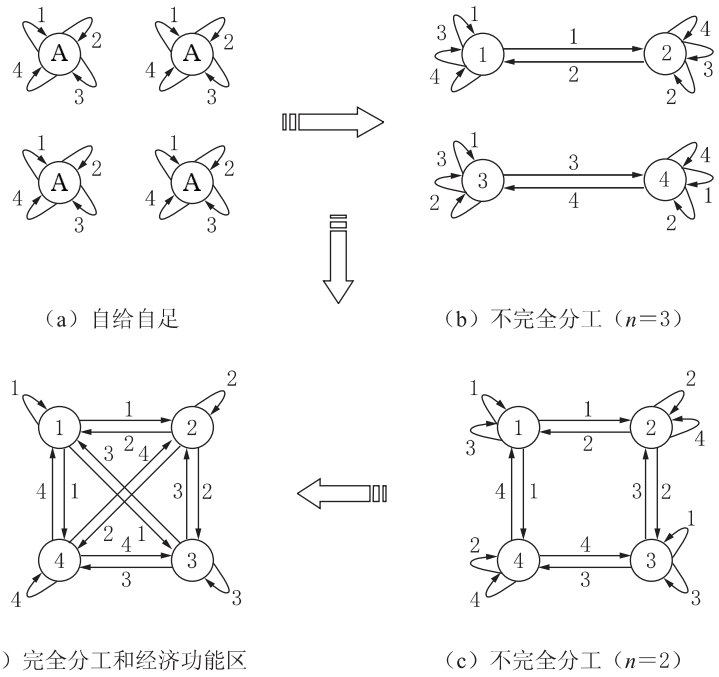


图 9.2　区域分工的演进和经济功能区的形成

上述经济功能区的出现和演化，是在市场的力量下自组织实现的。但是，依靠经济的自组织实现产业的变迁和空间分工、专业化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现在，认识到这种机理，我们就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科学制定区域空间规划，引导经济

快速实现空间分工，依据不同的空间要素禀赋，规划不同的经济功能区，并且通过配套的产业政策等实现功能区的快速发展和产业的空间聚集。

这里，我们所强调的区域空间规划既不是“长官意识”的自上而下型，也不是简单的自下而上型。这种区域空间规划首先强调对区域自组织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制定的规划必须与自组织规律相吻合，而以前单一的自上而下型区域空间规划往往体现为市场适应行政计划，是一种客观适应主观、有悖市场经济规律的行为。这里我们所分析的区域空间规划深刻体现了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有机结合。

但是，这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有机结合的区域空间规划要求区域地方政府是典型的社会福利人，否则，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冲动将使其偏离社会最优轨道，区域空间规划的有效性也就难以保证。从现实来看，我国的区域地方政府则扮演了典型的经济理性人角色，追求大而全、小而全的区域产业来保证所辖区域的产值或可支配收入的最大化。

9.2 经济人地方政府与空间经济自组织

9.1 节的分析和研究都是依据福利型地方政府的假说为基础展开的，这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分析范式相同。然而，在公共选择理论中，政府却被定义为一种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理性人。而在我国的现实经济中，地方政府也的确是经济活动的重要主体，不针对这一重要主体进行分析，我们很难完整、准确把握空间经济自组织规律。

本节假设，地方政府是以追求可支配收入最大化为目标的经济理性人。[①]作为经济人地方政府，其目标函数已经游离于厂商和居民最优利益之外，形成了面向自己的目标函数。与中央政府进行博弈，不同地方政府间的竞争是经济人地方政府的重要表现。

9.2.1 经济人地方政府的特征

其实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地方政府以经济人的角色进入时，从一定意义上也就是一种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组织。但是，作为一个经济组织的地方政府

---

① 我国的地方政府经历了从福利型到经济人型转变的过程，关于描述这种转变的地方政府行为变异可参考金丽国：《区域主体与空间经济自组织》，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在这本书中，作者详细分析了经济人型地方政府为什么是以可支配收入最大化为目标而不是以追求 GDP 最大化为目标。

和其他经济组织相比有很多不同之处。在这些不同之处中，政府有三大显著特性：第一，政府是一个对全体社会成员具有普遍性的组织；第二，政府拥有其他经济组织所不具备的强制力；第三，地方政府拥有较其他任何经济组织更大的资源优势。①地方政府这样表述是有意义的。在很多理论中，将地方政府视为层级组织进行研究，而在本书中，地方政府就是区域的主体之一，是作为一个整体组织进行研究，强制力和资源优势在我们的研究中是需要明确突出的。相比起福利型的地方政府而言，经济人的属性会赋予其更多新特征。把握这种新特征对于准确分析经济人型的地方政府有着重要意义。

在同中央政府的关系中，福利型地方政府会与中央政府形成就预算内财政收入分配的博弈关系，包括财政转移支付等。除此之外，对于中央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的数量、区位等也会形成一定的博弈关系。例如就中央投资某条高速铁路如何进行线路布局，地方和中央就会形成讨价还价式的博弈。当行为主体演变为经济人型时，这种博弈关系就会更加复杂。除了仍然会面对的纵向财政博弈，在目标和行为方式上都会存在博弈行为。首先，由于两级政府的目标不同会形成博弈。地方政府会通过信息掩饰或者传递虚假信息来显示和中央政府的目标一致。在这里的研究中，我们强调地方政府在一定空间的衍生性，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强烈显示为中央对地方的派生性。中央派生的地方政府若与上级的目标不一致可能会导致重新派生。地方政府为了保证自身的组织利益，会向中央隐藏自己的真实目标，进而形成博弈。其次，中央对自己委派的地方政府行为有着明确的规范。但是，由于对地方可支配收入最大化的追求，地方政府行为必然偏离规范要求，形成在“合理的框架”内进行不合理的行为博弈。

对于一个经济人的地方政府，由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支配，与同级地方政府间体现出很强的竞争性。这主要表现在为争夺中央的资源而进行的竞争，为吸引外来资本进行的各种竞争博弈等。就福利型地方政府讲，上述博弈也会存在。但是，当彼此间竞争产生的效率损失影响到区域的福利增进时，福利型地方政府会寻求彼此间的合作。而经济人地方政府则由于对自己利益的追求很难形成内生的合作机制。

---

① 约瑟夫·E. 斯蒂格利茨等：《政府为什么干预经济》，郑秉文等译，中国物资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5 页。

从某种意义上讲，任何地方政府都会同上级政府部门在资源和控制权分配等方面处于竞争状态，同时，又会与其平行的地方政府之间产生竞争。从空间经济学的视角审视，所谓地方政府竞争是指地方政府间为了获得更高的经济总量（地区GDP）或者更高的地方可支配收入，围绕流动性要素、土地使用以及税收优惠等方面展开的竞争。[①]就初始动机看，地方政府竞争往往是基于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吸引更多的企业和居民聚集。在能够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居民和厂商会根据各辖区公共品供给状况和税收状况，依据效用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的原则进行最优的区位选择和再选择。而居民和厂商的这种流动本质上是一种要素流动，必然会引起空间经济的重新配置和调整，流入地的聚集经济强化同时也是流出地经济削弱的过程，因此，为了吸引更多的居民和厂商，地方政府间必然会在公共产品供给和可控制的税收方面展开竞争。但是，随着地方政府行为属性的变化，税收总量、可支配总收入的竞争就成为其竞争的主要内容。

9.2.2 空间经济视角的税收竞争

在空间经济的视角下研究税收竞争，最突出的特征在于聚集经济的存在。由于聚集经济的存在可以使流动要素变成准固定要素，流动要素的空间重置必须考虑聚集租金的作用。这里的聚集租金是指企业和居民从聚集经济中所得到的“收益”。在现实生活中，流动性要素对税率的反应并不具有完全弹性，而是在一定的区间呈现出无弹性。为了获得更好的公共服务更多的聚集经济效应，即使外围区域降低了税率，但并不会使流动性要素从发达区域流出进入低税率区域。不过可以想象，当税率低过某一阈值，核心区的产业就会流走进入外围区域，呈现出产业和要素空间重置的景象。对此我们可以使用新经济地理的框架分析这一问题。

1. 基于C-D函数的核心—外围模型的问题

克鲁格曼等人发展和完善的核心—外围模型已经成为新经济地理的奠基性文献，该模型深刻揭示了空间经济组织的内在动力和机制。本书在第6章和第7章相关研究中使用的就是该模型和基于该模型的拓展。但是，就我们所分析的问题而言，核心—外围模型存在如下一些问题：

---

① 对地方政府竞争的概括参考了魏后凯主编：《现代区域经济学》，经济管理出版社2006年版，第599页。

首先，过分依赖于计算机的数值模拟。由于空间经济的非线性特征，核心—外围模型无法获得解析解，需要依靠数值模拟得到结论。这种数值模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新经济地理在政策研究领域的应用。

其次，完全聚集而形成的核心与外围空间分异在现实中很少存在。很少有区域是没有非农产业聚集的完全外围空间，也就是说，局部聚集更接近于真实情况，重要的是聚集程度不同而不是是否存在聚集。

最后，过强的累积循环效应所描述的动态空间与现实不吻合。核心—外围模型所描述的空间一旦越过某一临界点，就会出现灾难式(catastrophic)的聚集或者分散，但是我们很难观察到这种灾难式的空间景象。按照这一思路，税收竞争的结果必然是优胜者实现完全聚集而失败者则为零税收，而这是不可能的。

这种灾难式聚集或分散的来源是核心—外围模型中市场邻近效应和成本关联效应存在很强的累积因果关系，而这是因为柯布—道格拉斯效用函数的作用使然。使用 C-D 函数，每一次所增加的收入中必然有一部分会用于工业品的消费，这会扩大市场份额进而吸引更多的厂商，这表明，空间的收入效应只要在工业品中得到体现，这种累积因果循环就不会停止。普鲁格(Pflüger，2004)构建了一个基于拟线性效用函数的新经济地理模型，由于剔除了工业品上的收入效应，该模型得到了局部聚集均衡。

当然，福斯理德(Forslid，1999)，福斯理德与奥塔维诺(Forslid and Ottaviano，2003)都研究了可解的核心—外围模型。但是，由于沿用了 C-D 函数，仍然不可能得到局部的聚集均衡。另外，普鲁格的模型更加容易操作，对于拓展到税收竞争问题也显得比较方便。下面的分析就是融合了普鲁格与伯克和普鲁格(Borck and Pflüger，2006)的成果而展开的。

2. 基于拟线性效用函数局部聚集的新经济地理模型

假设经济中存在生产制造品和农产品的两个区域，分别称之为南区和北区。两种生产要素分别为不能跨区域流动的劳动力(L)和可跨区域流动的资本(K)，其中资本我们以资本所有者企业家来替代。其余假设与 8.1 节相同。

假设效用函数、生产函数以及成本函数分别为：

$$U=\alpha\ln C_M+C_A,\ C_M=\left(\int_{i=0}^{n+n^*}x(i)^{1-(1/\sigma)}\,\mathrm{d}i\right)^{1/(1-1/\sigma)}$$

$$H=R+a_m x,\ \sigma>1,\ \alpha>0 \tag{9.1}$$

这里特别要说明的是，成本函数中的 R 表示人力成本，这里代表一种固定成本投入。定义工业品价格指数为：

$$P=\left[nP_i^{1-\sigma}+n^*(\tau P_j)^{1-\sigma}\right]^{\frac{1}{1-\sigma}},\ \sigma>1 \tag{9.2}$$

消费者要在一定的收入水平下，实现效用最大化，消费者面对的问题可以表述如下：

$$\begin{matrix}\max \alpha\ln C_M+C_A \\ \text{s. t. } PC_M+C_A=E\end{matrix}\Rightarrow C_M=\alpha/P,\ C_A=Y-\alpha$$

这里将农产品视为计价物，所以价格为 1。考虑消费者的成本最小化，将所得一阶条件代入预算约束式，经过推导整理可得到需求函数和间接效用函数：

$$\begin{gathered}x(i)=\alpha p(i)^{-\sigma}P^{\sigma-1},\ x(j)=\alpha(\tau p(j))^{-\sigma}P^{\sigma-1}, \\ V=-\alpha\ln P+E+\alpha(\ln\alpha-1)\end{gathered} \tag{9.3}$$

通过选择单位，令 L_A 表示劳动力投入，农产品的生产函数为 $C_A=L_A$，考虑农产品市场的完全竞争性，工资 $W=1$。

现在考虑企业的情况，以北区的企业为例，其产品既在本区域销售，也会在南区销售，用 $p(i)^*$ 表示北区代表性企业在南区的销售数量，则代表性企业的目标函数可以表示为：

$$\begin{aligned}\max \Pi=&(p(i)-a_m)(L+K)x(i)+\\&(p(i)^*-a_m)(L^*+K^*)\tau x(i)^*-R\end{aligned}$$

根据本章中的相关方法，很容易求得价格和销售量为：

$$p(i)=p(i)^*=a_m\sigma/(\sigma-1),\ \bar{x}=\frac{R(\sigma-1)}{a_m} \tag{9.4}$$

3. 均衡分析

均衡分析涉及短期均衡和长期均衡。短期均衡中人力资本企业家是不流动的，企业实现零利润。而在长期中，企业家可以跨区域自由流动，这种流动方向是指向能够给其带来更高效用水平的地区，直至差异消失。我们首先分析短期均衡。

假设每个企业使用一名企业家，而短期均衡时满足零利润条件，加上企业的价格方程和需求方程，可以得到：

$$\sigma R = \frac{\alpha(\rho+\lambda)}{\lambda+\phi(1-\lambda)} + \frac{\phi\alpha(\rho^* +1-\lambda)}{\phi\lambda+(1-\lambda)},$$
$$\sigma R^* = \frac{\phi\alpha(\rho+\lambda)}{\lambda+\phi(1-\lambda)} + \frac{\alpha(\rho^* +1-\lambda)}{\phi\lambda+(1-\lambda)} \tag{9.5}$$

这就是空间短期均衡的条件，所有的企业获得零利润。下面分析长期均衡。长期均衡最重要的关注变量就是间接效用函数的大小，为此定义 $\Omega(\lambda) = V - V^*$，由间接效用函数我们可得到：

$$V - V^* = \alpha\ln(P^*/P) + (R - R^*)$$

结合短期均衡条件方程，有：

$$\Omega(\lambda) = \frac{\alpha}{1-\sigma}\ln\left[\frac{\lambda\phi+(1-\lambda)}{\lambda+(1-\lambda)\phi}\right] + \frac{\alpha(1-\phi)}{\sigma}\left[\frac{\rho+\lambda}{\lambda+(1-\lambda)\phi} - \frac{\rho^* +(1-\lambda)}{\lambda\phi+(1-\lambda)}\right] \tag{9.6}$$

长期均衡的条件就是 $\Omega(\lambda) = 0$。

很显然，当 $\lambda = 1/2$ 时，也就是对称情况总是一种均衡解。通过长期均衡方程可以分析空间聚集的两种作用效应。第一种效应就是等号右边的第一项，代表了成本关联效应。当北区的企业家越多时，制造业部门越大，进而有更低的价格指数。第二项则代表了一种市场邻近效应，增加人力资本就会增加市场容量，这会增加企业的利润，也就是 $R - R^*$，进一步这又会吸引更多的人力资本。这里，贸易开放度或冰山成本起到了重要的平衡效应。图 9.3 是在 $\rho = \rho^* = 1$，$\sigma = 6$，$\alpha = 0.3$ 的条件下的数值模拟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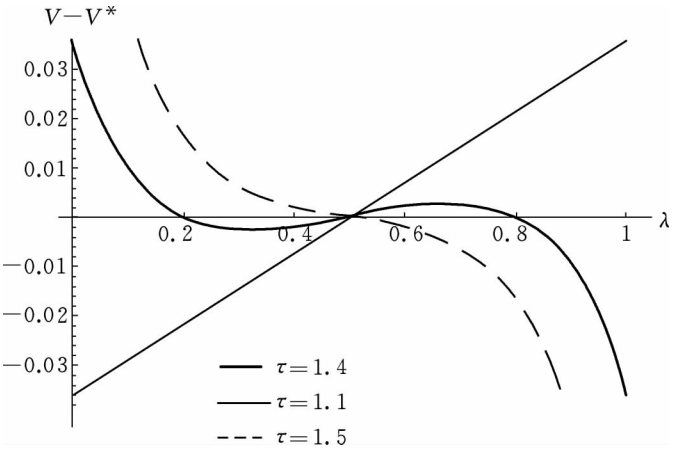


图 9.3　数值模拟

数值模拟的结果显示，当空间成本 τ 很高时（$\tau = 1.5$），分散是空间的唯一均衡；当空间成本下降（$\tau = 1.4$），两个稳定的非对称均衡就会出现；若空间成本极低（$\tau = 1.1$），接近空间一体化时，此时两个区域分别承担不同的专业化分工，呈现非对称的均衡。

在前面分析中提到了本模型和核心—外围模型的关键区别，对此可针对方程(9.6)进行深入探讨。根据方程(9.6)，假设一单位的人力资本从初始的对称均衡状态由南区进入北区，则人力资本的回报 R 会增加。此时，若是 C-D 生产函数，增加的 R 就会有一部分用于增加工业品消费，进而产生很强的累积需求关联效应；但在拟线性效用函数下，增加的 R 对工业品没有收入效应，这就减弱了累积效应，使得局部均衡成为可能。

由此可以看出，基于拟线性效用函数的空间经济组织依然是由两个向心力和一个离心力所实现，运行的机理同样遵循自组织的原则，所不同的就是代表这种自组织机理的累积因果关系在此被大大削弱了，而这恰恰反映了现实生活中存在大量局部聚集的空间景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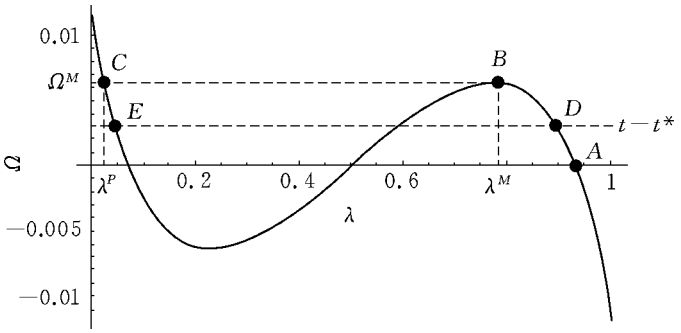
9.2.3　税收竞争与空间经济自组织

下面，我们在上述模型的基础上引入经济人地方政府，在公共选择和公共财政领域这种地方政府又被称为利维坦政府（Leviathan government）。当考虑地方政府的行为时，首先必须面对税收的作用。我们将通过分析表明地方政府间的税收竞争和空间经济组织运行之间的联系机制，同时还要证明，预算外收入的获得也与

这种机制密切相关。

1. 地方政府的目标函数

假设地方政府只对流动性要素征税，$K=K^*=1$，于是，$K^W=2$。这样，不同区域间间接效用差异方程就变为：$\Omega(\lambda)-(t-t^*)$。考虑税收时的空间局部均衡在图 9.4 中有表示，根据显示，D 和 E 是两个稳定的局部均衡，其中 D 点表示北区是相对核心区（并不是全部制造业聚集地）而 E 点表示南区为相对核心区。定义参数 λ 是税收差异的函数，即可以表示成 $\lambda(t-t^*)$，$0\leqslant\lambda\leqslant1$，在这个范围内，图中的几个参数的含义为：



资料来源：Borcka，R. and Pflüger，M.（2006）"Agglomeration and Tax Competition"，*European Economic Review*，50，p. 658.

图 9.4　局部聚集的数值模拟

$$\lambda^M=\operatorname{argmax}\Omega(\lambda),\ \Omega^M=\Omega(\lambda^M),\ \lambda^P=\max\{0,\ \lambda^L\}$$

其中，λ^L 定义为：

$$\Omega(\lambda^L)=\Omega(\lambda^M) \tag{9.7}$$

对于地方政府的目标函数，鲍德温与克鲁格曼（2004）作了如下的处理：

$$W(t,\ \lambda)=G-t^2/2,\ G=2t\lambda(t-t^*)$$
$$W^*(t^*,\ \lambda)=G^*-(t^*)^2/2,\ G^*=2t^*[1-\lambda(t-t^*)] \tag{9.8}$$

此时的空间经济的聚集形式依然保持三种形式：分散均衡、完全聚集均衡和局部聚集均衡。分散均衡不是我们考虑的重点，在此不作进一步的分析，下面，主要针对完全聚集和局部聚集进行探讨。

2. 完全聚集时的税收博弈和空间经济自组织

完全聚集时的分析在鲍德温与克鲁格曼(2004)中有着详细分析，下面的表述来自伯克和普鲁格(Borck and Pflüger，2006)的相关部分。

假设空间成本很低，可以保证间接效用的差异在 $\lambda = 1$ 处取得最大值，这就保证了完全聚集的实现。下面的税收竞争将通过两个地方政府间博弈的形式来阐述，鲍德温和克鲁格曼(2004)认为这是一个三阶段动态博弈。第一阶段作为经济核心的北区首先选择税率 t，第二阶段外围的南区选择税率 t^*，第三阶段就是根据市场实现空间配置。我们使用逆向方法求解博弈均衡。

首先考虑第二阶段，南区面对北区的税率 t 有两种选择，或者选择不竞争，保持原有的核心与外围空间结构，或者选择一个重置税率，让核心与外围的结构在空间重新配置，自己由外围变成核心，这一重置税率应满足 $t_d^* = t - \Omega^C$。这里 Ω^C 就是指聚集租金，该条件说明，南区若想替代北区成为核心，必须克服聚集租金的作用，这一点和基本税收竞争理论有着显著区别。在基本税收竞争模型中，只要任一方税率较低，流动性要素就会流向该地区，而聚集租金的作用告诉我们，一旦实现聚集经济，打破原有的聚集均衡就要克服聚集租金的作用。在 $\lambda = 1$ 时，南区政府的目标函数为 $W^*(t^*, 1) = -(t^*)^2/2$。南区政府最优选择可以为：

$$t^*(t) = \begin{cases} 0, \text{若 } W^*(0, 1) = 0 > W^*(t_d^*, 0) = 2t_d^* - (t_d^*)^2/2 \\ t_d^*, \text{若 } W^*(0, 1) = 0 \leqslant W^*(t_d^*, 0) = 2t_d^* - (t_d^*)^2/2 \end{cases} \tag{9.9}$$

下面分析第一阶段的博弈，选择的行为主体是北区的政府。此时，北区政府的收入可以表示为：

$$W(t, \lambda) = \begin{cases} 0, & \text{若 } 0 < 2t_d^* - (t_d^*)^2/2 \Leftrightarrow t > \Omega^C \\ W(t, 1), & \text{若 } 0 \geqslant 2t_d^* - (t_d^*)^2/2 \Leftrightarrow t \leqslant \Omega^C \end{cases} \tag{9.10}$$

该式说明，如果北区政府的税率很高，大于聚集租金，那么南区就会将产业吸引过去，实现空间重置。于是，对北区最优税率就是 $t_e = \Omega^C$。子博弈完美均衡是 $t_e = \Omega^C$，$t^* = t_d^* = 0$。

这里应特别注意的是，我们还需要验证核心区无约束条件下的税率是否低于 t_e。所谓无约束条件是指对核心区的地方政府目标函数不进行参数约束。此时，将 $\lambda = 1$ 代入目标函数，求最大化得到最优税率为 2。所以，上述子博弈完美均衡中北区的最优税率还应该满足 $t_e < 2$。

分析说明，在完全聚集时，核心区的地方政府会在度量聚集租金的条件下选择最优税率，外围区的地方政府进行竞争是不理性的行为。在我国，经常发生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就某些项目进行抢夺竞争，但是由于聚集经济效应和聚集租金的作用，好的项目总是要选择核心区投资。作为外围的相对落后地区，首先需要培育聚集经济效应，特别是人力资本的积累至关重要，而不是就具体项目在土地和税收优惠方面和发达地区进行恶性竞争。恶性竞争的结果就是发达地区被迫降低税率来防止项目旁落，其结果造成负和博弈，给地区和国家造成税收损失。

3. 局部聚集时的税收博弈和空间经济自组织

局部均衡时，应有 $\Omega(\lambda)$ 在 $\lambda<1$ 条件下取得最大值 Ω^M。博弈分析方法和完全聚集时相同，首先观察第二阶段南区的税率选择。对于给定的北区税率，南区地方政府收入目标函数为：

$$W^*(t^*,\lambda(t-t^*))=2t^*(1-\lambda(t-t^*))-(t^*)^2/2 \tag{9.11}$$

南区地方政府的最优税率选择决策可以表述为：

$$t^*(t)=\begin{cases}t_P^*,\text{若 } W^*(t_d^*,\lambda(t-t_d^*))\leqslant W^*(t_P^*,\lambda(t-t_P^*))\\ t_d^*,\text{若 } W^*(t_d^*,\lambda(t-t_d^*))>W^*(t_P^*,\lambda(t-t_P^*))\end{cases} \tag{9.12}$$

其中，$t_d^*=t-\Omega^M$ 是重置税率，南区地方政府选择重置税率是由于其带来的收入大于最优税率带来的收入。

下面分析北区地方政府选择，其最优选择是令南区政府在选择 t_d^* 和 t_P^* 之间无差异，也就是：

$$\begin{aligned}&W^*(t_d^*,\lambda(t_e-t_d^*))=W^*(t_P^*,\lambda(t_e-t_P^*))\\ \Leftrightarrow&\begin{cases}2(\Omega^M-t_e)-(\Omega^M-t_e)^2/2=2[\Omega(\lambda)-t_e](1-\lambda)-[\Omega(\lambda)-t_e]^2/2\\ \Omega(\lambda)-(t_e-t_P^*)\geqslant 0\end{cases}\end{aligned} \tag{9.13}$$

其中，t_e 指局部均衡中北区地方政府的税收选择。注意到 $\Omega^M>\Omega^C$，所以，只要 $t-t^*\leqslant\Omega^M$，北区就可以保持其相对核心区的地位。在局部聚集中，由于不存在聚集租金增加流动要素，使得此时的税收竞争更像基本税收竞争模型。但是，在局部聚集均衡中，Ω 在 $\lambda\in(1/2,1)$ 取得最大值，这意味着相对聚集核心区可以在存在税收差异的条件下保持，只要这个税收差距不大于 Ω^M。

分析表明，在空间视角下的地方政府税收竞争和基本税收竞争明显不同，非连续性在空间中得到进一步体现。税收竞争所产生的税收差异和资源空间重置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不可否认，经济发展水平相近区域之间的税收竞争在一定意义上可以促进资源空间配置的优化和高效利用，但是一旦陷入恶性税收竞争则会出现两败俱伤的底端效应。落后区域和发达区域之间的税收竞争往往对落后地区的空间经济自组织产生强烈的负面影响，甚至陷入恶性累积的自组织怪圈。也就是降低税收→税基未增加、外围地位不变→地方政府无力改善基础设施、投资吸引力降低→税收再降、超过聚集租金或者 Ω^M→由于经济发展环境恶劣仍然不能吸引资本……如果再考虑此时地方政府行为的严重变异，这种恶性自组织机制会持续强化，由此形成的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更多的是由区域主体行为方式不同使然。研究区域经济发展问题必须既分析要素禀赋非均质的差异性，还要特别关注区域主体行为方式的异同。当然，关于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等问题在第 8 章中已经有详细研究，在此不再赘述。

9.3 双目标地方政府与空间经济自组织

本书针对地方政府这一区域主体提出了两种不同行为的假说。通过分析表明，无论是追求所辖区域福利最大化还是追求可支配收入最大化都存在明显的片面性。单一追求福利最大化的假说与现实差距很大，而单一追求可支配收入最大化，将地方政府完全演绎成公共选择理论中的经济人，又与地方政府的公益性存在较大差距。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在改革开放以前，地方政府的福利性非常突出，但是几乎没有促进本地区福利增进的有效手段；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地方政府的经济人角色越来越被强化，区域经济发展中不和谐的现象逐渐增加。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适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地方政府的特征和行为必将面临重大调整。

那么，符合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目标一致的地方政府应该是怎样的呢？本书研究认为，在现行的根本制度框架内，地方政府面临双目标的决策。

9.3.1 双目标地方政府的内涵

双目标地方政府是指地方政府的目标函数既包括所辖区域的福利水平又体现了自身可支配收入，在以区域福利水平最大化为目标的同时也实现了可支配收入的优化增长，这种优化增长是在福利最大化目标之下追求可支配收入的次优结果，将这种受约束的地方政府称为有限经济人。图 9.5 表示了这种双目标地方政府的

内涵。我们对此进行如下的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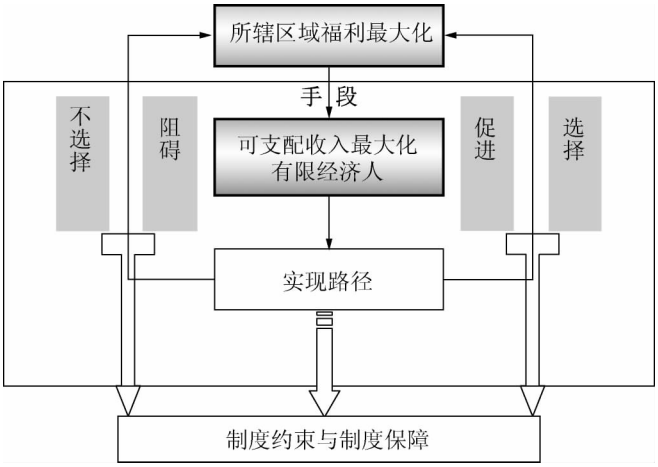


图 9.5　双目标地方政府的内涵

第一，地方政府的双目标层次不同，有限经济人是其重要特征。地方政府的首层目标是追求所辖区域福利最大化，转换成空间维度就是促进聚集经济。但由于公共品和服务的充足有效供给是聚集经济实现的必要条件，而地方政府能否实现有效供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可支配收入的高低，所以，追求可支配收入最大化就成为地方政府第二层次的目标。但是，地方政府在实现可支配收入最大化的过程中，由于目标的单一性使得很多实现路径对区域内其他行为主体造成了福利损失，这表明福利增进和可支配收入最大化之间存在矛盾。在双目标模型中，地方政府的经济人属性受到福利属性的制约，这种有约束的目标将地方政府规范为一个有限经济人，这也是我国地方政府应有的本质特征。

第二，有限经济人的行为原则最终为是否有利于辖区其他主体的福利增进。经济人地方政府在追求可支配收入最大化时出现大量损害其他经济主体的行为，从根本上说是因为缺乏有效约束，我们将这种约束分为目标约束和行为、路径约束。所谓目标约束就是地方政府背离其福利性本质转为经济人目标过程中的约束。地方政府经济人角色属性的存在有其必然的逻辑基础，但是如果背离或抛弃了其本质的福利属性，行为异化就会成为必然。而有限经济人的突出特征就是来自第一层次福利最大化目标的约束，也就是说，追求可支配收入最大化只能作为手段而存在，不能成为独立的目标决策。当有限经济人面对实现可支配收入最大化的诸多路径，行为原则就是该路径能否增进辖区其他经济主体的福利水平，能够增

进福利水平的路径就是适宜路径，反之则是非可行路径。如果说，这种目标约束仍然过于抽象，缺乏刚性约束，那么一整套有效的制度框架就构成了双目标地方政府的刚性约束。

第三，双目标地方政府模式的实现有赖于一套创新的制度架构。不可否认，两种不同属性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有着很大差异，存在尖锐的矛盾。将两个不同目标在相同地方政府的行为中得到体现，需要化解一系列复杂矛盾，而这又依赖于制度创新做保障。我国的改革已经从单项式改革进入综合改革时期，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行政体制改革将成为改革的重要内容，中央政府需要探索一套有效的激励和规范地方政府行为的制度框架，地方政府也面临组织创新的客观需求。

9.3.2 双目标地方政府实现的制度安排

市场机制是有限经济人地方政府运行和目标实现的力量之一，除此以外，一套科学、合理有效的制度架构更加重要。这种制度架构的核心是有效规范地方政府的过度自利行为，将其行为纳入市场自组织的轨道。美国学者丽贝卡·梅涅斯(2006)针对地方政府进行了研究，将其改革分成四种类型：以再造政府内部结构为目的的机构改革，以重塑政府和企业关系为目的的规制改革，以消除选举中赞助和欺骗为目的的选举改革，以及以改善美国人民生活为目的的社会改革。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抑制政府不合理行为的城市竞争，其目标不是 GDP 或地方税收等，而是居民福利水平。这种竞争的本质恰恰是利用市场的规制力量，与我们的研究结论正好吻合。根据丽贝卡的研究，结合我国地方政府的实际情况，我们应该在如下几个方面进行改革和制度创新。

第一，中央政府需要构建综合的考核评判指标和动态长效机制。我国之前的改革主要集中在经济体制上，宏观经济指标特别是 GDP 一度是中央对地方政府考核的核心指标。在这一制度安排下，为了自己的政绩和升迁，地方政府有更强的动机演变为经济人。由于相关领域的改革滞后和制度创新的力度有限，中央对地方政府的单一经济目标考核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造成地方政府变异行为越来越突出。另一方面，由于对地方政府运行缺乏动态长效的考核机制，一届政府官员的个人利益动机超过了组织的长效稳定运行。新一届地方政府官员接受上一届的“烂尾”已成普遍现象。这些现象说明，中央政府亟待改变传统的考核手段。

首先，中央对地方的考核指标应该是综合的，这一制度必将随着我国综合配套

改革的深化而加速形成。我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启动标志着改革从单领域、单项式转入宽领域和综合式，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等都将成为新一轮综合改革的重要内容，强调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是综合配套改革的基调和指导思想。改革指导思想的转变必将体现在中央对地方政府的考核上，更加关注经济运行质量和社会的和谐，既要考核效率、更要关注公平，既要实现经济增长、更要实现可持续发展，这种综合型的考核制度建立将有效改变地方政府过于热衷经济增长的现状。

其次，弱化对代表性官员的考核转而强化评价地方政府组织运行质量，这将有助于长效机制的建立。地方政府作为一个特殊的经济组织，其运行质量对于区域经济发展有着重大影响。在之前，中央政府很少关注地方政府的运行质量，而将注意力集中在代表性官员。这容易造成主管代表性官员为了政治利益或经济利益而作出损坏整个经济组织的扭曲行为。现在强化对地方政府这一特殊经济组织的考核，中央更加关注其运行的质量、效率和稳定性，这将对地方政府的短期利益行为起到规范作用。

第二，适时、适度加大地方政府财政分配的份额。中央和地方财政分配的比例对地方政府行为有很大影响。对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发现，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份额扩大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负面影响。在发展中国家，因过度财政分权而导致宏观经济失控的例子也比比皆是。阿根廷是一个财政分权程度较高的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地方政府预算约束不强，导致地方政府赤字巨大，地方政府向中央银行和其控制的地方银行大量举债。中央和地方的这种财政关系是一种不稳定的或者准赤字财政，它使阿根廷维持价格稳定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努力付诸东流。巴西1988年的扩大地方财政权力的宪法改革也显著地减少了中央政府执行宏观经济政策的能力，这是造成其近年来宏观经济不稳定的主要原因。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提出加大地方政府财政分配额度呢？

财政分权导致的诸多问题归根结底在于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行为目标不一致。在我国综合配套改革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下，中央会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创新有效规制地方政府行为，尽可能保证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目标的一致性。在地方政府行为得到有效规范的条件下，适度加大地方财政分配额度将巩固和深化地方政府的行为转变。因此，我们并不是简单强调分权刺激，而是在适当时机和条件下适度地增加地方财政分配额度，遏制地方政府由于可支配收入不足而

出现的攫取行为。这一遏制效应的出现还有赖于中央对地方综合配套考核的有效实施。

第三，打破行政区划束缚，构建一体化的经济新空间。在空间成本很大的情况下，缺少外界经济联系区域的最优选择就是建立大而全、小而全的经济格局并对其加以保护。地方政府是这种低水平格局的最大受益者。随着空间成本的不断下降，区域间的经济联系和往来日益频繁，大而全、小而全的经济格局必然引发区域经济的低水平竞争。地方政府为了保护自己稳定的可支配收入不受影响，开始设置诸多的经济或非经济壁垒保护自己区域内部的产业。根据空间经济自组织的原则，要素聚集是在区域间寻求最优配置的结果，地方保护主义阻碍了这种要素的空间配置，这也是为什么在我国空间经济处于他组织而非自组织的重要原因。

图 9.3 的数值模拟结果告诉我们，当空间成本极低时（特别地我们考虑没有空间成本），各区域将根据自己要素禀赋的空间分布情况选择相应的空间专业化。不同区域形成以某一类或某几类密切相关产业为核心的产业集群，在空间上形成一定的功能区。不同经济功能区之间的关系遵循分工网络的一般规律，这种空间的分工网络就是一体化的经济新空间。在这个新的经济空间中，自然也就不存在关于低水平重复建设等恶性竞争，呈现出和谐的空间经济。

本章小结

地方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本章首先对地方政府的属性进行了界定，给出了地方政府具有福利型和经济人两种属性。作为福利型政府，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制定区域空间规划和实施相应的区域经济政策等，体现自身的作用，实现整个区域社会福利的最优。作为经济人政府，地方政府就具有了自己独立的目标函数，参与区域经济运行，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本章对地方政府的上述两种属性及其行为作了分析，特别是使用新经济地理学的方法与模型研究了地方政府作为独立经济主体时的空间税收竞争以及地方政府恶性竞争导致空间割裂和低效率等问题，进而提出从行政区经济向经济区经济转变的思路。

思考题

1. 地方政府如何解决空间外部性问题？
2. 在空间经济中，区域经济政策具有非线性的特征，对此如何理解？
3. 从空间视角分析，哪些因素会影响区域一体化进程？
4. 如何理解空间税收竞争模型和一般税收竞争理论的差异？
5. 地方政府以经济人的独立主体身份参与到区域经济发展中是一种行为变异，引发地方政府这种行为变异的诱因是什么？

参考文献

金丽国：《区域主体与空间经济自组织》，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孙兵：《区域协调组织与区域治理》，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安德鲁·肖特：《社会制度的经济理论》，陆铭、陈钊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陈抗等：《财政集权与地方政府行为变化：从援助之手到攫取之手》，《经济学季刊》2001 年第 1 期，第 111—130 页。

赫希曼：《经济发展战略》，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1 年版。

黄凌翔：《国土规划的经济学分析》，南开大学 2005 年博士学位论文。

丽贝卡·梅涅斯：《限制掠夺之手：1880 年到 1930 年美国城市的腐败和增长》，《比较》2006 年第 10 期，第 173—192 页。

约瑟夫·E. 斯蒂格利茨：《政府为什么干预经济》，郑秉文等译，中国物资出版社 1998 年版。

张晏：《分权体制下的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周雪光：《逆向软预算约束：一个政府行为的组织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5 年第 2 期，第 133—144 页。

Baldwin, R. and Paul Krugman, 2004, "Agglomeration, Integration and Tax Harmonisation",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48, pp. 1—23.

de Crombrugghe, A. and H. Tulken, 1990, "On Pareto Improving Commodity Tax Change under Fiscal Competition",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41, pp. 335—350.

Down, A. ,1957,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Harper & Row.

Forslid, R. and Ottaviano G. I. P., 2003, "An Analy tically Solvable Core-periphery Uodel,"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3), pp. 229—240.

Forslid, R., 1999, "Aggomeration with Human and Physical Capital: An Analytically Solvable Case", Discussion Paper No. 2012, Center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sh.

Hoyt, W., 1991, "Property Taxation, Nash Eiquilibrium and Market Power",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34, pp. 123—131.

Kugler, Jacek, and William Domke, 1986, "Comparing the Strength of Nation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19, pp. 36—69.

Lee, K., 1997, "Tax Competition and Imperfectly Mobile Capital",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42, pp. 222—242.

Niskanen, William A., 1975,"Bureaucracy and Politicians",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8, pp. 617—643.

Pfluger, M., 2004, "A Simple, Analytically Solvable, Chamberlinian Agglomeration Model", *Regional Science & Urban Economics*, 34, pp. 565—573.

Stull, W., 1974, "Land Use and Zoning in an Urban Econom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4(3), pp. 337—347.

Wildasin, D. E., 1988, "Nash Equilibria in Model of Fiscal Competition",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35, pp. 229—240.

Wilson, J. D., 1999, *Welfare-improving Competition for Mobile Capital*,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Wilson, J. D., 1999, "Theories of Tax Competition", *National Tax Journal*, 52, pp. 269—304.

Zhang, Le-Yin, 1999, "Chinese Central-Provincial Fiscal Relationships, Budgetary Decline and the Impact of the 1994 Fiscal Reform: An Evaluation", *Chinese Quarterly*, 6, pp. 115—141.

第 10 章

区域协调组织与区域治理

本章将研究区域协调机制问题。以往的区域经济学教材或著作通常是以区域经济政策分析作为结束章节。但是，我们发现这些区域经济学教材或著作中的区域经济政策，更加接近于宏观经济政策，这些政策的制定主体是中央政府，执行者大都是区域地方政府，而厂商和居民等重要区域主体的利益最大化问题则被忽略了。因此，区域经济政策在执行过程中经常被扭曲，造成政策的无效或者低效。和区域经济政策的分析不同，区域治理的研究更重视区域内多主体的共同参与和互动，充分考虑区域内各个主体的利益需求，以调动微观区域主体的积极性。

区域协调机制以及组织研究是上两章区域主体研究的继续。区域主体的空间经济自组织主要是通过市场机制来进行。但是，市场失灵会导致空间经济自组织在空间上资源配置的无效率，表现为空间失灵。这就需要一种区域协调机制来加以解决。这种协调机制有两种形式：区域政府和区域治理。在区域这一层次上，区域政府的协调机制存在问题，而区域治理则是与空间经济自组织相适应的自主协调机制。下面，本章将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分析。

10.1 区域政府

10.1.1 空间失灵与区域政府

主流经济学关于市场失灵和政府关系的理论同样忽略了空间因素的影响。事实上，任何经济活动都要发生在特定空间上，市场失灵也不例外，市场失灵与空间因素相结合，就会形成空间失灵。参照市场失灵的定义，我们可以把空间失灵界定为由于区位之间的相互作用而造成的资源区域空间配置不合理。市场失灵是指市场机制未能使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而空间失灵则是指由于空间布局的不合理，造成资源在空间上配置的无效率。比如说，经典的外部性案例之一——钢铁场

和鱼塘，就是一种空间失灵。如果在规划时设计鱼塘在钢铁厂的上游就可能会避免空间失灵。

市场失灵是政府存在的依据，但是政府不是单一的主体，政府也是由不同层次组成，这主要是由于空间失灵的地域范围不同所致。空间失灵的影响地域范围不同，也就意味着政府所处理公共事务的可以根据地域范围划分。

以公共产品而言，最明显的是公共产品受益面存在着地域上的限制。比如说，城市的交通设施、环境优雅和良好治安，主要是由所在城市的居民和企业享有；而一个村庄的供水、供电系统的主要受益者是该村的村民，如果那个地方的环境保护搞得好、基础设施健全、中小学普及率高，那个地区的居民就有更多的受益。因此，公共产品可以根据受益的范围加以划分，某些公共物品如城市交通设施等，覆盖的范围局限于某个城市；像村庄的学校这样的公共物品，其受益范围是该村庄，而另外一些公共物品如国防，其覆盖的范围遍及全国，属于全国性公共物品。一般来说，根据受益范围的不同，可把公共物品分为全国性公共物品和地方性公共物品。

对于地方性公共产品的提供，应该由地方政府来提供，这样会更加有效率。首先，地方政府比较接近本地区的居民和企业，比较了解他们的偏好和要求，因而也能够根据他们的偏好和要求及时调整公共物品供给的数量和类型。其次，地方政府供应公共物品在财政方面比较容易收集，地方财政为地方公共物品提供资金，按照谁付出谁受益的原则，地方政府征收的税收用于地方公共物品的提供，容易得到所在辖区居民和企业的支持。相反，如果由中央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就有可能根据全局考虑，调剂财政收入的使用，某些地区付出了更多的税收，却没有享受相应的公共服务。

对于区域性公共物品的提供，人们很习惯地和地方性公共物品加以类比，于是就有了组建区域政府来协调区域内不同主体利益的要求，而形成区域政府主要是通过两种途径：大都市区合并和行政区划调整。

10.1.2 形成区域政府的两种途径

1. 大都市区合并

这里以美国的大都市区合并来阐述区域政府的形成机制。

美国大城市既是区域经济的中心，也是其周围郊区公共服务的主要供给者。尽管大都市地区的人口已经呈现出向郊区扩散居住的趋势，中心城市作为就业中心的地位并未发生改变。同时，中心城市的政府还修建了数千英里的排水管线和

水库、泵站、自来水管道等设施，保障了路桥、治安、公共卫生、燃气、环保、文化娱乐等基本公共服务。许多公共设施的建设维护费用由中心城市独自承担，所提供的服务对郊区产生了正向的外部性，使大量的郊区得以搭便车，而不必为此增加支出。

结果，大都市地区的经济和政治生活之间产生了结构性的矛盾。一方面，由于中心城市对整个区域的经济活动具有强大的聚集作用，郊区与中心城市间存在着密切的经济和社会往来，从而产生大量的人流和物流，致使交通基础设施严重不足。因此，区域的协调与合作变得很有必要。另一方面，郊区政府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拒绝与中心城市政府的相应合作，而中心城市政府也没有办法。对于这个矛盾，当时的主导观点认为，城市病的来源可以归因于分散的政治体制，其结果是缺乏区域权力的让渡体制。

解决问题的途径是形成大都市区政府，其主要途径包括中心城市兼并融合和市县合并。中心城市融合兼并是指中心城市通过将周边地区的地方政府融合兼并，形成一个统一的大都市区政府，由大都市区政府统一负责本区域内公共事务。这样，过去那种数量众多但是规模很小的政府体系就被一个大规模的政府组织所取代，根据政府管理的相关理论，这样规模较大的政府能够产生规模效益，为辖区内的人们谋取更大的福利。市县兼并是指临近的中心城市政府和县政府进行合并，由新的政府向区域范围提供公共服务，市政府和县政府原有的一些功能被整合到新的政府中去，但是仍然能够履行其他的一些功能。

2. 行政区划调整

行政区域和经济区域不一致会带来问题。行政区经济阻挡了经济一体化的进程，限制了统一市场的发展，造成了资源浪费、利用率低下以及地方保护主义盛行的弊端。从中我们可以分析得出造成这一局面的锁链形式的原因体系：地方政府各自经济利益是动力，政府运用经济能力完成其经济职能是地方政府干预经济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政府拥有的经济资源，配以本身的政策工具使得政府的经济行为无障碍展开。环环相扣并无一环缺失的状况下，形成了作为政治空间的行政区与作为经济空间的经济区域之间的矛盾。

如果行政区与经济区的边界是重合的话，那么二者的冲突会少许多，然而，现实情况却相反。行政区域和经济区域经常处在不一致的状态，两者之间的冲突在所难免。本质上，行政区经济源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也强化了对经济的干预，阻

碍了统一市场形成，阻碍了区域经济联系，从而出现了与经济区域相悖的运作态势。

行政区划调整的意义在于使行政区间的问题内生化，即通过行政区调整和合并，把原来有经济利益矛盾的行政区合并为一个新的行政区，从而使经济区域和行政区域的边界重合，这样原先的区间问题就变成了区内问题，可以通过区域经济政策加以解决。

但是，行政区域的边界与经济区域的边界的不一致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因为二者形成的机制不同。行政区划属于国家制度的一部分，行政区的边界具有很强的刚性。一旦行政区的边界确定，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保持稳定。而经济区域的边界则显得很不稳定，因为经济区域主要是由于经济区位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形成的，随着经济条件发生变化，经济区域的边界也会发生相应的调整，因而经济区域的边界会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发生变化。

行政区域边界的稳定与经济区域边界的不稳定，使得行政区划调整的效果受到很大制约。我们可以设想，最初是行政区间的问题，通过行政区划调整成为了行政区内的问题，从而使区域问题通过区域政策得到了很好的解决。但是，随着经济区域边界的变化，行政区域的边界与经济区域的边界的矛盾再次出现，但是行政区域边界的调整却无法跟随经济区域的边界调整。因此，行政区划调整对于区域政策的形成和实施是一个有力的工具，但是却不是一个能够经常使用的工具。

10.1.3 区域政府的国际经验

1. 英国的区域政府

英国是单一制国家，建立于议会主权之上，其政治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没有足够的独立性。英国由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四个地区联合而成，由于历史、文化的原因，这些地区在组成联合王国后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原先的政治传统，使得英国国内政府的结构和彼此关系较为复杂，不同地区的政府的结构与过程有着不同的特点。

考察英国地方政府间关系，不能不关注它的一个比较独特的地方。在英国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架构中，除了民选的政府以外，还有许多依功能而设立的非民选的专业单位。此类专业的非民选政府组织或准政府机构，大多是单一功能的组织，常在中央政府、地域性部门及多功能的民选地方之间，负责某项政策的执行与管理，担任起执行特殊功能及沟通协调的角色。

有关地方政府间横向合作机制的措施除了上文提到的以单一功能非民选政府取代原有部分地方政府的职能外，更在各地方政府间成立所谓府际互动论坛。这类组织是各地方政府自愿组成的合伙性组织，它们彼此互为各地方当局的代表，甚至代表其他公共部门，以使政策执行与规划能获得充分的辩论与协调，并藉此监督某项特殊政策领域。

此外，为了解决地方政府之间应该或者可以共同经营管理的事项，如环境污染及水资源的管辖等问题，英国政府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开始发展出一套协作规划的执行策略，并将焦点放在协力合作的培养及共识建立的方法上。

2. 法国的区域政府

法国是一个中央集权国家。就政府间关系而言，法国的国内政府间关系模式是中央集权的政府间关系的典型代表。在法国传统的体制中，地方政府设省和市镇两级。这两级地方政府建制在法国大革命后就已经出现。但从 1972 年以来，开始变成三级政府：大区、省和市镇。

法国政府由二级变为三级的原因在于加强地方政府间协调和地方政府间合作领域的拓展。20 世纪 60 年代戴高乐执政的第五共和国时期，为了推行国家经济计划，需要各级地方政府的积极参与和相互协调、合作，中央政府把促进政府间的横向协作的发展提到战略地位的高度。在此期间，政府间横向关系有了很大发展。随着大区建制的出现和发展，推动了法国省级政府间关系的进一步深化。首先建立了 21 个计划区，并成立专门的省际委员会。此外还成立了官方的协商组织——地区经济开发委员会。随着地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计划区主要省的省长成为计划区的负责人，有权指挥计划区内其他省的省长，并负责计划区内的计划和公共投资的协调。

然而，由于在区域内，各地方为了保护自己的势力范围，缺乏合作精神，冲突不断；与此同时，地方的分权也加剧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政治冲突。在这种形式下，法国于 1972 年进行了更为彻底的地区性改革，在原有改革的基础上，确立了 21 个具有法律地位的本土行政区，负责地区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所以，在原有的省和市镇层级上，又多设了一级行政区，即大区政府。

根据这次改革，大区肩负经济规划和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使命。在经济规划方面，中央要求每一大区政府都要在与中央驻大区专员的协商基础上，制定五年大区发展规划。这一规划将成为国家与大区政府以及大区内各类企业和公共行政部

门、非营利部门等订立各种合同性协议的依据。此外，由部长任命共和国专员，代表中央各部领导设在本区的机构，负责国家在本区的利益，保证法律在本区的执行并监督行政管理。所以，中央权力下放、大区权力增强的过程是十分有计划和控制的，由于有了共和国专员的协助与监督，转移后大区政府职能的行使效果也有了较大的保障。

3. 美国的区域政府

为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区域开发，美国于 1933 年 5 月通过《麻梭浅滩与田纳西河流域开发法》，并依法成立了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以下简称 TVA），负责领导、组织和管理田纳西河和密西西比河中下游一带的水利综合开发和利用，并且作为开发美国大块集中连片的贫困落后地区的试点。作为联邦政府机构，TVA 只接受总统的领导和国会的监督，完成其规定的任务和目标，除所设三人理事会由总统任命理事外，在内部事务方面 TVA 有广泛的自决权，可以高效率地自行处理和解决有关问题。对田纳西河流域规划的实施及其所属业务部门，TVA 都进行强有力的领导，包括在计划制定、工程建设、企业管理等方面下达指令和进行指导。

TVA 对全流域进行了统一规划，制定了合理的流域开发建设程序。首先是集中力量开发流域内丰富的水资源，把握住流域发展最关键的环节——水坝建设，从而控制住洪害，疏通了田纳西河航道，生产了大量廉价的水电。随着水运条件的改善，流域内外经济联系加强，吸引大量的资本进入田纳西河流域在利用当地原料基础上，利用方便而廉价的水运从外部运入大量原料，在沿河两岸布局冶金、化工和核工业等高耗能、耗水的产业。与此同时，在水源条件改善后，积极开发土地资源，发展肥料工业、农业、林业。这样，整个开发过程重点突出，层次分明，整体性和系统性较为明显。

4. 日本的区域政府

日本首都圈规划于二战后，主要是抑制首都圈过度发展。1999 年，日本国会众议院甚至提出为缓解东京都过于集中的发展局面，建设首都圈城市带，准备把中央政府机构和职能迁出首都圈即“迁都计划”。第五次首都圈基本规划在第三、第四次基本规划的基础上，再次强调了建立区域多中心城市“分散型网络结构”空间模式的设想。其战略思路是通过培育、利用业务核心城市，推进广域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的整治改造和都市空间职能的重组，从而改变东京都中心部的单极依存结构，实现以据点城市为中心、彼此相对独立并能方便交流联系从而互相分担城市

职能的自立、互补、高密度、水平、分散化网络型区域空间结构。

日本高度重视跨行政区域的协作。都圈规划非常重视各行政区划单元的跨区域协作，规划提出的措施并不是分解到行政单元和具体地区，而是由整个都市圈的成员共同执行。为保证规划的顺利进行，日本还于 1956 年成立首都圈整备委员会专门负责首都圈规划事务。该委员会负责审议通过首都圈的规划方案。委员中包括国会议员、规划涉及区域内的地方行政官员的县知事、市长，县(市)议会议长、企业财团的法人代表、大学教授以及民间自治工会组织代表。国家级政府官员所占比例与大学科研机构所占比例相同，地方行政与地方县市人大常委会所占比例相同。

10.1.4 对区域政府的批评

大都市区的政府改革运动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艰难历程，到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激进的集权主义的改革理论开始受到人们的攻击。人们首先对碎片化的理论提出了质疑，比如，罗伯特·比什和文森特·奥斯特罗姆(Robert L. Bish and Vincent Ostrom)指出：每个地方政府单位独立行动，不顾及大城市地区其他公共利益，这一假设只有有限的效力。可以把大城市地区具有多种政治管辖单位的传统治理模式看作是“多中心的政治体制”，这更为适当。“多中心”意味着许多决策中心，它们在形式上是相互独立的……它们相互之间通过竞争性的关系考虑对方，开展多种契约性的和合作性的事务，或者利用中央的机制来解决冲突，在这种程度上，大城市地区多个政治管辖单位可以连续的方式运作，其互动行为的模式是一致的，并且是可预见的。①

人们进而对大都市政府的工作效率和经济效益产生了怀疑。这些批评家常常以大城市政府为参照，认为由于大城市政府的规模是如此庞大和僵化，因而在提供某些服务，如警察、教育、废物处理、交通等方面表现无能，而投票选举所产生的市长和为数不多的几个高级市政官员，也并非像传统改革理论家所鼓吹的那样能够有效地反映公民的意志，由于每个社区居民的愿望、生活方式、存在的问题千差万别，高度集权的政府往往不能做出灵活的反应。

---

① Robert L. Bish, Vincent Ostrom, 1979, *Understanding Urban Government: Metropolitan Reform Reconsidered*, Washington, D. C.: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公共选择理论以蒂布特模型及“多中心政治体制”的合理性与效率作为回应，来说明地方政府的碎片化现象，将地方政府视为竞争性市场中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提供者和生产者，为这一现象作出了合理的经济学解释。奥斯特罗姆、蒂博特和瓦伦(Ostrom，Tiebout and Warren)认为，在大都市区建立大型的政府组织，可能会产生回应迟缓、服务成本上升、效率低下、公共生活凋敝等问题。相反，在多中心的政治体制中，大都市区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提供者、生产者之间，可以像市场中的企业一样进行竞争，从而获得实实在在的收益。大量地方政府的存在，及其所提供服务的多样性，使这些政府作为“交易的代理人”，为作为消费者的地方居民提供了选择的可能性，使他们流向在服务和税收方面符合自身偏好的社区。因此，如果多中心政治体制能够解决冲突，并在适当的约束之内维持竞争，那么它就能够成为富有活力的安排，来解决大都市地区各种各样的公共问题。①

为了论证众多地方政府提供服务的公正和效率，奥斯特罗姆等人将政府所提供的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性质分为三种：(1)公共物品源于控制间接后果、外部性或溢出效应；(2)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是因为某些物品或服务无法打包供给；(3)公共物品是为了维持对地方事务的某些偏好状态。毫无疑问，在大都市区范围内，一个区域范围的政府在提供这三类公共物品和服务方面，也许并不一定会比众多数量的小政府更有效率，尤其是大量专区政府的出现，弥补了郊区一般地方政府因自治权限的制约在服务范围和功能上的不足，区域性政府的设想和试验在这些方面更是缺乏竞争力。因此，公共选择理论以消费者的共同偏好为标准，来确定提供服务的范围与水平，进而确定地方政府的功能与边界。这样，也可以排除在合并体制下，一些消费者被迫为不需要的服务付费，而另一些真正需要服务的消费者又得不到想要的服务的现象。②从这个角度来看，虽然，每一项服务都由不同的政府来承担并不理想，因为那样就使得很多交叠的地方政府的存在成为必要，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公民个人能够更加准确地表达自己的偏好，只不过有可能因有太多的政府而无法明了该向哪个政府表达哪种偏好。从此可以看出，奥斯特罗姆认识到这种地方政府体制的复杂性，他形象地说：“一个人同时属于几个地方政府，这看上去也许有

---

① 奥斯特罗姆、蒂博特和瓦伦：《大城市地区的政府组织》，载麦金尼斯，《多中心体制与地方公共经济》，上海三联书店 2000 年版。

② 奥斯特罗姆等：《美国地方政府》，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96 页。

点复杂，但无非也和在不同的商店里购物的复杂程度差不多——一些商店是综合百货店，另一些是专卖店而已。”①

10.2 区域治理

区域政府的种种问题使人们开始考虑其他的区域协调机制。治理的研究在最近十多年间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并已在多个学科中积累了大量的相关文献，其中最为主要的就是政治学和经济学领域，此外还包括法学和社会学等学科。这些研究在丰富我们关于治理和城市治理的知识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使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深对治理和区域治理问题的理解。

10.2.1 治理和区域治理的概念

关于治理这一概念，最广为人知的领域是在企业理论中。公司治理在过去数十年间得到了经济学家和法学家的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并已经成为了经济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至于每当人们谈到治理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公司治理以及委托—代理理论。事实上，除了公司治理之外，还有大量关于城市治理、区域治理、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研究文献，这些文献对治理问题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例如米尔顿·罗西瑙(Milton D. Rosenau)②就在他的名著《没有政府的治理》一书中，讨论了全球治理这一课题。在西方国家，城市治理、区域治理、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逐渐成为政治学和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的显学，并日益受到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的关注。

本书将治理定义为：内生于一个有组织的社群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安排，通过这些制度安排，可以实现社群的集体活动，包括设定社群的目标和规则，做出决策，组织并协调集体活动，设定并实现社群的功能和目标。

把区域治理定义为：内生于一个区域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安排，通过这些制度安排，区域主体可以实现区域内部的集体行动，包括设定区域的目标和规则，做出区域公共决策，组织并协调区域的集体活动等。

治理是一种内生于社群的控制机制。这就把治理与那种凌驾于其他力量之上

① 奥斯特罗姆等：《美国地方政府》，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98 页。

② 罗西瑙是华盛顿大学的政治学教授，知名的国际政治理论家。传统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把国际体系视为一种无政府状态，罗西瑙则认为，尽管无政府是事实，但并不存在无政府状态，没有政府的治理是一种高于民族国家的国际协调方式。

的统治区别开来了，这种统治力量是外生于社群，通常由政府所有。例如，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城市政府是中央政府的附属物，城市的控制者是更高级别的政府，城市本身很少有自我控制的机制。内生于社群的控制机制的好处在于，这种控制机制的目的是使得社群作为一个整体的利益最大化。外生于社群的控制系统是由外生于社群的主体所操纵，其目的是使外生主体的利益最大化，这样可能只有在很偶然的情况下，社群的利益才可能得到考虑。

治理的职能是组织并协调集体活动。这就为治理机制的作用的范围做出了规定，它影响的是有关集体利益的活动，即公共领域，有关个体利益的事务治理并不加以干涉，调节个体利益的职能仍然是由市场机制来实现。现代制度经济学已经指出，在产权明晰的情况下，市场机制能够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然而，在公共领域，由于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相比所具有的特殊性质，市场并不能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甚至出现公地的悲剧这样的难题。治理机制所要解决的难题正是这些公共领域的失灵问题。它与市场机制相互依存，相互协调，共同实现社会的最大福利。

治理是这样一种机制，它的目标是实现社群的一致性。治理是内生于社群的控制机制，这种控制必须得到社群内部不同利益集团的认可，才能得以有效实施，否则就会遇到抵制。因而，治理实际上反映了社群在某些问题或方向上具有共同的利益，体现出彼此之间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通常是在公共领域，因为公共符合所有群体的利益。除了一致性外，社群内还存在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可以通过市场交换机制来进行协调。

治理包含有管理的职能，但其内涵大于管理。我们看到，治理机制能够设定社群的目标，并制定规则，来实现社群的职能。可见，治理机制具有一套内涵的系统，实现对社群公共事务的管理职能。然而，治理又不仅仅限于管理，它的内涵大于管理。

10.2.2 区域治理与区域管理

区域治理和区域管理是两个容易混淆的概念，这主要是因为它们有许多相似之处。首先，区域管理和区域治理关注的都是公共领域的问题。区域管理的主体是政府，其活动代表了公共的利益。而区域治理是区域的控制系统，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的机制。其次，区域管理和区域治理活动的内容相似，二者都关注区域社会和政治的稳定以及经济的发展。

但是二者的不同之处也是很明显的。首先，区域治理的内容要比区域管理广得多。区域治理涉及区域公共生活的方方面面，它既包括区域政府的管理活动，也

包括区域政府以外的一些问题，如区域环境问题。其次，区域治理的参与者要比区域政府更为多元化。区域管理的主体是区域政府，区域政府决定区域管理的机制和过程，包括协调、规划、控制和建设等，其他主体可能作为区域政府的协商者和咨询者，但却不能成为区域管理的决策者。相比之下，在区域治理中，区域政府只是作为一个重要参与者，还有其他众多的参与者，区域政府和其他参与者共同做出有关区域问题的决策，区域政府在其中并不能起到支配一切的作用。第三，协调的机制不同。区域治理更多是通过协商和沟通机制来解决问题，其作用的发挥往往依赖于主要参与者之间形成的坚强和稳定的联合，各个主要参与者在区域治理中的地位是平等的，形成了区域内部的网络状的关系结构。而区域政府的协调方式主要是通过由上向下的等级体系来进行的，权威在其中起到关键作用。最后，对于区域各利益集团的影响不同。由于是通过协商和沟通的机制来发挥作用，因此参与区域治理的每一个团体都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并防止了自己的利益受到侵害，即使是弱势群体也可以通过参与相应的非营利组织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在区域管理中，由于政府处于支配性地位，其权力很少受到挑战，因而那些接近区域政府的集团往往能够获得更大的利益。

10.2.3 治理的制度分析

治理是一种协调机制。最为常见的协调机制是市场机制，历来也最为自由主义的倡导者所推崇。市场机制是通过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进行调节，但是由于外部性和公共物品的存在等诸多原因，人们认识到市场也会失灵，仅凭市场并不能确保资源配置的效率和社会福利的改进。自从马克思和凯恩斯以来，政府计划的调节作用日益受到重视。市场不是万能的，政府同样如此，随着人们研究的逐渐深入，政府失灵问题也渐渐为人们所熟知。治理机制是一种介于市场协调和政府协调之间的协调机制，可以作为这二者的补充。然而相比较这二者而言，治理的协调作用的认识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

治理协调的特点是没有一个固定的协调模式。市场和政府的协调模式是固定的，人们可以清晰地分辨出它们协调的方式，市场协调是通过看不见的手进行产权的交换，所有的个体都参与这种协调过程，而政府协调则是通过一个权威中心在支配着这种交换，因而它们的协调模式是单一的，治理协调则不一样。可以把市场协调和政府协调这两种截然对立的机制视为协调机制的两极，而治理机制就是位于这两极之间的各种协调方式的总和。因而，治理协调机制是一种混合的协调机制，

有些接近于市场，另一些接近于政府，还有一些处于中间状态。有的完全是独立主体之间自行决定解决影响他们的一些共同的问题，而在其他情况下，这些主体会联合政府来共同解决这些问题。在广义的理解上，政府协调可以视为治理协调的一种极端形式，即只有政府这个唯一的参与者。纯粹的市场协调和政府协调在现实生活中是很少见的，绝大部分的协调都是以这种混合协调机制的面目出现的，这与具体的环境和所涉及的具体事物有关。

自主治理的现象在生活中是很常见的。一个居民小区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业主们从开发商那里购买了物业的产权以后，除了自己私有产权外，还共同拥有小区的一些公共财产的权利，小范围的如楼道，大的如小区环境，路灯等。业主们通常会组成业主委员会来商讨小区的一些公共事宜，并与开发商和物业管理公司进行交涉。行业协会是另一个例子。行业内的一些企业联合起来组成行业协会，决定行业的一些规范、标准和进入条件等等，有时还会就价格竞争、产量竞争等问题进行协商，并作为一个整体代表企业与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进行沟通。有时这种联合被看成是卡特尔，并受到政府的管制。

治理机制需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中发挥作用。首先，稳定环境表现为参与者的稳定。难以想象参与者不稳定的环境里，治理机制能够发挥很好的协调作用。如果参与者的流动性很大，那么他就可能不会接受特定环境中的一些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制度，一旦条件对他有所不利，他就会选择退出，而这很容易为其他参与者所效仿。其次，每个人对于未来都有一个内在的贴现率。如果环境比较稳定的话，这一贴现率就相对较低，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就比较容易成为现实，人们可能会为了将来的利益而放弃当前的利益。而在不稳定的环境下，这一贴现率就很高，人们更加看重眼前的利益，而对未来评价很低。这样治理机制的作用就很有限了。在非常不稳定的环境中，如骚乱时期，整个社会已经失去了秩序，这种情况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是不可或缺的。

一般认为，治理机制在一个比较小的集体环境中更为有效。丹尼斯·C. 缪勒(Dennis C. Mueller)指出，在具有同一行为模式的、稳定的小社会中，自愿的公共物品供给较多，合作行为的约束较强。[①]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在进行研究时所选择的样本也是一些较小的环境，“研究对象将限定在小范围的公共池塘资源上，其位

① 丹尼斯·C. 缪勒：《公共选择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9 页。

置坐落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受其影响的人数在 50 人到 15 000 人之间”。[①]治理机制与政府相比，优点在于：每个参与者都可以表达自己的利益；参与者对于生存的环境知识要比政府更为丰富；协调的手段多样化。但所有这些都与信息的交流有关，随着集体规模的扩大，信息的流量将以指数级递增，这样协调的成本将会大大增加，甚至超过了协调的好处。但是，并非较大规模的环境就无法发挥治理协调的作用，例如在城市这样的特定环境中，地方政府与其他的组织如行业协会、市民和各种非政府组织共同治理城市，各个微观单位虽然数目众多，但是可以通过组成利益团体把他们的要求加以反映。规模是相对而言的，相对于是单个的市民或企业，一个城市的规模过于庞大，沟通具有很大困难，但是对于各种协会和团体来说，是可以进行有效的信息交流的。

10.3 区域治理的参与者

在前面两章，区域主体被界定为能够实现一定经济空间（经济区域）自组织和运行的最少类别的微观承载对象，据此，政府、企业和居民是形成区域空间自组织的关键区域主体。需要说明的是，参与区域经济发展的主体并不仅仅局限于这三者。这种限制是为了更好地揭示空间经济的组织机制。在现实生活中，大量的行业行会都会参与到区域经济的发展中。而在区域治理中，有重要影响的经济主体都是区域治理的参与者。除了地方政府、企业和居民这些区域主体，区域治理参与者还包括非营利组织（NPOs）。这些参与者有不同目标和约束，通过彼此间的相互作用，形成了区域治理的自主协调机制。

10.3.1 政府

1. 政府的目标

政府通常有多重目标，这些目标包括经济的、政治的和社会的目标等等，而且在每一个方面如经济方面，也有多重目标的存在。这些目标彼此之间并不存在谁更加具有支配性地位的问题，往往视具体情况有所不同。一般来说，政府都比较重视对经济目标的追求，因为经济的增长将使政府能够掌握更多的资源。但不同的政府对经济的介入情况也不一样，在西方一些国家，政府更多是提供一些服务，而在中国，由于经济正处于转型时期，政府通常在经济生活中介入较深。

---

①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上海三联书店 2000 年版，第 48 页。

应该指出的是，政府追求的目标有时与政府公务员所追求的目标是不同的。人的存在可以分为个体、群体和组织三种形式，即个别的人、合群的人和组织化的人。个体通常是作为群体成员和组织成员存在，每一个个体都有一个职位，扮演相应的角色。政府是由公务员组成的，但是公务员除了扮演公务员的角色外，还要在其他群体中扮演诸如父亲、兄弟、朋友等等角色，这些有时会与公务员的角色相冲突，也构成了政府失灵的一个原因。

2. 政府对区域治理的参与

政府对区域治理的参与首先是通过向社会提供法律规范，约束人们的行为，从而为人们创造一个稳定的生活工作环境。如果有人违反了这些法规，政府还要提供相应的惩罚措施，确保法规得以执行。其次，政府向社会提供一些公共服务，包括公共管理和咨询等。第三，政府还承担组织区域活动的责任，它可以组织各种类型的区域治理参与者就一些重大的区域问题进行讨论磋商。

3. 政府权力的来源

政府的权力主要来自于法律的规定。通常在宪法和其他相关法律里会对政府的权力和责任加以明确的说明，政府在这样的法律框架下履行自己的职能。此外，政府的权力还来自于人民的授权，人民在选举政府时将会对政府的目标、战略和措施进行审核，一旦通过，就具有了法律的效力。

4. 政府权力的约束

政府的权力受到以下一些因素的制约。首先，宪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如果政府做出了违反这些法律的行为，其合法性将受到质疑。其次，中央政府的管制。中央政府将根据情况协调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并控制和监督地方政府的行为。第三，公共财政的制约。如果政府缺乏足够的财源，它的一些活动就难以得到有效的支撑，甚至沦入“吃饭财政”的境地。最后，公务员的能力。如果公务员的素质不高，政府的措施执行的难度就会增加，限制其权力的作用范围。

10.3.2 企业

1. 企业的目标

相比较而言，企业部门不像政府部门那样有多重的目标，其目标比较单一明确，主要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而不必像政府部门那样要充分兼顾民主、公平、正义、社会责任等多元目标，所以不会产生矛盾的现象，在协调工作上也相对简单不少。而从管理的角度来看，企业具有积极、冒险、创新、变革的精神，再加上企业之间不

具有上下隶属的权威关系，因而比较容易沟通协调。另一方面，企业部门因为没有政府行政体制的束缚，所以在动员、资源使用以及效率等方面，都要优于政府部门。

2. 企业对区域治理的参与方式

企业对区域治理的参与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即共同生产和游说影响决策。

共同生产是指政府部门通过与企业部门进行合作，结合政府与社会的资源，共同生产公共服务，以解决日益增加的财政压力，并让企业乃至居民得以参与公共事务的决策与执行。共同生产的原因是为了解决不断要求政府部门提供大量高质量的公共服务。政府部门会经常面临财政不足的情形，这样通过企业参与公共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提供，可提升各项建设与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并减轻政府财政负担。共同生产具有以下作用：(1)扩大公共服务的范围；(2)提高了公共服务的效率；(3)增进公共部门的影响力；(4)促进了公共服务提供的创新模式。

企业还通过对政府进行游说参与区域治理，不过这通常只有大企业才能做到。大企业由于资产规模大，沉淀成本高，不像小企业那样可以采取比较灵活的方式应对政策的变化，因而大企业对区域治理的参与更具有主动性，客观上有参与的需求。另一方面，大企业实力雄厚，能够对区域经济的某个或数个领域产生决定性影响，因此受到政府的重视，它们的一些需求或意见能够得到政府的及时反应，因而能够发挥独特的影响力。但是大企业的游说产生的结果有可能是消极的，有时游说的结果是以牺牲一些弱势群体的利益换取的。

3. 企业参与区域治理的原因

企业在区域治理中由最初的被动和从属的地位，向主动和平等的地位转变，背后有其深层的原因。首先，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区域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区域能够在竞争中占据优势的一个重要砝码是其所提供的优质的公共物品，但这往往需要大量的投资。因而政府会面临财力不足的情况，从而求助于企业部门，希望它们参与公共建设和公共服务的提供，或是参与公共物品的融资。其次，全球化还导致区域地位的凸显，地方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区域为了在全球竞争中取得优势，会要求更大的自由和权利，反对中央政府的过多干预。为了减弱对中央政府的依赖，在融资方面也要由过去依赖中央政府的模式向其他方式转变。①

① Alan Harding, Stuart Wilks-Heeg and Mary Hutchins, 2000, "Business, Government and the Business of Urban Governance", *Urban Studies*, Vol. 37, No. 5 - 6, 975 - 994.

10.3.3 非营利组织

区域治理中的非营利组织(NPOs)可以分为公民社会团体和社区组织。公民社会团体和社区组织二者之间的区分是以空间为依据的,社区组织的存在是以在特定空间上居住的人们具有共同的利益为基础的,而公民社会团体所涵盖的范围要更广,它包括宗教组织、行业协会、教会组织以及政党等等组织,一些为人们所熟知的妇女联合会和青年组织也属于公民社会团体的范畴。下面主要以公民社会团体为例说明非营利组织对于区域治理的参与。

1. 公民社会团体的目标

公民社会团体的目标一般较为明确,通常会体现在组织的章程之中。这种目标可能在一开始正是公民社会团体发起的基础,这些目标为组织的成员所赞同,反映了成员共同的观点和利益,并需要成员为之付出努力。公民社会团体的目标可能较为宽泛,关注若干比较重要的问题,也可能比较单一,集中在某一具体事务上。有一些政治团体可能会有政治上的要求,希望能够通过政治程序使其他人或组织接受自己的观点和要求。另外一些组织则可能是关注一些社会事务,如弱势群体的关爱问题。需要引起注意的是一些国际非政府组织,它们的关注更多是在经济和社会事务上,通常它们会以专家或帮助者的身份出现,促进区域社会经济的进步。当然,无论是哪一个公民社会团体,作为一个组织,其首先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组织的生存问题,包括组织的资金来源以及组织的合法性。

2. 公民社会团体对区域治理的参与

公民社会团体是以公共组织的身份出现的,就像前面提到的,它可以弥补政府和市场的不足,向其成员提供一些公共服务。其次,它可以与政府合作,提供一些公共服务,并由政府给予相应的资金支持。第三,公民社会团体可以代表成员的利益与政府和其他组织进行协商和博弈,在区域治理这个舞台上为成员谋取更多的利益。第四,它可以游说政府官员和政治家,通过向他们表示支持换取政治上的好处。此外,一些政治团体,如政党,可以直接推选自己的候选人参与竞选,直接把自己的一些理念和设想付诸实施。

3. 公民社会团体的权力的来源

公民社会团体代表的是成员的利益,因而权力主要取决于其所代表的利益集团的实力。如果代表的利益集团实力强大,那么它就能够在区域治理中发挥很大

的影响力。特别是，公民社会团体可以联合其他的组织，共同就一些问题提出要求，这样就会大大增加其影响力，有时这要求公民社会团体的领导者具有非凡的个人魅力。如果公民社会团体所代表的利益实力不强，就难以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但有时它可以通过与其他组织联合，在某些问题上与它们保持意见一致而发挥重要作用。

4. 公民社会团体的权力的制约

首先，公民社会团体的权力受到组织的规模的制约，这取决于它们能否争取到更多的成员加入。其次，成员的忠诚度也是一个重要的约束。如果组织能够不断关心并有效维护成员的利益，成员就会保持很高的忠诚。第三，组织的财力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它限制了组织的活动空间。最后，组织领导者的能力也会限制组织的作用的发挥。

10.3.4 居民

居民构成了区域治理的另一个重要参与者。在讨论居民对区域治理的参与时，在某些方面可能会与非营利组织有所重叠，因为许多非营利组织所代表的正是居民的利益，并反映居民的要求。但是这种间接的对区域治理的参与并不能全面反映居民的参与情况，而且非营利组织作为居民的代表，同样会产生委托—代理问题。

1. 居民参与的概念

居民参与是指对某项公共事务或政策具有利害关系的个人或团体，直接涉入政策过程中，以影响政策结果或了解、熟悉有关该政策的信息的一种活动。居民对区域治理参与的最普遍的方式通过投票选举，但无论是从民主政治的内涵还是从公共政策的形成过程来看，居民参与不只局限于投票行为，还应包括对公共事务积极而深入的介入；这样的行动不仅是消极的维护居民自身的利益，更可以创造公共利益；所参与的人员不只限于社会或政治精英，还应包括普通居民，他们可以对与自己有关的社区事务具有决定的权力。

2. 直接参与和间接参与

无论是通过代议制民主还是通过非政府组织，居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主要是间接的。而真正的参与应该是居民和政府以及各种组织一起，就一些公共领域的问题进行磋商。在传统或代议式的参与模式中，居民参与的过程是由外生的力量决定的，这些外生的力量界定了议题和决策的程序，并决定居民参与的范围。在这

种情况下，政府和各种非营利组织的角色是专家，居民则只是顾客，因而不能质疑专家的权威与技术知识。但是这种模式最大的问题在于，专家并不是真正了解居民的需求。

直接参与，是一种由居民深入而持续地参与决策过程，以便影响某种行政或政策的参与方式。在这种模式下，居民从一开始就要参与，并且必须有足够的时间去了解相关信息，而专家的职责就在于协助他们认知问题真相、协助居民作出决定。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居民在参与过程中是合作的伙伴。

这两种模式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传统的参与模式是由现存的制度和程序来界定议题，而居民却离议题本身相当遥远，甚至议题的目标与居民的需求是相冲突的。而直接参与的模式是直接由居民来界定议题，再通过相应的程序与环境，为居民创造有效的参与空间。因此，居民的参与是直接的、全程的。而在传统参与模式中，居民处于一种被动的地位。

3. 居民参与的条件

居民参与公共事务必须要具备一定的主客观条件才行，主观条件是指居民本身愿意主动地投入个人的时间、金钱、精力来为公共利益努力，客观条件则是在制度和经济上能够给予人们充裕的空间与机会来参与。如果国家经济落后，人民终日为生计奔波，那么他们根本就没有精力去考虑什么政治问题或是公共事务。因此，居民在参与公共事务的过程中，会受到两个方面的影响，即参与的愿望和参与的能力。

10.3.5 区域治理参与者的自主协调机制

区域治理的参与者掌握不同的资源和权力，同时也受到不同的约束。参与者在区域治理这样一个大舞台上，与其他参与者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关系，这些不同的关系的结合形成了复杂的决策过程，反过来这些决策过程又影响了参与者之间的关系。这些诸多关系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区域治理参与者的自主协调机制。

区域治理的自主协调机制包含三个方面的重要内容或要素，这三个要素相互作用，相互依赖，构成了区域治理的三个不可或缺的子系统。这三个子系统分别是：(1)主要参与者；(2)规则或制度；(3)目标。区域治理的参与者之间存在着持续的和复杂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是围绕着区域治理的目标展开的，同时这种相互作用要受到区域治理规则的制约，这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的规则。区域治理参与者的自主协调机制如图 10.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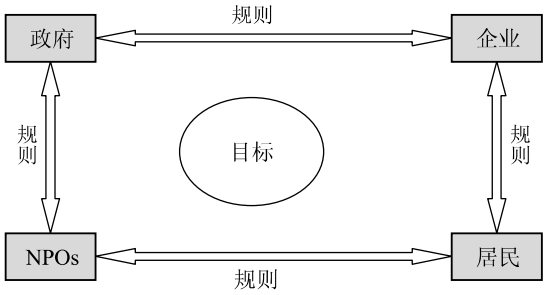


图 10.1　区域治理参与者的自主协调机制

1. **主要参与者**

在区域治理中，主要参与者主要包括政府、企业、NPOs 以及居民，他们是在区域治理中，能够拥有或控制相当规模数量的有重要影响的经济、政治或社会文化资源的人，他们通常是一些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或者是一些团体的领导，具有相同利益的一些个体通过这些团体得以组织在一起以寻求共同的利益。这些主要参与者有各种不同的类型：选举的或非选举的；政府的或非政府的；经济组织的或非经济组织的；公共组织的或私人组织的；等等。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或者是他们所代表的利益集团，他们通过多种方式，或者是直接参与，或者是通过间接的方式施加对区域治理的影响，以形成、调整、改变和实施区域的目标、战略、规则和其他公共决策。

2. **规则**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区域治理中的规则。“规则”指的是那些规范区域中的人们和组织的行为的相对稳定的制度，这些制度构成了主要参与者决策、实施决策和相互之间作用的制度环境和框架。这样的一个制度框架能够维护区域治理的秩序和一致性，并使区域治理作为一个整体履行自身的目标和功能。如果在一些问题上形不成某种共识，一个人就不可能与另一个人相互交往。人类的相互交往，包括经济生活中的相互交往，都依赖于某种信任。信任以一种秩序为基础。而要维护这种秩序，就要依靠各种禁止不可预见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的规则。

3. **目标**

目标是由各种战略、政策、计划和规划等组成。这些“目标”通常由区域治理的主要参与者根据他们自己的利益加以制定；或者是源于他们在给定的制度环境下互相之间的相互作用（竞争，争论，讨价还价，妥协，协商，合作，等等）；或者是外部

力量所强加的；或者是历史继承的。在所有这些目标中，通常存在一个“总体目标”，它是在特定时期主要参与者之间在各种层次上的激励的相互斗争和妥协的结果，反映了他们之间某些基本的一致。

围绕着区域治理的目标，区域治理的参与者在既定规则的框架下，形成了区域治理的自主协调机制，区域治理的自主协调机制将会产生区域治理问题的结果，如：

- 区域发展的空间格局和模式；
- 区域发展所带来的获利机会由谁来分享；
- 区域主体能得到什么样的区域公共服务；
- 谁来承担区域发展和公共服务的成本；
- 不同的社会阶层受到上述这些问题的不同影响，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在区域治理参与者形成的自主协调机制中，政府只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并和其他参与者一样，受到区域治理规则的作用，区域治理的目标的确定以及实现要依靠众多参与者的协商和参与。这和政府层级系统的决策和执行机制是不同的。这种差异性带来了一些问题，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区域治理的组织缺乏政府组织那样的权威性，从而会造成决策和执行中的困难。这方面的内容将在下一部分加以考察。

10.4 区域治理的运行分析

10.4.1 区域治理的权威

1. 区域治理权威的可能来源

区域治理权威可能来自于：

（1）中央政府的授权。

中央政府的授权对于区域治理的权威形成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在以集中决策为特征的中央集权国家。中央政府的授权不但丰富了区域治理的职能范围，还为区域治理职能的履行提供了合理合法的依据，便于区域治理工作的展开。

（2）地方政府的契约。

地方政府通过契约形成的权力是区域治理权威的第二个可能来源。区域治理组织的有些管理权力既不来源于国家法律的明确授权，也不来源于中央政府的委托，而是由其成员通过一定机构和程序赋予区域治理组织对它们进行管理的权力。为了防止恶性竞争及相互损害，同时形成合理的区域分工格局，各区域治理主体就必须联合起来，以集体的力量克服这些阻力和障碍。

(3) 区域治理组织的职能履行。

区域治理的权威归根到底来自于地方政府对区域治理组织行使其职权能力的认同和信赖,因此建构区域治理必须以此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代表区域治理主体的利益为本源,在此基础上构建区域治理的基本框架,完善其组织体系,建立其制度体系,确立起牢固的根基,形成组织权威和制度权威。区域治理从本质上来看是公共权力在不同公共机构间的分工,区域治理承担了权力分工中的部分职责,区域治理通过履行相应职能,并与区域治理主体进行交换,构成了区域治理存在的合法性。

2. 区域治理权威难以形成的原因

(1) 自主治理的难题。

自主治理就是一群占用者进行自我组织,以解决公共池塘资源中的提供、占有和生产问题。理性的占用者采取集体行动而不是独立的行动,其原因必然是集体行为能够给他们带来更大的好处。在经济学理论中,主体之间通常是通过交换联系在一起的,他们之间是一种竞争的关系,交易双方都试图在交易中获得更大的收益。在这样的情况下,合作是少见的,并且也是受到自由主义者谴责的,他们认为类似于卡特尔和工会这样的组织带来的结果是低效率的。但是,在公共池塘资源这样的特定情况下,占用者自我组织的集体行为不但是有效的,也是必不可少的。

但是,公共池塘资源的占用者在自主治理的过程中遇到了不同的难题。艾莉诺·奥斯特罗姆指出,没有广为接受的理论来合乎逻辑地说明占用者如何解决下面的三个问题:新制度的供给问题;可信承诺问题;相互监督问题。这三个问题如果不能得到有效解决,自主治理就将会是不可能的。

(2) 退出机制。

区域治理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其自愿性质,地方政府可自主决定加入或退出区域治理。区域治理是地方政府的自组织形式,成员退出是其自由的选择,如果成员感觉到自身的利益在区域治理中没有得到很好的诉求,而在其外能获得更多的利益,就有可能选择退出。这就要求区域治理必须认真考虑其行为对每个成员的影响。这种自愿性质,使之不能在许多重要问题上采取有效措施,并损害了区域的公共利益。

(3) 缺乏财政收入来源。

区域治理权威不足的一个原因是没有独立的收入来源。区域治理没有征税

权，大多数处于资金和人手不足的状况，严重削弱了它们在解决区域性问题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是那些无法获得中央政府资助的区域治理，由于过分依赖其成员的财政支持，为了不触怒其成员，区域治理一般避免与其成员发生直接冲突，也不愿对有争议的问题进行规划。

3. 区域治理权威的加强

(1) 中央政府与区域治理的权威。

第一，中央政府权力适当下放地方政府。

中央政府权力下放地方政府，使得地方政府具有相当程度的自治权力，这是区域治理形成的前提条件，如果地方政府缺乏自主权，那么连本地区事务的充分管理权力都不具备，就更不用说让渡部分权力给区域治理了。如果没有中央政府的权力下放，即使形成了区域治理组织，其职能的行使也必然会受到中央政府的极大干预。此外，地方政府行为由于受到中央政府的很大制约，因此会更加倾向于从中央政府那里寻找区域问题的解决方案，而不是进行区域治理，这样必然削弱区域治理的权威性。

第二，中央政府对区域治理的财政支持。

区域治理可以通过收取地方政府的会费来弥补其活动支出，但还可以考虑其他的来源，比如说中央政府的财政支持。中央政府的财政拨款的合理性在于区域治理履行区域公共管理的相关职能，带有公共物品的特征，中央政府的财政支持是对区域治理公共服务的相应回报。

中央政府对区域治理的财政支持可以采取以下一些形式：首先，财政预算。中央政府可以在年度工作计划中设立对区域治理的支持，这样在年度财政预算中就可以开列相应的区域治理项目。其次，专项基金。中央政府还可以设立某些专项基金，来支持区域治理的工作，比如说区域规划基金。最后，合作开发项目。区域治理在进行本区域的某些开发项目时，可以寻求与中央政府合作开发，中央政府可以通过合作开发项目的方式配套相应资金。

第三，中央政府对区域治理的立法支持。

区域治理的法律地位也可以通过中央政府的相关立法得到确认，这样就可以加强区域治理的权威性。如果区域治理只是地方政府的自组织机构，那么区域治理存在的依据只是地方政府的偏好，如果地方政府认为有必要，区域治理将得以存在，如果地方政府认为区域治理无法达到目的，或者其职责已经完成，可能就会撤

销区域治理组织。这样，区域治理组织的独立性将受到很大挑战，甚至其能否存在都将取决于其他主体的意志。

中央政府对区域治理的立法支持还包括区域立法权的下放。纵观世界各国所采取的区域政策会发现，区域政策往往是一个体系，既包括中央级法规，又有专门委员会和地方政府制定的行业性、地方性法规。所以，构建区域法律体系必然要涉及立法权下放这个敏感问题，如何能做到既促进区域合作又保证中央的政令统一，将是地方立法的关键。

（2）地方政府与区域治理的权威。

第一，充分认识到区域协作的重要性。

破坏区域协作各自为政的做法，其结果是不仅区域整体利益受损，而且每个地区经济也都在低水平重复，形成了所谓的“公地悲剧”。通过区域治理这一形式，实现区域内部协调发展，不同地区就区域公共事务进行磋商，并商讨解决方案，是一种多赢的局面，这一观点已经被世界上诸多经济发达国家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地方政府必须认识到区域治理的重要性，不要因为区域治理束缚了地方政府的行为，而认为区域治理是一种负担。

第二，对区域治理措施认真执行。

区域治理与一般的组织不同，其决策的形成是区域主体共同形成的，其执行也有赖于区域主体的共同执行。区域治理本身限于财力、物力、人力，缺乏决策执行的条件和手段，区域治理决策要依靠区域主体的自觉性。这就造成了区域治理执行中的困难，因为区域主体可能会根据自身的利益来对区域治理决策加以有选择的执行，对自己有利的决策，则认真不打折扣，而对自己不利的决策，则有可能不执行或者执行不力，但这样的结果会使区域治理权威受损，长期来看，也不利于每个区域主体自身的利益。

因此，各区域主体必须要站在较高的角度，从长远的眼光来看待区域治理决策的执行问题，对于一些共同形成的区域治理决策，在决策形成过程中，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使之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靠，但一旦形成决策，就要不折不扣地加以执行。以环境污染为例，对于排污量和治理费用分配的方案，一旦形成决议，各地方政府就要认真执行，否则的话将会引起其他地方政府的报复，采取和其同样的政策，其结果必然是污染问题难以得到解决，影响整个区域居民的福利。地方政府不仅要自身努力约束自己的行为，遵守共同的协定，还要在本地区努力推行共同协

定，消除本地区的一些可能误解，一起摒弃短期利益，从长远眼光看待区域治理的决策执行。

第三，提供区域治理必要的资源支持。

地方政府应该成为区域治理资金的主要来源，这是因为地方政府从区域治理那里得到相关服务，是区域治理的受益者，这和非营利组织提供服务收取费用是同样的道理。地方政府在对区域治理提供资金支持的过程中，需要界定清楚权力和义务二者的关系。区域治理重要的不是缺乏资金，而是缺乏独立的资金来源，这就体现在区域治理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上。如果地方政府把提供资金作为权力，而对区域治理提出种种不合理的要求，甚至动辄以退出区域治理或者减少资金支持作为要挟，这样就不利于区域治理的发展。地方政府除了把提供资金作为权力外，还应认识到这是地方政府的义务，认识到区域治理在区域协调发展中起到的关键性作用。

除了在资金方面提供支持外，地方政府还需要在其他方面，比如说人力资源方面对区域治理提供支持。区域治理机构比较精简，人数一般不多，因此其工作的开展会面临人手不足的局面，这时就需要地方政府提供一定的人力支持，协助区域治理职能的行使。

（3）区域治理形成自身的权威。

第一，合理界定区域治理的职能。

区域治理要形成自身的权威，首先必须要合理界定区域治理的职能，这是区域治理运行的前提。如果区域治理的职能不能得到清晰合理的界定的话，就会引起一些问题。

区域治理的职能应主要集中于区域公共事务。考虑到经济区域边界的不稳定性，区域治理是解决区域公共事务的重要制度建构。在区域公共事务方面，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职能方面存在着真空，而区域治理的存在则填补了这种空白，而且这是区域治理的优势所在，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所难以替代的。因此，区域治理的职能因为要集中于区域公共事务，就不会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产生冲突，而且不会从根本上产生能力问题。

区域治理还应注意不能随意调整职能范围。一旦职能范围确定，就不可随意变更，尤其是在执行过程中，不可随意扩大职能范围。如果随着环境发生变化，有必要改变职能范围，也要经得地方政府的协商许可，才能加以调整。

区域治理的职能范围确定不仅要注意到越位的问题，还要避免区域职能缺位的问题，即应该属于区域治理的职能范围，区域治理一定要做到。既然存在区域治理这样的制度建构，区域主体就会对其寄予期望，如果一些区域公共事务出现无人负责的局面，就会很自然地将其归咎于区域治理，并对区域治理是否真的履行自身的职责表示怀疑。

最后，区域治理在界定职能时一定要注意的是，区域治理是服务于区域主体，而不是管理。多年来，人们一直把政府看成是管理机关，尽管出现了新公共管理运动等，政府提升了服务意识，但是政府与管理等同的观念仍然没有根本改变。如果把这种意识带入区域治理，就会造成区域治理的定位错误，并影响区域治理的权威。区域治理的权威不是依靠权力的压制，而是因为其出色地履行了自身的职责。

第二，区域治理相关机制制度化。

区域治理作为区域主体的自组织，需要有其特有的制度化的基础与条件。区域治理制度化是区域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要建立起完善的制度和运行机制，使区域治理的理念与精神能得到真正的贯彻与执行。它不但将区域治理的理念与精神制度化，而且运行机制也要适合于区域自身发展的需要。

区域治理制度化一方面将区域治理机制具体体现在制度层面上，适当强化独立意识，加强区域治理的权威；另一方面建立一种体制，减少一些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限制约束和功利化的侵扰。同时，它也使组织免于为环境所控制和完全沦为政府附庸的保障。

第三，加强自身的能力建设。

区域治理的形成是区域公共事务发展的产物。一方面，区域治理顺应了区域经济发展和区域公共事务快速增长的趋势，另一方面，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反过来对区域治理的能力建设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和期待。可以说，能力建设是区域治理组织健康发展的关键和保证。加强区域治理的能力建设，可以从以下一些方面入手：要保证区域治理组织管理核心的权威性；要加强区域治理人才建设；要建立区域治理的评估指标体系。对区域治理的合理评估，既是区域主体的要求，同时也是区域治理显示自身工作绩效的途径。

第四，保证区域治理过程透明化。

要极为重视区域主体对区域治理的责任心，不允许在区域治理过程中有贪污腐化和推诿责任现象的存在。透明化与责任心对于区域主体了解区域治理的运作

是至关重要的，它可以使利益相关者知道哪个部门从决策和执行中获益最多，因此必须保证区域治理过程透明化。信息的自由传播和易获取性对于区域治理的透明化与责任心而言是基本要求。区域公共政策要以一种透明的和可预见的方式来实施。

为了实现这一点，一些可行的途径包括：

- 区域主体自由和公开地参与区域治理决策的磋商，区域建设项目招标和竞标程序透明，出版独立的年度审计报告；
- 消除管理上和程序上会导致腐败的漏洞；
- 在区域治理中倡导为民服务的道德规范；
- 建立区域治理工作人员的行为规范；
- 鼓励在媒体上就区域治理问题进行公开的、及时的和自由的讨论。

第五，多方设法获得可靠的经费保证。

经费保证对区域治理是至关重要的，它是区域治理职能运行的依据。在前面谈到了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要在财政方面对区域治理加以支持，以增强区域治理的财务基础和权威性。作为区域治理本身，也需要积极采取种种措施来多方设法获得可靠的经费保证，这要注意以下一些方面。

首先，资金来源必须是可靠的。资金来源必须具有稳定性和连续性，一些偶然性的拨款或捐赠数目可能很大，对于区域治理很有意义，但是如果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则是不可靠的经费来源，不能成为区域治理资金的主要来源。一些稳定的经费来源包括：地方政府缴纳的会员费用，中央政府的专项拨款，区域治理的服务收费等等。要注意赢取稳定的经费来源。

其次，经费来源必须具有独立性。这主要指的是获取经费时不可以有附加的条件，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在区域治理中谋取更多利益，会通过多给经费的方式，附加条件为本地区争取利益，这种经费来源不能作为区域治理的经费来源，否则的话，就会导致区域治理失去公平性，还会造成区域治理受某些利益的摆布。

再次，不可依赖某一主要经费来源。如果区域内部不同地区贫富不一，有些地区由于比较富裕，因此承担了较多的经费。但是，这种状况不可以过度，否则的话，这些地区会认为自己承担了主要的经费来源，因而会以此诉求区域治理中的特殊地位，影响区域治理的权威性，使得其他地区排斥以区域治理作为解决问题的途径。

最后，区域治理不可以营利为目标。为了弥补经费困难，一些非营利组织采取措施增加财源，其结果是变得更加商业化。这种发展方向不可以成为区域治理的目标。区域治理拥有一定区域公共权力，如果以营利为目标，就可能造成区域治理滥用权力，造成腐败，这也会侵蚀区域治理的合法性，损害区域治理的权威。

第六，循序渐进确立区域治理的权威。

要注意的是，区域治理权威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的工夫。区域治理涉及权责划分、政治制度、行政区划、管理体制、机构人员调整等，其问题成因涉及因素较多，历史因素、制度因素、人文因素、地域因素等复杂交织，理顺难度很大。如果急于求成，为了区域治理工作顺利开展，急于树立区域治理权威，反而会过犹不及，损害了区域治理的权威。

因此，要本着尊重历史、正视现实、展望未来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因，以战略的思维，由点到面、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分远近、别易难、有步骤地加以理顺而不是一蹴而就。区域治理权威的形成，要依靠区域治理在区域公共事务处理中的出色工作，这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要不断增强区域主体对区域治理的信任，并对区域治理产生依赖感，把区域治理作为区域公共事务可靠的解决方案，届时区域治理的权威就自然形成了。

10.4.2 区域治理的运行

1. 区域治理政策方案的形成

(1) 区域治理政策方案由谁提出。

根据对区域治理参与者的分析，有可能提出区域治理政策方案的参与者有以下一些。首先是地方政府的官员。地方政府官员代表地方的利益，区域问题的解决能够给地方带来好处，而且如果能够主导政策方案的提出将有利于给本地区带来更大的利益，因此地方政府官员有责任提出政策方案。其次是公共知识分子。前面提到，政策方案的供给是需要一定的成本的。这种成本包括时间成本，提出高水平方案需要的知识积累，以及为了提出方案付出的金钱成本。除了最后一项以外，公共知识分子都具有自己的优势。一些企业可能也有提出政策方案的需求，这是因为区域治理能够给这些企业带来好处。这些企业的利益通常跨越了单一地方政府，因此良好的区域治理带来的区域协调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能够给企业增加利润。此外，企业有参与公共决策过程的愿望，因为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公共政策，也能得到更多的关于公共政策的信息，从而可以在和竞争对手的竞争中占据

先机。最后，如果形成了较为正式的区域治理组织，那么区域治理组织就是政策方案责无旁贷的提供者。区域治理组织成立在政策方案提出方面的好处体现在，政策方案的提出不再是临时性、偶然性和不连续性的，从而使区域政策方案成为一个连贯有机的体系。

（2）政策方案的形成。

具体来看，区域治理政策方案的形成要经过三个阶段。

首先，区域问题发现阶段。问题发现通常为问题形成的开始阶段，是某个问题被发现，并已引起区域治理参与者较多关注而准备采取可能行动的过程。一般来说，最早注意到区域治理问题的参与者是企业，它们通常能够从微观视角察觉到区域问题的解决与否带来的变化，地方政府的官员将是第二个注意到区域问题的参与者，因为他们是企业抱怨的对象。然后，计划、统计、调查研究和预测分析等机构的研究人员、专家学者，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和课题中，能觉察和确认某些重要的公共问题。

其次，区域治理问题界定阶段。问题界定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提示区域问题的性质。要弄清区域问题的影响范围，是否尽管在区域内形成，但并不是带有区域整体性的问题。二是揭示区域问题的原因。是否问题形成的原因是在区域层次，而不是在地方政府或是中央政府层次？而且，是否必须通过地方政府协调或是区域治理组织协调解决？因为一些第三方组织也能在区域协调方面做出贡献。三是建构实体问题，将问题纳入一定的学科背景和相应的概念框架体系之中，用具体的专业术语界定出区域治理问题，这是一个专业知识的运用过程。所以，它要求区域公共管理者和知识分子的协作。

第三，区域治理政策方案设计阶段。政策方案设计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为实现既定的政策目标，大致可提出多少个政策方案；二是将各个政策方案的设计勾画出来，包括方案的行动原则设计，基本措施、发展阶段的描述等。政策方案设计针对未来，作出政策的情境和政策付诸实施时的情境往往随时间的推移而有很大的不同，因此政策方案设计的构想必须着眼于未来，着眼于付诸实施时的政策问题情境。

（3）政策方案的提出。

区域治理的政策方案的提出可以有以下一些途径。

第一，通过地方政府间协调机制。地方政府形成了自己的政策方案后，可以在与其他地方政府就区域公共事务进行协调时提出，来表明自己对于区域公共事务

的看法、立场和解决思路。不同政策方案的碰撞，实际上是不同地方政府的观点调和一致的过程。如果通过协调，形成不同地方政府都能接受的最终方案，就可以将其作为区域治理行动的依据。

第二，通过区域经济发展论坛。区域经济发展论坛是区域治理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区域治理正式组织的有效补充。论坛形式的特点是可以各抒己见，仅仅代表个人立场，可以视为区域治理参与者思想的交流。而且这种交流由于具有非官方的色彩，因此能够畅所欲言，对于区域治理最佳方案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尽管是非正式的机制，但是一旦参与者的思维受到论坛的影响，就可能会在正式的文件中得以体现。

第三，通过区域治理正式会议。如果区域治理形成了正式的组织，如区域议会，政策方案就可以在区域治理议会的会议上通过正式的流程提出，并被区域治理组织的其他成员评价。政策方案通过正式会议的讨论，形成的最终方案就有了很强的约束力，对于方案的顺利执行具有重要意义。

第四，通过公开媒体。政策方案也可以通过公开媒体的方式发布，这样可以引起区域内更多人的关注和讨论，这既可以是官方正式的媒体，也可以是一些学术性的刊物。得到更多人的关注，就能够吸收更多更充分的意见，对于政策方案的完善很有好处。此外，更多人对于方案的关注，对于政策方案的最终顺利执行很有帮助，因为充分讨论的方案能够得到更广泛的认可。

2. 区域治理政策方案的确立

（1）区域治理政策方案纳入决策过程。

区域治理政策方案在提出后，就进入区域治理方案确立的流程。在这一阶段，不同的政策方案将被比较、选择，最终选择一个政策方案作为执行的依据。与政策提出阶段相比，政策方案的确立阶段非常重要。与一般政策过程相比，政策方案的提出阶段并没有太大的区别，都是区域治理参与者根据自己的情况提出自己偏好的方案。但在方案确立阶段，情况就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区域治理涉及不同的利益主体，这些利益主体代表不同地区的利益，因此协调起来就会比较困难。

（2）区域治理政策方案的比较和确立。

首先，在区域治理政策抉择过程中，可以考虑采用德尔菲法，在广泛依赖各方专家和顾问力量的基础上，依靠专家所掌握的广泛的知识和信息，依据科学程序，运用科学的方法和技术，进行科学决策。

其次，在区域治理政策抉择过程中，政策抉择主体必须充分了解各方利益要求、全面权衡各方利害关系以及利益内部的直接利益与间接利益、现实利益与未来利益、形式利益与内容利益的关系，通过利益的协调，来实现正和博弈，实现多方面都能接受的政策方案，这样也有利于政策的最终推行。

第三，在区域治理政策公共抉择过程中，区域治理政策抉择主体的抉择行为必须按规定的制度和程序进行。这样，就可以使政策方案建立在法定的程序之上，保证政策公开、公正和透明，也增强了政策的权威性。

3. 区域治理政策方案的执行

区域治理政策执行主要包括三个阶段：一是执行的准备阶段；二是区域治理政策的实施阶段；三是执行的总结阶段。这三个阶段相互衔接，构成一个完整的执行过程。

在区域治理政策执行的准备阶段，首先要正确地贯彻执行区域治理政策，认真学习和理解区域治理政策，这主要是在执行者的范围内。同时要做好政策执行的物质准备和组织准备，确保有执行政策的权威和主要工作人员的承诺，同时还包括充足的装备、物资设备以及其他的支持设施。

区域治理政策执行的实施阶段是区域治理政策执行的中心阶段，是实现区域治理政策目标的关键环节。区域治理政策执行的实施阶段包括宣传、政策实验、全面推广、沟通与协调等几个环节。这几个阶段体现了政策实施循序渐进的理念，既保证了政策执行的效果，又最大限度降低了政策执行的成本和风险。

区域治理政策执行总结是一个完整的政策执行过程的最后一个环节，其重要意义在于继往开来。通过对执行成绩、执行经验的总结，可以加深对政策过程的认识和理解，这一方面可以对现有政策加以进一步完善和提升，另一方面也可以为下一轮政策执行积累更丰富的经验。区域治理政策执行的总结包括区域治理政策执行的监测、政策执行再决策等内容。

10.4.3 区域治理的模式

1. 专题项目合作

在这方面，主要是围绕着一些跨地区项目，如比较难以由地方政府单独解决的问题、矛盾或者需求，如跨区公路、大桥、水利建设等等，通过一些共同合作项目的建设来实现区域合作。专题项目式合作的优点在于可以根据不同的跨区共同性问题的需要而度身定做，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便利性。可以就某一区域性公共产品

展开专题式合作，就合作项目签订协议、契约或合同，一切按照法律文本的规定实施，违反者应负违约责任，保证了区域合作项目的权威性及有效性。此外，政府间专题项目式合作的特点还在于其灵活多变，具有较强的时效性，它往往是由于某一公共性问题的出现而开始，也随着该问题的解决而终止，不需要设立专门的区域性机构和人员，是一种较为简单但有效的区域行政的实现方式。

2. 专业委员会

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关于府际合作发展方面有一个比较成功的制度创新——特区(special district)制度(也可称之为专区等)，对于美国社会区域性事务的管理，提供跨行政区公共服务与产品起到了很好的成效。美国的特区是由州议会或地方政府根据州法律创设的特殊目的政府，一般行使一种或有限几种职能，拥有独立于一般政府的行政和财政自主权。特区通常被称为“区”(district)、“管理局”(authority)、“委员会”(board)。

设置特区的目的，一是为了规避州宪法和法律以及自治宪章所规定的赋税和借债总额的限制，或者为了分散税收负担，以便筹集资金举办某一领域的地方事业；其次是处理特殊问题需要特定领域的专业知识，设立特区并建立相应的独立管理机构，可以摆脱一般地方政府通常存在的政治斗争的干扰，便于由有关专业人才进行管理；第三是出于政治原因，如为满足联邦政府拨款要求而成立某种特区；第四，也是同跨地区政府间合作关系最密切的是，为履行越出地方政府行政边界的某种功能，普通地方政府之间将各自的全部或局部区域合并为一个特区，设立独立的管理机关，以实现规模经济，将该项功能的受益者包括在内，或者与某项职能的自然边界相吻合。从技术上看这些功能往往涉及原料、能源、动力等经济因素和道路路线、河流走向、土壤土质等自然地理因素，处理这些问题就不得不打破历史形成的行政地域边界的限制。

无论在欧洲还是在北美，在城市区域的协调发展过程中都形成了一大批松散的非政府组织来推动城市区域的发展。作为一种民间的组织，其组织方式是多样的。纽约大都市区的跨区管理是典型的非政府组织形式。

纽约大都市区包括纽约州、新泽西州北部及康涅狄格州南部，地跨 3 个州 24 个县，总人口 1 800 多万，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密集区之一。早在 1898 年纽约就和它周围的 4 个县联合组成了大纽约协作组织，但直至目前，仍没有形成统一、具有权威的大都市区政府。松散的非政府组织是城市区域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

包括：1921 年纽约和新泽西州联合成立的港务局（port aughourity，PA），至今仍管理整个区域内多数交通运输设施，包括港务局、桥梁、通勤线和海港设施（PA 的 12 名委员由州长任命，财政上相对独立）；1929 年成立的区域规划协会。协会只是一个私人的非营利团体，但区域规划委员会对跨区域的城市进行规划；在纽约大都市区发展的过程中，针对一些具体的区域性问题，如供水、排水、垃圾处理等，都形成了一系列专门的非政府组织来协调整个区域的发展。所以纽约大都市区主要以一系列松散的非政府组织对跨区域的事物进行管理，而不是建立一个管辖全部事务的大都市政府。

3. 区域委员会

区域委员会是由县、自治市以及特区等组成的自愿性区域组织，主要目的是加强地方政府之间的交流、合作与协调，以解决美国大都市区所面临的一些区域性问题。全国区域委员会协会代表美国 450 多个区域委员会，它对其成员的界定为：由地方政府创立的有多重目的、多重管辖权的公共组织，它们将多个层级的政府成员聚集在一起进行总体规划、提供服务，并培育区域合作精神。它们有不同的名字，从政府联合会到规划委员会再到各种发展特区。联邦政府的法令授予区域委员会制定大都市区发展规划、审查地方政府拨款申请的权力，对那些与大都市区整体规划不符的发展规划，区域委员会可以予以拒绝，这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大都市区的有序发展，消除了地方政府相互竞争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区域委员会的形式有：区域规划委员会和政府联合会。政府联合会是由民选官员或由民选官员为代表的地方政府组成的多功能自愿性区域协会。政府联合会的管理机构主要由成员政府的重要民选官员组成，其资金至少部分来源于成员政府。美国最早的政府联合会于 1954 年成立。政府联合会的主要目的是为其成员政府提供一个论坛以讨论大家共同关注的问题，对那些有着广泛影响的联邦、州和地方项目进行协调。在某些必要情况下制定解决特定问题的政策，并通过其成员执行决策。政府联合会的关注点一般是与注重实效的项目有关的短期政策，如技术援助、共同采购、双向警察协助、公共服务培训、固体垃圾处理等。值得注意的是，政府联合会作出的决定对其成员政府一般没有约束力。①

① 刘彩虹：《区域委员会：美国大都市区治理体制研究》，《中国行政管理》2005 年第 5 期，第 39 页。

4. 城市联盟

区域治理的另一种模式是地方政府联盟，国外一些学者称之为城市联盟（citistate），组建的城市联盟不属于一级政府，不是行政实体，而是一个类似于邦联的灵活的联合体，成员政府彼此让渡出部分公共权力，制定具有法律效力的制度章程，明确规定管辖范围与内容，在共同的管理事务和治理领域内享有唯一的权威性，而在超出此范围外则无权干涉各地方事务。

城市联盟一方面与古罗马时代及中世纪时代的城邦的含义相似，另一方面又具有新时代的特点，现代城市联盟已融入全球性的、迅捷的电子通讯和资金流动之中，并且还是世界人口增长的主要容纳地。因此，我们可以把城市联盟理解为以现代城市为主体的区域经济、政治共同体。这种共同体以周边城镇为经济腹地，是经济中心即中心城市的聚集和扩散能力能够达到并能促进其经济发展的地域范围。按组织生态学的观点来看，若把一个城市联盟比喻为一个人，则中心城市就是这个人的心脏，周边城镇则是他的其他组织器官。

城市联盟目前主要还停留在理论层面，其实践遭遇到现有行政区划和行政体系的障碍。但是，一个与城市联盟理念接近的例子是欧盟，只不过欧盟是以国家为单位形成的政府联盟，而城市联盟的组成单元是城市和地方政府。

10.5 中国的区域治理分析

10.5.1 中国区域治理发展存在的问题

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是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形成的，区域的经济一体化受到管理体制及经济运行经济体制的影响和制约，从而阻碍了整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治理问题越来越突出，也已经影响到了区域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这些区域治理问题主要有以下一些。

1. 地方保护主义盛行

市场一体化是区域一体化的基础，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产品市场、生产要素市场及服务市场一体化的过程。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全国性及区域性的市场体系正在形成，与市场经济要求相适应的市场体系仍未形成，区域产业结构趋同，企业的专业化分工、企业的规模经济及城市的规模经济难于形成。形成地方保护主义的最主要因素就是地方政府的干预，地方政府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导致地方政府间的无序竞争，形成行政区域间的壁垒，这种行政壁垒的存在与

市场一体化的要求不协调，导致了一系列的区域问题。

2. 区域内产业结构雷同

中国区域产业分工与布局仍面临着许多问题，区域内各地方产业结构“同构化”和“低度化”的趋势进一步加剧。区域内合理的产业结构布局应该是协调的地域分工，发挥不同地区的比较优势，形成整体的综合优势。但是，目前中国的区域内不同地区产业结构雷同，发展规划中设定的主导产业基本相同，这主要是由于地方政府过多参与了经济发展的结果。这种产业结构相似性的增强使得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区域内合理分工格局无法形成，严重影响着经济发展。

3. 区域公共产品供给不足

区域公共产品能够为区域内所有地区提供服务，对于区域的整体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这些区域公共产品既包括一些公共基础设施，如道路、港口等，也包括如治安、防疫和污染等公共服务。由于区域公共产品的受益人为整个区域，因此从理论上讲区域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也应该是区域内所有地区。从实践上来看，很多区域公共产品的提供是由上级的政府来提供的，如省内高速公路的建设等，这对于区域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上级政府提供公共产品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更高一级政府有可能对区域内公共产品的真实需求信息并不完全把握，这可能会造成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和需求并不一致。其次，可能会导致某些公共产品的供给较为积极，这些通常都是能够带来利益的项目，而对一些如江河和空气污染治理这样的公共产品提供就不那么积极。第三，上级政府提供公共物品通常以行政区域为对象，而经济区域与行政区域经常不一致，这就造成区域公共物品的提供并不恰当。此外，还存在基础设施布局不合理的问题，基础设施体系处于一种各自为战的状态，各地方自成体系、分散孤立地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造成了很大的浪费。

10.5.2 中国区域治理问题的深层原因

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形成合理的区域分工格局，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有两种体制同时起作用：其一是市场体制，其二是行政管理体制。如果管理体制与市场体制相互协调，就可以通过管理体制克服市场失灵造成的缺陷，有利于市场机制作用发挥；反之，则会阻碍区域市场一体化的形成，不利于区域经济的发展。

区域经济发展中管理体制问题的本质在于经济区域边界与行政区域边界的不

一致。经济区域通常跨越了多个行政区域，市场体制的内在要求是区域经济一体化，而地方政府则有自身的利益，这二者的不协调是我国在区域经济发展进程中面临问题的根源。可以通过地方政府的博弈模型来说明区域治理问题的形成机理。

1. 地方政府的囚徒困境

传统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下，地方政府是区域的唯一主体，区域治理呈现出典型的自上而下的路径特征。可以将具有经济人型地方政府特征的区域治理概括为单主体目标决策模型，相应的管理体制则是单一主体的自上而下的方式，在这种管理体制中，居民和企业都只是被动的接受主体。这种单主体目标的决策模型可以使用图 10.2 来体现。

	不合作	合作
不合作	(2，2)	(7，1)
合作	(1，7)	(5，5)

图 10.2　地方政府博弈的囚徒困境

这种地方政府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由于其他地方政府的博弈，其结果是各方利益都受到了损害。以招商引资政策为例，囚徒困境博弈模型展示了地方政府博弈的结果。

如果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中协调彼此行为，形成合理的产业结构，对于双方都有利，其结果是(5，5)；如果一方采取协作政策，另一方则通过降低税收和地价的方式竞争，则采取竞争政策的一方的结果是 7，另一方结果是 1；如果双方都采取竞争政策，则双方的博弈结果是(2，2)。

2. 地方政府的连续博弈

地方政府博弈产生囚徒困境不是一种有效率的结果。地方政府努力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其结果却是水平较低的均衡，未能实现最优解。不过，囚徒困境模型主要是静态博弈，在现实世界中，地方政府可能通过连续博弈来实现最优解均衡，这一机制体现在地方政府可以进行连续博弈，见图 1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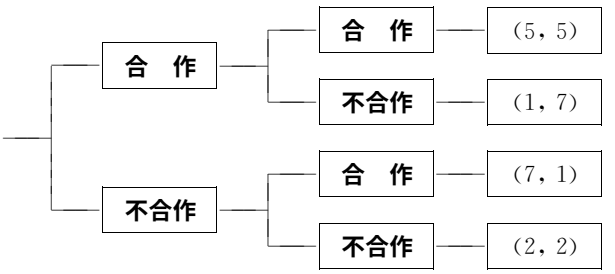


图 10.3　地方政府的连续博弈

在连续博弈中，地方政府不是同时作出决策，而是由一方先作出决策，另一方在其决策基础上作出进一步决策。先做决策的一方尽管希望通过不合作的决策来获得更大的利益，但是出于对另一方同样作出不合作决策的担心，作出合作的决策就是最优的选择。

3. 区域治理创新的必要性

地方政府连续博弈尽管可能实现合作解，但是这需要一个很长时间的相互适应过程，在这过程中会出现多次的相互不合作的报复和威胁，造成了资源的浪费。更为重要的是，地方政府的连续博弈是建立在地方政府是理性经济人的基础之上。但是，地方政府的官员是由一定任期限制的，其目标是在自己的任期内作出一定的政绩，因此地方政府官员特别是主要官员的利益与地方经济的利益有时可能并不一致，往往更加追求短期利益。在地方政府对经济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背景下，这会导致连续博弈的最优解可能根本不会出现，博弈的结果可能是囚徒困境的反复出现。

地方政府的行为在局部是理性的，但在整体上看是不理性的，这主要是由于缺乏区域治理的协调。通过区域治理体制创新，可以协调区域内地方政府的行为，使局部的理性和整体的理性达到一致。

10.5.3 中国区域治理的制度创新

解决中国区域问题需要建立有效的区域治理，它是解决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市场失灵及政府失灵的必然选择。区域的经济一体化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内在要求，建立在这一经济基础上的区域治理体制也应当与之相适应，这就要求中国区域治理的不断创新来适应区域一体化的发展。

1. 区域治理的组织形式

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中国区域治理组织应当包括以下几种类型：

(1) 松散的区域治理组织。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松散的区域治理组织在跨行政区域的经济合作、基础设施建设及公共管理方面的合作一直没有实质性突破，我国的区域组织大部分是松散的非政府协作组织，缺少必要的手段和明确的职能定位，但松散的协作组织也有其存在的意义。

松散的区域治理组织主要是通过区域内不同城市之间建立一个松散的、非政府组织形式的协作组织，为区域协调发展及经济一体化开展宣传和提供信息交流

的场所，作为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它为正式制度变迁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为更高层次的区域治理组织的建立创造了条件。同时，松散的区域治理组织是地方政府自愿组建的组织，组织的建设及运作方便，是一种制度变迁成本最低、易于操作的区域组织形式。因此松散的区域治理组织仍是我国未来区域组织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是我国区域治理组织中必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2）专门委员会。

专门委员会可以作为区域治理组织的另一个选择。区域可以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的自身要求，就城市区域经济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某一单一问题，成立单项的、小规模跨行政地区的专门委员会。单项的区域组织管理范围划定根据需要有大有小，大的基本上覆盖整个区域，小的则只有 2—3 个城市的组合。在职能界定上可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成立相应的区域专门委员会，成立如大气质量管理组织、大都市区交通运输组织、大都市区规划管理组织等。

（3）城市联盟组织模式。

城市联盟的模式是一种层次较高的区域治理组织形式，比较适合于内部各地区经济联系非常密切的区域。也可以考虑先建立松散的区域治理组织或专门委员会，在运行的基础上，随着条件日益成熟，逐渐过渡到城市联盟组织模式。城市联盟组织模式对于成员具有很强的权威性，要求成员让渡较多的自主权力，这只有成员对于城市联盟具有很强的信任和依赖才能实现。因此，对于城市联盟组织模式要求比较高。

2. 区域治理组织建立的途径

（1）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共同推动。

在区域整体利益主体缺失的背景下，中央政府是维护区域利益的代表，因此区域治理的建设需要中央政府的支持。与此同时，伴随改革开放的过程，地方政府日益成为区域利益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区域治理的职能和权力及法律地位界定最终要通过地方政府的协商来完成。区域治理组织建设作为一种制度变迁应当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共同推动的结果。

（2）区域治理职能逐步完善。

从国外区域治理的情况来看，既有为解决某一问题而成立的单项政府组织，如区域大气质量管理委员会，也有组建功能多元综合性地方政府联合组织。从实践来看，这种综合性的区域组织的操作难度较大。地方政府利益的整合本身

实践起来就比较困难，因此区域组织建设应当是先易后难，职能设定应当是从单一到综合逐步过渡，选择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入手组建相关的区域组织，从而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并逐步实现区域组织职能从单一到综合的转变。

（3）区域经济组织模式的多元化。

中国国情复杂，不同区域情况差别很大。因此，中国的区域治理组织将不是一种单一模式，而将是一种多元化的模式。中国作为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在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进程中，应当探索出更多的区域治理组织的新模式。

（4）推动区域治理的法律建设。

区域治理组织的发展需要相应的法律支持。以欧盟为例，欧盟经济一体化是通过一系列的协议等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件所推动的。所有的国家都必须遵守这些协议，而不能单独改变或是违背。如果成员国政策与条约规定相抵触，需要成员国做出相应调整。美国等西方国家区域治理组织的成立及其发展也都是建立在相关法律的基础上。在中国，政府具有很大的权力，如果没有相关法律的支持，区域治理的建立和发展将会遭遇众多障碍。

本章小结

本章首先分析了与空间自组织相适应的区域自主协调机制——区域治理的概念，对国外区域治理的模式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在此基础上，重点分析了区域治理的参与者，区域治理的权威、运行和模式。最后，对中国的区域治理问题进行了讨论。

思考题

1. 为什么要研究区域治理问题？
2. 比较城市治理和区域治理这两个概念。
3. 区域治理组织建立的途径有哪些？

4. 你认为在中国，区域治理权威难以形成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5. 如何加强区域治理权威？请你以地方政府博弈为例说明区域治理权威的加强问题。

参考文献

金丽国：《区域主体与空间经济自组织》，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孙兵：《区域协调组织与区域治理》，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上海三联书店 2000 年版。

奥利佛·E. 威廉姆森：《治理机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奥斯特罗姆等：《美国地方政府》，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陈振光、胡燕：《"管治"：理论角度的探讨和启发》，《城市规划》2001 年第 9 期。

陈振光、胡燕：《西方城市管治：概念与模式》，《城市规划》2000 年第 9 期。

丹尼斯·C. 缪勒：《公共选择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顾朝林等：《城市管治：概念·理论·方法·实证》，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郝寿义：《增强城市国际竞争力与城市治理》，《开放导报》2002 年第 9 期。

刘彩虹：《区域委员会：美国大都市区治理体制研究》，《中国行政管理》2005 年第 5 期。

刘君德、汪宇明：《制度创新：中国城市制度的发展与改革新论》，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迈克尔·麦金尼斯：《多中心体制与地方公共经济》，上海三联书店 2000 年版。

迈克尔·麦金尼斯：《多中心治道与发展》，上海三联书店 2000 年版。

皮黔生、王恺：《走出孤岛》，上海三联书店 2004 年版。

饶会林、郭鸿懋：《城市经济理论前沿课题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俞可平：《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

詹姆斯·M. 布坎南、戈登·塔洛克：《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詹姆斯·N. 罗西瑙：《没有政府的治理》，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B. 盖伊·彼得斯：《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Andrew, C. and Goldsmith, M., 1998, "From Local Government to Local Governance

and Beyo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2), pp. 101—117.

Jessop, B. and Sum, N.-L., 2000, "An Entrepreneurial City in Action: Hong Kong's Emerging Strategies in and for (Inter) Urban Competition", *Urban Studies*, 37 (12), pp. 2287—2313.

Jessop, B., 1998, "The Rise of Governance and the Risks of Failure: The Cas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55(1), pp. 29—45.

Pierre, J. and Peters, B. G., 2000, *Governance, Politics and the State*, St. Martin's Press.

Pierre, J., 1999, "Models of Urban Governance: The Institutional Dimension of Urban Politics", *Urban Affairs Review*, 34(3), pp. 372—396.

Pierre, J., 2000, *Debating Governan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hodes, R. A. W., 1994, "The Hollowing out of the State", *Political Quarterly*, 65, pp. 138—151.

后　记

区域经济学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是认识和解决区域问题的一个重要学科，其发展历史告诉我们，区域经济学是在研究和解决诸多区域或空间经济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发展起来的。从西方区域经济学研究的现状来看，其基本理论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不同流派从不同的研究侧重点出发，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形成了不同的理论体系。然而，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尽管伴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宏观经济学的快速发展和计量革命，区域经济学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在主流经济学不断成熟的同时，区域经济学却面临被边缘化的困境。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区域经济的蓬勃发展，区域经济学在中国获得了快速发展，很多区域经济学研究人员为建立适应中国国情的区域经济学理论体系作了大量工作，相继出版了大量的教材和研究著作。由于研究者的理论基础、研究角度、专业背景等不同，所提出的学科体系、理论框架甚至核心概念表述都有很大差异，可谓众说纷纭、百家争鸣。

南开大学是在国内较早开设区域经济学科的高校，有一批优秀的区域经济学学者，长期坚持区域经济理论研究。1997年，我和安虎森教授共同组织了当时南开大学部分从事区域经济学研究的中青年学者，经过一年多的讨论和研究，于1999年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区域经济学》一书。该书自出版发行以来，受到的欢迎程度是我们最初所没有预料到的，几乎国内所有的设有区域经济和城市经济专业的高等学校都把该书作为或者列为本专业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专业必修课的教材或参考书。大量的读者通过多种方式对该书提出了富有见地的评价。

在编写《区域经济学》一书时，我们归纳和梳理了国内外的很多研究成果，试图构建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框架。尽管大多数读者都对其给予了充分肯定，但我们深知，这本书距离我们的目标还有很大差距，在构建区域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道路上

仅仅是迈出了第一步。

在《区域经济学》出版后，我们将其作为南开大学区域经济学博士生教学的一本重要教材和博士生研究中的一个“镖靶”，不断进行丰富与完善。在反复的研讨中我们理清了更多问题，如经济区域是怎样形成的，区位理论和区域形成理论是什么关系，区域经济学的微观基础是什么，等等。博士生的区域经济学课程采取了滚动开发和双向互动的原则，根据多年的研究积累，我们设置了区位、区域、区域发展、区域经济微观基础、区域政策和区域治理等专题，每级学生选择相关专题重点研究，所有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又成为下一届学生进行深化研究的基础。近十年来，我们坚持采用这一方法进行博士生区域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并将相关的专题作为博士生论文选题和博士后研究的重点内容，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材料，对国际前沿研究文献的把握也越来越深入和及时，先后形成了 26 篇博士论文和博士后出站报告。

除了理论教学和科学研究，我们极力提倡学生深入实际经济生活，了解区域经济的现实需求和困境。面临国内外区域经济领域不断涌现的新的现象和问题，我们通过调查和讨论，将实际问题不断进行抽象，回到理论层面进行更一般的思考和研究，从而既保证了我们的研究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依据，也保证了应用经济学源于实践回到实践的要求。

之所以能够长期坚持这样做，一方面是因为南开大学具有优良的传统和严谨治学的学风，鲍觉民先生、蔡孝箴先生、季任钧先生、郭鸿懋先生等老一辈南开学人为我们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树立了榜样；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个人的特殊经历，在担任南开大学教授的同时，我还曾先后兼任天津市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天津市国土与规划管理局常务副局长、天津市滨海新区管委会副主任。这样的经历使我能处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实践的前沿，为结合国情的区域经济理论研究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2004 年《区域经济学》出版了第二版，虽然我们当时的研究已经有了很大进展，但还没有最终形成系统的成果。我们对《区域经济学》一书选择了保留初版体系特色，对相关内容进行修改和完善的做法。在这一年，南开大学“985 工程”区域经济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获得批准设立。区域经济学理论创新研究作为该基地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使我们得以在已有的研究队伍基础上，进一步整合南开大学一些长期从事区域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中青年学者组建了区域经济学理论

创新研究团队，将多年研究积累的成果加以系统化。

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套“区域经济学丛书”就是这个创新团队的最新研究成果，《区域经济学原理》则是这个研究成果的高度概括。如果说《区域经济学》一书主要是梳理、归纳并综合了国内外的研究成果，那么，现在这本《区域经济学原理》则是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在国内外前沿研究成果基础上的一次大胆创新，目的就是构建符合中国特色且能与国际接轨的区域经济学基础理论。

和《区域经济学》相比，《区域经济学原理》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创新和完善：

第一，《区域经济学》一书虽然研究的是空间问题，但却没有对空间属性作出判断，而《区域经济学原理》提出了均质和非均质空间有机统一的观点，并合理吸收了区域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等相关学科的优秀研究成果，这是对《区域经济学》一书的进一步完善。

第二，《区域经济学》意识到了建立区位理论和区域形成理论之间联系的重要性，但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区域经济学原理》一书则将从区位到区域的形成作为理论框架构建的核心，并努力使用规范的经济学语言演绎了从区位到区域的路径和内在机理。

第三，《区域经济学》对微观基础的研究不足，而《区域经济学原理》则高度重视区域经济学的微观基础问题，将区域主体与空间经济组织机理作为重要的研究内容。

第四，《区域经济学》关于区域经济发展问题仍沿用了宏观经济增长模型，《区域经济学原理》则初步构建了具有时空结合特征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型，特别是对区域经济循环发展规律的研究使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得到了进一步深化。

第五，《区域经济学》没有特别地研究区域不平衡问题，而《区域经济学原理》则对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提出了要素适宜度概念，试图打破传统区域经济不平衡转向平衡发展的研究范式，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区域协调发展的思路。

第六，《区域经济学》较为详细地研究了区域经济政策，《区域经济学原理》则在《区域经济学》基础上将视角转向了区域治理问题，这是与研究区域经济政策不同的方式和理念。因而，《区域经济学原理》不是简单替代或者摒弃《区域经济学》一书的思想和成果，而是在其基础上的一次突破和创新，并与之相辅相成。

《区域经济学原理》一书致力于构建既符合中国国情又能够与国际接轨的区域

经济学研究框架。毫无疑问，这是一项涉及面广、内容繁多、难度较大的复杂工程，试图通过一本著作解决这些问题将会面临很多困难。因而，我们采取了丛书的形式表述整体研究成果。需要说明的是，这套“区域经济学丛书”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和相互承接关系。

《区域经济学原理》是这套“区域经济学丛书”的纽带与核心，清晰构建了一个区域经济学的研究框架。除带有总论性质的对区域经济分析的逻辑前提和方法论进行探讨的部分（《区域经济学原理》的第1、2章）外，这个研究框架的具体内容由五部分有机构成，而这五个部分又可以相对独立地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共同支撑《区域经济学原理》一书的基本思路和基本观点。

第一部分是区位与区域形成，这部分内容涉及《区域经济学原理》中的第3、4、5章。高进田博士研究完成的《区位的经济学分析》在反思传统区位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区位观，较为系统地分析了区位—区位选择—聚集经济—经济功能区——经济区域的历史和逻辑的演化机理。

第二部分是区域发展理论，对应于《区域经济学原理》的第6章。王建廷博士研究完成的《区域经济发展动力与动力机制》在经济区域形成的基础上，构建了以聚集为核心的时空相结合的内生动力模型，揭示了始于要素禀赋的区域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这跳出了区域经济发展研究简单沿袭宏观一般经济增长理论的路径。

第三部分是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理论，对应于《区域经济学原理》的第7章。金相郁博士研究完成的《中国区域经济不平衡与协调发展》通过实证研究，揭示了不同要素对于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将古典经济学的自然要素禀赋纳入分析，提出了要素适宜度概念，阐明了由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到区域协调发展的新路径。

第四部分是区域主体与空间经济自组织，对应于《区域经济学原理》的第8、9章。金丽国博士研究完成的《区域主体与空间经济自组织》力图从区域微观主体的空间行为视角来构建区域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和揭示空间经济演化的微观组织机理。由于主体经济行为必然会影响到区域经济发展与不平衡问题，所以这部分的研究也是对区域经济发展和不平衡发展研究的一个补充。

第五部分是区域治理，对应于《区域经济学原理》的第10章。孙兵博士研究完成的《区域协调组织与区域治理》强调区域内多主体的共同参与和互动，依据区域内各个主体的利益需求，调动微观区域主体的积极性，进行区域的有效治理，为区

域经济发展政策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另一种值得借鉴的思路。

在这套“区域经济学丛书”中,《区域经济学原理》着重对区域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和基本观点进行阐述,而对这些基本观点的具体论证和详细分析则是在相应的支撑性研究专著中展开的。这些支撑性著作也不是割裂的,而是递进和相互论证的。《区域经济发展动力与动力机制》是在《区位的经济学分析》揭示了经济区域形成机理的基础上展开的;如果说《区域经济发展动力与动力机制》体现了单区域的经济发展规律,那么《中国区域经济不平衡与协调发展》则是多区域经济发展所呈现的一种经济形态;《区域主体与空间经济自组织》又为区域经济发展与不平衡发展问题提供了微观基础;由于区域主体的完全市场行为在一定条件下会出现空间失灵,宏观上需要一种区域协调机制来加以解决,《区域协调组织与区域治理》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这套“区域经济学丛书”在逻辑上环环相扣,层层递进,共同构成了一个区域经济学的分析体系。

《区域经济学原理》及相关支撑性研究著作的完成,整个研究历程近十年,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和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给予了大力支持,在此表示感谢。

南开大学城市与区域经济研究所的刘秉镰教授、江曼琦教授、吴浙副教授、黄楠副教授、李玉峰副教授等对本套“区域经济学丛书”都提出了积极建议和支持,在此表示感谢。特别感谢南开大学“985 工程”区域经济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给予的支持和资助。

2007 年 5 月,南开大学组织召开了《区域经济学原理》研讨会,会议邀请了国内部分著名的区域经济学专家和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陈栋生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陈秀山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魏后凯研究员、河南大学李小建教授、南开大学蔡孝箴教授和郭鸿懋教授、兰州大学高新才教授、清华大学殷存毅教授、华中科技大学马彦琳教授等参加了研讨会,并对书稿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评价,这对书稿的进一步完善至关重要。

南开大学城市与区域经济研究所 1997 级以来的博士生倪鹏飞、刘学成、张屹东、高炽海、金相郁、舒东、王恩东、王家庭、李文斌、姜国杰、韩铁林、白玫、姜巍、蒋荣健、殷存毅、张帆、张凤和、王安栋、孙雷、吕昌源、高进田、孙兵、赵金涛、高雪莲、马白玉、邹治平、张洁、孟明、黄凌翔、王建廷、王志锋、杨树海、纪益员、胡军、路永忠、刘宏、潘文达、刘惠敏、郑立波、李兰冰、尹玉梅、金丽国、刘勇、刘维林、林泉、左惠、曹允春、蒋笑梅、李占通、王淑莉、张合林、张坤、徐志强、肖绮芳、张鹏、芦岩、李

金辉、过晓颖、张换兆、孙强、许建生等和博士后靖学青、马彦琳、施琳、张勇、邢海峰等对本书的框架形成与写作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如果说这套以《区域经济学原理》为核心的“区域经济学丛书”取得了一些成绩，得到了很多专家的肯定，那么这个成绩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很多学界同仁、我的同事、学生都为此付出了辛勤劳动。

感谢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的何元龙先生和责任编辑李娜、钱敏、麻俊生、林芸、王炜和谷雨，正是他们的辛勤劳动才保证了本丛书快速面世。由于该套“区域经济学丛书”所构建的理论框架和研究内容有一定深度和难度，并具有尝试性，从一定意义上讲，它也仅是一个阶段性成果，还有待在教学和实践中接受进一步检验。虽然我们尽了最大努力，但由于水平和能力所限，难免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不足，甚至是错误，我们对所有可能出现的问题负责，希望读者和学界同仁斧正。我们也希望本套丛书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吸引更多的学者研究这一领域的问题，形成具有中国特色并与国际接轨的区域经济学研究体系和理论成果。

尤其要感谢的是，在区域经济学界德高望重的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陆大道教授，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陈栋生研究员，中国区域科学协会会长、北京大学的杨开忠教授和中国城市经济学会顾问、南开大学的蔡孝箴教授为本套“区域经济学丛书”撰写了书序，并在书稿的完成过程中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这是对我们的极大鼓舞和鞭策，我们将不负众望，在此研究的基础上不断深化和完善，为我国区域经济理论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郝寿义

2007 年 8 月于南开园